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中央编译局文库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贾高建

副 主 任：魏海生　柴方国　季正聚　崔友平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　雷　牟建君　杨雪冬　沈红文　张凤宝

陈家刚　胡长栓　郗卫东　葛海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25卷

主　编 王学东
副主编 戴隆斌(常务) 童建挺

第二国际第八次(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文献(2)

本卷主编 童建挺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顾锦屏　高　放　张中云　胡文建

宋洪训　沈志华　洪肇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学东

副 主 编：戴隆斌（常务）　童建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瑾　吕瑞林　邢艳琦　许宝友　张文成　张文红

陈新明　林德山　胡振良　姚　颖　晏　荣　崔海智

彭萍萍　薛晓源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

刘　波　魏　力　梁志斐　何妙生　曹青林　孙建社　吴琦生　文晓明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盛菊艳　苗永姝　贾宇琰

总 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宗旨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当时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于 1847 年 6 月创建了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亲自拟定并于 1848 年 2 月公开发表了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来，历经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西方推进到东方、从欧洲扩展到全球，终于突破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取得了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胜利。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进军、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的重大成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20 世纪末，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挫折。但是，历史并没有因此而终结。由《共产党宣言》奠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在曲折中前进。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工人党仍在不断探索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道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继续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完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六十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文献档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这些文献档案，对于我们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各个时期的特点，科学地研究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丰富且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载体，其文献档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早在1984年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就发起编辑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当时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共同组建了编辑委员会。编委会商定：这套文献主要收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包括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收编材料力求齐全；凡外国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根据外国版本翻译；凡文件散见于外国不同出版物者，尽力搜集完整，组织力量统一编译；文件完全按照原件翻译，译文力求准确，不作修改删节，以便读者根据完整、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了解这些国际组织的历史。在当时代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资助下，经过编辑委员会、编译工作者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这套文献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截至1997年共出版了21卷。

到上世纪末，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遇到了巨大困难。首先是编委会发生了重大变故，主编林基洲、副主编王颖和校纪英相继谢世；其次是出版经费难以为继。为继续出版这套文集，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多方努力，组成以会长顾锦屏为主编的新编委会，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争取到一笔资助，于1999—2001年又出版了两卷。此后，

因缺乏经费，编辑出版工作完全陷于停顿。

2010 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的鼎力支持下，中央编译出版社以这套文献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中共中央编译局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基础上，给予了相应的资金支持，组建了新编委会，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文献整理和编辑工作，并将这套文献纳入“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规划。

经新编委会研究决定，这套文献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在其前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出版。通过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和适当改变编辑方式，新《文献》的资料更详尽、收文更齐全。例如，在原《文献》的某些卷次中，对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只列目录，不收正文，而新《文献》则全部依据最新的中译本收录，以方便读者查阅。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扩大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和选材范围，采用开放式结构，规模暂定 60 卷，约 2500 万字。

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对这套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这套文献的立项和出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文献的前两任编委会和编译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这套文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这套文献的重新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编辑委员会

2011 年 12 月 20 日

编辑说明

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丹麦哥本哈根音乐会宫举行。参加大会的有23个国家的896名代表。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

大会列有八项议程，主要讨论了仲裁与裁军、工会运动的统一、合作社与党的关系问题。在帝国主义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大会着重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通过的有关决议重申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基本精神，要求通过国际仲裁法庭和国际会议，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实现普遍裁军，并责成国际局在出现战争危险时，立即采取必要步骤，促使有关国家的工人党彼此协商、一致行动以防止战争。关于工会运动的统一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各国工会运动要互相支援，每个国家的工会运动都应该在组织上保持统一。关于合作社的问题，大会公布了比利时、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茹尔·盖得代表法国社会党少数派以及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的四个决议案。最后在列宁和其他左派的坚持下，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强调指出，合作社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它仍然是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它的主要使命是协助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决议要求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合作社运动，在合作社内部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进行活动，并加强工会、合作社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

本卷收录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1）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续）；（2）附录，包括《美国社会党全国书记向1910年5月

15 日全国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社会主义的宣传》、《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建立等三个报告》。两个部分的内容均译自 1982 年瑞士日内瓦明科夫出版社出版的乔治·豪普特主编的《第二国际史料》第 20 和 21 卷（Géorge Haupt, Histoire de la II^{e} Internationale, Tome19/20/21, Minkoff Reprint, Genève, 1981/1982）收录的法文、英文和德文文献。

本卷主编依据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标准统一了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报刊名等专用名，增加了对原书中一些名词和引语的注释。书中文献的脚注，凡未加说明的都是原文本编者所注；中文本译者或编者所加的注，均注明“——译者注”或“——编者注”。

目 录

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续） ……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哥本哈根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0 年 8 月 28 日—9 月 3 日）提交的报告 …… 3
俄国社会革命党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 95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1907—1909 年活动的报告 …… 110
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 117
挪威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报告 …… 148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向 1910 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 164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 188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 1907—1910 年间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形势和发生事件的报告 … 201
荷兰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报告 …… 224
比利时工人党的报告 …… 228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 235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报告 …… 240
1907—1910 年间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 …… 249

波兰人的社会主义组织向1910年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提交的
报告 …… 262
波兰社会党（PPS）的报告 …… 276
俄属波兰工会委员会关于俄属波兰工会运动的
报告（1905—1907） …… 287
亚美尼亚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楚纯）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
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 297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向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
提交的报告 …… 316
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报告（1907—1910年） …… 324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
报告 …… 329
美国社会党向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
报告 …… 340
“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向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提交的报告 …… 354
日本社会党的报告 …… 363
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向哥本哈根国际
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 …… 367
俄国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斯图加特大会以来的活动的报告
——提交1910年9月举行的国际社会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 403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联盟（“锡安工人”）致尊敬的社会党
国际局和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 411
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土耳其的形势 …… 415
土耳其欧洲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 …… 419

附 录 …… 427
美国社会党全国书记向1910年5月15日全国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 429
社会主义的宣传
——在1910年5月15日召开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 459
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致国际 …… 480

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向大会
提交的报告（续）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哥本哈根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0年8月28日—9月3日）提交的报告

序 言

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未能向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提交报告。因此，本报告涵盖从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算起的6年时间。这个时期爆发了伟大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社会民主工党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党在这个时期或多或少完整的历史等同于俄国的革命史。

但是我们没有应有的地位，也没有应该拥有的向读者提供一份良好报告的条件，因此无完成撰写这样的历史的任务。在得逞的反革命的阻挠下，我们至今无法拥有一份俄文的关于这个阶段的社会运动总史，特别是各个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这股反动势力阻止我们对不同地区的运动形势进行调查，窃取有关组织的档案，迫使我们只能以发表在一些专刊上不完整的材料为基础，撰写近5年来俄国无产阶级开展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事件。这些刊物是秘密发行的，无法全面记录工人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件。撰写俄国工党和我们政党运动的历史将是我们未来的事业。

这份向社会党人的国际提交的报告摘要是我们运动的综述，旨在让各位知道俄国无产者像他们欧洲和美洲的兄长一样，无论在革命风暴中还是在反动势力嚣张之时，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地高举自己的旗帜。

国际无产者对俄国无产者的关注和给予的支持，证明了俄国无产者争取自由斗争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俄国无产者是全世界无产者理想的化身和代表，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奋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于1910年6月

一、1904年8月—1905年5月

出席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在库罗帕特金失守辽阳[①]、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王子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之际离开了代表大会。这个任命在犹豫了六周后，才被最终确定下来，于普列韦[②]被炸死后下达。王子试图开辟一个新时代，以取得人民对沙皇政府的信任。

“新时代”是按照专制政权的意愿炮制出来的，旨在至少在军事、财政和道义上失败之后能够寻求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恰巧又成为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发动的起点。这两股势力在战争初期迅速扩展，导致新旧俄国的武装冲突。专制政权培养出来的老式斗争干部全部站到上层资产阶级一边，只有无产阶级一家站出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与其进行斗争，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王子的讲话面对着的正是这些人。他们属于地方自治机构中的自由派，能够率先表态支持政府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在地方自治机构、市镇在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在宴会上

① 在日俄战争中，俄军于1904年9月3日从辽阳撤退。——编者注

② 普列韦（1846—1904），时任沙皇内务大臣，1904年7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编者注

的讲话中，并最终在11月6日[①]召开的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②]上得以概括。它足以表明其反民主和反革命的性质，表明俄国统治阶层期待的和解倾向的胜利。这同时又是个自由开放的政策，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释放了短暂的善意。

俄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完全由急于以人民的名义与日渐式微的沙皇政权和解的自由派反对党和反革命势力占据的时期。自由派反对党坚持保皇与调和，拒绝革命的解决方案，否认俄国存在“革命人民”，在道义上鼓励和加强了政府的地位。根据1904年12月12日的法令，政府拒绝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它取缔刊物，禁止举办宴会，发出了加强与日益增长的“反叛”势力进行斗争的号召，以此告诫人们战争[③]的失利和反对革命的自由派势力的增长都不足以粉碎专制政权。

发言权属于人民群众。革命将裁决专制政权与妥协的自由派之间的冲突。

1905年5月前的工人运动

1904年12月12日的法令是对地方自治机构代表大会呼吁修改宪法的回应，它确认了专制政府的全部权力。12月13日，巴库爆发持续22天的大罢工。3个星期后，作为对自由派所说的俄国不存在“革命人民”的回应，圣彼得堡数千名工人被枪杀；1月9日—22日，俄国无产者向冬宫挺进，吹响了大起义的号角。

1904年的秋冬，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派举行的宴会上举行示威之后，开始了意义更加重大的动员无产者和革命者的工作。工人阶级成为这场运

---

① 本文所用日期均为俄国旧历。——编者注

② 即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活动家代表大会。——编者注

③ 指日俄战争。——编者注

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者预言无产阶级将是俄国革命的主导力量的理论得到确认，并进一步明晰。工人阶级将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首先，运动的地域与整个帝国的无产阶级居住区一致。由于帝国边疆无产阶级人口众多，那里的运动持续时间长并且频繁。由于铁路沿线职工容易受到工业中心革命的影响，运动继续发展的方向与火车线路具有一定的联系。革命运动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和西部各省最为激烈。这些地区的大罢工出现了街头示威、修筑路障以及同警察的暴力冲突。1 月期间，华沙、罗兹 、栋布罗瓦和拉多姆省的对峙一触即发。

同样性质的运动在里加的激烈程度稍有逊色。在大批被枪杀的牺牲者下葬的那天，里加当局默许示威活动，参加抗议的工人达到三四万。运动迅速扩展至雷瓦尔、利耶帕亚、叶尔加瓦和其他城市。维尔诺的总罢工吹响了东部省城一系列罢工的冲锋号。梯弗里斯的罢工不仅有工人参加，并且很快汇集了高加索的全体农民。

俄国中部地区的运动虽然没有如此强烈，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罢工拓展至莫斯科和俄国中部的主要城市赫尔松、萨拉托夫。

无产阶级总罢工首次采用停开火车的做法。1 月和 2 月，维斯瓦河、梁赞—乌拉尔铁路段爆发罢工；随后，基辅、莫斯科—布良斯科、萨马拉—乌法、里加—奥勒尔、莫斯科—梁赞等铁路段爆发罢工。几个月后，这个方法成为无产阶级手中掌握的强有力的武器。

铁路罢工取得成功不仅需要车间工人参加，也需要保证火车准点的铁路员工的支持，这是确保 1—3 月罢工成功的第二个特点。初期扩展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罢工，由于无产者阶层的加入而更加全面、深入。无法一一列举罢工波及的地区和参加罢工人员的职业。估计有 150 个地区的 100 万人参加了罢工。

我们同时获悉参加罢工的还有商业职员、裁缝、理发师、磨粉厂工人、锯木厂工人、印染厂工人、制灯厂工人、屠宰场工人、管道工、船

运工、运输工、装卸工，厨师、咖啡馆服务员、家庭佣人和送水工等等。罢工波及整个俄国和所有行业人员。1 月 9 日—22 日期间罢工成为一种全面抗议的形式。下面是一位俄国知情者对这种斗争形式的描述：

“罢工反映了俄国的不同社会结构、不同阶层的政治意识和地方特点。罢工囊括多种形式的抗议，其中有经验老到的工业无产者讲究方式方法的斗争，有农业无产者的自发斗争，有刚刚觉悟的士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和银行职员的反抗，甚至有聚集在警察局昏暗污秽的办公室中警员的含蓄粗野的抱怨。”

这是对罢工涉及阶层和人员的极为恰当的描述。

罢工的普及标志着这场运动的一致性。这同时也是无产者的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普及性和一致性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无疑击碎了只有“单一民族”不断革命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说法。1—3 月的事件表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围绕劳工和资本的斗争分裂后完成的。

这场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就无产阶级基础来说是单一的，但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特点，因此导致以下结果的出现：

1. 在这场罢工中，无法将同时出现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分开；

2. 所有的经济冲突都具有政治特点，所有的政治冲突都具有经济特点。

1905 年春天的革命运动表明，没有出现一个反对**俄国旧政权**的具有同一个使命的资产阶级，而是出现一个相互抵触的资产阶级社会。这场运动还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一个正在制造引爆半封建沙皇政权炸药的实验室。

劳资斗争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超越了 19 世纪欧洲的革命，考茨基称这场革命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这种局面使俄国革命异常复杂并加速其演变进程。

无产者作为阶级发挥的作用与俄国革命的特点紧密相关。我们看到，在 1905 年 1 月的革命中他们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在随后的运动中，

他们继续发挥着引领航向的**主导**作用。通过他们的斗争，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不仅是俄国革命的倡导者，而且唤醒了社会其他阶级的觉悟并决定着斗争形式（罢工、工人代表委员会、起义）——直率地说所有阶段的革命都与无产者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所有人民群众的集体运动融入到无产者的运动中都能达到高潮。无产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在以后的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清晰。我们在1905年的春天已经察觉到无产阶级运动与农民土地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高等院校学生的全面罢课是无产阶级运动影响的直接结果。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推动下，全社会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加强了民主要求并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

在1月9日—22日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资本主义初期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互依赖的任何蛛丝马迹；但在年后的几个月中这个特点开始展现。我们收集到的很多资本家撰写的报告、陈情表和讲话稿都努力表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否则没有其他途径使工人阶级恢复平静。

下面是一份研究伟大的资产阶级运动的材料："资本家认为政府试图通过借助经济让步阻挠工人运动会剥夺整个经济基础，政治机制的缺陷是导致工人运动的唯一动因。"圣彼得堡作坊主和企业主撰写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写道："所有的一切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向工人作出的任何让步，包括修改现有的劳工法律条款都无法平息工人阶级造成的混乱。平息或至少减缓这场剧烈动乱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改变**国家现状**的深入的**政治**改革。"

资产阶级在工人施加压力的阶段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

与这场革命的总体特点和无产阶级斗争扮演的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规模地介入这场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工党与工人阶级一起通过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使自己的力量得到确认。反动势力摧毁这个时期我们建立起来

的组织架构需要假以时日。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和小组在整个俄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小组之间和小组与中央组织机构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被禁止的非法活动异常活跃。他们向群众散发了成千上万份宣言式的宣传材料。这些宣传品已经无法满足新的要求，人们越来越需要社会民主自由的声音。

在这个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工党不再满足于扮演教育者和政治事件解说者的角色。在采取政治行动的气氛中，我们党开始引领革命运动并被工人阶级认为是最有威信的民众运动的组织者。

那些日子的活动记录显示，总罢工的开始和结束全部都由当地社会民主工党决定。尽管警察层层阻挠和设置路障，在党的不懈努力下，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1905年春天的运动中还是接受了我们的目标与口号。舆论普遍认为我们是俄国工人阶级的合法代表。

社会民主工党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事例很多，我们仅举其中的第一个典型事例。这一事件发生在圣彼得堡并成为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标杆。这里指的是施德洛夫斯基议员领导的名声昭著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1月9日—22日事件的压力下成立的，任务是负责调查圣彼得堡工人不满的原因和寻求未来解决危机的出路。

委员会的成员除政府官员和企业主外，还包括工人阶级代表。工人们无视议员制订的选举代表的规定，在作坊和工厂以普选方式选举出自己的代表。绝大部分当选的代表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他们在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和采取的策略直接受到社会民主工党政治行动的影响。工人代表提出了下列参加委员会的条件：工人集会自由，在委员会言论自由，公开会议内容，不得侵犯人身和住宅，在委员会拥有审议权而非协商权。由于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工人代表拒绝参加委员会并向选举他们的工人发出罢工的号召。

在罢工号召中，他们提出以下要求：继续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

斗争，派人视察工作，工人保险，立即停止战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拥有罢工权利和信仰自由。

号召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们圣彼得堡无产阶级代表，坚信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和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是将政治权力交到工人阶级手中。我们坚信挽救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人民中间……以选民的名义，我们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的基础上选举会议代表。只有在这样产生的会议中，工人阶级才能拥有武装自己的全部政治权利，才能进行将自己从全面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斗争。”

这些豪言壮语表明了1905年春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觉悟的程度，表明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思想的影响力以及全体工人阶级或多或少觉悟的朝向。

参加这场运动的广大无产阶级队伍的人数至今尚无确切数据。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与政府和资本家展开了维护自身重要权益的斗争，最终提出建立立宪会议的要求，引发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1905年初夏的运动规模不大，五一活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不管怎样，许多城市（圣彼得堡、莫斯科、顿河畔罗斯托夫、萨马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沃罗涅日、基辅、萨拉托夫、巴库、特维尔等）“五一”还是举行了罢工和集会。雷瓦尔、利耶帕亚、叶尔加瓦、科斯特罗马、乌法、叶卡捷琳堡、巴图姆、弗拉基高加索、莫吉廖夫、明斯克、喀山、洛扎、卡里什等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华沙的五一游行引发了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流血冲突。根据官方统计，示威者中死伤人数约为150人。

然而，这场运动在尚未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出现危机。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剧，以至于革命力量期盼降临一个将其引爆的合适

时机：1905 年 5 月 14 日对马海战失败引起的动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机会：

斗争更为激烈。发生了与现政权的武装冲突。武装夺取政权的想法呼之欲出。

革命者组织起来。用革命推翻《布里根诏书》[①] 计划成立的杜马。用革命推翻旧政权。用革命尝试建立一个新政权。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中，革命者找到创建自己政权的独特形式。

那个时期，所有党派都在利用出现的这个机会，制定未来的行动计划：5 月和 6 月初是各个政党举行大会和报告会以及各个政治派别思考和考虑介入政治的时期。所有会议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话题。5 月，自由党代表大会选出一个代表团，并派遣它说服尼古拉二世向革命势力让步：具有民主组织特点的自由职业者协会喊出至今只有无产者认可的成立立宪会议的口号。同时，社会民主工党在代表大会日程中加入了讨论武装起义和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议题。

党内生活与 1905 年 5 月的代表大会

（一）党的壮大

在我们报告所描述的这个阶段中，党内生活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影响和活动能力在加强，有意愿接受党的领导，或为更加强大的工人阶级；二是党内不同意见和冲突在加剧。

1904 年提交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报告显示我们党有 39 个委员会

---

①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 1905 年 3 月 3 日颁布，主要内容是准许成立咨政团，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农地的费用。——编者注

和11个小组，并指出：

“无法列举所有地方组织自己展开的零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如果这样的话，俄国全部省城和市镇都将被点名，更不用提农村，因为那里到处都能听到从首都返回家乡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话语，那里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作品。”

这些描述在1905年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期间多次被重复提及。

而且，在这一时期，每个工业中心和农村没有不定期组织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机构。组织内部的特点和活动方式同时开始转变。组织更加民主化。党的活动越来越朝着群众运动方向发展。以广泛鼓动为目标的大型集会取代了小型宣传活动，并仗着人多势众的“力量法权”藐视践踏法律。撰写呼应重大事件文章的期刊取代了稀稀拉拉的宣言。非法报刊数量和影响的增加，实实在在地表明党的力量的发展壮大。

除了设置在国外的印刷厂外，我们党在俄国有上百个秘密印刷厂，印制我们的宣言、报纸和小册子。据不确切数据显示，仅1904年一年，地方和中央组织印刷的关于反对战争的宣传材料达到205种，发行量达到120万份。

中央委员会向1905年5月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表明，1904年4月至1905年5月期间，党在整个俄国发行的由地下和国外印刷厂印制的文学作品达300种。

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印刷厂里用俄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印制了69种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刊物和宣言。要使大家全面了解党在宣传和开展活动中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还需要补充无数地方组织付出巨大努力的数据以及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的《火星报》、《前进报》发表的大量宣传材料。

除上述报刊外，1904年底国外还发行了一份广受欢迎的报纸《社

会民主党人报》，各个地方组织也开始尝试发行自己的机关刊物：莫斯科委员会发行了《劳动呼声报》，高加索联盟用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发行了《无产者斗争与社会民主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发行了名为《铁钉》的刊物，其发行范围扩展至切尔尼戈夫、波多尔、沃伦政府治下的农民，基辅发行了供当地农民阅读的乌克兰语的《真理》杂志。

我们观察到党的委员会不管规模大小都发行了自己的刊物。

党员人数增加了。活动日益频繁。党可以说全方位地领导了运动。党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党将自己的活动方法传给农民、陆军和海军。为此，党专门建立了与无产者组织保持密切关系的组织结构，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党创造了一种专门的文学作品，印刷发行了诸多宣传手册和宣言。党的刊物也广泛宣传这些特别的组织和活动。同时，社会民主工党对高等院校学生的影响也明显加强。

在1月事件和紧随其后的事件的鼓动下，党越来越关注立即进行斗争的问题。武器、使用武器和运输武器的问题提上党的议事日程。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成立了负责提供武器、保护武器、学习掌握各式武器的特别小组。然而，不管党作出多大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总是无法满足现实的要求。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对党有不少抱怨。

最后，社会民主工党在1905年春天的革命中成功地组织了首批行业协会。

除党内的意见分歧外，俄国各民族的组织各自为政也是阻碍社会民主党政治影响扩大的一个障碍。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如何与这些组织团结协作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革命派全面开展活动的形势下，在社会民主工党和资产阶级政党集中力量采取行动之际，这个局面无法持续下去了。我们党的地方组织经常与其他民族的组织发生关系。1905年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致工人的呼吁书”。

过去曾有过一次共同行动的尝试：在芬兰积极抵抗党的倡议下，召开过一次全体革命者及反对派的统一行动会议（1904 年秋）。除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外，邀请出席大会的有：社会革命党、后来成为立宪民主党核心的解放社，波兰全国联盟，波兰社会党和其他一些规模不大的组织（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的组织）。这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建议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派、乌克兰革命党、即将加入乌克兰革命党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的会议。会议对此仍然作出否决的回应。

（二）党的策略问题和内部分歧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会

1. 大会和全会前夕

党内争论始于 1903 年 8 月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分歧的重点是组织工作，争论一直持续至 1904 年革命觉醒之际。那个时期，策略问题高于组织问题。刚刚觉醒的自由派在那个被称为的“信任时期”（政府对社会人士“信任”的时期——1904 年年底）[①] 提出了我们党与自由派力量对比的问题。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什么作用并以什么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在 1 月事件后被更加普遍地问及。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政府的问题成为各种不同策略斗争的战场。这场争论源于群众

① “信任”时期的到来是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 1904 年秋宣布的。为了应付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当时作了一些次要的让步，如略微放宽书报检查的尺度，实行局部的大赦，允许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等等，指望以此欺骗人民并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到自己方面来。——编者注

公开反对沙皇主义之时。在我们提出的口号受到挫败后，这些争论仍在继续；每当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出现转折时，这些争论总会再现。

这些不断的争论说明我们提出的某些口号失灵，证明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革命力求保持本阶级政治是导致争论的根源。在每个特定的时期，由此引起的争论又总能将分歧导向一个共同点。1905 年春天围绕策略的争论在革命文学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另外，我们还看到一种将资产阶级革命推进到底的企图。根据这个想法，革命将在联合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力量的支持下实现。这场革命将导致这股联合力量组成革命民主专政。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是这种思想的逻辑结果，这种逻辑旨在依靠事实上农民革命的形势对抗地方及市镇议会自由派的反革命和调解的态度，在整个革命阶段自由派始终未放弃过君主制的想法。

另一种思想主张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站在第一线，充当革命的主要发动机。无产阶级发挥极左派的角色，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和加速总体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应注意不要过分威胁资产阶级，以免将其推入反动势力的怀抱。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削弱了阶级斗争力度，夸大了资产阶级力量。

在组织方面，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各派的中庸派，他们倾向于将政党与阶级混为一谈；另外一派主张建立一个性质明确、权力集中的代表工人先锋队的组织。他们认为唯此才能为阶级政治提供最坚实的保证。

两个策略不同的派别是这样各自聚集在一起的：一派围绕新《火星报》，另一派围绕 1904 年发行的《前进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引起两派的激烈争论。党的中央机构决定推迟召开大会，然而这导致许多地方组织举行会议提议要求召开大会。他们组成一个名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小组，负责大会召开事宜。中央委员会最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同意召开大会。

然而，许多地方组织派遣的代表在抵达国外召开会议的场所后并没

有出席大会，而是在新《火星报》的领导下，在上述大会召开期间召集了“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

拥有法定出席大会权利并拥有大会表决权的31个地方组织中，实际出席大会的只有21个（不包括中央委员会）。另外5个拥有发言权的组织出席了大会。其余9个组织的代表与《火星报》新编委会，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参与地方委员会活动的团体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两个大会于1905年4月底同时举行。

2. 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会——我们以会议采用的名称称呼——在革命最关键的前夕基本确定了党的理论和学说。会上热烈讨论了这场革命中最重要的及其相关的全部问题。

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武装起义、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和对农民的策略、党与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关系、对社会革命党和自由党的态度、党的新行动形式和加强行动措施等问题。当然，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特别是党内两派的关系也成为会议关注的重点。

大会和全会设立了各自的执行机构。大会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全会成立了组织委员会。大会机关报为《无产者报》，全会机关报为《火星报》。

两个会议闭幕后，双方执行机构立即着手就党内团结问题开展谈判。谈判尚未结束，发生的革命事件迫使他们接近，首先是在联邦委员会的基础上双方地方团体开始靠近，随后为促使召开一届统一的大会，双方进一步靠拢。

中央委员会发表了长达400页的大会记录。全会仅仅发表了一些会议决议。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仅列举两次会议最重要的决议，用心的读者借

此足以准确地了解每个派别对无产阶级形势和政治的看法。

3. 土地纲领和农民运动

议程问题引起大会和全会的关注是因为其中涉及土地问题（土地纲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已获通过）。当时的土地运动和民主运动要求将扩大土地纲领一事列入议事日程。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要求“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①]。

尽管党对这个要求没有设置明确的边界，仅是表明党对农民的支持，但面对这场革命风暴，仅此表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产生误解。为此，大会和全会决定关注这个问题，焦点是：“在土地斗争中向农民提供支持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这场斗争最合适的形式？”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注到农民运动的无组织性和存在着反动的经济分子，但承认农民运动事实上具有重要的革命性，要求党的全体组织针对以下问题采取措施：

（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

（二）提出必须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的实际口号，作为使农民运动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手段，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实行有利于农民的一切革命民主改革，使农民摆脱警察官僚和地主的压迫；

（三）号召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举行各种各样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体拒绝交纳赋税，拒绝服兵役，不执行政府及其走狗的决定和命令，以便瓦解专制制度并支持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攻击；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

---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430页。——编者注

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①

全会同样关注这些问题。全会支持农民革命运动，甚至要求他们剥夺地主的土地。全会还考虑筹建农民委员会。但全会认为农民运动的组织形式是向制宪大会提出要求。

两派修改土地纲领的意见在随后召开的1906年代表大会议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次代表大会制订了新的土地纲领。

4. 无产者在革命中的作用和目标。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总规定

这个问题涉及党的直接行动，是媒体最热衷的问题。两个会议的系列决议对此提供了解决方案。决议的目标：

"1. 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参加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的选举）——根据全会的表述；

2. 举行武装起义和完全战胜沙皇制度的条件。"

这些目标导致了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大会主张采取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原则，前提条件是实现货真价实的民主变革。全会提出的主张不切实际，要求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反对无产者和农民联合实施专政的策略。部分全会的与会者认为大会提出的策略可能"逼迫资产阶级准备革命，削弱资产阶级的重要性"。

在"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决议中，大会注意到沙皇政府的企图——它在那个时期的惯用手法：一方面，在加强镇压运动的同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2—155页。——编者注

时，组织由充满盲目的种族仇恨的反动分子参加的“黑帮队”；一方面，通过让步和许诺改革来磨灭工人阶级的斗志，试图用描绘的立宪改革蓝图[①]平息全面动乱。

为此，大会通过了如下述决议。大会建议：

（一）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嘴脸，在宣传和行动中指出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被迫的和虚伪的，另一方面强调专制政权无法为无产者提供满意的改革方案；

（二）利用竞选活动，向工人们揭示政府采取措施的真实目的，指出无产者必须通过革命途径才能实现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目标；

（三）组织无产者立即提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将其他劳工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四）组织对政府领导的“黑帮队”和其他反动分子入侵的武装反抗。

在确定必须通过斗争实现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武装打击反动分子的目标后，大会决议提出将武装起义作为争取立宪会议的主要手段。但是决议没有涉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手段。大会指出无产者在争取制宪的斗争和起义中的政治作用，以保证为社会主义斗争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决议特别强调这种新旧俄国殊死搏斗的形势。鉴于决议的重要性，我们下面全文引用：

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鉴于：

（一）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二）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

---

① 大会召开期间，布里根委员会出台了一个“布里根杜马”草案，10月事件将其清扫出门。这个草案是一个死产儿。

（三）无产阶级必然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这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四）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五）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①

最后，考虑到为争取召开立宪会议进行斗争的条件，大会通过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一）无论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二）在人民的武装起义取得彻底胜利，也就是推翻了专制制度以后，势必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充分的鼓动自由，并且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最高意志的立宪会议；

（三）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13—114页。——编者注

在一定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①

大会决议的结尾指出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宣传革命前进的可能性和制定宪法的思想，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向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立即实现我们纲领中提出的最低经济和政治要求。

在对待临时政府的策略中，大会同意派党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并与其所有的反革命企图开展斗争，无条件地掌控无产阶级政党和保持党的独立性。除这个议题外，大会还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经常施加压力，以“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

为更好地表述上述决议的总体精神，我们引用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小册子中评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几段话：

革命的出路取决于对无产阶级作用的理解：无产阶级是简单地成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是坚决的，但政治上是软弱的）的附庸，还是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取得对沙皇政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意义何在？我们必须清楚地知晓反对沙皇的真实的社会力量以及夺取决定性胜利的把握。伟大的资产阶级不是这股力量。大地主、工厂主以及立宪民主党中的“商业”社会也不属于这股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期待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他们不可能与沙皇制度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他们双脚拴着沉重的私人财产和土地的铁球，这使得他们不愿意摧毁自己需要的沙皇制度。在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斗争中，他们需要警察、官僚和军队势力。唯一具有摧毁沙皇势力的能量的是人民群众，是无产者和农民。对沙皇制度的决定性胜利意味着无产者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其他途径。只有专政才能取得胜利，这种专政必须依靠军队、武装的人民与起义，而不是依靠什么“法律手段”及和平机构……

夺取这个胜利能行吗？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对此不抱任何乐观幻想……前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36页。——编者注

进去斗争，我们期望胜利并指明获取胜利的途径。胜利的机会毫无疑问存在着……在与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为避免被其束缚手脚，无产阶级必须强大，加强农民革命意识，领导自己的斗争，实现彻底的民主……只有无产阶级知道必须将民主斗争进行到底。只有与农民结盟才能开展这场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足够强大，资产阶级势将站在这场民主革命的前列并将赋予这场革命自私和不彻底的特点。

评论引用到此，下面是全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夺取政权与参与临时政府”的决议。

在武装起义方面，全会没有提及运动准备到何种水平，没有将武装起义置于当时革命行动的中心，只是指出行动总体方向到了接近武装起义的时机。

决议这样表述：

“只有扩大行动，才能接近起义时间；只有为起义进行的技术上的准备能够真正派上用处，起义才能听从我们的指挥。”

社会民主党所说的“扩大行动”包括以下内容：

（一）通过鼓动使群众更多地参与当前的政治事件；

（二）加强政治组织与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及政治运动的联系，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三）向群众指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时刻准备进行武装反抗和加入起义；

（四）各地不同的无产阶级组织必须建立密切联系，实现社会民主党倡议的将无序运动转变为有序的起义准备。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与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五）通过广泛的鼓动，最大可能吸引最广泛的群众参加无产阶级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斗争，确保无产阶级起义受到最广泛的“非无产者”的支持。

我们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

党内两派的观念和策略决定了他们对不同党派的态度。随着革命的深入，政治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资产阶级政党在一系列选举中进一步组织起来，面目日益清晰，我们党的态度更加具体明确。

在大会和全会期间，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同派别，党只能表明一个总体态度。这个问题在后来越来越棘手，挑起了党内的争论。大会指出自由派政治斗争的缺陷，拒绝与他们达成协议的意向，但同时承认在反对专制的共同斗争中，与社会革命党达成临时协议的可能性与益处。大会确认这个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同时，大会对该党试图混入工人阶级有所警惕，认为他们的行动将破坏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

大会仅仅同意授权中央委员会审查与社会革命党达成的临时协议，并特别强调类似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性和无产阶级策略的完整性和纯粹性”。

下面是大会关于“对待自由派的态度”和全会通过的“对待革命党和反对党的态度”的决议。

关于自由派的决议

鉴于：

（一）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革命的甚至是敌对的资产阶级开展的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

（二）因此，社会民主党应该向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致敬，同时无产阶级应该向自己的阶级说明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与不足，特别是在其有所表现的方面。

第三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向同志们强调：

（一）帮助工人识别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代表广大地主和工厂主阶层的温和自由派，最后是差别最大的立宪民主联盟和众多不同的自由职业者的小团体；

（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篡夺工人运动和为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其他团体代言的企图。

最后，在关于党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关系的问题上，大会从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原则出发，考虑到革命初期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公开团结协作和实现组织统一的紧迫性，明确反对联邦式的统一方式，并通过包含以下基本意见的决议。大会承认“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必须努力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达成一致，以协调地方行动，为全体社会民主党组织组成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创造条件”。这个愿望在随后召开的1906年代表大会上得以实现。

活动的新形式

大会和全会特别关注党与群众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和新的斗争形式问题，只有新的斗争形式才能将党从革命前夕所面临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广大工人群众投身的伟大政治斗争的公开战场，因为他们无法参加地下斗争。

1905年春天，党朝这个方向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这条新的道路还需继续坚持下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全会通过了“组织尚未巩固的工人”的决议，指出党有责任领导革命时期自发参加运动的工人组织起来，“不要顾及现存法律的禁令，支持所有建立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业协会的尝试，引导工人组织起来”。大会强调“党组织必须与行业协会建立经常性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支持”。大会最后要求“全体工人党员”

加入行业协会。

大会还通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指出注意到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专制政权作出了让步，同意给予反对派一些自由。资产阶级是首当其冲的获益者。考虑到公开活动的重要性，大会要求党内积极分子务必关注以下几点：

（一）利用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种种机会，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要求同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加以对比，借以提高无产阶级的自觉，把无产阶级在这些活动的进程中组织成强大而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①

（二）利用一切合法途径或半合法途径建立工人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组织，并且应当力求保证（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社会民主党对这些联合会的影响占优势，力求使它们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三）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党组织在保持和发展它们的秘密机关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立即着手准备社会民主党转向公开活动的适当过渡形式，即使同政府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②

决议通过之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党没有夸大革命形势带来的先机，社会民主党人在尚未完全组织起来工人的支持下，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在公众中公开地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大会和全会的讨论和决议概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种倾向，在整个革命时期他们的论战从未停止过。两派之间的正式分歧表现在同时召开大会和全会的做法，但在反对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斗争日益尖锐、需要团结一致共同作战的情况下，这场争吵得以平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斗争有扩大革命疆界的能力，并能在共同行动中消除相互间的部分分

---

① 原文如此，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41页中刊载的决议内容有出入。——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41—142页。——编者注

歧和犹豫不决的弱点。10 月和 12 月的事件宣告两派始于 1905 年春的争吵的终结，但新的分歧又开始出现。

我们将回顾一下俄国工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二、从 1905 年 5 月至 1906 年 1 月

1905 年春是俄国的内战时期。几个月前发动的革命力量在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动中越来越强大，反抗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沙皇和反动势力不仅开动了他们的镇压机器，同时竭尽全力将反动分子、城市渣滓和农村反革命战斗队组织起来。在君主主义分子撰写的纲领和宣言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和要求，更不用说在极左翼撰写的纲领和宣言中了。实际上，是革命运动率先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革命方法问题，建议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或类似的机构（革命公社），以保证真正的群众代表的组织。为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 5 月召开的代表会议提到武装起义、群众罢工等问题，这是热情高涨的革命想象力的结果，事物本身的发展使这些活动成为当时的热点和现实政治。相反，政府和解的企图事先就注定要流产。布里根政府提出的宪法（8 月 6 日）和受到广大社会群众欢迎的给予大学自治权的法案（8 月 27 日）遭到挫折。政府的让步推动了革命运动，引发了资产阶级自由派与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的分裂。自由派将 8 月 6 日的宪法视为救命稻草，认为该宪法存在着有助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可能性，试图通过支持宪法来应对革命运动风暴，这导致自由派内战期间在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与毫无作为。他们脸面丧尽地告别战场并在镇压秋季农民的反抗和 12 月无产阶级起义的过程中不得不实施背叛策略，为签署反革命条约铺平道路。

实际上，自由派与无产者的分歧在 10 月之前的事件中已经显现，

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更多的革命农民及陆军和海军舰队的进步分子觉醒并加入革命斗争。6 月黑海舰队（战舰波将金王子号）的起义和在春夏发生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的农民反抗确认了这场革命的基本力量。俄国中部和西部、波兰、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的抗议导致 6 月召开了有 22 名政府代表参加的农民大会。代表们给予新的行动方法一束耀眼的光芒，他们提出要坚决地集中革命力量，使自由派的调和策略陷于瘫痪、革命势力占据上风。10 月的日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合作，组织更加完善有力，社会民主工党与自由派的对立加剧：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派针锋相对，贵族阶层和产业工人阶级针锋相对。

10 月罢工前的工人运动

在斗争的气氛中，工人运动日益扩大，延伸至更广泛的疆域。新的无产者阶层加入进来。下面的例子表明随着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开始站到最激进的中部城市圣彼得堡、波兰和里加的行列中间。6 月和 7 月，俄国中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爆发了 5 万工人参加的持续 72 天的大罢工。俄国中部城市舒亚、奥列霍沃—祖耶夫、科斯特罗马（6 月 1 日—15 日）以罢工形式向他们提供了支持。所有罢工都具有暴力特点。

几十万工人强行举行集会和行使抗议示威的权利。

同一时期（6 月）举行的总罢工使生活全部停止。总罢工涉及所有社会活动领域——从交通和商业员工直到使报刊停止发行的排字工人，波及利耶帕亚、尼古拉耶夫、明斯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几乎整个顿河盆地的煤矿、冶炼厂、梯弗里斯、巴图姆、高加索铁路沿线、秋明、彼尔姆，当然还有波将金号战舰起义和波兰反抗引发的敖德萨政治大罢

工，这场罢工在导致街巷战后暴发了罗兹起义。

为纪念1月9日—21日罢工半周年，6月开始了一系列罢工和示威活动。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和索尔莫沃等地工人开始罢工。6月10日弗拉基高加索全线以及萨拉托夫、罗斯托夫、察里津、新罗西斯克和巴库支线开展了为期10天的大罢工。俄国另一端的里加、雷瓦尔和科夫诺也举行了罢工。这场罢工最终以摧毁比亚韦斯托克城的军事设施告终，但同时引发了波兰、西北部地区直至乌拉尔的罢工。9月，罢工工人与部队发生流血冲突，首先是莫斯科排字工人和面包作坊工人与军队的冲突，圣彼得堡旋即予以声援，两个星期后这些罢工与10月的总罢工汇集到了一起。

暴力是这个时期运动的特点。到处都是与军队的冲突和枪战，街巷战星罗棋布。根据官方统计，1905年夏天死伤人数达到几千人。同时，至少给罢工积极分子配备武器和希望掌握武器要领的呼声骤增。这个时期清楚地表明了革命阶段的主要特点。在各个社会阶层参加的坚决斗争中，无产阶级站得最高。军队和农民起义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军队和舰队的革命只能依靠从作坊和工厂走出来的工人并与无产阶级保持联系；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摧毁了以封建君主和贵族为基础的经济，削减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抵制。然而，由于政治觉悟较低和缺乏有效的行动方法，他们无力维护取得的革命成果，在反动派的进攻策略面前只能缴械投降。为此，无产阶级在集中革命力量之际，经常因他们的拖沓而与之发生摩擦，也正是打着这个烙印的农民在反对地主的无序斗争中逐渐成为革命民主大军中的一支常规力量。

这种拖沓在军营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建立军营的目的是为了留住这些无知的农民。通过革命克服农民和军营中的这种弊病异常困难，特别是在12月的日子里政府成功开动强大的武装力量镇压革命的时候。城市成为内战的主战场，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将罢工作

为俄国革命最受欢迎的特有武器和民族先锋队反抗旧政权的斗争手段。

开展夏天的这场新阶段斗争的前提是大力推广无产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的办法。罢工场所的现场会议成为协调和组织的工具。现场会议推举出代表团。代表团对代表事宜保持缄默，他们背后是孕育着革命新政权胚胎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立新政权一方面表明反对旧政权的斗争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是开展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必须考虑的问题。

集中无产阶级力量的新形式的核心是罢工委员会、代表委员会，这些机构都是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罢工委员会是罢工时期的产物。他们全部由无产者组成并以这种形式固定下来，是无产阶级活动分子的新的活动形式。这些形式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实际上是属于特殊的伟大革命活动时期，受到社会民主党的直接影响和领导，社会民主党在夏季工人运动期间战胜了所有的挑战。

要准确了解无产者在这个短暂时期的协调和组织情况，必须回顾一下运动中表现出高度同质性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和他们所依靠的20万工人的革命纪律。无产者集中起来的阶级特性使他们成为一种武器，成为政治的最高裁决者，他们不但有能力支持反对旧政权的资产阶级，而且能够给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俄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和他们高举的斗争旗帜使无产者无意也无法充当资产阶级的配角。无产阶级拥有的这种至高无上的超强能力和作用迫使资产阶级必须寻求与旧政权妥协。妥协的目的是消灭无产阶级赋予这场革命的特性。

自由派等待政府方面作出让步，期盼革命和无产阶级陷入瘫痪。

政府的让步无法阻止无产者继续进行斗争并推翻仅仅拥有咨议权的布里根杜马。面对维特同意给予杜马立法权的承诺，无产阶级问道："谁召集杜马，是旧政权还是新政权？"

10月大罢工囊括了先前革命阶段的全部特点，革命的普遍性、同

质性、进攻性、组织起来的力量、无产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决定性作用和领导能力。10月大罢工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0月大罢工汇集了革命阶段的所有力量并将其转变为一股躁动的潮流，将全部问题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此以后，人们斗争的目标不再是为了对政权施加更多的影响力，而是旨在夺取政权。10月17日—30日期间，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面对面地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一边是贵族反动派和大资本家，一边是无产阶级和各种无产者。中间分子——自由派——向反革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焚烧贵族财产拉开了斗争的序幕……

三、在公众舞台出现前夕的社会民主工党

开展全面的鼓动、日益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以及政府机制的失灵扩大了社会民主工党活动的基础，要求社会民主工党展现全部力量和能量。新成员的一再加入使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群众渴望通过社会主义刊物聆听到社会民主党组织者发出的社会主义声音的要求。党迅速地壮大。为此，党必须脱离地下色彩。在尚未夺取初步胜利之前，革命使在公共场所、工厂门口临时召开的自由地传播社会主义声音的社会民主党大会“合法化”了。这些活动的组织也同时取得进展。幕后受到社会民主工党支持的工人行动必然导致觉悟的工人团体的产生。这些觉悟了的工人非常自然地推动工厂和作坊工人与地方党的中心组织建立政治联系，他们散发社会主义宣传品，为集会提供演说者和开展集中收取会费等活动。市镇、街区小组和委员会的存在推动党组织的民主化。群众积极分子能够参与党的行动方向的决策，学会参加自己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刊物（宣言、单页传单、简报、决议、报刊）的数量不计其数。在此随便举几个数量突出的例子。1905年3月9日—5月

18 日期间，梯弗里斯委员会用格鲁吉亚语和俄语出版的刊物销量达到 9.6 万份。加入党的克里米亚联盟仅在 1905 年头 3 个月发行的宣传材料就达到 16.3 万份，高加索委员会 13.5 万份，特维尔委员会 5.4 万份，莫斯科委员会（6 月 15 日—8 月 15 日）7.8 万份。这里仅是地区委员会的发行数量。不涉及国外和中央委员会印刷发行的数量。

以下是《火星报》记录的国外发行的刊物。1905 年 6 月 1 日《火星报》报道 23 个地方组织发行刊物 18 万份。

两个星期后的 6 月 15 日，《火星报》报道 21 个组织发行刊物 17 万份。在此两个星期后的 7 月 1 日，《火星报》报道 30 个组织发行刊物 23 万份。7 月 15 日，42 个组织发行刊物 32 万份。8 月 1 日—13 日，《火星报》报道的俄国发行的刊物有 75 种；8 月 13 日—29 日有 43 种；8 月 29 日—9 月 10 日有 56 种；两个星期后有 63 种，22.5 万份。这个数字是不确切的。它没有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民族的组织发行的刊物（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崩得）。

与此同时，许多组织找到了自己出版发行刊物的办法：高加索联盟、梯弗里斯、敖德萨、莫斯科、喀山、伊尔库茨克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印刷精美的机关报，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中央委员会除在国外发行《无产者报》外，还在俄国发行《工人报》。《工人报》和中央机关报《火星报》与通俗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是相互补充的。

随着活动强度的加大，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党对农民、军队和舰队的行动给予特别的关注。

我们上面提及了这些情况。伏尔加河盆地的萨拉托夫委员会特别重视对农村的宣传工作。在该地区其他委员会的支持下，萨拉托夫委员会于 8 月举办了“东部地区工人”特别代表会议。

俄国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支部和高加索组织在农村开展的活动成绩斐然，古里亚和伊梅列季亚农民进行了公开的反抗，旧政权在这些反

抗中全部被推翻。在阿里汗诺夫率领的军队抵达之前，群众已经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组成新政权，社会民主工党一直掌控着形势。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同样也在三届杜马中该地区当选议员的数量上体现出来。

士兵与城市和农村起义群众的长期接触，摧毁了军营的长期以来的纪律，方便了在军队和舰队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使得这些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波将金号战舰的起义与加入我们党的克里米亚委员会有关系，这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我们党的正式代表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此后爆发的一系列陆军、海军士兵的反抗也说明我们党在内部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我们发行了面向士兵和水兵的宣言、册子和报纸，这是我们组织发行的刊物中重要的一部分。

同时，社会民主工党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城市和农村的行业和政治组织（联盟）中的影响也在扩大。自称与政党没有任何瓜葛的律师和大学教师组成的协会将富人网罗到俄国的立宪民主党时，其他协会按照社会民主工党的指示，开始招募处境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相似的人员——商店职工、小学教员、铁路员工，接过他们的口号并使他们的行动与党的行动协调一致。

党的影响力在大学开学之际表现得十分突出。9 月开学时，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向学生发出号召，呼吁结束始于年初的全面罢课，敞开大学校门，让学校成为秋季的集会场所。中央委员会在“致全体勤奋学生”的号召书中写道：“你们应该在大学城汇合。你们应该把教室作为揭露政府的讲坛……你们应该利用学校讲坛和高校提供的便利条件，立即与无产阶级一起开始准备武装起义，这是俄国革命的唯一出路……行动起来，不要让政府在遗憾地忆及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只记得你们举行过的罢课活动。”

许多学生接受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建议。开学伊始，学校变成了革命者共同的俱乐部，工人们成群结队地进入学校，聆听不同派别革命政党演说家的讲演。大学集会在10月大罢工中发挥巨大作用。

此时，起义问题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党必须确定自己对沙皇政府作出的让步的态度。它同意召开由地主和上层资本家代表组成的协商会议。8月，政府公布了1906年1月将召开这个会议的宣言，使其成为政治议论的中心。

党内两派出现了分裂。支持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一派表示要“抵制”协商会议，《火星报》派反对抵制运动。其中部分人建议将无产阶级的选票投给先进的自由派代表。

为制订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策略，9月召集了双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中央委员会代表（“多数派”），组织委员会代表（“少数派”），崩得代表，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与会。

会议通过了代表“多数派”意见的“抵制”决议，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党此后加入了这个决议。只有“少数派”代表拒绝加入，《火星报》在决议发表后对其展开猛烈抨击。

在10月的日子前，支持抵制的决议一直是党所有行动的基础。

这个决议受到与会组织发表的宣言的启发。在它们的思想的指导下，党的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决议草案，党的活动分子在会议和群众集会上曾经也提出过此类建议。

支持“抵制派”的行动是10月运动的先期行动。在群众眼里，在10月17—30日沙皇政府发表承认自己失败的公告之前，这些行动已经不可挽回地挫败了布里根政府设想的杜马及自由派的妥协策略。

12月起义被镇压几个月后，政府着手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事宜，对沙皇召集杜马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再次被提上桌面。10月和12月事件的结果使政府畏惧再召开一届仅有协商特点的杜马，但他们同时又不敢

完全剥夺城市和农村民主派拥有的选举权，这就是8月6日杜马的特点。

四、10月—12月期间的社会民主工党

我们不能把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工党开展的气势磅礴的运动一笔带过，因为这3个月是党开展活动的顶峰。要说明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个时期的影响范围和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唯有通过政府具体的专业调查机构对包括每座城市、每个村庄、所有阶层百姓、所有行业的工人、水手、铁路职工、邮电职工、村子里的日常雇工和哥萨克人的调查后才能进行。目前还没有为这场革命献身的无产者的确切数字。

在这场内战中，10月17—30日的宣言仅仅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和起点。它决定了俄国的命运和前途。无产阶级在其中发挥了战斗先锋队的作用，它是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以自己为核心团结了全国所有的反抗力量。无产阶级的口号、方法和策略都带有革命口号、方法和策略的色彩。除无产阶级外，敌人沙皇那里没有一支能与之匹敌的独立力量。席卷俄国半壁江山的农民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实施其政治方略的大后方。

起义的人民视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的代表。在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无产者找到了用工人委员会领导人民斗争的形式。

10月的总罢工迫使沙皇政府许诺召开立宪会议，将夺取政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对革命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初期它一直被要求政府履行承诺的呼声所掩盖。自由派千方百计将这场运动控制在宣言划定的范围内。事件发生的逻辑撕下了这块遮羞布，明确提出权力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无产阶级认为这个问题揭示了用武装斗争反对旧政权的主题。

工人代表委员会同时以代表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组织和新的革命政权胚胎的双重身份活跃在舞台上。

罢工初期，他们与工人阶级和革命一起成长。很快，他们奋起抗击沙皇政府和胆小怕事的资产阶级，成为街区工人意志的代表。工人代表委员会名义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机构，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党员。①

而且，许多地区（波兰西北部，尤其是莫斯科）由当地党的委员会或党的委员会的联合会领导着工人委员会。

工人委员会和党的策略如下：利用从沙皇政府那里争取到的半自由状态和沙皇政府的混乱无序，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势力为进行不可回避的决定性斗争做准备。工人委员会和党抓紧一切机会利用他们承诺但延缓实行的结社、新闻和言论自由，要求将人民武装成民兵，实现无产者和受压迫人民的联合，并将俄国工人委员会串联到一起。在这个大目标外，作为无产者政治行动和角色的后续行动，他们还开展了争取局部改善的经济活动和斗争。很快出现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并导致工会的大规模行动。

党在四面八方开展活动。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口号响彻每个工厂和集会会场。社会民主工党在农村创建了自己的组织。它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每天晚上各类组织都召开会议。党开始筹备战斗小组，收集武器，组织抵抗“黑帮武装”。

大城市开始发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仅圣彼得堡就有3种报刊：发挥党的机关报作用的《新生活报》和《开端报》以及通俗刊物《俄罗斯报》；莫斯科有2种发行量超过5万份的刊物。书面宣传材料由国外

① 80%因参加工人委员会被逮捕的人宣称属于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委员会首任主席与党没有任何传统联系，对党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但宣布自己是党员。

运到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的扩张前所未有。

根据俄国最著名的图书参考目录，1905 年 10 月至 1906 年 4 月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学刊物有 1600 种，发行量达到上千万份。同一参考目录显示，社会民主党刊物有 1000 种，社会革命党刊物有 400 种，自由派刊物有 200 种。《共产党宣言》同时用 6 种语言发行了 100 万册。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媒体自由取得的成果。

无产者与工人委员会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学会了社会主义语言的表达方式，威慑力越来越强。他们与其他民众阶层的联系日益巩固，为应对革命武装各派受到的攻击加强了相互间的协调。

维特伯爵组织战地法庭审判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宣布波兰实施紧急状态挑起了 11 月大罢工。这次圣彼得堡的罢工较之 10 月罢工[①]更加成功。反对判决水手死刑的罢工在士兵和海军中引起一系列反抗。

内政大臣杜尔诺沃作出取消邮电和通讯工会的决定，当即引发全俄国邮电通讯系统的罢工和其工会作出加入工人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军事委员会拟审判主持俄印边界库什卡会议一名工程师的说法差点引起铁路工人新一轮的罢工。

11 月中旬，政府察觉到继 10 月和 11 月无产者罢工导致铁路和邮电通讯瘫痪后，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军队的起义亦迫在眉睫。

在我们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策划下，11 月 15 日在前中尉施米特的指挥下黑海舰队举行起义，发出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呼声。革命者控制了所有的来往电报，切断政府和皇村[②]与圣彼得堡的联络。电报报告

---

① 在工人委员会宣布结束罢工命令的那一天，参加罢工的有 452 个工厂的 104597 人。74 个工厂的 14635 名工人于一天前恢复工作。

② 叶卡捷琳娜宫所在地。——编者注

首都工人委员会基辅7日发生新的军人起义，20日皮亚季戈尔斯克和叶卡捷琳诺达尔传来同样的消息，23日哈尔科夫、塔什干、梯弗里斯、里加、莫斯科和奥廖尔等地军人起义。工人委员会成为俄国革命的中心，他们不再信任维特宣言，但在自己的行动中依旧相信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工人委员会与农民委员会进行接洽，农民们焚烧俄国欧洲部分一半市镇的财产使其名声鹊起，赢得很高声望；工人委员会向俄国中部和东部派遣代表。工人委员会发表了对士兵宣言，积极准备“财政宣言”，呼吁民众到国家银行取款和停止支付等。

政府焦急万分，动用皇家近卫军进行反击。11月27日，政府逮捕了圣彼得堡工人委员会主席。为此，工人委员会呼吁全体无产者继续准备武装起义。政府宣布利夫兰、萨拉托夫、切尔尼戈夫、奔萨、辛比尔斯克[①]和基辅进入紧急状态，对铁路和邮电通讯系统职工罢工采取严厉措施，赋予地方当局全权，派出部队镇压起义农民，下令逮捕农民罢工和土地运动领袖。12月3日，政府逮捕了全部工人委员会委员。

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政府已经宣布取缔圣彼得堡的8种报刊，其中3种是曾经发表过“财政抵制”宣言（要求民众前往国家银行取钱和停止支付等）的社会民主工党报刊。

党的中央委员会虽然与工人委员会和农民联合会一起签署了宣言，但深知宣言只能是一个“消极抵抗”的武器：是对反动派强迫发动战争的还击行为。[②] 因此，在工人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党的代表提议举行一次政治罢工。然而由于工人委员会委员被捕入狱，会议中断，未能形成决议。两天后莫斯科工人委员会在他们的决议中接过了这个口号：宣布12月7日中午举行政治大罢工并力求将罢工变为武

① 即乌里扬诺夫斯克。——编者注

② 这种直接的行动使12月国家银行库存收入减少400万卢布。

装起义。

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委员会和29条铁路工人的代表在会上表决通过了支持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工人代表委员会发表“致全国人民”呼吁书，概括当前形势，号召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立宪会议的召开。崩得和社会革命党联署了呼吁书。

为更好地了解1905年年底最后3个月罢工的巨大规模，下面发表商业和工业部的官方统计数据。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数据，只涉及产品提交人工检查的工业部门。铁路、煤矿、海军兵工厂、军工车间、财政部的后勤服务职工、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罢工等均不包含在内。政府部门承认统计数据低于实际数字。

因此，浏览下列数据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罢工一览

	10月	11月	12月
罢工次数	2846	1342	2266
罢工工人人数	518752	325534	43314

只需看一下在此之前的10年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176次、罢工人数43125名的统计就足以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

12月政治罢工的数据表明党发出的号召得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广泛响应。有40个城市参加罢工，除圣彼得堡外全部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导致圣彼得堡缺席罢工的是自由派而非无产者。圣彼得堡的缺席使莫斯科在起义期间被决定莫斯科命运的沙皇卫队占领。

10月罢工的胜利有其自身价值。11月罢工具有展现民众英勇气概的特点。12月罢工是起义前的演练并与起义融为一体。当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组织宣布12月起义时，边疆地区的起义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俄国中心和中部地区融入了12月的罢工。同时，在莫斯科、顿河盆地、

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从满洲里返回的部队都与当地工人委员会、铁路工人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建立了联系。除工人集居的村落外，起义工人还控制一系列城市（新罗西斯克、尼古拉耶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波罗的海地区和整个西高加索等诸多城市）。

此时我们无法恰如其分地对12月起义的意义作出评价并得出结论。我们只能观察到俄国无产者在与沙皇政府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责任感引起西方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考，他们修正了从技术和现代国家角度看无产阶级不可能与强于自己的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理论。

无产者在政治上对俄国革命的领导导致他们在技术上起义的领导。我们不想妄称我们的党已经十分成熟以致能够肩负重任，但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无产者表现出的灵活和冷静，足以将哥萨克和近卫军的胜利演变为皮洛士式的胜利①。

社会民主工党有组织的战斗成为全国各地群众起义的核心。

无产阶级在军队意志涣散时继续战斗并取得初步成果，但仍无法推翻阻隔无产者及市民与军队、无产者与农村、无产者与被形形色色自由派（因惧怕农民所提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抛弃的农民之间的壁垒。在全体农民中间没有一支参加总运动的后备队伍，长达几个世纪的专制统治培养了农民的兽性、奴性、残酷性和血腥性，使他们只能提供无组织的盲目支持，在日益完善的现代化技术面前束手无策，将机枪和装甲车拱手让给沙皇政府——无产阶级等待的只能是被粉碎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枪决的命运。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沙皇政府在征战国外的同时，开始了全国性

① 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的胜利，典出于公元前280—前275年的皮洛士战争。——编者注

扫荡。据其向第一届杜马的报告，政府实施暗杀 14000 起，枪决 1000 人，伤亡 20000 人，逮捕 70000 人，对一群人数众多的被驱逐的男女实施酷刑，把他们慢慢折磨致死。

我们党这样公告：我们发出抵抗到底的口号，我们必须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一边。我们成千上万名党员牺牲在无产阶级英勇代表倒下的地方：战场上。

自由派舆论将无产阶级喻为可怜的施舍者。无产阶级的策略是激怒舆论，如同利用胜利一样将失败也作为一种武器，以争取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不久后发生的事件证明 12 月的日子进一步巩固了无产者与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联系。

在内战期间，反革命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们将恢复旧制度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在这条道路上遇到的唯一阻力是 12 月的抵抗，形形色色的自由派代表不了严肃有力的抵抗。尽管起义被镇压，但它使政府无法蚕食许下的全部诺言。政府被迫召开杜马并试图将杜马变为在全国实施和平的手段。

第一届杜马选举与 1906 年的五一节

12 月的抵抗迫使旧政府不得不召开第一届杜马，但是抵抗被镇压后召开的首届杜马只能听命于专制者。在莫斯科起义的第 3 天，政府颁布了相对于 8 月 6 日的布里根宪法而言增加了法定选举人数的选举法案。起义被镇压后，专制政府采取的所有宪法措施都旨在限制和削弱必须召开的杜马的攻击性。

最显著的事实是杜马召开前颁布了“俄罗斯帝国基本法”这部专制法案。帝国管辖的 87 个政府和省份中，80 个按照特别法管理并对其中 39 个实施戒严。上文已经提及市民被捕和流放的人数。在波罗的海、

高加索、波兰和西伯利亚被枪杀的人不计其数。战地法庭的工作夜以继日。死刑宣判成批进行。革命媒体全部被禁言。所有革命政党甚至反对派政党都不得不由公开协会转变为地下非法协会。

更有甚者，维特伯爵政府通过“基本法”剥夺未来杜马的全部权利，还恬不知耻地呼吁人民群众前往票箱投票！

对借宪法外衣掩护专制政府的策略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党内展开了激烈辩论。大部分党员提议将抵制投票作为无产者唯一具有尊严的手段，以抗衡沙皇主义“复兴俄国”的策略，同时呼吁召开立宪会议。

抵制选举是无产阶级对专制政权推出的“宪法成果”的最明确的表态。这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采取的最合适的斗争形式，目的是阻止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沙皇政府控制首届俄国人民代表机关。通过抵制选举，无产阶级再次表明即使经历了 12 月的失败，他们也绝不后退，永远站在为夺取政权而立即投入斗争的队伍的前列。

这是四面楚歌的专制政府制造的一个类似议会的选举。政府威胁将抵制选举的人投入监狱，自由资产阶级呼吁革命人民无论如何参加投票。

抵制是唯一有效的反对宪法幻想的斗争工具，沉湎于这些幻想只会一劳永逸地推迟通过直接革命夺取政权斗争的准备。信任杜马是沉湎于这些幻想尝试的第一步，也是这场运动的特点。这是自由派策略的实质。

总的形势是党内没有任何声音要求参加第一届杜马的选举。党内“多数派”呼吁将“积极抵制”策略贯彻到选举的各个层面，与这个策略相对的策略是要求参加第一阶段投票（选举杜马代表），尽可能将选举集会变成当地群众和工人委员会的集会，尔后再实施抵制。后者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半抵制策略，没有得到工人群众的呼应，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尽管各级小组拥有自主权，但绝大部分地方小组采取了全面抵制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全一致地加入了这个策略。政府对抵制宣传采取特别措施，自由派媒体为挫败社会民主工党及其策略开展了积极鼓动宣传，尽管如此，无产者仍然广泛响应抵制号召。

我们手头没有抵制规模的确切数据。工业中心（圣彼得堡、敖德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波兰、立陶宛）严格执行了抵制策略。这个事实证明了一个普遍真理，即抵制维特宪法闹剧的是工人阶级中最具觉悟、最革命的分子，他们发挥了最具洞察力的革命战士的作用，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当然引路人。正是这股力量在第一届杜马会议上据理力争，迫使杜马勉强接受无产阶级实施的抵制策略。

50% 拥有投票权的车间和工厂的公民（法律规定每个拥有 50 名工人以上的车间和工厂可以组成一个选举单位）拒绝参加所有阶段的投票。

波兰实施全面抵制。华沙、琴斯托霍瓦、谢尔盖等没有一家官办工厂参加投票。华沙 114 家工厂中只有 4 家参加投票，罗兹 143 家工厂中只有 5 家参加投票，其他地方情况大同小异。

在余下 50% 的俄国工厂中，有一小部分参加投票。（法律规定每 2000 人中可以选出 150 名代表参加投票，圣彼得堡 3200 人中有 400 名代表参加投票）。按此估算，可能占工厂总数 10% 的工人拥有投票权。如果这部分工人参加投票，那么上述统计数字还须减去一半。各地拒绝抵制的人微乎其微。

法律规定任何工人组织可以组织代表工厂全体工人的投票，但投票代表人数不能少于 14 人。①

---

① 12 月 11 日给予工人投票权的法案涉及的 46 个政府中的 18 个已经派出工人代表。——编者注

尽管社会民主工党没有参加选举，但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工人委员会代表向他们出来的选举代表提交的请愿书照搬了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内容，有时这些要求被地方政府全面采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政府）。

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还表现在杜马小组的10名议员（小组共有成员14名）选举我们高加索当选的议员为党团小组组长，紧接着又推举他为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正式代表并与他们共同组成第一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

这里需要说明，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选举是在俄国其他地方选举结束后进行的。那时选举的总体情况已经明朗，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同意社会民主工党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

因此，党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正式宣布参加选举，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所有工人选民团都推举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工人代表，社会民主工党在梯弗里斯、巴统、库塔伊西都取得胜利。库塔伊西政府的全部3名代表和梯弗里斯政府的1名代表均为社会民主党人。

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省城农民决定将票投向“工人党”。

例如在梯弗里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获得8078票，其余各党（立宪民主党、激进派、民粹派和黑色百人团）总共才获得3577票。在库塔伊西政府中，225名农民选举代表均来自社会民主工党。阿克莫林斯克州为党争得光辉的荣誉。1名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鄂木斯克当选。

大部分选举在4月举行。在筹备五一活动时党就通知大家要加入竞选鼓动内容，节庆活动热闹非凡。

1906年五一节庆被普遍视为是最重要的活动，最疯狂的反革命都无力粉碎无产者表现出的巨大活力。所有卑躬屈膝的媒体都对这个“前所未有的革命动员令”拉响警报。

大小工业中心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罢工。商店再次关闭，无轨电车停止运行，报纸停止发行。

从如下有关政治罢工的数据中人们能够对此有个大致的了解：

政治罢工次数

（根据旧历，俄国在4月19日庆祝五一）

3月92次；4月1026次；5月449次；6月86次。

参加罢工人数

3月28538人；4月152476人；5月93854人；6月11112人。

这个数据不包括大型企业（铁路、煤矿、军工厂），也未包括以下地区：高加索部分地区、西伯利亚、中亚及其他地区。有一份完整的数据证明了俄国工人庆祝国际节日的规模。通过比较1900年和1906年的数据，我们得出的同样的结论也证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功。

五、1906年4月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

1905年12月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会议委托两派中央机构尽快在以每300名党员中产生1名代表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在选举大会代表期间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导致此次选举未能反映党的真正实力。拥有表决权的代表33300名党员的61个地方组织和22名拥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大会。另外与会的还有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的首要问题是统一。

除这个重大议题外，会议通过了接纳至今还未参加党内生活的上万

名工人的决议，会议日程还包括土地问题、对当前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策略（对待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农民运动、工会、资产阶级政党、没收土地）以及制订党统一的规章制度。

大会是党在地方组织行动方面统一、理论方面分歧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12 月起义的失败、抵制杜马选举未能阻挡杜马的召开以及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选举中击败沙皇政府后的蠢蠢欲动，这一切再次唤醒 10—12 月起义期间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的幻想：再次组成一个“全民反对党”。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认为抵制杜马是“回避”10—12 月的起义和对其“错误”情绪的发泄，尽管沙皇政府层层阻挠，立宪民主党还是赢得了杜马选举，而党在 1 月和 2 月期间还未考虑好是否以参加选举取代已经发出的抵制号召，因此有必要为实现俄国立宪会议的目标调整党的策略基础。

会上分歧显而易见，各派阐明了自己的总体态度，代表具有觉悟的多数派的党的执行机构在民族组织加入后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党内生活进一步复杂化。

（一）土地纲领和农民运动

会上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党纲中的土地部分。

上文说过 1905 年春天党认可的 1903 年的土地纲领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已经时过境迁。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数派会议决议主张党支持农民运动，没收封建地主、修道院、教会和庄园主的土地，并指明制订新的土地纲领的方向。

激烈的争论导致党内出现三种不同派别的意见，这还不包括认为没有必要出台一个特别别土地纲领的一派，后者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确定农民运动实施策略的决议代替土地纲领。三派的意见，一派主张

国有化，一派主张分配，一派主张市镇化[①]。

首先谈一谈没收土地问题，三派在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主张国有化的一派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全部胜利后才能够提出来。那时在实现共和制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工党不应该仅仅提出土地国有化的可行性，因为这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要求。

这些同志认为在实现土地国有化的过程中，最佳做法是在党的行动与宣传中，把农民为争取土地的斗争与社会民主工党为争取共和制及实现全面民主化的体制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反对土地国有化的人提出土地归属市镇的想法，将没收的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构。

支持市镇化方案的同志在对国有化提出批评的同时，指出它的两大危害：一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手中集中如此庞大的国有化的土地的危害——它手中掌握的这个巨大力量随时可能成为旧政权复辟的武器；二是唤醒反对国有化的边疆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危害。

市镇化方案的设计者认为自治市镇的庞大机构控制没收的土地能够抗衡中央政府的复辟。但他们坦承在没收大块土地时，一个反动中央政府存在的背景将使革命流产。另外，他们还反对国有化方案，主张必须以消除私有制为方向没收大块土地，担心发生如同旺代[②]一样的地方叛乱，换言之不可避免地发生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反对国家干预的反革命运动。归属市镇的方案没有提出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而土地国有化方

---

① 即地方公有。——编者注

②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 年 3 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旺代后来成了反动叛乱和反革命策源地的同义语。——编者注

案将革命农民委员会视做农民与大庄园主进行斗争的领导机构，要求当即接管没收土地的行政机关通过立宪会议的相关机构制订土地基本法。

主张分配的人支持社会民主工党立宪会议纲领中提出的农民应该以私有的形式自由地、全面地拥有没收的土地。

三派意见角逐后，大会通过土地归属市镇的方案，同时向分配派作出巨大让步，向国有化派作出部分让步。纲领以 62 票对 42 票获得通过。

除纲领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对待农民运动态度”的决议，指出农民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和革命性，要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将他们的经济主张与我们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巩固农民组织（农民委员会、独立农民联合会、农民代表委员会）。决议还指出必须“引导农民加强立即进行武装起义的意识，加强与城市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同时进行起义的协调”。决议强调只有立宪会议才能实现农民的要求，谴责土地恐怖主义策略和焚烧财产的做法等，建议拒绝交纳地租、捐税，拒绝服兵役，抵制政府机构，主张用选举产生的机构代替政府机构。决议最后建议向杜马递交请愿书、陈情书和派遣代表团。

（二）对待杜马的态度以及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成立

这个问题以及事先就“局势”展开的辩论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高潮。与其他问题一样，代表党内斗争的两个不同策略的决议被提交了上来。这场斗争始于选举大会代表期间，并延续至大会期间。两派先前的分歧集中在抵制杜马方面，会上的焦点是对杜马采取何种态度。社会民主工党面对的一个既成事实是第一届杜马的多数派属于立宪民主党。

大会未能避免对党在杜马选举中采取的策略进行评判。尽管大会的多数派告别了抵制杜马选举的策略，但是两派发言人都表示抵制是当时

唯一可行的策略，抵制选举不是哪个派别的事情，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分子的事情。

崩得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民族组织代表宣布他们组织承认1906年冬天实施抵制策略的必要性和革命性。

大会明确表示注意到上文提及的党内另一派主张的半抵制策略没有得到响应和贯彻。

“多数派”提出的决议强调“只有实施全面并坚持到底的抵制才有可能使社会民主工党支持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逼迫‘立宪民主党’承担杜马无力解决问题的责任，将无产者和农民民主革命从‘制宪幻想’中拯救出来”。

另外，面对业已存在并且具有反对派性质的杜马，抵制派提出的决议承认杜马可以间接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新型革命运动的广泛基础。决议要求无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危机与杜马危机交织在一起时，利用准备参加新的反对专制斗争的杜马。由于没有党的候选人参加杜马竞选，决议不赞成在杜马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党团。

党内另一派提出的决议获得多数通过。对该决议持批评意见的同志认为它存在三个不足：总体而言，决议对杜马特别是对它在革命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过分乐观；对杜马性质的描述过分抽象，几乎将其视为一个立法机构，没有充分考虑杜马的阶级代表性，尤其是杜马在希望依靠人民和害怕人民独立革命行动之间的摇摆性；最后，杜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民主观不同。决议提及的第三个不足与第二个不足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决议提到的社会民主工党有责任揭露资产阶级政党的摇摆性，有的同志指出这个提法不完整，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只有引入农民民主革命力量，才能领导革命前进，阻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最后，还要注意决议涉及大会后举行选举（高加索和西伯利亚）

的部分，它指出党应与其他政党联合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有关于此，党没有遇到原则上的反对意见。

总之，通过的决议没有太多地受到12月起义失败和立宪民主党赢得大选的影响。

根据决议的精神，党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选举中赢得不少席位。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党的当选代表进入杜马时，成立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

（三）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党对待其他政党态度的决议充实了党对待杜马态度的决议。这是革命时期最重要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党的刊物在大会期间多次就此展开讨论。杜马的召开、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杜马这个政治舞台上的表现，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政党的社会政治基础进行定位，并决定对待他们的态度。大会结束几个月后举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使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注目。

尽管大会期间多次谈及这些政党在革命期间的不同态度，但大会没有形成决议，而是希望党的中央组织根据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决议精神确定自己的策略。

由于缺乏对俄国政党进行分析的基础性决议，会后围绕如何将党的活动与杜马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些争论。最不利的方面是大会前夕和大会期间通过的决议互相矛盾。其中，一项决议的第一条表示“支持针对现行体制的一切反抗和反对行动”；另外一个决议要求准确界定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民主作用，分阶段地利用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对付自由派和君主派（立宪民主党），揭露后者在历史上曾经背叛革命，宣传只能采用合法和宪法赋予的手段。

（四）武装起义和没收财产

4月20日宪法引起的有关杜马和利用杜马进行斗争的问题并未阻止大会就立即进行群众斗争的主题展开讨论。

在“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中，党的代表大会承认武装起义是实现党召开立宪会议这一近期目标的唯一手段。将此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表明党急于对10月和11月的事件进行总结，确定党在领导群众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为此，大会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多数派”决议的第一部分分析了革命运动逐渐转向群体、热烈和主动的过程，注意到平和而耗尽人们力量的大罢工在12月最终转变成武装起义，看到存在着人民通过公开斗争对抗现代化军队的可能性；决议结论部分指出当时运动已经达到武装起义水平，全面政治大罢工不应被视做附加和辅助手段；要求党研究12月起义的经验，开展行动建立和巩固隶属或非隶属于党的战斗小组，加紧做好军队内部工作，协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行动。

决议认为这场革命是10月罢工、政府剥夺许诺的自由以及群众试图再次夺取自由等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少数派”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决议。他们的决议闭口不谈导致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的背景，仅指出“起义最重要和最便捷的办法是加强党对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军队的宣传与工作”。决议赞同党必须组织和武装战斗小组，与其他政党签署有关起义的协议。决议最后强调阻止将无产阶级拖入不利的武装冲突的企图是党的特别责任，这种企图源于“对革命武装起义的愚蠢幻想”。

上述的最后一句话是少数派决议的核心思想，这种表述是独一无二

的。伦敦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这方面的决议。

对关于没收财产的决议意见完全一致。全体赞同禁止战斗小组攻击、掠夺私有财产。必须依据宪法以及在当地政府和指定的革命政权机构的同意下，根据革命政权的指示和符合全面审计的条件下，才能没收公共银行和国家机构的资产。

（五）工会运动

10月期间，工会迅速扩大，吸收了成千上万名工人，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尽管反革命的野蛮镇压挫伤了这个刚刚起步的运动，但无法全面阻挠其存在。沙皇政府在全面消灭工会运动的企图未遂后，不得不同意让其合法化，将其列入警察司法管辖范围。

1906年3月4日颁布的“关于工会运动的临时条例”旨在更好地通过行政手段管理革命时期强行诞生的行业运动，然而这成为工会运动发展的起点。鉴于条例的存在，政府深感取消工会力不从心。

大会不仅总结了国际工会运动的经验，而且对俄国面临的形势进行了认真思考。为此，大会决议指出“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将无产者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改善工人阶级面临的严峻形势。大会注意到“行业协会在革命时期在政治斗争中吸收了无产阶级”。

大会承认党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组成工会，并支持他们推动建立中立的行业协会。

大会决定党利用一切合法手段，特别是上述提及的3月4日颁布的条例，继续争取协会的全部和全面自由的权利，“在斗争和行动中将工会和党组织联系起来”。

（六）民族组织的统一与组织章程

大会日程最后一个但同时又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党的统一：（1）由于组织原则，崩得于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与党脱离关系；（2）同样也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纲领中确定的民族自治作用有不同看法，党内未能形成一致意见；（3）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革命斗争要尽可能团结所有无产者和从所有民族无产者的利益出发。为巩固和保持党内全面和全体团结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以及各级地区委员会出台的决议表明党内确实实现了统一。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无产阶级要求进行革命运动的呼吁，业已存在的党内分歧消失了。

再次无法一一枚举各组织签署和批准的规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同派别的全部协议。我们仅指明一点：领土自治原则是各个组织达成协议的基础。对崩得的行动没有划定领土疆界。一项通过的决议这样概述对待各民族党组织的原则："大会赞同与崩得统一的计划，强烈反对按民族组成无产者组织。"

波兰社会党代表被授权在大会上宣布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汇报了工作。

1906年9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了与崩得统一的条件。早些时候（8月），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亦接受和批准这些条件，并正式改名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秋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成为现实。

致力于统一斗争的原则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反对大屠杀专制政权和资产阶级民族政治的必然结果。

党的组织章程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1）只有承认党的纲领并提供物质支持才能成为党员；（2）大会承认在俄国革命的全过程实施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大会对上述原则作出的唯一确认，它终结了党内围绕组织问题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六、首届杜马

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结束之时，正是第一届杜马拉开帷幕之际。工人、农民轰轰烈烈的行动和运动笼罩着俄国的首届“议会”。人们坚信新的革命风暴将战胜和平的议会主义者。党的行动取决于杜马与日益高涨的无产者和农民运动。

面对夺取政权的根本问题，革命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夺取政权是10月—12月起义确立的明确目标，这个目标在12月起义被镇压后几乎不再被人提起。而议会多数派立宪民主党领导的杜马对形势持有大相径庭的判断。他们有意识地希望通过实施旧政权的平稳过渡及缓和政策来取代争取权利的斗争和向人民发出直接号召的做法。他们用沙皇主义“宪法”规定的“议会”的合法的权力来对付无产者和农民革命的策略。

这个议会多数派的策略在杜马与人民之间埋下了鸿沟。由于杜马中的农民力量和具有民主革命特点的“劳动团”组织不充分以及政治经验不足导致的犹豫不决，使杜马中没有一个与多数派匹敌的力量。面对强大的农民和民主要求，“劳动团”无法站在自己角色的历史高度，而且在最危急的情况下，它经常还被立宪民主党牵着鼻子走。

在对杜马作用的看法、对多数派策略提出的批评、揭露杜马的无能和对俄国“议会”的幻想方面，我们的杜马党团与无产者和最先进的民主分子思想高度一致。

借助于向人民直接发出号召和公众集会，我们与无产阶级群众建立了直接联系，我们尝试单独脱离杜马的尝试在全国引起反响，促进了群众的革命性。我们必须指出我们采取这个策略是形势所迫。杜马的存在使我们获得些许但常常受到野蛮镇压的自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自由为党服务。

口头和书面宣传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新的刊物又一次出现。社会民主工党的刊物在圣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波尔塔瓦、喀山、梯弗里斯、维尔诺、哈尔科夫、科斯特罗马、普斯科夫、库尔斯克等地开始发行。必须承认这些刊物几乎每天被没收。法庭持续不断地受理这类案子。为此，刊物必须每周更名换姓。然而只要杜马存在，政府就无法完全取消发行量巨大的社会民主党刊物。

革命文学作品或是以原文或是以译作形式发行。除在党内发行外，普通书商也刊印发行。

人们抓紧翻译那些11月和12月起义期间尚未翻译的作品。译作大批涌现，很多时候几个书商同时发行。人们什么作品出都读，什么作品都买。

除在杜马和国内每个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发行大量文章、宣传材料、小册子和宣言外，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工会刊物也快速成长。我们没有数字显示其增长速度，但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工业中心和行会——包括马车夫协会——均拥有自己行业的机关刊物。

大量的刊印发行并未阻碍党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下印刷厂。中央委员会1907年提交伦敦代表大会的报告显示，从1906年5月1日至1907年5月1日，地下印刷厂印刷发行了110万份小册子和单页材料。面向工人和士兵的传单和报刊（《前进报》、《无产者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军营报》、《士兵对话》、《士兵之路》）由这些印刷厂集中印刷发行，且销量越来越大。

党不满足于书面宣传的扩大。口头鼓动也是这个时期党最主要的活动形式。

社会民主工党的演说者重新出现在作坊、工厂门口和群众集会上。宣讲的主题为杜马、政府政策和党的行动。一般情况下，集会结束时通过的决议会发表在相关报纸上，然后再提交给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整个俄国不管城市规模多大，都能收到人民群众集会通过的提交给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决议。集会上我们的演说者经常与其他党派的演说者发生舌战。

在这种斗争的氛围中，组织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举行活动的次数频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越来越多。更多的党员在民主的基础上参加政治宣言的撰写起草工作。

工厂、作坊以政治因素为借口大量减少用工人员。1905 年圣彼得堡国营工厂裁员造成 1906 年春天出现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是最典型的事例。4 月 20 日那天，莫斯科进行失业登记的人数达到 2. 5 万。圣彼得堡的情况与之相仿。

党和工会积极着手将失业者组织起来。许多中心城市迅速成立了“失业者委员会”，提出以下口号：举办公共工程！为给市镇政府施加压力，“失业者委员会”派出上访团，组织集会并提出由“失业者委员会”领导公共工程的组织工作。

这场运动激发了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兴趣，在当时的整个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特别关注这场运动，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并参与有关活动的策划。

第一届杜马期间群众的革命热情焕发了党的生命力，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和占领土地运动再现，士兵和水兵的暴动更加频繁。

第一届杜马期间，军队的骚动波及整个俄国（库尔斯克、沃罗涅耶、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皇村），骚动的威胁越

来越大。①

农民运动的精神状态首先表现在他们印刷了多如雪花的请愿书，寄送给杜马中他们代表参加的名为“劳动团”的激进民主党党团，宣传材料口吻坚定地要求立即开展“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

在与庄园主进行的直接斗争中，同1905年相比，1906年春天第一届杜马期间的农民运动范围更广。确切地说，这场运动波及占整个俄国一半的215个县城。

这场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直接摧毁财产，纵火烧毁或抢劫财产和牲畜、种子和林中木材；有的采取罢工形式，停止在农田的工作。

后一种做法在东南部地区非常流行，因为社会民主工党在那里有很强的影响力，组织领导了这场运动。我们的强大表现在我们不仅能够向农民发出五一活动的号召，而且还是活动的实际组织者。

这是俄国农民无产者首次大规模地参加无产者的五一活动。

第一届杜马期间无产者的罢工运动也在扩大，罢工范围更广，罢工涉及越来越多的行业，而且经历了各种暴力形式：同盟歇业、逮捕、部队和警察干预。

新阶段罢工的特点不是其强大的抵抗力，而是其相当的规模与普及性。我们看到海港工人罢工波及全俄国：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刻赤、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港；规模小一点的罢工有伏尔加盆地、喀琅施塔得的罢工；同时爆发的还有基辅、维尔诺、敖德萨、哈尔科夫、梯弗里斯面包工人的罢工。圣彼得堡有1万人参加罢工。参加人数如此众多不得不让人想起10月的大罢工。当时所有大城市都举行了罢工。除上面列举

① 总参谋部公报提供的情况如下：截至1906年6月底对军队骚动的部分调查显示，皇家近卫军骚动6起，步兵军团和军营骚动29起，骑兵团骚动7起，工兵团骚动3起。其余的系列调查正在进行中。

的城市外，阿尔汉格尔和伊万诺沃州的克列缅丘格也出现罢工。在我们党的倡议下，高加索成功组织了一天的总罢工，抗议军事委员会审判造反的士兵。最后是顿河盆地煤矿工人的罢工。

以下数据能够帮助大家大致了解这场运动的规模。1906 年共举行 6114 次罢工，其中 64.8 万人参加了 3602 场罢工，一半的罢工发生在 4、5、6、7 这 4 个月期间，正好与第一届杜马召开的时间相吻合。①

1906 年的这场罢工运动在达到高潮后，于 8 月开始退潮，尽管有时有些小高潮，但在快速跌落谷底后未能再次反弹。

这场运动迫使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将杜马讲坛变为组织人民群众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进行直接斗争的工具。这场运动、斗争和活动的氛围决定了党对杜马的策略。

杜马很快就与政府发生冲突。但领导杜马的多数派不想诉诸革命，并且对任何可能引发革命的举动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他们不想成为革命的工具。

杜马多数派在寻求与旧政权妥协的同时，提出杜马组阁的口号，推翻极左派提出的让人民参加反政府斗争和与人民建立直接联盟的倡议。最后多数派起草了“告人民书”，建议人民“温和而平静”地等待杜马制订的土地法。

面对杜马和多数派，我们党必须有一个明确态度。

党的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和党的执行机构认为无产者必须支持杜马，支持杜马进行的反政府的斗争。大会提出党应该将杜马多数派的口号变为自己的口号，在特定的形势下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不仅是立宪民主党的政府。

---

① 同样，这里仅引用经常接受检查的工厂的数据，不包括高加索、西伯利亚、铁路、矿山和国家企业。

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社会民主工党的积极分子和群众集会建议工人“支持杜马提出推翻政府、以杜马任命的内阁代替现有内阁的努力，强调替换政府是为召集立宪会议创造有利条件”。这个决议对杜马多数派叛变革命保持沉默。

党内另外一派——实际人数的多数派——主要支持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党的委员会的意见，认为社会民主工党不应该支持杜马，也不应该将杜马多数派的口号变为自己的口号。一个自由的政府不能仅仅是阻挡旧政权的屏风，而应是一场新的革命斗争的结果，其口号就是召开立宪会议。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从道义上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自由政权和杜马推举的政府，并将此作为其斗争的近期目标。最后，他们明确表示杜马多数派的口号是将人民变为旨在与政府妥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工具，而不是推动人民为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

这派承认杜马推选政府具有革命意义，认为革命可以利用这一事件，但不能接受其提出的任何口号，反对自由派借助发动革命力量为召集立宪会议的目标为手段与旧政权讨价还价。因为这样做群众的政治注意力才会集中在杜马之外的斗争，即唯一试图将杜马变为组织群众工具的极左政党身上，而不是杜马的多数派立宪民主党。

为此，圣彼得堡党的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形成对立，并成为其他一系列党的委员会决议的基础。决议指出：“杜马软弱无力。它之所以软弱无力，不仅因为它手里没有政府拥有的刺刀和机关枪，而且因为它就整体来说是不革命的，不能够进行坚决的斗争。”①

决议要求左派党团向人民发出这样的号召：“杜马软弱无力，不能指望从杜马那里得到土地和自由，显然人民必须自己去取得这一切，发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70页。——编者注

展的趋势是要在杜马外面进行决定性的斗争。”①

党内多数人持此立场，反对以下口号：建立一个杜马内阁，实施一种与之相应的策略。除上面提及的党组织外，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都站在这个立场一边。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也反对上述口号。

面对一个准备接受妥协的杜马，采取革命和行动策略的目的是将尚在犹豫的主张民主的“劳动团”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剥离开来。用这一有力而急迫的革命策略应对杜马多数派的策略的做法因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的加入而受到确认。

第一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

杜马解散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共有 18 位成员。根据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党团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日常监督下，以党的官方机构身份开展活动。小组作为党的常设机构的生存期每年只有 3 至 4 星期。小组通过杜马讲坛以宣读特别宣言的形式向无产阶级告知其成立的消息。

特别宣言指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突出作用，宣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无产阶级成立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宣言指出，社会民主工党进入杜马不是来开展立法组织工作，而是为拥有一个全权代表大会，即推动实现一个人民掌握全部权力的立宪会议的目标而奋斗。

宣言这样表述党团的工作任务：**“杜马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宗旨是为组织一个集中全部权力的立宪会议作出贡献。”**

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是杜马党团采取即刻行动的方式。

党团利用一切机会发出号召。为此，在政府策划大屠杀时，社会民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170 页。——编者注

主工党党团提出与立宪民主党截然对立的议事日程，要求法院审判最高行政机构全体成员并由人民承担此项审判工作。

在讨论集会自由法案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提出与立宪民主党相反的草案。在立宪民主党提出的12条中有11条对自由进行了限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提出的3条，要求实现完全和全部集会的自由，取缔现存的全部限制，追究违反规定官员的责任。

在起草向饥荒地区提供救济的决议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拒绝对政府表示任何信任，要求向现场派遣议员，与地方人员和农民工人饥民委员会一起组织救援，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救助手段，撤销秘密经费，禁止向政治宪兵提供侦察经费等，缩减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官员的经费。

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建议与立宪民主党要求向政府提供1500万卢布的提案发生冲突。虽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和部分“劳动团”成员提出反对意见，但立宪民主党的议案还是获得通过。

杜马会议期间发生了比亚韦斯托克大屠杀，尽管军队和当局对此予以坚决支持，但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还是建议在杜马会议日程中这样宣布：“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唯一办法是武装人民。”我们党团还号召人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吁请地方自治机构尽一切努力维护安全。

杜马多数派（立宪民主党）强烈抵制对比亚韦斯托克大屠杀作出的革命回应，他们试图将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掩埋起来，自大屠杀发生至杜马解散的5个星期内，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合乎“宪法”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最后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为杜马土地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宣言。宣言批评和推翻立宪民主党和“劳动团”提出的草案，要求除小私有者和农民的地块外，毫无补偿地没收教会、寺院、庄园主和地主的土地。这是党的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精神。

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反对立宪民主党要求对政府抛出的土地问题公告保持平静的号召。社会民主工党要求杜马走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的道路，为显示对政府的独立性和忠于自己，杜马采纳了这一做法。

杜马被迫回应反动派的攻击，直接向人民发出号召，但杜马多数派认为作出这种必要的回应欠妥。他们认为杜马的“告人民书不应具有鼓动号召力，而应帮助平息人民的情绪，并向人民说明面对杜马政府无计可施”。

在此影响下，杜马6月6日—19日通过的“告人民书”由一种革命措施变成一种欺骗人民的手段，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对此投了反对票，“劳动团”投了弃权票，所有寄托在杜马这个革命机构上的希望以及以此为基础结成的反革命和革命两股势力的联合策略被全部击碎。

反对“告人民书”者立刻揭露多数派——立宪民主党——的背叛策略并宣布撰写一份有别于他们的独立宣言。

我们小组未能在杜马这个神圣的讲坛宣读自己的号召。在立宪民主党发出保持平静的号召和散布政府无力对抗杜马谎言的两天后，杜马被宣布解散。将自由作为交易的那些人立刻将责任推到维堡方面，抱怨人民没有予以他们足够的支持，而事实上是他们多次背叛了人民。

我们党团的行动不仅仅限于上面提及的部分。党团成员想方设法在杜马外开展活动并与无产阶级群众建立各种联系。为此，我们杜马代表参加了圣彼得堡和省城的集会，为保持相互之间的联系，还召集了有觉悟的工人与杜马代表的专门会议。这些会议由于杜马的解散而终止。从俄国四面八方寄来的号召书、贺信、请愿书和决议书表明他们丰富多彩的活动。

解散杜马

解散杜马是政府发出的举起屠刀和机关枪的直白，俄国全体政治派别对此的回应是向民众发出号召。在这方面，杜马多数派也没有高招，他们仅表现出进行严肃斗争的意愿。在杜马衰弱时期，杜马多数派回避与群众进行直接联系，实际上是屈服于反革命势力的意愿。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效忠。在杜马解散离开圣彼得堡之际，他们仅仅作出支持“消极抵抗”的表示。

所谓的“维堡宣言”自然是无法满足社会民主工党党团期盼的。在与“抗议派”共同签署“维堡宣言”时，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当即公开发表了对此的补充条款并与“劳动团”杜马党团发出以下两个号召书：一个是告陆海军书，一个是告全国农民书。立宪民主党起草“韦堡宣言”时企图藏匿的内容在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发出的为夺取政权召集立宪会议而奋斗的号召中一目了然。

党的中央委员会与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一起参加了号召的撰写，并在革命政党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立即进行总罢工的设想和以下口号：“保卫杜马，召集立宪会议！”

这个号召没有得到党内各派的热烈响应。然而几天后革命的英勇气概驱逐了重重疑虑，先是斯维亚堡，接着是喀琅施塔得和雷瓦尔举行的军事起义。斯维亚堡连续 3 天坚持斗争。与军人的起义相之呼应的 7 月总罢工是无产阶级对解散杜马作出的最有力的回应。然而这场运动的有限规模和农民的消极表现说明革命力量已经筋疲力尽。

要说明的是圣彼得堡确实有 7 万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但他们不是最积极的分子，至今也没有参加过什么运动。综合数据表明他们发动群众投入这场公开斗争的能力极其有限。继此之后，斗争的规模一直在缩

小。下列数据就是证据。

政治罢工次数		参加罢工人数	
6月	86次	6月	11112人
7月	496次	7月	93965人
8月	9次	8月	5988人

罢工仅限于圣彼得堡市说明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与杜马初期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被解散的政府”体制在军事委员会的支持下运作，对政党开展活动极为不利。杜马解散前一天的夜晚，社会主义刊物被全部封杀。6月间几乎所有的行业协会都被解散。公众集会无法进行。

尽管人民对解散杜马无动于衷，但是政府不敢进行公开政变，即完全取消杜马。

政府在解散杜马的宣言中保证在旧选举法的基础上召集第二届杜马。形势依然是革命的。政治危机将导致一场自上或自下的革命。唯有与反政府的政治力量开展公开的斗争才能找到解决办法。这是缘何党不能放弃革命口号和立即进行斗争的原因。虽然筋疲力尽，但无产阶级仍在部分地区表现出集体反抗的力量（罗兹反对9月枪决的罢工，圣彼得堡抗议审判工人委员会代表的运动）。无产阶级仍在试图加强自己的组织能力。

除了令人悲伤的政治形势，我们还观察到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以及俄国面临的新情况——大批整个俄国资本家赖以生存的工厂被关闭。失业问题引起工人组织机构的关注。到处都是流浪街头的失业者。伏尔加地区失业者达到几万人，圣彼得堡失业人员超过1.4万。

行政当局解散了失业者委员会。1906年秋天同盟歇业的雇主开展

的运动规模很大。新的同盟歇业浪潮波及包括圣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萨拉托夫、梯弗里斯等地的几万名工人。波兰和西北部地区的情况更加糟糕。华沙、维尔诺、陶格夫匹尔斯、明斯克等地被解雇工人数量不断增加，闭厂灾难性地蔓延。罗兹工厂同盟歇业波及3万工人，持续了4个月。在此背景下，工人中间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抢劫私人财产和个人攻击行为很猖獗，党不得不与此进行斗争。

在这样的条件，党与被宣布取缔的或半合法的行业协会继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报告会。行业刊物迅速增加。到年底，仅圣彼得堡就拥有25家机关刊物。排字工人联合会会员达到3万名。五金工人联合会拥有同等数量的会员，纺织工人联合会会员达到1万人。

5000名会员的代表出席了西北地区皮革工人大会。

当然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力量更加薄弱。

在这种条件下，党努力地落实维堡确定的拒绝服兵役的口号，尽管加强了对准备开赴军队的新兵的工作，但是这些活动和所进行的专门的文学宣传只有一些间接收获。

人们在党内激烈地讨论战斗的组织问题。崩得、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解散了战斗队。分歧导致党内其他组织召开了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相关组织的19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召开上述会议，为此另外召集了一次军队组织工作会议[①]。党内辩论没有导致事情复杂化。伦敦代表大会作出的取消所有特别战斗队的决定被彻底放弃。

---

① 即是“在军队中进行工作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编者注

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夕，没有组织大规模运动并不表明无产阶级对政治的冷漠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影响力的削弱。1906 年 10 月，我们成功举行了庆祝 1905 年 10 月的总罢工。在审判工人代表委员会之际，圣彼得堡无产阶级征集到上万名无产者的签名，这表明战地委员会的体制无法轻而易举地摧毁无产阶级的团结。

由于被告人的态度和工人证人几乎都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表现出的同情与好感，审判本身成为一场严肃的政治亮相，证明无产阶级坚守革命先锋队岗位的决心。

第二届杜马竞选运动更鲜明地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和他们与社会民主工党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

七、第二届杜马

选举运动

至 1906 年底，形势只能接受热情不减的革命力量的方案或是上文所说的政变方案。

一方面，参加先前的英勇斗争后稍有泄气和疲惫的无产阶级正在等待出现真正的农民运动的迹象。然而农民缺乏率先革命的能力，革命力量陷入瘫痪。与此同时，反革命力量尚不具备公开政变的胆量。他们不得不同意召开第二届杜马，但希望撤销 12 月的选举法，以便在对其进行篡改后，用新选举法其取代 12 月的选举法。借助“参议院决议”的帮助，他们取缔 25% 的农民——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投票权，增加了富裕农民和农庄经营者的胜算。在城里工人集中的区域，取缔了 10% 的工人选民的投票权，对政府来说这个比例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无数次通知，要求各地和各级官员“跟踪”竞选运动，千方百计与“左

派”斗争——首要之举是禁止左派的竞选集会，没收他们散发的呼吁参加选举的传单，进行法院公审，以此剥夺政府反对派的投票权；更有甚者，通过行政渠道作出流放西伯利亚的判决和逮捕选举代表。这就是那些不敢公开进行政变的反革命势力筹划和操纵的竞选运动。

尽管如此，政府的期望落空了。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虽然没有发动武装起义，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仍然完好无损，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选举来的新杜马比首届杜马更加“激进”。政府反对派占据了四分之三的席位，多数派的180个席位中包括当选的社会党和“劳动团”议员。这届杜马只能赋予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更加尖锐的特色。

工人的态度非常明确，如同我们一位同志所言：“和平者只能是成功地将对手置于墓地后才能言谈和平。”

参加第二届杜马的问题在党内没有引起任何争论。在1906年召开的选举筹备大会上，过去赞成抵制第一届杜马的同志（波兰社会民主党、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发表声明，确认有必要积极参加杜马选举和杜马工作。

崩得向大会提交的决议称立宪幻想的破灭、首届杜马的经验和杜马宣布解散表明将杜马变为革命工具是可行的。为此，崩得确信参加选举与广大群众的觉悟并不矛盾，应该用通过革命斗争实现制宪目标的口号取代自由派主张的和平手段。

波兰社会民主党表示支持对第一届杜马选举采取的抵制策略，强调是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态度和自由派的妥协阻碍了抵制策略的成功，“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与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竞选场上交锋”。在这样的形势下，为进一步揭穿宪法的虚伪性和维护革命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建议积极参加选举运动。

虽然参加选举没有引起争论，但是人们还是热烈讨论了有关参加选举斗争的方式问题，尤其是在第一轮选举中（俄国选举分成若干等级进

行）与其他政党的联合问题。在报刊为此组织了热烈的讨论后，党于11月份召开了一次寻求解决问题的会议。

32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形成两派意见。18名代表组成的会议多数派中包括党内“少数派”和崩得分子，他们认为选举斗争的宗旨是摧毁反动派“夺取杜马的计划”的企图。为此，除工人选民团外，在选举第一阶段必须与所有革命政党、民主政党、反对派以及包括立宪民主党等团体达成协议。凡是反动派可能获胜的选区，都应该签署相关协议。

会上的少数派——党内“多数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确信左派将成为杜马的多数派已经十拿九稳，指出自由派鼓吹反动派的危险是为争夺犹豫不决的选民而使用的伎俩，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的重点不是与反对派开展斗争，而是揭露自由党的背叛策略。会上的“少数派”发表声明，提出需要采取的策略：告知群众只要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沙皇政府手中，就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治自由；阐明杜马没有能力实现革命要求；批评导致第一届杜马倒台的自由派，特别是革命面临被君主派、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主导的危险。他们同意与其他政党签署协议，但强调这是一个例外，总的方针原则应该是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一阶段的选举中保持绝对的独立性，特别指出只有在“其他政党同意接受我们提出的进行立即斗争的口号，即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和成立民主共和国的条件才能签署协议”。

许多城市实施了联合，特别是在“左派联盟”要同时对抗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地方。

许多城市的选举结果取决于立宪民主党如何广泛宣传反动派的危险性。由于社会民主工党也视之为危险，因此对立宪民主党的批评只能轻描淡写。

实际选举结果表明反动派的危险只是立宪民主党玩弄的伎俩，他们

的胜利是部分社会民主工党对其放任自流所致。

立宪民主党官方机构提供的选举数据如下：

城市选区立宪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与极左派①候选人名单的得票情况

立宪民主党	138039 票
左派	74807 票
十月党	94887 票

在进步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在内组成竞选联盟的城市，危险的反动派没有立足之地的态势一目了然。左派联盟获得 112057 张选票，右翼得到 38954 张选票。即使在立宪民主党和“左派联盟”各自分享一半选票的城市（最有利于第三派联合），右翼获胜的几率同样为零。

大会通过“少数派”与崩得分子的决议，同意与立宪民主党签署协议，但强调由地方组织决定联合时机。总的联合形式在大会结束后继续受到热烈讨论。党内再次出现新的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无产阶级与革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与反动派和自由派作斗争；另一派倡议组成全民族反对反动派的力量。后者的想法来自于部分同志提出的后来被党拒绝的社会民主工党与立宪民主党共同竞选的纲领。

除关于联合竞选协议的决议外，大会还通过了为实现制宪目标全力以赴地进行革命斗争的竞选纲领。

在竞选期间，面对不利形势，党广泛开展活动并取得骄人战绩。党置身于被取缔的非法组织中间，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和极大的热情开展鼓动宣传，成为竞选活动的主角。社会民主工党的报刊再次现身。集会上重现社会民主党人士的讲演，尽管演说者走下讲坛即被投入监狱并在法庭上以党员的身份受到审判。

---

① 指社会民主工党。——编者注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仅我们一党在竞选期间就发出号召36次，散发传单上百万份。专门组成的竞选小组和地方委员会散发的宣传材料不计其数。我们无法提供党组织活动的技术细节（走访选民、散发传单）。必须指出行业协会在选举运动期间给予党广泛的支持并公开表示对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好感。

竞选结果回馈了我们付出的努力。在工人选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与任何政党结盟，独自奋战，大获全胜，向杜马输送了23名代表。

社会民主工党在一系列没有与其他政党结盟的城市（如梯弗里斯、库塔伊西、巴统、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利耶帕亚、叶卡捷琳堡等城市）获胜。总的看，至少30%的选民在选举时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工党或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确保21名加入党组织的候选人和5名同情我党的候选人当选。3名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在农庄主选区当选。党的正式候选人共有54人当选，另有10名不属于我们名单的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他们在随后的杜马会议期间加入我们的党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竞选期间取得的伟大胜利，表明广大工人群众紧跟我们党并与其组织成员保持着联系。这样的成就表明党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拥有民心。无产阶级提出的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实施与自由派争夺影响力斗争的策略是我们竞选运动的特点，也是我们杜马党团的策略。

（一）第二届杜马期间的工人运动

选举运动给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但仍不足以唤醒自杜马解散以来一直处在期待中的无产阶级。这个时期经济和政治斗争的步伐放缓，统计数据如下：1906年共组织政治罢工

3569 次，参加人数 650685 名；而最后的 3 个月共有罢工 68 次，参加人数 25500 名。当年共举行经济罢工 2545 次，参加人数 457721 名；而最后的 3 个月为 245 次，参加人数 37000 名。

经济斗争处于停滞状态。1907 年年初平均每月罢工未超过 81 次，参加人数 1 万人；而 1906 年平均每月罢工 211 次，参与人数 38000 名。

与此相反的是 1907 年竞选期间政治罢工次数有所增加。统计显示共举行罢工 320 次，93000 人参加罢工。这是一种临时现象，因为在第二届杜马解散时，这种形式的罢工消失殆尽——如果不包括对此届杜马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进行特别诉讼时举行的抗议示威——而且参加罢工的人数微不足道。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罢工有：巴库的罢工，莫斯科轻轨职工的罢工（2 月），随后举行的电力和煤气行业职工的罢工，里海、巴库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兵等的罢工，汇集到莫斯科罢工洪流中的圣彼得堡油漆工人的罢工。此间还爆发了 6000 名面包工人的罢工。5 月莫斯科印刷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工业区的纺织和冶金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总之，我们面临的形势远未平静。

这些罢工与以往相比更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特点。1903 年和 1901 年罢工时提出的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主张再现，工人阶级再次激情昂然，工会又一次组织起来和扩大规模。引起这场运动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日用必需品（根据官方统计，面包价格上涨 50%）价格的飞快上涨。参加上述斗争人员的工资增长低于物价的上涨。四处响彻提高工资的要求。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原因。工人合作社的发展正好始于这个阶段。

这个时期工会运动的活动首先是组织全国或地方性的代表大会。这类会议在开始时非常之多。2 月召开了首次冶金工人工会代表会议，代表 27000 名工人的 29 位代表出席；建筑工人举行了首次代表会议。3 月

召开了西北地区皮革工人统一代表大会（代表5000人的26名代表与会），宣布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裁缝们也召开了代表大会。

召开的类似会议还有：全俄印刷工人（代表43个城市3万工人的72位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机械工人代表会议，伏尔加河社会民主主义航运工人代表会议，商贸职工代表会议。

6月举行了中部地区纺织工人的第二次代表会议。

1907年上半年有13万人参加了工会组织。

合作社运动的迅速发展推动大工业中心在罗奇代尔合作社[①]的基础上成立纯粹的工人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圣彼得堡、哈尔科夫和巴库聚集了几千名社员。由于政府的迫害或取得的成果与预期落差太大，合作社社员的数量慢慢萎缩。小型合作社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发行。在工会和合作社内，党员总是战斗在第一线。党的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就两个组织共同有兴趣的问题开展热烈讨论，试图利用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促成工会与合作社的统一。竞选活动和工会刊物的表现以及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工人群众理解他们组织与党保持联系的必要性。毫不夸张地说，社会民主工党是工人组织和工人统一的中坚力量。

在反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中立”工会和“中立”合作社，但这并未导致出现工会与党决裂的现象，上文提及的背景可能是一个因素。另外，在反动派鼓吹民主化的影响下，我们注意到与工人组织相比，反而是党内出现了削弱党的作用和价值观的苗头。

在6月3日反革命政变成功、第二届杜马宣布解散、同反动派斗争

---

① 全称为罗奇代尔公平先驱者合作社。1844年在英国的罗奇代尔镇由28个失业纺织工人自发成立，当时每人出资1英镑作为一股，共28英镑，后来逐渐发展壮大，社员增加到近3万人，股金增加到40万英镑。它所建立的罗奇代尔原则后来成为指导国际合作社发展的基本原则。——编者注

愈加艰难的岁月里，这个现象进一步加剧，与此展开的斗争日益艰难。

直至那时，党内才开始反击这种倾向。

在政治表现方面，除了选举和杜马党团开展的行动激发了加入党组织的热情外，首先应该谈及的是1月9—22日在圣彼得堡、华沙、罗兹、萨拉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一系列城市举行的罢工示威活动。五一节的活动也非常热闹。

五一期间有236家工厂和作坊的12万名工人参加了活动。在敖德萨举行了总罢工，港口和铁路工人全部停止工作。华沙生活全面瘫痪：所有工厂和作坊停工，报刊停刊，轻轨停运。车辆停止出行。

下表表明了五一活动的规模（根据旧历，俄国的五一是在4月）：

	罢工次数	罢工人数
3月	16次	10657人
4月	638次	82478人
5月	1056次	187770人
6月	1次	950人

无产者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信任没有任何动摇，1907年党不仅得益于上述组织的所有活动，而且议会党团开展的活动也给予它很大帮助。

在描述这些活动之前，我们先谈谈合法的社会民主工党刊物在选举期间的工作。这是它们最后一次的合法活动。当然，这些刊物经常需要适应对它们进行骚扰的警察当局提出的工作条件，尽管如此，与那些被取缔的刊物相比，它们还是能够较好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与第一届杜马选举期间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刊物只被允许在两座城市存在。第二届杜马尚未问世已经宣布了对它们的取缔令。第二届杜马期间

圣彼得堡发行的两份刊物是党的最后两份俄语刊物（边疆身份乌克兰的两份刊物存在的时间稍长）。

在工人居住中心，党已经离不开这些被取缔但仍在地下发行的刊物。

这种“地下”生存的方式对党开展活动至关重要，其重要性比第一届杜马更加突出。在“地下”活动的庇护下，我们筹备了党的日常会议，引导近15万名工人参加确定会议日程的讨论。在党的存在被宣布非法以及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威胁下，如此众多的党员参加讨论并直接选举大会代表足以表明党的力量、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及其广泛的组织能力。

15万名党员，54名当选议员，一个发行量巨大的刊物，以及在工人组织中的重大影响，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党的合法性，这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届杜马期间的力量。斯托雷平先生只有发动6月3日的政变才能战胜它。

（二）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

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由66名议员组成，其中55名是拥有表决权的常务代表，11名是拥有咨议权的“参与者”。党团议员的参选资格是由党的地方组织正式提出的。

这届杜马中有37个政府的代表。其中1名代表担任杜马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第二届杜马的特点是中间派立宪民主党的衰弱，他们在竞选中丢失的上百个席位由左派（“劳动团”、“人民社会党[①]”和社会革命党）及社会民主工党取代。

---

① 即劳动人民社会党。——编者注

这届左派杜马向反革命政府发出了挑战，大选的胜利促使他们表达要“自由”的愿望。杜马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群众消极等待的状态使中间派立宪民主党得以实施妥协策略，以寻求维持它在“议会”中的优势，这一策略明显地将矛头指向革命和杜马中的革命议员。

只有社会民主工党议员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妥协策略。犹豫不决的民粹派在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工党支持的民主派中间摇曳不定，以争夺议会中的优势地位。

在此情况下，我们党团的策略非常明确。首先将矛头直指杜马民粹派头目，同时努力争取杜马全体革命派和民主派，力争使他们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和领导，迫使后者与反动派妥协的“千方百计挽救杜马”的策略破产。

只有鲜明地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我们才能执行自己提出的集合全体革命派的策略，迫使革命派在我们与立宪民主党两者之间站队。我们在杜马展开的行动表明只有将此作为唯一条件，而不是寻求类似“反对派一致行动”的方案，才能够实现自己确立的目标。态度暧昧的小资产阶级认为“反对派一致行动”的方案掩饰了各派对它的明确态度，这使得我们提出的鲜明有力的策略更具务实性，加强了我们在杜马的地位。

如果社会民主党支持“反对派一致行动”的策略，势必加强立宪民主党对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影响，导致小资产阶级不愿意向杜马中我们这个强大的党团提供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自由派在第二届杜马中毫不掩饰其反对革命的倾向，这为我们党团执行自己的策略提供了方便。自由派党团的每个行动都表明它无力单独地与旧政权较量。

在向斯托雷平政府交出社会民主工党议员的问题上——解散议会的借口，立宪民主党的犹豫态度是自由派叛变革命的先兆。

我们党团总体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尽管初期在试图实施“反对派一致行动”的问题上迈错了几步。

在党对形势分析和指导党团工作方面，应该说，党清楚地看到杜马和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革命的解决办法。在发动群众准备迎接这一时刻时，社会民主工党注意保持了节奏。

在杜马召集前的几天，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写道：“一面是黑帮专制制度，一面是左派的杜马。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形势。最尖锐的斗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斗争不可避免，我们才用不着推进它、加快它、催促它。这件事让克鲁舍万（基希纳乌种族清洗的组织者）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去关心吧。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明确地、直接地、无情地、公开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揭露真相，使他们看清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意义，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像视死如归的勇士那样沉着迎敌……‘斯托雷平之流和罗曼诺夫之流的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因此，不需要任何过早的起义号召！不需要任何对人民的庄严宣言。不需要任何‘宣告’”①。

这些话语表达了另外一个矛盾：一个左派的杜马面对的是衰弱的群众革命力量的运动。形势要求采取灵活和冷静的策略。

社会民主工党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提高了声音。在此仅列举以下几个例子：

第一个举措是回应斯托雷平的宣言②。立宪民主党害怕引起冲突，

---

① 引文出自1907年2月11日列宁发表于《无产者报》第13号的《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387页）。此处依法文译出，部分地方与俄文版略有出入。——编者注

② 指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在1907年3月6日（19日）在第二届国家杜马第五次会议上宣读的政府宣言，主要内容是政府打算继续执行解散第一届杜马以后所实行的政策。——编者注

决定保持沉默，做法是同意接受一个简单的会议议程，以保全杜马。他们成功说服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党团推迟表决社会民主工党党团提出的对政府投不信任票的议程。

只有社会民主工党一家在议会讲坛上宣读了回应政府的声明，迫使反革命政府退让，强调“杜马应该成为有能力解放人民的强大工具”，社会民主工党对人民力量寄予了厚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立宪民主党的胆怯，我们党团对政府作出独家回应的声明在俄国产生强烈反应，挽救了杜马的脸面，然而声明力求站在民主派立场上的做法引起党内积极分子的激烈批评，认为声明不完整，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因素。

在救济饥民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政府的作为和1905年、1906年项目的资金进行调查。专门委员会不仅要查账，而且应根据得到的情报开展对地方政府的调查。

立宪民主党急忙表示这个议案违法，是对执政党进行的革命恐怖活动。

立宪民主党的批评和他们提出的限制委员会核查账目的相反议案得到斯托雷平政府和右派的赞许。

民粹派脱离了立宪民主党，杜马内部形成新的反对派势力组合。新的组合预示：“左派”党团旗手社会民主工党将与依赖十月派和右派的中间自由派开展斗争。

在向失业工人提供救助的问题上，同样的核查建议又一次提了出来。我们党团再次遇到阻挠。立宪民主党力图只向因经济危机原因失业的工人提供救助，将由于政治因素流浪街头的庞大失业工人排除在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是温和派与立宪民主党对抗。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左派”联盟获得部分满足。

立宪民主党将军事运动委员会问题提上议会日程，旨在借此表明自

己的自由主义和改变人们心目中他们正在成为的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我们必须揭露其虚伪性和缺乏政治常识的一面。

事实上，立宪民主党正在准备借助披着的“合法”外衣，绞杀镇压革命战士。我们党团的责任是揭露军事运动委员会维护的所谓宪法，该宪法保护的是13万地方贵族的利益，而不是农民和工人的要求，让人民明白与反革命政权的斗争和坚持不懈地与“合法”的反革命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在土地问题的辩论中，我们党团起初将批评焦点对准政府，提出必须没收土地的要求，以免触及党团内部不同派别的分歧。鉴于立宪民主党的强烈抨击，社会民主工党放弃了这一策略。社会民主工党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将严厉的批评对准立宪民主党要求以庄园主提出的“合理价格”重新回购土地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全力支持没有任何补偿地没收不属于农民土地的想法，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对土地问题作出最终决定。

土地问题的辩论是我们在杜马斗争的高潮。

由于政府绕过杜马作出的武断规定，杜马的预算权被完全剥夺。然而在竞选中，预算问题是立宪民主党攻击政府的主要利器。为兑现承诺，他们不得不参加这样一场斗争：将预算问题提交杜马委员会或是立即投票否决？第二个解决办法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方案。在几个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党团的支持下，一直试图“保全”杜马的立宪民主党挫败了社会民主工党的方案。在对动议案进行辩论时，社会民主工党的发言人指出代表政府的预算案旨在使人民长期处于饥饿，由城市和农村的贫苦群众承担沉重的税负，上交的税收主要用于维护官僚体制和与全民为敌。发言人还指出由于不拥有预算表决权，政府向杜马提交预算案只在寻求杜马的盖章，是谋求国外对其信任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结论是否决预算案。

结果是：立宪民主党站在社会民主工党和部分“民粹派”提交的动议案的对立面，投票赞成向沙皇政府拨款25亿卢布。

无产阶级策略与立宪民主党策略的对立同样表现在招募46.3万名新兵的法案上。我们党团对法案提出否决意见。对全国和整个军队来说，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而立宪民主党和“百名黑帮”以爱国主义为名投了赞成票。更有甚者的是他们自寻其辱，跑到国防部长和斯托雷平先生那里为他们自己的一位演说者发表的讲话进行道歉。这位演说者说，在专制体制下军队具备驱逐议员的能力，但最终将在西方和东方遭遇失败。

在一次有关议事日程的辩论中，我们党团特别提到，常备军祸害人民，是领导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国内连续发生动乱的持久因素，是对和平的威胁，唯有民兵和人民武装及短暂的兵役制能够保证全体人民的安全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专制政权手中的军队将导致民族骚乱、引发民族之战，是捍卫有产阶级利益的工具；通过战争导致国家破碎的制度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事组织；杜马通过新兵招募法案将对不负责任的政府使用军队承担责任，并将毫无选择地投票通过包含新兵招募费用在内的预算，最终降低杜马在人民心中的威望。

据此，我们党团拒绝向专制政府的新兵招募法案予以支持。

立宪民主党的保全策略剥夺了杜马的战斗力，无法实现民众的要求。在杜马存在的3个月，群众对杜马的支持愈加加剧了政府对它的野蛮攻击。反革命窥视到群众无力进行公开抵抗，因为他们面前是一个遭到羞辱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杜马，决定对社会民主工党议员严惩不贷。这些议员坚守战斗岗位，利用杜马讲坛进行革命鼓动，在议会咨询中刁难政府，支持与杜马外的工人组织保持紧密联系。社会民主工党成为反动贵族联盟政变阴谋的第一个牺牲品。

检察院的检察官已经接到命令，指控书不是针对个别议员，而是针

对整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在6月1日—14日的会议期间，斯托雷平政府要求杜马交出我们党团的全体议员，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限定杜马在24小时之内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反革命的打算如下：受到羞辱的杜马交出真正的代表革命的议员或者杜马被赶下台。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面对这样一个准备发动最后攻击的敌人，我们党团要求杜马采取决定性行动。我们要求杜马顶着违法的风险，利用手中所剩的最后权力来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对预算案组织专门表决，对没收贵族土地的法案进行表决。

杜马中的全体左派与我们站在一起。但是在“十月党”和“百名黑帮”的支持下，立宪民主党决定将这场议会闹剧进行到底。一边是立宪民主党中最具影响力的议员劝说政府更换手法，通过友好洽谈而不是采取立即发动政变的方式解决问题；一边是立宪民主党党团一次次地推翻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建议，打着挽救有关规定的旗帜，继续要求修改杜马会议议程。我们党团主席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未能改变立宪民主党的叛变态度。他说：“在政变发生前夕，特别是政府的‘屠刀已经列入议事日程’之际，应该将关及人民生命的重大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第二天杜马不复存在。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议员被捕。一道特别法令宣布修改选举法。政变大功告成。

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犯下的重大错误是试图维护自己的行动，没有在杜马开展寻求右派支持的行动，仅仅是简单地依靠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和要求作为支持。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在杜马中力图成为人民代言人的做法受到群众欢迎。受迫害的人民越来越习惯将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视为自己利益的维护者。最具说服力的是我们党团收到日益增多的来自工人、农民和其他民众的请愿信、动议和要求。

社会民主工党与群众日益密切的联系加剧了政府担忧，他们看到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是唯一一种能够加强自己对手力量的策略。他们最为

担心的是当前群众与士兵之间的联系。

法庭对社会民主工党议员的审判表明了社会民主工党与群众和士兵的关系；反革命政府的指控毫无说服力，这表明社会民主工党借助杜马可以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力量。政府在解散杜马后只逮捕和审讯社会民主工党议员，表明我们是众多“左派”中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对尼古拉二世形成真正威胁的一支力量。他们意识到打击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够威慑全体革命力量。

以攻击社会民主工党议员为序幕的政变是斯托雷平先生迫使社会民主工党议员为自己肩负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命付出的代价。只要他们尚未对“非法和秘密的联合会”——工人代表委员会——在全体俄国无产阶级面前进行公审，这场反革命的演变就未宣告结束。

面对进行密谋的指控，我们议员在狱中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进行密谋，然而我们寄希望于人民的公开行动。人民只能进行密谋。与人民为敌的人才是阴谋家。”

几个月后即 1907 年 11 月 22 日，我们的伙伴，更确切地说 6 月 3 日的密谋者在拒绝配合司法闹剧后，被宣判 5 年监禁。他们是真正敢于以广大无产阶级的要求对抗反革命阴谋的战士。

宣判当天爆发的圣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总罢工表明无产阶级深深知晓谁应该坐在反革命的被告席上。

八、伦敦代表大会

第二届杜马期间在伦敦召开了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最民主、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代表大会。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出席了大会。每 500 名党员中产生 1 名大会代表。代表选举是在全体选举人就会议日程展开讨论

之后进行的。305 名代表来自 145 个组织，代表了 15 万名加入组织的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 31 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

在谈及代表大会工作之前，先说明一下与会代表的特点和有关党内基本情况的数据。工人代表占出席大会总数的 43%；48% 的代表是地下工作者，即非法人士！15 个民族的代表出席了大会（119 名俄罗斯代表，98 名犹太代表，38 名波兰代表，31 名格鲁吉亚代表，30 名拉脱维亚族代表，7 名乌克兰代表，3 名亚美尼亚代表，1 名芬兰代表，1 名鞑靼代表，1 名白俄罗斯代表，2 名德意志代表，2 名爱沙尼亚代表，1 名奥塞梯代表，1 名希腊代表，1 名立陶宛代表），38% 的代表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3 至 5 年，20.8% 代表的党龄 6 至 8 年。

政府对大会代表的迫害打破了所有国家对社会党代表迫害的纪录。代表们总共遭到 711 次指控和审讯，5 名代表被处以死刑。除地方组织的代表外，参加会议的还有 10 名杜马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议员，其中 3 人是我们党的正式代表。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除了中央委员会和杜马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报告外，还包括下列问题：杜马；资产阶级政党；工人代表大会；工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

大会主要时间用来讨论中央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报告，重点自然落在党在这个多事阶段采取的策略问题上。

批评的焦点可以这样概述：为对付“民族反对派”的幽灵，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得不调整策略，阶级斗争的方针常常成为策略调整的牺牲品。

尽管这些批评在大会一系列的决议中有所体现，但这并未阻止大会承认“杜马全体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维护了无产阶级和革命利益”。

大会辩论通过了一项关于党团行动的决议，提出有必要利用杜马的讲坛阐明俄罗斯民族面临的问题，揭露有产阶级代表党团小组的反革命

性和他们在俄国境内寻求调和各民族无产阶级（波兰民族主义分子）与所谓自由派之间的尖锐斗争。

大会特别关注杜马、社会民主工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报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至今仍然具有价值，其中一份决议指出6月3—16日的政变突显了“杜马的无能和它不具备民主的特性”。另一份决议指出政变未能改变各个政党的属性和面目。

通过的关于杜马的决议表明了社会民主工党对杜马的态度，强调杜马没有能力实现民主要求以及通过“议会道路”赢得政治自由。决议呼吁为实现召集立宪会议的目标，必须与专制政权开展公开的斗争。

党决定在杜马内进行的斗争必须整体上与在杜马外开展的斗争的步伐一致，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开展抨击、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而不是考虑杜马选举的结果。

最后通过的一份决议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千方百计“保全杜马”的口号，反对社会民主工党接受行政当局附属于杜马（责任内阁）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体现了“自由派企图与专制政权达成妥协的倾向”，只有在一场革命运动的支持下才能实现这种妥协，但是这样的革命运动对民主的决定性胜利没有足够重大的意义。

通过关于杜马的决议表明在党内“少数派”和“多数派”的交锋中，大部分党员在对待杜马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与“多数派”相仿。大会对诸多问题采取的解决方案显示的亦是同样的结果。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以及部分崩得代表在这些问题上也与多数派立场一致。

通过的决议中最重要的是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决议，提出必须区分两种派别：一种是争议较大的自由派，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一种是民粹派（“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

“多数派”强调必须指出俄国自由派背叛人民利益的态度，同时指出应该支持民粹派，尽管他们具有空想的、有时甚至是反革命的特点，

但并这不妨碍他们随自身小资产阶级处境的发展变化，表达具有民主和革命因素的愿望。

“少数派”通过的决议对自由派的“立宪幻想”和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一视同仁，不知道利用民粹派客观革命的倾向对付自由派的妥协策略，主张无区别地与这些党派采取“联合行动”。这种策略在现实中放弃了与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使无产阶级政治附属于所谓自由派的现实政治。

党内各派经受住了反革命施加的重重考验，这证明多数派方案是正确的，迫使投票反对多数派的部分人士在各自派别及其基本倾向明朗之后，承认了多数派方案的正确性。

下面谈谈工人运动。大会探讨了工会和中立工人组织的问题，呼吁党内有影响的人物关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

关于工会，虽然大会确认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的支持成立中立工会的意见，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最大限度地推迟确认“有必要在行动中保持工会组织与党联系”的决议。

大会向党的积极分子和各级组织重申“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会承认党的领导以及与党建立联系”。

党靠拢工会的倾向引发坚持原则的“中立分子”和组织起来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独立社会党人”的强烈抨击。伦敦代表大会几个星期后召开的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表明大会通过的党与工会关系的决议完全符合国际社会主义思想。

“工人代表大会”的想法不源于无产阶级，是党内“少数派”中的一个小组倡议的，一方面旨在将其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政治行动的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重新激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个想法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酝酿发酵，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对解散杜马没有作出回应导致部分党员对党不满增加之际。人们开始在党的日常

行动之外寻求其他办法。这些同志非常自然地接受广泛的“工人代表大会”和“广泛”的工人党的想法。

实际上“工人代表大会”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特别是非社会民主党成员反对党的一种宣传手段。这个想法被无政府主义工会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对立面民主派利用。对党来说，这些游离分子的发展壮大将与党形成对抗。

至少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是一种“清除”党的隐晦的表达方式。党在领导多年的反革命斗争并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标识后，目前它领导的这场革命令人失望。

“少数派”支持这个想法，其他人——“多数派”，甚至崩得分子——反对在党外建立工会、合作社以及“工人代表大会”或更为广泛的工人党形式的特殊的独立机构。

大会强调社会民主工党有必要加强针对广大群众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推动工会与合作社的组织，积极参加独立工人组织（工人委员会等），但认为鼓动成立“工人代表大会”是有害无益的，这有可能将广大群众置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之下。

有必要谈一下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行动”的决议。大会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坚决反对“个人行动”和“妥协”方案，决定解散全部现有的与党组织有联系的特别战斗小组。

大会还通过一项规定，其中第一条要求“只有接受党的纲领，交纳党费，隶属于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成为党员。

大会简要描述了始于第一届杜马、止于第二届杜马的俄国革命阶段。

大会是在第二届杜马尚存之际召开的，但是通过的决议表明大会已经意识到这届杜马的脆弱性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的革命决裂。这次是政权上层发动了政变。

杜马被宣布解散，社会民主工党议员被捕，选举法被修改。

反革命取得了胜利。

九、在反革命的枷锁下

6月3（16）日，被称为为政变背书的宪法开始执行。这是一个分为6个选民团的四级选举制度。该法案剥夺了亚洲地区一半人（800万）的投票权，将其议席削减了26个。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26席中的一半席位由左派人士占据，其中三分之一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当时杜马中的高加索议员多数（60%）属于左派，其中35%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然而新的选举法将高加索的议席削减了19个，原有37个议席的波兰被削减了23个，另外还有19个城市被剥夺了议会代表。选民团分配制度必须服从。在每个重要的有产者的第一级选民团中，平均254个选民选出1位复选人；而在民主派的选民团中，平均每3942名选民产生1位复选人。

农民选民团的变化翻天覆地。地主选民人数增加32.89%，农民选民减少56%，工人选民减少46.15%。在许多村庄，农民选民人数减少60%—80%。

具体情况如下：

230名土地占有者选民团的一级选民选举1名复选人；

1000名城市选民团的选民选举1名复选人；

15000名城市二级选民团的选民选举1名复选人；

60000名农村选民团的选民选举1名复选人；

12.5万工人选民团的选民选举1名复选人。

为全面剥夺农民工人复选人的反抗能力，他们的代表不是由选民团投票产生，而是由当地政府大会指定。在全俄国欧洲地区的53个地方政府大会中，其中28个城市的多数派由土地占有者控制，另外4个中

的半数由他们控制，还有21个城市的多数派属于土地占有者和城市有产者一级选民团代表组成的联盟。

工人复选人数量由208名减至112名。选举法规定6个地方政府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代表，即每个政府中1名，但是他们的产生必须由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组成的政府多数派投票表决通过。

绞杀制度、全面剥夺自由、解散行业协会和新的选举法，总而言之，反革命所有的丑恶行径使各地党组织希望采取抵制选举的方案。然而形势明显表明抵制不能成为培育革命的利器，是一种自愿放弃斗争的办法。

为了解决这个策略问题，1907年6月党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26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与会，会议作出参加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决定。

党对这一决定没有任何遗憾的理由。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在杜马内外发挥的作用表明党团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俄国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赢得19个议席。工人选民团选出的6名代表全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许多代表在里加、高加索、西伯利亚、乌拉尔省和许多工业地区当选。

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行动是党政治生命的重要体现，由于上面提及的情况，他们在杜马外开展活动越来越难。

尽管如此，党仍然抓住一切时机发动无产阶级群众并以他们的名义提出政治要求，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特别是在经历挫折、失望情绪深深笼罩的时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对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进行审判时，上面已经提及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举行9万人和4万人的罢工。无法脱离工作岗位的人员以表决的方式支持抗议决议。全俄国当时罢工人数达到13.4万人。

从那时起，作为政治宣言的罢工运动退居二线（1908年举行罢工

464 次，罢工人数 92694 名；1909 年举行罢工 50 次，罢工人数 8500 名）。现在仅在五一举行罢工（1908 年 432 个社团的 89000 人参加；正式数据显示 1909 年五一只举行了 50 场罢工），因为反革命严格禁止政治罢工。

工人阶级没有放弃其他政治活动方式。他们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公开集会，提出政治和经济要求。这种形式的斗争成为他们手中真正的武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组织他们参加以下的大会：合作社大会、业余大学大会、妇女大会、作坊和工厂医生大会、反酗酒大会、反对卖淫大会。工人代表积极参加，有时从全国来的代表多达 50 人。会上组成各类“工人小组”，代表们陈述自己的报告，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和方案。

几乎每次大会，警察和“自由派”先生都会公开驱逐工人小组离开会场。主持会议的自由派人士粗野地打断工人代表的发言，拒绝将他们的方案提交表决。

参加这类大会使工人的特性有所变化，政治特性更加突出。这些代表提出的报告和决议——特别是在妇女大会、反酗酒和卖淫大会——与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观点一致，表明无产阶级仍然忠于自己的世界观并能够用自己的世界观看待和解决特有的问题。

斯托雷平政府对此自然不会手软，它颁布禁止工会组成代表团参加大会的特别法令，剥夺工人进行公开斗争的合法形式。

政府仍不满足于自己采取的令人厌恶的措施。在反酗酒大会召开前夕，他们逮捕了圣彼得堡工人选举的代表和 1 名杜马社会民主工党议员。一切谈及此类大会内容的报告被禁止发行，调查资料被没收。

另一种工人阶级斗争的方法是举行工人会议对国内政治生活问题进行表决。表决通过的动议被提交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并由经常被宣布取缔的非法媒体予以发表。他们以这种方式组织了反对处死刑的运

动，反对政府以提审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同样的理由迫害工会的运动，反对沙皇政府进行恐怖活动的运动，反对第三届杜马拒绝给予芬兰自治权并向芬兰社会民主党表示同情的运动。

政府禁止一切具有政治性质的公众集会，警察局拒绝批准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举行有关杜马活动的报告会。工会会议例外地被允许举行，但必须由1名驻场警察监督。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工会会议都被宣布解散。

在政府提出工人保险法草案之际，工会利用这类会议开展鼓动工作。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成千上万名工人参加了这类会议。当局很快采取了叫停的行政措施。

圣彼得堡举行的杜马改选是党政治生活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次改选是由于杜马开除1名立宪民主党议员引起的（我们党团的科索洛托夫同志同时也被开除，他是乌拉尔两名议员中的一位。取代他当选的是1名前选举团的成员）。

选举法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但是党挑选了1位候选人并努力帮助他竞选。我们还得到一个唯一的机会，即允许我们一份被取缔的周刊合法存在几个星期，此前它被列入斯托雷平政府的黑名单。

尽管历尽艰难，而且投票日又非节假日，但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仍然获得19.26%的选票，也就是说有权投票的2.5万名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我们。

虽然选票增长不多，但社会民主工党在道义上获得的胜利不容否认。这一点我们的对手立宪民主党也予以肯定。他们的官方媒体估计社会民主工党的选票增加了10%。

在市镇和乡镇议会自治机构选举中，我们党也有所进展，一般乡镇自治机构都由地主控制。仅以圣彼得堡为例即可说明市镇自治选举情况：在该市的200万居民中，只有1.4万名大地主有投票权。

我们梯弗里斯的党组织制订和发表了市镇选举纲领。我们同志的竞选活动取得成功，4 名在斯塔夫罗波尔当选，7 名进入梯弗里斯市镇委员会，2 名进入巴统市镇委员会。1908 年，另外几名社会民主党人在里加当选。

我们组织起来的工人小组在个别城市市镇选举中加入了选举联盟，特别是圣彼得堡工人小组加入了“居民和市镇选民协会”。他们对形势提出批评，提出全民参加市镇选举的要求，呼吁向失业者提供救济，在霍乱猖獗的地方加强卫生措施等，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个全新领域开展活动的转折点。

特别要提及的在工人居住区有步骤地组成“抗击霍乱委员会”一事，这是与病害斗争唯一有效的办法。然而由于资本家开办的工厂担心糟糕的卫生条件被暴露和政府胆小怕事的政策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选举运动中人们曾经热烈讨论是否参加乡镇选举的问题，拉脱维亚党已经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在农村夺得不少席位。

上述活动与宣传都是由非法组成的小组借助非法的刊物开展的。依靠合法手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党的刊物在俄国只能在地下开展工作。工会刊物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罚款、追捕和禁令导致他们的生存极端困难。当前工会数量极为有限。只有以下组织拥有自己的正式刊物：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裁缝、石油工人（巴库），敖德萨、基辅、伊丽莎白格勒等地工人。

这些刊物的编辑由工人选举产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没有自我封闭在各自代表的行业。他们花费了工会大部分的预算经费。

党在国外发行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工人刊物《真理》杂志。《真理》杂志发行 8000 份。许多地方党的委员会如敖德萨、莫斯科、尼古拉耶夫、梯弗里斯、巴库等都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发

行量分别为2000—6000份。报刊由地下印刷厂印刷。①

发放传单的工作继续进行，但远远满足不了增长的要求。传单内容涉及当前的热点和工人运动。非法组织的工人内部讨论的热点也是这些问题。

为弥补宣传的不足，我们成立了内容更加广泛的俱乐部。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还在国外创建了社会民主主义学校，俄国党组织向该校选派了25名工人。

目前，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募集捐款，并成立了党校筹备组织委员会。

同样，我们也有普及的图书馆，收藏了“自由时期”社会民主工党发行的刊物。

地方党的委员会难以发行自己的报刊。但需要说明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尼古拉耶夫、梯弗里斯、秋明和乌拉尔委员会在1908—1909年间曾经创办过自己的报刊。

关于近几年的罢工，下面的数据能够使人们得到大致的了解：

举行罢工的原因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 增加工资	2584次	967次	441次
2. 缩减工时	689次	341次	141次
3. 改善工作条件	967次	474次	187次
4. 政治原因	3645次	2744次	558次

无法一一列举工会受到的迫害和经历的痛苦。只需说明1908年政府宣布解散的工会的数量超过了允许成立的数量。1906—1908年期间

① 崩得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也有自己的报刊。

莫斯科工会章程需要提交当局批准。结果那个时期全莫斯科只有16家工会。行政当局一纸令下即可解散俄国所有城市工会（例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处以的罚款足以使任何地区的工会破产。72种工会刊物在1908年只剩下10种。1908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局宣布解散了80家工会和取缔了27种刊物。尽管如此，全俄国至1909年底仍然还有200家工会和4万名工会会员。圣彼得堡有工会20家，1万名会员和4万卢布的预算。莫斯科有16家和7000名会员。印刷工会在1910年年初拥有1689名会员。在巴库、梯弗里斯、敖德萨、维尔诺、伊丽莎白格勒、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其他城市都还有工会存在。

1909年共有34种地方工会刊物，发行量为216份。

最后几年工会运动的特点先是集中，尔后的主导思想是通过互助合作开展斗争。需要强调的是工会密切与我们党关系的意识在加强。

工人俱乐部与工会一样受到政府的迫害。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会被禁止，图书馆被关闭。俱乐部举行规模稍大的活动常常受到当局质疑并以各种借口关闭会场。尽管如此，这些组织周围仍然聚集了成千上万名会员。

杜马党团处境困难。在社会堕落和对民主无动于衷的时期，在地主和资本家占据上风的反革命议会中，党团肩负着维护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使命。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支持下，他们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日益成为倍受关注的中心，不仅是无产阶级理所当然的代表，也是全体革命民主要求的代言人。在所有日常的政治议题中，他们不仅反对沙皇反动派，而且还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斗争。这些团体中还包括政府的直接帮凶“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在宣布成为“陛下的反对派”后，完全脱离了民主派，成为“十月党”的帮凶。

我们无法赘述党团的全部活动，仅列举一些重大活动。他们参加了预算、土地、外交、恶毒的取消芬兰自治权法案的辩论，等等。

关于劳工立法，由于第三届杜马只关注加强反革命的势力，对此日程一推再推。受雇主协会领导的由大工业财阀和“十月党”组成的杜马委员会对涉及工人的法律草案（例如保险法案）采取了拖沓态度。

第三届杜马只通过了两个涉及少数工人的法律：第一部是“财政部系统工人工伤法案”（涉及13.6万名工人）；第二部是商业职工每周休假法案。我们党团投了反对票，因为两部法案损害了这些人员的利益，尽管法案声称将改善他们的处境。

我们党团广泛地利用了质询权。议会多数派自然也广泛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利反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质询的主要问题有阿捷夫[①]事件、政府对波斯的政策和迫害工会等。

有关1910年五一节的情况，我们没有得到完整的信息。这些信息告知我们，政府进行了迫害。尽管政府确实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圣彼得堡工厂还是举行了众所周知的五一庆贺活动。圣彼得堡许多工厂当日停工。许多印刷厂包括报纸印刷厂举行罢工，第二天大部分报纸停刊。尼古拉耶夫、萨拉托夫、沃罗涅日、塞兹兰和高加索的失业者举行了庆祝活动。罗兹工人在罢工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有的工人遭到逮捕。

* * *

在反革命统治的艰难岁月中，党内生活中出现了极端的两派：杜马部分社会民主工党党团议员的召回派和取消派（宣称反对所有非法和地下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同时党内的两个主要派别“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始终忠于党的旗帜的“少数派”（孟什维克）开始靠拢。格

① 阿捷夫（1869—1918），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该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892年起充当警察司密探。——编者注

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是后一派的领袖。

“多数派”不赞同召回派，这些人以歧视合法斗争形式的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闻名，公开主张党内全体成员的团结。支持必须与“取消派”倾向斗争的党员对此作出积极回应。知识分子蔑视非法和地下组织行动，尽管我们以适应现存条件为理由缓和了口号和行动，但他们仍不肯退让。“取消”党内非法组织、修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观点，他们首先坚持进行合法的斗争。

我们党很快摆脱了这两股极端倾向的束缚，在将合法与非法行动的看法以及开展议会内外行动结合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党的一套组织方法，成功地在党与工人运动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关系。

两次重要的会议确定了党的行动路线。

1908 年 12 月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会议之前召开了俄国工业中心地方组织会议、西北各省组织会议、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筹备会议、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会议。这些会议为会议选出了 5 名工业中心代表、2 名圣彼得堡代表、1 名乌拉尔代表、1 名西北各省代表、1 名伏尔加省代表、3 名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1 名哈尔科夫和基辅委员会代表、3 名崩得代表和 5 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除以上具有表决权的代表外，还有 5 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1 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

会议讨论了党的组织策略和方法，确定坚持 1905 年的革命传统和群众斗争的传统。会议还思考了与反革命和黑色杜马进行斗争的新条件。

1910 年 1 月举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申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次重要的全会谴责出现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错误倾向。

艰难的反革命岁月（1908—1910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尽管受到严重打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后退半步，无产阶级运动继

续昂首挺立。极端残酷、血腥嚣张的反革命无力击垮无产阶级和我们的党。

工人运动在继续发展。因此，我们坚信国际无产阶级不久将看到俄国无产阶级新的觉醒，他们将继续高举1905年的旗帜，即社会主义和国际团结的旗帜，痛击代表国际反动派希望并且已经陷入泥潭的沙皇制度。

最终胜利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者。

于1910年8月

俄国社会革命党向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一

三年前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我们提交了我们党的报告[①]。在起草那个报告时，第二届杜马仍然存在。在那届杜马中，我们党有40名议员。我们的议员在杜马中提出的“土地法案”得到杜马中104名代表农民的议员——接近杜马全体议员的四分之一——的签名赞同。俄国那时已经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总督将军们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但是我们党的地方组织仍在党的各个领域内积极开展工作。这使我们能在提交给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向全世界工人汇报社会革命党在我们广袤的祖国的大中心城市和偏远的角落开展的社会主义宣传、革命鼓动和斗争工作。

后来情况完全不同了。

第二届杜马被强行解散。为了保证地主阶级的多数，本来就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不公正的选举法再度被修改。6月3日（公历为16日）颁布的新选举法甚至委托由地主成员占多数的选举机构来选举农民代表。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被缩小到不值一提。

第二届杜马的强行解散，我们党是有所预料的。在那届杜马召开前

① 见本书第23卷第362—384页。——编者注

夕，我们党在1907年2月25—28日于（芬兰）塔墨尔福斯[①]举行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就清楚地意识到杜马解散的必然性。党从内外两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目标。党认为，那时杜马就应该“在人民面前揭露政府，加强与人民的联系，使任何企图强行解散杜马的行动变得困难和冒险，这应该成为一场新的革命运动的起点”[②]。

事实证明，因遭受失业、贫困和莫可名状的压迫之苦而无法掀起一场新的运动和斗争的劳动人民，没有能力立即发动一场总起义，而这是应对6月3日的政变的唯一正确的方式。因此，党在第三次会议（于1907年8月举行）上提出：

“（1）这些唤起俄国革命、加强革命的社会物质基础的总体因素，不仅没有停止发挥作用，而且还在继续发酵；

（2）经济危机及自然相伴它而发生的现象——饥荒、失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丰收和工商业回暖的年份只不过是瞬间的回光，根本不能影响整个趋势的发展；

（3）政府的措施根本不能改变整个国家生产力的瘫痪状况，只是使总体形势更加混乱。”

党的委员会指出：

“同所有反动势力的愿望相反，党坚信，俄国革命根本没有瓦解，它将随着群众中不满情绪的增长和觉悟的提高，建立起越来越稳固的基础”。[③]

---

① 今坦佩雷。——编者注

② “社会革命党（R. S. P）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杜马内外的策略的决议”（俄文版）；法文版见《俄国论坛报》1907年2—3期第5页。

③ 《俄国社会革命党第三届委员会通讯》（俄文版），1907年7月于圣彼得堡出版；法文版载《俄国论坛报》1907年第8期第8页。

由于政府前所未闻的残酷镇压，群众不可能通过任何有组织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于是通过种种徒劳无益的个人极端行动爆发出来。因此，党的第三届委员号召党组织特别注意“所有那些本身要求群众有组织的行动并激励他们加入广大的组织的方法”。

“鉴于分散的、小规模的暴动是对力量的无谓浪费”，第三届委员会同时又指出，在群众最终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的影响下，农民和士兵中存在着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可能性。从这样的看法出发，即“不能把军队的起义设想为一种根据约定的信号同时发生的席卷各地的起义，而应把它视为各地大规模的、成功的运动发展成为的一种自然现象”，第三届委员会告诫地方党组织，不要阻碍一场爆发后可能取得巨大——哪怕是暂时的——胜利的运动的准备工作。但是，“应该看到，每一场反对沙皇专制和当前政府的自发的和广泛的群众运动，都不能是无组织的，而应该是建立在明确的计划的基础之上的”。从这种立场来看当时的形势，党的第三届委员会宣布反对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只有哪些对未来的革命策略失去希望的人才会以议员的身份进入第三届杜马；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不参加选举的做法都是一种消极和无力的表现。新的选举法不过是对人民已经占领的阵地发起的一场进攻。党对此的看法是，应该以更加激烈的斗争来反击这场进攻，而不是使自己向这种局面妥协。因此，“对 6 月 3 日发生的反动政变作出的最坚决和最有力的回答、人民与君主王朝之间的最激烈的搏斗”应该是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选举。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党宣布抵制选举。然而，我们党的决定受到了孤立。除波兰社会党之外，其他所有政党都决定参加这次选举。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有力的宣传，使群众反对政府的罪恶伎俩的革命态度继续保持下去。工人群众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拥护和支持我们的抵制策略。

圣彼得堡有59家工厂的工人有权参加选举。但是其中28家工厂的工人，也就是说，近半数工厂的工人抵制了选举。在剩下的31家工厂中，也只有极少数工人投了票。例如，6家最大的工厂总共雇用了21885名工人，仅有5000人——不足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参加了投票。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一如既往忠于我们的党。在1907年初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他们大多数人把票投给了我们党。[①] 这一次，绝大多数人又拥护我们的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在莫斯科省的310家工厂中，54家工厂的工人拒绝参加选举，其余工厂也只有少数工人参加投票。在辛菲罗波尔，据反动报纸透露，“连续几天来，城里的大街小巷，甚至僻静角落里，都张贴着社会革命党号召抵制杜马选举的传单”。这一号召在工人群众中受到热烈的响应。

乌拉尔地区的情况同样如此。宣传抵制选举的活动遍及各地，并得到拥护。在卡塔夫伊万诺夫斯克，那里的工厂在上次选举中有1000多人把票投给社会革命党，而这次只有少得可怜的大约20余人聚在一起决定不顾大多数人的抵制愿望参加选举，并推选出1名代表。在维亚特卡省，为了避免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党为了在选举的后续阶段进行抵制，选出了党的代表。在兹拉托乌斯特城，4000名选民中只有90人参加了选举。而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在这个地方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获得胜利。在莫托维利哈的大工业中心，7000多名选民中只有400人参加了投票；900多名铁路职工也只有90人因当局的大力蛊惑而参加了选举。在布良斯克、特维尔、舒亚、奔萨和克列缅丘格等地，情况也如此。在这些地方，选举或者根本无法举行，或者——在更多的情

① 在那次选举中，工厂工人代表选出的代表不是社会革命党人，这是因为，大工厂虽然投票给社会革命党人，但由于选举规则，大工厂工人在选举中没有占优势，相反，一些小工厂工人却有着优势。

况下——只有非常少的工厂工人参加。在许多地方，工人群众对一些党组织放弃积极抵制策略——也就是扰乱选举程序——的做法感到不满。一些地区（如乌拉尔地区）支持抵制的多数人采用威胁的手段来阻止少数人（以全体选民的名义）选举代表的企图。

我们党在农村中的组织，由于党员不断地遭到逮捕、流放，甚至处死，受到极大的削弱。因此，党不能进行必要而又广泛的宣传工作。即使在时机较好时，也由于农村地域广大，乡民居住极为分散，组织抵制选举的活动也非常困难。然而，只要是在我们的组织能够有一些力量开展抵制宣传的地方，宣传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如在维亚特卡省①，我们的委员会仅能派出4名鼓动员。但经过他们的努力，一个乡的村民就通过决议，宣布不举行任何选举。其他不少乡的村民拒绝参加选举，尽管政府官员加以威胁，有的还对不参加投票的人处以罚金。在波尔塔瓦省的迪克安卡乡，村民两次因抵制选举而被罚款：第一次每人被罚半个卢布，第二次增加到一个卢布。尽管这样，选举仍未能举行。②

即使在举行了选举的地区，人们也可以看到，群众对第三届杜马的选举起先是漠不关心，后来逐渐变为厌恶和憎恨。“我们已经选了两次代表！这已经够了。我们不是小孩，让人来耍！”这就是被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从农村中选出其想要的驯服代表的专制政府强迫去投票的群众的普遍心理。

社会革命党的抵制策略是在与专制政府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的基础上联合和组织劳动群众的一种尝试。毫无疑问，这样的策略符合这些群众的愿望，符合他们自尊的感情。这种策略未能引导工人群众建立起强大和永久性的、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与政府进行斗争

① 全省面积为134538平方俄里。

② 整个俄国共计约有500个乡（全国共有19000个乡）实际上没有举行选举。

的组织。与之相反的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的策略，同样也没有使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政府前所未闻的镇压下免受解散的命运。

不过，社会革命党并未期望采用抵制策略能立竿见影。党知道第三届杜马将会召开，它早就指出杜马会是什么样子：它是政府手中操纵的傀儡工具，是各种反动势力——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中心，是为西欧金融寡头的利益、为挽救破产了的专制主义的残渣而设立的舞台，是一个以“议会”的名义颁布最反动的法令（对芬兰法、波兰法、犹太人法、大学法，等等），从而使俄国代议制政府的每一项原则都信誉扫地的机构。

社会革命党依靠的主要是道德上的胜利。而且，它的看法已经为第三届杜马在最近两年半的全部活动证明，杜马中的反对派采取的做法也不止一次与之一致，这些事实使我们党在今后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可能在群众中赢得更为广泛的政治影响。

二

1908 年，社会革命党受到政府最残酷的迫害，而它面对着的国家政治生活却一片宁静。

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党有必要对组织和策略采取新的方针。尤其必要的是，重新组织党的力量，联合所有在政府的迫害中幸存的组织，并使它们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因此，党决定召集现有的各个组织举行一次代表会议，以对当前所有的紧要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有关的决议。

1908 年春，在这次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党各区的地方组织先后各自召开了党的地方代表大会。党的代表会议于同年 8 月在伦敦举行。出席会议的都是全国工人和农民集居中心（除莫斯科地区之外）的代表，如圣彼得堡、乌拉尔、高加索、伏尔加、乌克兰和最南端的地

区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共74人，会议进行了12天，举行了24次会议。①

从代表们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运动的条件极其恶劣，政府的迫害和镇压使许多组织遭到破坏，但是工农群众并没有屈服。人民被从前的种种事件唤醒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党的社会革命活动的领域已经非常广阔。

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所有紧要问题的决议②，并制定了党今后活动的计划。

党认为，当前这一时期是短暂的，是下一场必然会到来的人民革命的新浪潮形成之前的准备阶段。因此，会议决定，在群众中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加强群众与党的地下组织的联系，并把这些组织联合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同政府进行的暴力斗争绝不能化为零散的、没有政治意义的行动；相反，它应该是完全集中的斗争。

代表会议就工农运动中的策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决议，如关于反对政府有关土地问题的立法的斗争的形式和方法的决议，关于地主问题的决议，关于工联主义和合作运动的决议，关于失业问题的决议，关于集体协议的决议和关于同盟歇业的决议，等等。③

会议代表在通过这些决议时，形成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这就为党在执行这些决议的过程中进一步开展活动，奠定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伦敦代表会议结束之后，党立即举行了第四届委员会会议。按照伦敦会

---

① 我们的两位英国同志——亨·迈·海德门和约·F.格林——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有关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党的中央委员会公布的俄语报告。

② 这些决议的俄文版见1908年9月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讯。关于党的代表会议和第四届委员会》；法文版见《俄国论坛报》1909年第9—10期。

③ 见《俄国论坛报》1909年第9—10期第3—9页。

议制定并得到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成立的党的第四届委员会批准的计划，1908 年下半年和 1909 年年初党组织的工作主要是：1. 通过演说和印刷材料，扩大党的宣传；2. 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区加强我们党的影响作用。从 1907 年下半年到 1908 年年底，党（主要是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发行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品（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等）共计 200 多万印张。1908 年中央委员会的收入为 17 万卢布（约合 1.7 万英镑），支出大约为 1.6 万英镑。其中组织工作方面的支出为 8000 英镑，印刷出版的支出为 2640 英镑，武装组织方面的支出 2320 英镑。

三

作为反对革命的手段，沙皇政府有计划地在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政党中精心制造了许多变节事件。近来，人们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1909 年年初，在 V. T. 布尔采夫同志的大力帮助下，一个极其重要的密探——社会革命党内的叶夫诺·阿捷夫——被揭露出来。这件事对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困难，暂时扰乱了党有条不紊的工作。不过，党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909 年 5 月，党紧急召开了第五届委员会会议。由于会议的召集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到会的代表不是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地区组织都有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消除阿捷夫叛变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问题。委员会认为，尽管这件事对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它没有导致沙皇政府所期望和斯托雷平所嘲讽的那种结果，也就是说，它没有导致党的队伍丧失斗志，陷入瓦解。委员会声明，因这一卑鄙的行为而造成的危险虽然巨大，但万幸是局部性的；党的队伍中被揭露出一个叛徒，其罪恶的活动多年来给党的很多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件事现在将激励我们去找出并肃清党组织中的叛徒。

第五届委员会也讨论了党在最近这一特殊时期的活动计划。委员会认为，自伦敦代表会议以来，国家的总体状况和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党原有的策略计划仍保持不变。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尤其是对那些有关组织的问题的说明，并发出了一些有关党对各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军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的指示。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委员会决定接受前一届中央委员会的辞呈，但委员会表示完全信任这些委员。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它负责调查阿捷夫事件，肃清其产生的影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现在已接近尾声，其报告可望不久就能见到。

第五届委员会的所有决议[①]都被提交全体党员表决，并以压倒多数的同意而被批准。

在这困难时期中，第五届委员会的会议对党的活动具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党的各个组织都只能进行地下工作，不可能举行公开的群众大会和进行定期联系，这次会议使完成党的所有重要工作成为可能。由于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对党的现有力量有了明确的估计，认识到党现在的处境并总结了党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

会议发言者都一致认为，当我们国家度过这段由于反动而造成的极其艰难的时期后，将迎来一个解放斗争的新纪元。在第三届杜马中得到铁心支持的政府，公开地走上了对任何表现出来的自由思想或者自由活动进行系统迫害之路。它企图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启蒙运动、工联主义或者工人阶级组织。社会主义政党遭到前所未闻的残酷迫害。监狱和流

① 俄文版由俄国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于1909年5月出版，题为《俄国社会革命党第五届委员会会议通讯》；法文版见《俄国论坛报》1909年第7期第12—19页。

放地到处都是政府残酷迫害的牺牲者，数千名男女被绞死。

农民引起了政府的特别注意。1905—1906 年间，俄国农民曾一致坚决要求所有私人地产为全体人民所有；这给沙皇政府敲响了警钟。因此，沙皇政府决定，用乡镇公用土地来吸引住农民的注意力，以此作为诱饵来瓦解农民。在 1906 年 11 月 9 日（俄历）沙皇颁布的土地法令中，斯托雷平政府用掠夺来的钱设立了一项基金，以此炮制了一个计划，在拥有私人地产的“强大”和“团结”的新农民阶级中争取对地主所有制的支持。政府实际上决定把“醉鬼”和“懦夫”——斯托雷平这样轻蔑地称呼农民中占多数的贫困的半无产者——踢走，通过完全牺牲他们来实现这一目的。事实上，斯托雷平政府正在私人高利贷者和剥削者之外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和佃户。这些人一方面欠下农民银行巨大的债务，另一方面还需要向众多的官员（银行官员、土地官员等）交纳二倍或三倍的款项。农民银行已经成为帝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除了抵押给银行的土地之外，它还拥有 400 万俄亩土地。用这个官方机构排挤的数以千计的土地所有者的做法，只能使债务缠身的农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政府自己身上。对乡村公共土地使用权的强行破坏也只能引起混乱和憎恨，而这种憎恨首先是指向当局的专制和残暴。但是，这种做法不能产生能够在任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巩固摇摇欲坠的现状的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它不会像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讲的那样创造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条件。根本不会！这依然不过是一种恶劣的官僚专制，一种对农民的无情毁灭，除了回归已经废除的农奴制之外，别无他样。

四

社会上的反动浪潮和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影响到党的处境。我们党

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不得不退回到和以前一样的地下组织状态。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党不得不用全部力量来反抗政府的迫害。

在不放弃利用法律所允许的组织（工会、合作社、“业余大学”等）提供的任何机会来捍卫和加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党致力于在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层中宣传自己的思想，建立党的秘密支部，通过各种途径与广大劳动群众联系。不管条件怎样恶劣，我们党始终没有停止工作。为了唤醒群众的觉悟，党已做了巨大工作。群众觉悟提高了，这种觉悟在现在必定会成为阻止反动势力滋长，使政府政策失去人民支持的可靠基础。

如同一年前的伦敦代表会议指出的那样，党的这次会议也认为劳动群众并没有站在反动派一边，他们的革命活动只是在那些受到政府最严厉镇压的地方呈下降趋势，有时甚至匿迹，但这些地方的许多群众依然忠于革命。反动派渗透到了我们走在最前列的队伍——与敌人短兵相接的组织[①]，我们的领导机构受到最严重的破坏，这就要求党将主要工作放在重建领导机构，恢复组织之间的联系。过去，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包括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最重要的中心地区。党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在与波罗的海和北部相邻的地区（主要是里加），在后杭爱省和沃洛格达省开展活动。此外，在乌克兰的农业省区，如哈尔科夫、基辅、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波尔塔瓦等省，也有我们党的活动。在那些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主要是与许多遭受政府残酷镇压后坚持下来的农民组织恢复联系。在与人们所说的南部地区相邻的地区，党专门在塔夫利达和赫尔松省的部分地区的农民中开展系统的工作，在这些地区，农民兄弟会在继续活动着，新的组织也在涌现。在一些地区，它们结成了地区联盟。

在广阔的伏尔加农业区——它曾在革命运动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

① 指俄国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编者注

用，党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政府在那里实行残酷的恐怖政策，迫害进步农民和镇压党的领导组织。重新恢复这些组织已无可能，找到和联合那些无疑还在伏尔加农民中活动的革命者和党员已是一桩困难的事情。

在俄国东部和中部的零星省份中，党也在农民中开展革命工作。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下诺夫哥罗德、梁赞、维亚特卡等省中，存在着农民组织（人们所说的兄弟会），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组织地、不停地进行着活动。

党在工厂无产阶级中的活动主要局限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乌拉尔矿区和高加索石油工业区（巴库）。在乌拉尔山区，尤其是兹拉托乌斯特、伊兹黑瓦和莫托维利哈等地的冶金工厂中，工人长期以来就很好地组织起来，为党的活动提供了基础，那里党的活动开展得很好。也可以这样说，在以巴库为中心的高加索地区，党的工作在俄罗斯工人和当地工人中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尽管近年来条件恶劣，但党的工作仍然稳步前进着。

除上述在按照党的路线开展工作的地区，在全国的许多地区（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农民、工人和陆、海军队中有我们党残存的组织，但这些组织尚未能与我们党的中央组织接上联系。

五

上文所述的我党在全国各地的分布状况，基本与1909年春举行的党的第五届委员会会议所描述的相似，在最近的这一段时期无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党组织的活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总的影响，在各个地方现在有的在增强和发展，有的在削弱。但总体上说，党的工作仍然集中在那些党开展工作较久的地区。

出于保护党的秘密活动和地下工作的必要，我们不能列举各个组织以及它们人员的比较详细的情况，也不能公布有关党的力量和活动方式的准确的估计数字。

由于俄国警察采取的特别严厉的措施，党的出版活动暂时主要在国外进行，这一时期的情况大致如下：

党的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有：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劳动旗帜》，在陆军和海军中发行的宣传刊物《为了人民》，为农民出版的《土地和自由报》和为工人群众出版的大众读物《人民事业》。此外，《俄国论坛报》也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出资发行的，但由于该报主编身体不佳，报纸于1910年初停刊。1910年，党创办了一份新的俄文季刊《社会革命党人》，介绍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和纲领问题。

下列书籍和小册子也是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斯捷约尤夫：《农民灭亡的规律》（两个版本）；泽温：《意大利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温尼琴科：《一场斗争》；希什科：《1906年11月9日法令》；乌里扬诺夫：《一位第一届杜马代表致农民的公开信》；格尔舒尼：《往事的回忆》；阿诺尼姆斯利[①]：《伦敦代表会议报告》和《纪念希科》等。在1909年6月1日至1910年6月1日的12个月中，中央委员会共出版发行了54000份期刊、22000册书籍和宣传册子。每个印张有40000个字母，总计250000页。

为了使这些重要文献运到俄国，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运输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09年6月到1910年6月的一年中，用于出版、运输和其他必要的组织工作的经费共计80000多卢布（约合8000英镑）。

至于我们在俄国本土出版的俄语刊物的情况，我们只能作一般性的介绍，因为泄露其详细的情况会危及刊物的生存。在过去3年（1907

① 阿诺尼姆斯利为英文“Anonymously”的音译，意为“匿名”。——编者注

年—1910 年）中，政府发现和破坏了许多地下出版机构。这些机构一旦被破坏，不仅印刷人员，而且与之有关的所有人员都遭到逮捕，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几个地区的委员会，即外高加索、北方、乌克兰、西北地区、乌拉尔以及西伯利亚和塔夫利达两个联合会，总共发行了 13 种期刊。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西北地区委员的刊物，共计 5000 份。15 个城市委员会也出版了 21 种期刊。3 个工人团体也出版了 3 种日报。这样，除中央委员会发行的刊物之外，以上 25 个组织总计出版发行了有 37 种报刊。另有一些或多或少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纲领策的各种工会，在这三年中也出版了一些自己的报刊，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邮电工人联合会、全俄路工会、黑海海员和码头工人联合会、里海商船船员工会。出版名为《国民军队》月刊的陆军军官联合会和在自己的 3 个分会出版 4 种刊物的全俄士兵和水兵联合会也受到我们党的强烈影响。

六

目前，反动势力正在俄国猖獗。国家在经历反革命大行其道的艰难时期。社会公众思想混乱，政治冷漠情绪在不断抬头，文化在堕落。一些过去曾是先进政党中的思想理论权威的学者，其中有的曾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现在也公开成为反动思想的头面人物。他们或多或少转向“秩序”，转向民族主义、官方的正教，甚至去讨好受到官方保护的俄国教权主义。过去几乎未所闻及的色情文学，如今也在文学刊物市场上稳定地占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严肃的理论著作的需求在下降，读者的品位越来越变得不可捉摸和不稳定。总之，反动势力的胜利不仅仅局限于非精神层面。大部分有教养的人士屈从于反革命势力的精神影响。我们在告诉工人群众可喜现象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强调这些相反的方面。

不过，我们也不会忘记指出，与这些丑恶的现象作斗争的迹象在此

刻也是明显的。政治暴政已越来越使人不能忍受。国家杜马中反对派的种种有组织的努力，已被证明统统是徒劳的。反对派的种种让步、妥协都不能使其摆脱受围攻的处境，相反只能助长极右翼分子的肆无忌惮和狂妄。于是，不管愿不愿意，反对派都只能被迫更多地采取示威的策略。有几次它们以退出议会的方式来表示抗议。然而，这种做法收效甚微。现在，统治集团对它们一再退会的做法不屑一顾。它认为反对派从来就没有胆量集体退出杜马，因为这一举动就意味着半立宪制政府彻底瓦解，意味着呼唤人们重新采取不妥协的革命策略。沙皇政府认为，宪政的装饰品连同所有的配件都应受到保护，尽管在这个国家肆虐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和杜马中“百人黑帮”的肆无忌惮的行动，已经使这个准议会成为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恶和可怜的胡闹场所。俄国议会的这种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态度和反对派的软弱无力，正在为人们转而支持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政党准备条件。我们这个持不妥协策略的党，就是这些政党中的一个。事实上，杜马已经面临一种抵制，一种对它完全冷淡和轻视的抵制。如今工人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还远没有达到能够集体地表现出来的程度。尽管如此，由热烈的期盼、一些模糊的希望和寻找出路的想法酝酿出来的情绪已经在逐渐增长。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大胆的、主动的革命行动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释放出巨大的力量，成为引起群众起义的转折点，尤其是在革命力量已经聚集起来，得到加强并做好进攻准备之时。社会革命党正在为了这一聚集和加强革命力量的工作——这一为决定性的进攻做准备的工作——而全力以赴。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907—1909年活动的报告

不幸的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提交一份记载它在拉脱维亚和俄国工人阶级经历的最困难时期的活动的报告。从1905年秋天到1908年年底，拉脱维亚（库尔兰和立窝尼亚地区）实行了军管。从那之后，特别警察监管日常的秩序。从1907年年初起，警察讨伐队和临时特别法庭在库尔兰和立窝尼亚地区肆虐。单凭本地奸细和德国贵族的告密，任何一个仅被怀疑参加过革命运动的人都会遭到拷打，或者绞死和枪毙。后来警察讨伐队和临时特别法庭不复存在，但是常设的战地法庭代替了它们。在它审理下，数以千计的人被处死或关押。根据1910年之初里加的一个重要监狱的囚犯自己所做的调查，在该监狱中光政治犯就有135人，合计徒刑1022年零6个月。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今天战地法庭的活动仍然猖獗。今年上半年，参加1905—1906年革命的革命者在里加有2名被判处死刑，其他正在等候战地法庭的判决。此外，还有许多同志因在过去两年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而被捕和等候战地法庭的判决。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继续活动和工作。

自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之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在立窝尼亚、库尔兰以及维捷布斯克的部分地区开展活动。党员中有4个民族的成员：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立陶宛人。绝大部分党员是拉脱维亚人，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居民中处于绝对多数。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有 8 个地区组织。党员人数 1907 年为 16000 人，1908 年为 5000 人，1909 年为 3500 人。1907 年党组织的收入总数为 25291 卢布 27 戈比，同期支出 24316 卢布 4 戈比（1907 年 5 月没有包括在内）。1908 年收入为 6260 卢布 90 戈比，支出 6316 卢布 98 戈比（不包括 9、10、11 月）。1909 年收入为 4192 卢布 66 戈比，支出 4142 卢布 62 戈比。以上数字仅指中央委员会的经费收支状况。由于中央委员会的经费只占整个党组织经费的 25%，其余费用由地方组织自行安排，因此党的经费实际上更多。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红十字会”积极支持我们被捕和被判刑的同志，还为我们同志承担法庭辩护的费用。这两项开支每年合计大约有数千卢布，但是这些经费是单独的，不包括在上述经费数目之内。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在西欧有 15 个社会民主党组织，265 名党员和 1 个国外委员会。国外委员会在经费和宣传方面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提供支持。美国有两个拉脱维亚人的社会主义组织在活动。一个是美国社会党的拉脱维亚民族组织，成员近千人，现已被美国社会党接纳为成员组织。另一个是拉脱维亚工人联合会，约有几百人。这两个组织，特别是第一个组织通过专门募捐在财政上给我们党提供了帮助。1907 年和 1908 年期间，海外拉脱维亚同志资助的经费是相当可观的。以 1908 年为例，该年度我们党的财政收入中，半数是由海外同志援助的。1909 年海外的资金援助除西欧地区之外大大减少，但它仍然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与党有十分密切关系的“红十字会”的财政经费中占很大的一个部分。

1909 年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与 1907 年相比下降了不少，同时党的收入也下降了。如下几个因素解释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1904 年年初，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约有 1000 名党员；后来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党员人数也迅速扩大。在革命时期，即 1905 年和 1906 年，

党员人数增加的速度更快，达到了顶峰。那时有许多同志来自中产阶级，他们在革命时期加入无产阶级组织，但当反革命势力占上风和镇压开始时，就退出了我们党的队伍。拉罗维亚在报告涉及的这几年——1907、1908、1909 年——普遍存在的、至今仍未消退的工业危机，严重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许多加入了组织但阶级意识较弱的劳动群众因此离开了社会民主党队伍。除了国家的政治状况，我们还必须特别指出一个打击拉脱维亚劳动群众的斗争精神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地警察和保安队的野蛮行径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和调查。1906 年和 1907 年间，里加的秘密警察因以中世纪刑罚手段折磨政治犯而声名狼藉。然而，不仅里加的秘密警察，而且普通警察和从利巴瓦[①]、米塔瓦[②]、温达瓦[③]以及其他小城镇和省区的德国贵族中招募来的义务警察也对政治犯进行拷打和处罚，还特别使用了一种新的处罚方法——“放犯人逃跑，然后将之射杀”。现在对政治犯的惩罚和折磨在程度上比 1906 年和 1907 年轻了不少，但这样的惩罚和折磨并没有被停止，严刑拷打政治犯的事情依然发生。在不能通过拷打达到目的时，警察就企图通过恐吓、劝诱等方法来使犯人叛变和告发其他同志。从 1909 年到今天，里加的政治犯如果出卖自己的同志，就不仅可以恢复自由，而且能得到一笔赏金，甚至还能在警察机构中得到一个好的职务。反动势力猖獗的同时，政府还千方百计地瓦解群众队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由于叛变和告发遭受很大的损失，结果导致党员意志松懈，人数下降。但是，这场危机显然已被克服了。在整个反革命反动期间，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一刻也没有放松自己的活动。社会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

① 今利耶帕亚。——编者注

② 即叶尔加瓦，米塔瓦是德国人的叫法。——编者注

③ 即文茨皮尔斯，温达瓦是德国人的叫法。——编者注

的在群众中得到了比三年前更加鲜明的宣传。现在，中产阶级成员脱离了我们组织，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就构成了我们党的主体。此外，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经济处境或革命传统与无产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党的活动和领导权都是由工人控制的。在所有阻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统统被受压迫的俄国无产阶级扫除之前，这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战胜反动势力进攻的保证。

1907—1909 年三年中，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开展活动：维护和加强地方组织；向那些党的工作因反动势力的破坏而中断的地区派出宣传员和散发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册子，以恢复那里的组织活动。

在这三年中，党出版了下列报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发行了 47 期（第 60 号—99 号，第 101 号—107 号），共计 429500 份；1907 年 5 月 1 日出版的《五月画报》，10000 份；《当前政治问题》第 12 期，4000 份；《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公报》第 1—3 期，合计 18000 份。除这些报刊之外，还有 10 期以俄语出版的《斗争报》（第 11 号—20 号），共计 33000 份；5 期专刊《士兵呼声报》（第 24 号—28 号）共 15000 份和 10 期《刺刀》（第 1 期—10 期），共 48000 份。后两种报刊是专门为军队组织发行的。这里我们需补充说明的是，从 1905 年初到 1908 年的几个月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为了进行专门的鼓动在士兵中建立了军队组织。军队组织有自己的委员会，发行自己专门的报刊。除了上述报刊，里加还有一份在知识分子组织中发行的俄语报纸《同志报》，它出版了 3 期（第 1 号—第 3 号），共 3000 份。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共发行了报刊 561000 份，宣传册子 1149700 份。宣传册中，以拉脱维亚文出版的有 836800 册，以俄文出版的有 244900 册，以立陶宛文出版的有 52000 册，以德文出

版的有9500册，以犹太文出版的有3000册。此外，专门为士兵中发行的宣传册有12500份。如上数字包括了中央委员会的地下出版机构出版的报刊和宣传品，但未包括每年也发行大约数万册的地方组织的报刊和宣传品。所有这些都属于非法的秘密出版物。然而，在我们的秘密出版机构遭到几次搜捕，损失了许多同志和经费（10人被判处63年劳役，9人判处18年徒刑，17人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于1909年年底决定，中央机关报刊在国外印刷，在本土只是不定期地印刷一些宣传册子。同年8月《社会民主主义先驱》杂志第一号面世，这是一份党的理论刊物，由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出版。它共发行了几期，约16000份。现在，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报》再度出版，取代了它。卡尔·考茨基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最近被译成拉脱维亚文出版，发行量为4000册。除了以上的非法印刷物之外，在拉脱维亚还发行了数万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杂志（其中一些遭到没收）。这里尤其必须指出的是，过去三年中，一份每周两期的合法的拉脱维亚语马克思主义报纸除了有过几次中断外一直在出版。这份报纸的目的，是启发和进一步提高和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

1907年夏天，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建党后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08年秋天，它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三年期间，他们还举行了几次党的代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回顾和检查前一时期党的全部工作，制定新的策略。许多在革命时期似乎是有用的策略如今不得不停止使用，必须制定出与当前时期的条件相适应的策略。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第一届俄国杜马的选举。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我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但由于政府千方百计反对社会民主党，我们只在里加的选举中使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同志——扬·奥佐

尔——当选杜马代表。尽管俄国政府在6月3日的反动政变后对选举制大加修改，使之变得更为恶劣，但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里加工人在第二选区仍取得了压倒里加大资产阶级政党的胜利。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普列德卡林凭多数选票——大约300张——被选入第三届杜马，尽管在选举宣传期间他被当做政治犯关进了监狱。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城市自治机关或者市镇选举，因为工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利。但是，对这一选举，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市政纲领和宣传材料，指出市镇选举中的错误和不民主的做法，这些做法说明了阶级之间的差别。至于农村自治机构的选举，地主和管家们每人都有一票，而农工和那些无地的人每人才有十分之一票。社会民主党参加了选举，在几个地区中被选为代表。这些代表们正在为按收入累进的做法给市政府征收的税分档进行努力。在一些地区他们的努力已经取得成功。此外，他们还在为实行专门的伤残保险和贫困保险以及改善人民教育状况而进行斗争。

至于工人运动的合法组织，库尔兰地区根本不允许成立工会。农业工人也没有任何组织劳动协会的合法权利。直到1908年年底，里加才成立了第一个各行业工人的工会（印刷工人工会成立的时间更早一些）。目前，里加共有9个工会，会员大约有5000余人。工会发行的报刊有两种，一种是以拉脱维亚文出版的《工会会员》，每月两期；一种是以德文出版的《波罗的海印刷工人报》，每月一期。三分之二的工会组织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政府禁止工会给其会员举行教育讲座，只允许举行与行业直接有关的讲座，如裁缝怎样裁剪衣服，面包师如何烘制面包等等。政府也禁止工会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善会员的劳动条件。总之，只要工会采取任何步骤来改善工人群众的处境，就会被关闭。因此，在面临各种经济问题和冲突时，工人们都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是他们唯一的引路人和帮助者，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冲突和罢工斗争都证明了

这一点。譬如，最近里加的石工请社会民主党为他们出版一份小册子，党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政府对工会的这种残酷迫害，使工人不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合法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迫使他们转向社会民主党。

党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妇女和青年组织。

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1907 年至 1910 年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国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期间，现行反动统治者准备对芬兰的自治和民主自由进行决定性的进攻。俄国政府开始摧毁芬兰的基本权利，在众目睽睽之下，第三届杜马中的多数派公然批准了这种丑恶的行径。今年芬兰社会党面临这样的艰巨任务，即竭力利用在 1905 年革命中获得的成果，尽一切可能加强已经取得的阵地，密切注意着俄国反动派的阴谋和内政部的计策，始终准备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利，并通过即将发生的为芬兰自由宪法的斗争来继续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反抗。

我们必须简述一下芬兰的政治自治。

在同瑞典交战期间，芬兰议会于 1809 年在博尔戈召开，亚历山大一世在那儿堂而皇之地向谈议会保证维护芬兰宪法。在 1809 年签订腓特烈港[①]和约，瑞典明确地将芬兰交到俄国沙皇手中，成为他控制的大公国时，这种立宪政府的法律就已经被确定下来。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芬兰成为俄罗斯帝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对于外国政府来说，它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法庭、海关、币制等。

根据始于瑞典统治时期的法律原则，未经国民会议同意，不得实施法令，不得对人民征收新税。自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以来的所有俄罗斯君

① 今哈米纳。——编者注

主都承认了芬兰的自治，他们每人（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即位时都许诺将像其前任者一样保卫芬兰的各项权利。芬兰的自治不仅以政治文件为据，而且也依据若干世纪以来的历史惯例，芬兰正是按照这些惯例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从自己的愿望出发来发展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

仅仅在几年前，芬兰议会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而颁布的法令就表明了这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自治的原则。它明确地宣称自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除非得到芬兰大公和芬兰国民会议两方的同意，否则既不能废除也不能修改。

俄国政府当然曾经几度侵犯过芬兰的权利，但这类做法一直被认为是专横的、非法的。1894 年 2 月（即博勃里科夫总督时期）的情况尤甚，当时沙皇发表声明，胆大妄为地以俄国沙皇的名义来废除芬兰宪法。这个声明的结果是，1901 年当局企图通过政变来废除 1878 年根据芬兰人的基本权利而精心制定的民兵法，并用行政手段将新的军事法强加于芬兰人民。这一企图因人民抵制而归于失败。新军事法未能实施。当 1905 年到来时，芬兰无产者在 10 月宣布总罢工，开始了革命斗争，这名总督将军的独裁告终。各种违宪的教令——军事法也在内——被撤销，沙皇 1905 年 11 月 4 日的声明宣布恢复“法令秩序”。在该声明中，沙皇允许稍稍落实一点普选权和政治权利，对国民议会进行一点点民主改革。这些改革同样被当时的议会所接受，并在沙皇尼古拉于 7 月和 8 月批准后成为法律。现在受到俄国反动派进攻威胁的，恰恰是这些民主改革措施：普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权、结社权、个人的不可侵犯。芬兰无产阶级现在在为芬兰的政治自治和人民自主行动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捍卫的，也正是这些改革措施。

伴随革命斗争和胜利而至的是芬兰整个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发展。已获得的种种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主要归功于社会党的有力行动，这

是群众在1907年3月15日和16日的首次立法机构选举中涌到我们旗下的原因。我们党获得了329946张选票并取得了80个席位，这占新议会全部席位的五分之二。

自社会党的这次选举胜利后，芬兰的代表机构一直被俄国反动派所不乐意地承认。不管怎样，斯托雷平政府当时并没有对芬兰发动任何重大攻击：为了消灭俄国革命起义的残留分子，首先必须使用绞索和杀戮，而且也必须利用芬兰资产阶级的怯懦和优柔寡断。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答应在此期间为俄国提供2000万马克的军费。然而，随着俄国政府越来越具有威胁性，议会在1908年就政局质询芬兰参政院。辩论的结果是社会党的决议案获得多数票支持。老芬兰党人由于政治原因而没有投票，资产阶级的参政院被人们投以不信任票。该参政院被指责一直过于迎合俄国政府的种种要求，任由警察在芬兰领土上对俄国革命者和流亡者进行迫害，曲解芬兰的政治权利并延误了已经开始的改革工作。沙皇随即于4月命令议会解散，以莱昂·梅克宁为首的参政院辞职了。

新的议会选举定于7月1日和2日举行。俄国反动派在此间隙对芬兰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6月2日的敕令宣布，今后芬兰各种事务以及芬兰议会的各项决议，均不得由芬兰官员直接呈报沙皇，而必须首先通过俄国大臣。这种做法是对芬兰内部事务的一种侵犯，俄国国务会议当时显然想借此使芬兰议会的全部立法改革工作瘫痪。为回答这一敕令，芬兰人民在7月选举中再度把选票投给了社会党，使社会党赢得选举。随时准备向俄国政府妥协的老芬兰党既丢了选票，又失去议席。（559席中，他们仅保住了54席）

1908年秋天，议会还能平静地工作。然而当1909年2月议会会议开始时，议长在讲话中提及博勃里科夫的昔日助手塞叶恩被任命为副总督一事，并就干预芬兰事务的违宪行为问题表达了议会的观点。卡尔斯科耶·塞罗立即下达了一道解散议会并定于5月1日和3日重新选举的

正式命令。

斯托雷平政府打算利用屡次解散议会的做法使芬兰的国民代表机关声名狼藉。它希望削弱群众对选举的兴趣并同时打击社会主义。结果恰恰相反。社会党候选人在全国获得337630票（即全部选民的39.8%），我们的议会党团在议会获得了84个议席。而且，新议会带有公开的反对党的特征，老芬兰人党再度惨败：他们丧失了6个议席。

俄国政府随后公然继续推行其凶暴的政策。1909年10月7日的声明宣布，能够决定军事法问题的只有俄国政府而不是芬兰议会，帝国君权的原则适用于该问题。

芬兰议会必须批准从芬兰的公共基金中拨出圣彼得堡所要求的钱款；无需议会的事前批准，芬兰必须付出2000万马克；随后的年份还将设立一项军事税，开始是1100万，以后每年递增100万，直至达到2000万。这份声明是对芬兰宪法的真正侵犯。俄国政府竟敢攫取处理某些问题的权力，而这些问题过去只能与国民代表机构共同决定。冲突是必然的，这种侵犯威胁到我国的根本利益，各资产阶级政党被迫投票反对这个军事计划。更不待言，社会党人作为沙皇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率先反对这个计划；即使它被以合法形式提出，社会党也将再次投票反对这样的做法。

议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声明俄国的要求缺乏现存法律的依据，因而按照法律该军事税不能从芬兰财源中支付。老芬兰党人原则上赞同这项决议，但他们连同几个“立宪派”芬兰青年党人希望批准那些出于合理的理由而要求的款项。

尔后议会被第三次解散。同时芬兰参政院——老芬兰党人占大多数的资产阶级联盟——经过好一番踌躇，在想同俄国反动派妥协的种种企图终于彻底失败后也辞职了。随后，对芬兰法律一无所知，不懂我国局势和需要的俄国军官被委任组成了芬兰参政院。这些俄国人尤为擅长执

行来自圣彼得堡的违宪命令，擅长制造对我国的文化发展的极大伤害，并将俄国的制度运用到芬兰行政中。

今年2月1日和2日的选举再次明确无误地证明，芬兰人民站在他们的选出的代表后面，他们坚决决定将不屈不挠地把这场业已开始的护宪斗争继续下去。社会党再度获得最多的选票（占总数的40%），他们的席位由84席增至86席。

而且由于墨守成规的老芬兰党人在护宪冲突中已自我表明最乐于向沙皇让步，大批选民抛弃了他们。他们党的议席在3年内由59席降至42席。例如，他们在北方的选民投了激进的小土地所有者政党的票。

新议会前景难测。沙皇政府正在此时将前些时候所决定的“政变”计划付诸实施。3月27日，俄国政府发布声明，宣布将在芬兰实施俄罗斯帝国法规，而且今后芬兰宪法的基本内容——大多数同芬兰直接有关的问题（教会、刑法、公共教育、出版和结社法等）——必须由杜马和国务会议决定。芬兰应派四名代表参加杜马，一名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这样，芬兰议会将被变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省级行政机构。

该声明完全是对帝国宪法的摧毁和对芬兰人民权利的蛮横剥夺，他们甚至竟敢向芬兰议会提出让它政治自杀的这一令人作呕的要求，并强迫它当月必须对此表态。

他们早就清楚，芬兰议会将如何回答。

芬兰议会在答复中援引历代俄国君主曾许下的维宪诺言；它指出，根据芬兰宪法，唯有经芬兰议会和君主共同决定方能修改基本的法规。议会进而宣布将不会放弃其决定权，因而不能对俄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表态。该决议于5月5日被议会一致通过。然后议会转向其法定的议会工作，包括否决了俄国政府提出的军事税。会议于5月30日结束。议会将于何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再次举行会议？这点还不能确定，看来好像不大可能。

俄国政府认为恰好可以利用第三届杜马的权力来掩饰对芬兰的侵犯。斯托雷平曾正确地断定这种代表机构具有奴性。杜马中的多数派也曾为期托雷平的压迫政策欢呼过，这种政策现在已经被用来对芬兰的自由宪法发动凶猛的攻击。

芬兰人民坚定而一致的意愿，欧洲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的抗议，欧洲著名法律人士的分析，对政府理性的呼吁，某些俄国官僚的意见，这一切都既不能阻止残暴和丑恶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能打消俄国反动派的盲目仇恨。因此，我们目睹了一位俄国政府大臣的可耻表演，当君主政体的支持者们见利忘义地把君主关于立法机构（其职责本在于为俄罗斯帝国奠定宪政基础）的誓约置之于不顾，去摧毁另一国人民的现有宪法时，该大臣不是求助于现有的法律，而是诉诸暴力。

对我们无产阶级来说，芬兰的政治自治意味着民族主权、民主自由、精神文化和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繁荣。俄罗斯帝国的法律在芬兰实施则意味着社会、政治、精神领域的奴役。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野蛮的压迫；对于全体芬兰人民来说，这意味着深重的苦难。

芬兰社会党不抱任何徒劳的幻想。它无疑将经受迫害和血腥报复，如同其俄国兄弟们已经经受的一样。但我们也相信，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摧毁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有素的芬兰无产阶级将在这场充满荣誉和光荣的战斗中产生。

政治组织

党的统计资料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社会党力量的下述数字。

隶属于党的力量：

1906 年，937 个协会，会员 83027 人（其中男会员 65017 名，女会员 18983 名）。

1907 年，1156 个协会，会员 80328 人（其中男会员 61455 名，女会员 18873 名）。

1908 年，1127 个协会，会员 71266 人（其中男会员 54438 名，女会员 16828 名）。

在 1907 年和 1908 年分别有 197 个协会和 274 个协会没有公布其会员的数目。

人们初看之下可能认为党在倒退，但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革命年月的浪涛给我们队伍带来大批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斗争结束时退了回去，鲜明的阶级界限刚使他们明白过来，部分人便重返小资产阶级队伍。

同样必须指出，在 1906 年和 1907 年我们的协会也算进了那些自称加入了我们党但没有定期交费的会员。现在我们各团体的报告中，只包括那些加入了组织并定期交纳党费的会员。

社会主义在芬兰劳动群众中已根深蒂固。各组织的力量在继续增长，由于非常广泛的宣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地方协会遍及全芬兰。城乡各地都在开设工人图书馆和阅览室。人民之家的数量年年增加。始办于几年前的各社会主义报刊拥有大量读者，而且党现在有很多印刷社。各组织的年度收入一直在增长。

1906 年各协会拥有 129 栋房屋。

1907 年各协会拥有 226 栋房屋。

1908 年各协会拥有 370 栋房屋。

1906 年度收入：1080875 芬兰马克。净资产：1052986 芬兰马克。

1907 年度收入：2468966 芬兰马克。净资产：1681021 芬兰马克。

1908 年度收入：2506481 芬兰马克。净资产：3361039 芬兰马克。

这一切全将成为俄国破坏者的猎物！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工人协会在几个地方收到了市政当局拨给的

维持图书馆和阅览室的补贴。

1906 年这些补贴金额达 71086 马克，翌年仅有 60058 马克，1908 年降至 37097 马克。这也是正在芬兰涌起的这场始终尖锐的斗争的一个征兆。

议会活动

芬兰实施的无记名和直接的普选制包含下列规定：凡年满 24 岁的公民，不论男女，均在议会选举中享有投票权。该选举权不给予连续 2 年未纳人头税（1—2 芬兰马克），不能提供贫困证明者，连续 3 年未登记住处以及所有定期接受慈善机关救济者，所有丧失公民权利者或年龄不足者等。全国划为 16 个选区。共选 200 名议员，其中 199 名由 15 个选区选出（每一选区有 6—22 名代表）。北部的拉普马尔肯选区仅有 1 名代表。根据比例制，选民对一张有三名候选人名字的名单投票。这种名单根据政党的提名编制，按照抗特计算法（1—1/2—1/3）[①] 统计票数。

选举统计资料表明了下述结果：

1907 年，社会党获得了 329946 票，即全部选票的 36.7%，80 个议席，其中 9 名妇女。

1908 年，社会党获得了 310826 票，即全部选票的 38.4%，83 个议席，其中 13 名妇女。

---

① 抗特计算法是比例代表制下的一种议席分配方法，因其发明者比利时数学家维克多·抗特得名。基本规则为，把每一参选党派所取得票数除以一、二、三，直至议席数目，然后将得出的数字分配予该党派名单上的排第一位的候选人、第二位的候选人，如此类推，然后比较各党派候选人所获得的数字，高者为胜。——编者注

1909 年，社会党获得了 336490 票，即全部选票的 39.8%，84 个议席，其中 12 名妇女。

1910 年，社会党获得了 316951 票，即全部选票的 40%，86 个议席，其中 10 名妇女。

在某些地区，像南塔瓦斯特兰、北塔瓦斯特兰、奥布北区、圣米歇尔、库奥皮奥东区和西区、东瓦萨，社会党的选票超过了 50%。这种惊人高的比率得用近几年社会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党在一场延续几年的激烈斗争后，已经推翻了封建议会并在 1905 年赢利了民主自由。

在反对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工人政党是维护自治和自由的最有力的斗士。社会党在芬兰确实是希望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实行彻底改革的唯一的党，它竭尽全力去实现这种改革。正因如此，不仅城市工人，而且农村的劳动群众和小土地所有者都把维护自身利益的任务交给它。然而，社会党从未否定过它的学说的基本性质。它在工作中总是试图忠实于其社会主义纲领的原则。

当社会党在 1907 年的首次选举中获得了如此众多的选票时，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坚持认为那只是短暂的胜利，并声称社会主义潮水将很快退落。但是，社会党不仅坚守了他们的阵地，而且一直在继续获得新的议席。党所获票数确实在变化，而且 1909 年和 1910 年的票数少于 1907 年。但通过比较投票总数就能看出，社会党的得票率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在芬兰，投票的情况在各地各不相同；在议会接连遭到解散的时期，在各个选区都出现了某种明显的厌倦投票的情绪（在 3 年之中举行了 4 次大选）。社会党所得的票数不应归于偶然的胜利。来自不同选区的稳定的选票数证明了这一点。芬兰政党的总体结构变化非常缓慢。芬兰社会党发挥了它的所有力量，试图启发群众并在群众中持之以恒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为了说明在我国政治党派的分野和芬兰议会的立法工作，我们想简单介绍一下芬兰的经济形势。

芬兰的经济形势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主要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这种发展的动力是对森林资源的资本主义式开发。甚至现今我国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二还是木材产品。

1907年工业企业雇用的工人总数约为135000人，其中39000人受雇于锯木厂、造纸厂和赛璐珞厂。1907年芬兰的工业产值估计达51.16亿芬兰马克。1900年人口普查之后，全国产业工人人数（含其家庭人员）为288343人，占总人口的10.6%。但是，工业中雇用的工人人数要多得多。实际上我们必须加算上伐木业和木材运输业中雇用的大批工人。我们没法制定有关这类工人的精确统计表，因为他们没有固定职业并且只是暂时在农业中劳动。1908年城镇工人人数总计达438564名（即总人口的14%）。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由于水力资源的因素，有半数工厂坐落在农村。

农村人口构成了芬兰人民的很大的一部分。在1906年人口普查后的连续几年中，他们的特别统计数字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形势。

农业中雇用的总人数达155万名（即人口的57%），我们还得再加上37万没有固定职业的劳动者。

因此，农业形势的发展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基于农民群体的政党集团来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农村最有影响的政党是由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其中有少量的地主）建立的，他们在1901年纳税11万。接着是代表16万户人家的半劳动者——小农，最后是真正的农业劳动者（无地者）和没有选举资格的人，他们代表13万家农户。

在最近这段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农业危机，因而在无产阶级阶层和小农中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我们现在来谈谈我们党的真正的议会活动。社会党党团在议会中拥有的力量使我们必须对现在的局势进行猛烈的批评，揭露资产阶级政党虚伪和暧昧的政策，始终为加强议会的权利而奋斗，并首先利用革命后的短暂间隙在所有领域推广众多必要的改革。这些愿望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党无情的阶级政策的阻碍。后来，当议会制定并通过的法令被提交俄国大臣时，改革的工作变得更为前途不测。可是社会党仍然一直在工作，以便至少为解决各种立法问题制定出将采取的路线。

在这三年中，芬兰议会做了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涉及各个领域的若干问题得到了处理。议会的实际会期很短（正常情况下每年为 3 个月，议会总共工作了 14 个月）。但是，反复解散议会危害匪浅。许多紧迫工作在会上没有讨论。

俄国政府的侵略性政策及其违宪行径，连续不断地埋葬了议会。议会在每次会议上都采取反对反动进攻的立场，并通过质询、请愿和发表演说的形式来抗议这种违反宪法的行径，而且强调芬兰自治的原则。资产阶级党团（尤其是老芬兰党）起初的确准备在几个问题上让步，如果出现的是法律问题的话（例如在军事税问题上），他们早就同俄国总督妥协了。但是，斯托雷平的残暴政策迫使他们最终转向反对派。社会党人一直是沙皇专制的敌人，他们在原则上拒绝任何妥协，并始终不渝地捍卫芬兰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

我们现在来谈谈议会制定的法律。首先必须引述“面包房法”。

面包工人为改善他们的处境曾进行了 20 年的斗争。10 年来，他们一直要求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议会彻底修改了政府提出的该议案并准予于 1907 年 10 月进行三读。该法于 1909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其主要规定如下：每周工作至多 48 小时，每日不超过 10 小时。上班不

得早于上午6时，下工不得迟于晚间9时。星期日休息，节日前一天晚间6时下班。除了每年可加班100个小时外，绝对禁止追加工作时数。

1周加班不得超过10小时（将为加班工作设立专门的记录册）。加班工资必须增加30%。夜班应当取消，只有市政当局将有权批准夜班，每年10次（但不得在节日前夜）。

工资将以现金形式支付，不得以提供食宿或其他形式来支付。社会党人的要求曾经是：8小时工作日，晚间8时下班，每周仅允许加班8小时。

土地法

从17世纪初以来，由于农业大企业的发展，芬兰已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小佃农阶级，他们支付实物地租，就此而言类似于中欧的农奴。不过，芬兰的这些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并且完全不受土地的束缚。以租借的方式出让的土地通常是农村大地产的一部分。如果该土地的面积大到能使耕种者从中获取其主要收入，它就被称为“洛普”。1901年有67000名小佃农（“洛普主”）。在主要由工、农业工人和手工工人聚居的地区拥有极小片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被称做“做日工者”，1901年他们的人数为94000名。

最近10年间，资本主义企业日益增加，宗法状况已经消失，一个固定的农业工人阶级在芬兰形成了。同时，由于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增加地租、随意收地和其他类似的方法，小佃农的处境变得更糟。

政府曾试图根据1904年的法律（由议会于1900年表决通过）对地租状况进行整顿。但由于这个法律仅仅考虑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愿望，对小佃农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善。小佃农和做日工者的不满情绪继续增长。1905年罢工后，他们组织过多次重要集会，疾呼其不幸。这导致了多

次温和的罢工。“洛普主”大批参加了行动，他们被我们党的成功所激励，并在我党的帮助下于1906年和1908年举行了由他们组织的代表大会。政府当时也想着手处理该问题。他们为此任命了一个土地委员会。除了修改土地法，该委员会打算借助国家信贷使“洛普主”变为小土地所有者。圣彼得堡没有批准这一方案的主要部分，只是将有利于土地所有者的法律修改计划送回了芬兰议会。这种态度很难使农业无产者满意，议会于1908年起草了一个颇能反映出我们党影响的新的土地法案。该法案在1909年3月12日得到批准。

该新土地法旨在解决“洛普”问题和那些作为农村人口居住地的小块土地的问题。其主要固定如下：新佃农租地的期限定为50年；地方农业委员会有权将其他类型土地的租期限定为25年（以前租期普遍很短，取决于契约规定的条件）。社会党要求所有土地的租期均为50年。在租期之内，租金应以现金支付，不得提高；也可以用做日工或支付实物的形式来代替。当租赁双方中一方提前一年要求以现金支付地租时，必须改为现金支付形式。评估委员会必须确保租价合理，并保证在同一省份小块土地租价不得相对高于大片土地的租价。不准任意收地。在租约期满时，土地租耕者可得到一笔由土地委员会估算的改良土地的补偿费。土地租耕者也可经该委员会许可转租土地，但不得要求得到比上述补偿费更高的金额。夏季工作日不得超过11小时。在冬季的6个月中，工作时间应为平均9小时。我们的议会党团要求夏天工作10小时，冬天工作7小时。

每一个市政府均设一个或数个租约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土地耕种者和所有者选出的相同数目的委员组成。如果订约者不能就谁担任委员会主席达成一致，则由法庭任命主席。我们的议会党团要求民主选举，租约必须经该委员会批准。遗憾的是后者没有强制力。它也起了仲裁法庭的作用，订约双方都必须出面。

这一租地法具有追溯效力。原定于该法批准后1年内期满的契约将延期7年。所有原将于2年和3年后期满的契约均延长6年，以此类推，一直追溯到那些在该法开始实施后还有12至13年有效期的契约，这些契约被批准延期一年。所有的土地耕种者均有权得到改良土地的补偿费，并有权要求在其他问题上得到最有效的保护。

该租地法必将导致芬兰农业形势的重大改观。由于允许小佃农以最合理的方式耕种其小块土地，其地位肯定得到了保证。劳役地租将被废除，逐渐转为现金支付。劳役支付的形式无疑很快将在芬兰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消失。地主被迫雇用拿工资的农业工人。该法律也将消灭封建经营的残余并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以劳役形式支付的地租曾异常之多，耕种者常常不能用现金付租。这正是向现金支付形式转化之所以缓慢的原因。有关向他人出售和转让租约的条款也带来各种困难。社会党人正确地要求在实行最严厉的规定的前提下扩大这种权利，以使地租不至于涨得太高，耕种者能得到足够的改良土地的补偿费。

劳动保护法

这项法律由政府主动起草并于11月15日在议会进行表决。不幸的是，它的批准工作现仍在搁置中。那些热忱爱国的芬兰资本家们正竭尽全力阻止批准该法律。

该法律的规定适用于下述范围的工人：（1）各工厂和作坊；（2）建筑企业；（3）铁路、电车、运河和要塞建设系统；（4）浴室；（5）运输和搬运业。但它不适用于农场工人或雇工不足3人的企业。妇女和矿工也不受该法律的影响。我们的议会党团要求这项法律应扩大到所有的雇佣劳动者。

这项法律禁止未满14岁的儿童劳动。经劳动机构批准，在某些例

外情况下可以雇用13岁的儿童。社会党人要求年龄界限应定在15岁。该法律将未成年的儿童划分为两类：未满15岁的儿童和15—18岁的少年工人。前者工作每日不得超过6小时，后者每日不得超过8小时。社会党人的要求是，15—17岁的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过5小时，17—19岁的工人不超过8小时。

矿山、采石场或其他公认的危险部门不能雇用儿童和少年工人。建材运输业也不能雇用男女少年工人为搬运工。

使用童工只能限于上午7时至下午7时之内，使用少年工人限于上午6时至下午7时之内（职业教育要求例外的地方可予以批准）。

凡未采取每班工作8小时的两班制的地方，禁止在晚间9时至翌晨6时内使用成年人（满18岁者）做夜工。该情况下劳动可延续至晚间8时。凡实行三班制的地方，如果每周定期换班，允许使用夜工。劳动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批准破例。我们的议会党团则要求完全停止在晚8时至晨6时内做夜工。只有在实行两班制的情况下，劳动时间才可以延续至晚间10时。（受雇从事必不可少的工作的人可予以例外）

规定两周的工作量为120小时，即每天10小时。一周只准许加班10小时，但例外情况下允许更多。

加班小时的报酬将比平常高50%。社会党人的要求是每天工作8小时，农业工人例外，他们在夏季可每天工作10小时，冬季7小时。夜间（晚8时—晨6时）不准加班。每年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00小时，或者每月不超过10小时。

星期日休息需连续30个小时，特殊情况下可将其调至该周内其他几天。不能强迫任何人在星期日劳动。星期日劳动将领取双倍工资。

禁止孕妇或产后4周内的妇女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社会党人要求孕产妇休息14周，包括产后8周。此外，妇女在产假中将从公共财政中得到与工资相当的补助金。根据现行条例，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工

作。12—15 岁儿童每日可劳动 7 小时，15—18 岁的少年工人可劳动 14 小时。

童工有半小时休息时间，少年工有两次休息，时间共 1 小时。严禁童工和少年工上夜班。但经劳动机构批准，可以雇用男女少年工做夜班。受雇童工也可像少年工一样劳动 14 小时，但第三天应休假 1 天。地面下的工作和采石场不得使用童工和少年工。也禁止使用童工和女工从事给运转中的机器加油的工作。

市镇选举法

这项法律由议会在 1908 年秋制订，它规定必须在城市和乡村社区实行普选权和比例代表制。它现在仍在等待着大公[①]的批准。1905 年事件后，资产阶级政党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许下了各种冠冕堂皇的诺言，说他们正打算抑制市镇实行的财阀选举制并用民主的法律取代之。只是在经过激烈斗争后，社会党人才成功地使该法以现在的模样通过。执政党不再愿意听到关于选举改革的声音了。

这项法律使城镇和乡村的地方代表制具有强制性。目前许多村庄的代表制是非强制的。市镇选举中采取无记名直接投票的普选制和比例代表制。凡年满 21 岁的男女公民均为选民。未缴纳市镇税费者、无贫困证明者、长期接受慈善机构救济者、流浪者等没有选举权。

我们的议会党团反对这些限制并要求所有年满 20 岁者均享有选举权。根据这项法律，市镇代表机构必须由纳税人选出的构成，这样构成的代表机构必须决定本市镇最重大的问题，诸如财政问题等。我们的同志反对建立用这种方式构成的代表机构。他们也要求改革市镇税费，实

① 指俄国沙皇，他同时担任芬兰大公国大公。——编者注

行累进所得税。

对于正在全力以赴地争取实现这一改革的芬兰工人政党来说，该选举法问题已成为一场尖锐的斗争。由于现行的多元选举制，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着市镇行政机关（例如在赫尔辛福斯[①]的市政厅里只有一名社会党议员）。当前的反动统治者在种种问题上（如救济失业者的问题）明显地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敌视。

义务教育法

议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案，开始在芬兰实行义务教育。儿童应在居住地5公里周围内的学校上学（学校将按上述条件建立）。就读时间从7岁延续到13岁。初等教育免费。所有儿童均有免费课本和学习用具。如果儿童住处距学校超过5公里，必须发给上学路费并最终要建造学生宿舍。此外，市政当局有义务帮助本地居民家庭，使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我们的议会党团要求将就读时间延长为从7岁到15岁，包括2年补充教育，并且供给上述学生伙食、衣服、路费和宿舍。

宗教教育是学校教学大纲中的必修课目。只有通过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儿童们才能够应其父母或监护人的要求而免修该门课。这项法律不得不提交俄国内阁；后者已在一份备忘录中宣称，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必修课程问题。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这项法律能否通过还是未知数。我们党在议会关于公共教育预算的讨论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坚持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发放学习津贴、讲课津贴、课本津贴等。圣彼得堡自然从预算中减少了数额可观的教育经费。

---

① 即赫尔辛基。——编者注

社会党人也投票赞成提高大学教师和那些需赡养家庭的女教师的工资。国家支付的津贴费每年增加了200芬兰马克。

在议会制定的各项法律中，我们必须引述一下反酒精法，该法在反酒精运动声势浩大的芬兰意义重大。这一禁令是议会于1907年主动起草，并以多数票赞同通过的。只有瑞典人党反对禁令。该议案在芬兰参政院一直搁置到1909年。当时，参政院的资产阶级联盟建议大公拒绝批准该法案，尽管这些先生们在参政院里对之投了赞成票。1909年议会起草了又一法案，对原来的法案稍事修改，例如：不允许发给蒸酒人和酿酒人的补偿金，同样不允许发给售酒人。该法令完全禁止在芬兰出售酒精含量超过2%的各类酒精饮料产品和进口品，预定用于药剂、科学用途及芬兰的俄国驻军士兵的酒品例外。目前很难指望该法案获得批准。众所周知，那些对军人参政员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制酒资本家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

我们要谈谈其他几个特别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法令。为了继续扩大劳动保护法的成果，议会起草了一项关于劳动过程中意外事故的法令，这有助于减少危险性事故的次数。我们的议会党团要求对各种保护性措施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使议会接受了每个工人在工厂应有10立方米工作空间的条款；目前他们只有8立方米。该法令包括关于工厂中的餐厅、食堂等等的其他各项条款。关于劳动检查的法案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劳动检查员任期5年。副检查员必须从工人中选出，其人选提名必须征求本地区工人的意见。政府能够强令市政当局设立地方检查员的职位。一年至少必须对工厂和作坊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员不可提前发出巡视通知，他必须亲自听取工人的怨言。检查员既不能是工厂的所有者或股东，也不能是工厂使用专利的所有者。工人有关工厂不法行径的陈述被严格保密，只要事情没有诉诸法庭并且意见不被认为是诬陷。社会党人曾要求，除了首席检查员外，还应任命12名检查员和同样数目的

女检查员。目前检查员人数为5男2女，每个地区检查员必须配有2名工人作为其副检查员。后者必须是年龄小于30岁、至少已工作10年以上并具有必要的技术知识的熟练工人。首席检查员由参政院任命，任期3年。检查员和副检查员由劳动局任命，任期3年。各工人组织分别推荐其候选人。市镇检查员必须由工人组织选举产生。这些法令仍在等待批准。

此外，由议会各委员会完成起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议案，如上文引述的林地法之类，仍悬而未决。实际上林地在芬兰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项法令涉及木材公司购地问题。在芬兰，如同在多数北方国家一样，木材公司购买了大量土地并将农民逐出了其古老的属地。在几个地区，半数以上的土地已落入这些公司手中。这种情况对农业非常有害。资产阶级政党主张限制这种购买。老芬兰党人要求不准上述公司购买土地。社会党人不能接受这种主张，因为这种措施威胁了国家的木材业。他们只能够赞成对适宜用于农业的土地和农业发展必须的森林采取限制措施。1908年，以这种形式起草的法律被议会接受。社会党人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之间投出了具有决定性一票。他们不希望损害本国的经济发展。我们的议会党团提议政府应拥有出售木材公司土地的权利。50年后这些土地应无偿地交还国家。该提议未被接受。这项法律同众多的其他法律一样，仍在等着大公的批准。议事日程中还包括一项有关森林保护的法律（扩大森林委员会的权利）。但这项法律尚未在全体会议上讨论。

此外，议会应人们要求起草了许多请愿书，向政府（即芬兰参政院和大公）提出种种建议，旨在要求他们依照议会确定的原则准备议案。在这些请愿书中，我们想谈谈强制耕作的方案。在芬兰，许多耕地被其所有者投机性地闲置。

无地的无产者提出了一项主张：应该强迫土地所有者耕作这些土

地，否则就得将其租给那些愿意耕作的人。这一主张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这些土地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出租。租金要根据土地所有者先前的土地收益来估算。该建议当然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反对，未被议会接受。

有关仆役法的改革值得一提。社会党议会党团要求立即废除这一臭名昭著的法律。我们也通过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狩猎法的请愿书，狩猎的权利不应由土地所有者独占。

支持生育保险、支持已婚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经济角度看，摆脱作为男子的孩子监护人的地位）的请愿书以及有关行政官员问题的请愿书同样值得一提。在后一个问题上，我们党确定了下述基本原则：应该将行政官员置于民主基础之上；部分行政官员应由直接选举产生。政府当局和某些行政官员不仅要对他们行为的合法性负责，也要对其行为的得失和效果负责；工资等级应予以理顺；取消退休金，设立养老保险。我们党还起草了一份决议，反对对行政官员的宗教限制和排斥妇女就业的限制。

在反犹问题方面，一份涉及获得芬兰公民权的条件的请愿书被接受了，我们的议会党团在其中加入了支持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意见。最后，还有一份要求税制改革的请愿书。我们的议会党团提议取消间接税，并对收入和遗产征收累进税，但未获成功。

如上所述，我们的议会党团竭尽全力为立即进行改革而奋斗。由于他们的主动性和有力行动，所有这些方案都被提交议会并以一种或多或少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得到解决。社会党员主动提出了许多方案，迫使资产阶级各党对这些问题表态。其中的几个值得一提：降低参加议会选举的年龄界限，从 24 岁降到 21 岁；扩大议会权利；议会就预算问题举行公开表决；实行缓刑（请愿书被接受了）；组织芬兰人口普查；工人郊区问题（目前它们大多数属于农村乡镇，我们要求将其纳入毗邻

的城镇）。后一份请愿书号召研究该问题并得到了认可。此外，还有关于失业者请愿书。我们要求由工人联合会来分配失业救济。政府任命了一个包括两名社会党议员的委员会来审查失业保险问题。

我们的议会党团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事故保险的议案，但资产阶级多数派仅仅接受了一份请愿书。

在不采用宗教仪式的公证结婚问题和取消对渎圣罪的处罚问题上，有关议案被收存，但未获讨论。

社会党议会党团也多次行使他们的质询权。他们要求政府的代表（即芬兰参政院的参政员们）说明改革工作延缓的原因，解释他们应对之负责的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关于警察当局的野蛮行径）。在讨论预算案期间，社会党议会党团的许多决议得到受理。

芬兰议会处理了各种领域内的大量问题并制定了种种解决方法。但改革工作遇到了正准备摧毁一切文明化改革的俄国内阁所制造的难以逾越的阻碍。芬兰无产阶级深知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我国人民的权利系于以民主为基础的议院，他们绝不会放弃他们的自治议会。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策略上的分歧。选举议长的问题引起了不同意见。我们的议员确实曾投票赞成过青年芬兰人党的斯温胡武德，但后来他们因为不愿意为资产阶级议会的议长可能采取的行动承担责任而投了弃权票。少数派推荐了一名个人身份的议长候选人，但多数派反对这样做，因为选一名社会党人当议长，将不会获得议会的多数票。另一方面，第一副议长的职位被我们议会党团获得。

了解议会党团是否应该抵制课税，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芬兰议会的预算权非常有限。国家预算由固定税收和固定支出构成，只有政府（芬兰参政院在征得沙皇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它作出安排。政府也决定关税（它占总收入的50%），政府在以前就宣布这是它的权利。政府所需的收入须经议会投票决定。这些收入包括如下税

费：酒精税、啤酒税、纸牌税和印花税，它们总计约1600万芬兰马克。（总预算约为1亿芬兰马克，铁路建设预算是3200万芬兰马克。）

我们议会党团中的一部分人曾希望投票反对这些税项并在预算问题上采取原则性的立场，他们提出了下述拒绝把芬兰人民的钱委托给政府支配的理由：因为这笔钱未必会按合法的方式来使用。同这种观点相左者提出了下述论点：（1）酒精税和啤酒税是对我们有利的反酒精的税项，它既减少了酒类生产，又减少了消费（我们的啤酒是一种充斥市场的饮料，酒精度低于2%的啤酒不纳税）。（2）将这些税项收入用做交通和公共教育的资金，这已成为我们的预算方案中的不变的做法。（3）如否决上述税项，政府最终将能通过提高关税来弥补失去的收入。提高关税尤其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议会党团中的多数同志接受了这种观点，并投票赞成了这些税项。

在俄罗斯帝国拒绝芬兰的立法方案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所有人自然都赞同那个决议案本身。我们议会党团中的少数同志对其中陈述理由的一节有不同意见。该节写道，芬兰人民乐于就各种问题同俄国人民进行讨论并达成协议。少数同志宣称这段话是向俄国政府妥协，他们认为同现行俄国统治者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议会党团中的多数同志认为这句话并不是上面说的那种意思。

必须指出，尽管存在上述种种情况，我们议会党团的议会活动策略总体上是一致的，党始终团结一致地行动。

当西罗拉同志由于几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同老芬兰党人秘密达成妥协而在1909年被任命为芬兰银行的行政官和代表时，党内也出现了种种意见。

* * *

最近几年的政治局势本身决定了党的策略。必须利用革命创造的有

利条件，武装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加强议会活动的地位。同时必须相信，我们合法活动的自由可能很快就会被剥夺。在进入当前的这段时期时，革命尚未结束，当时可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即担心某些团体会背离社会主义斗争的阶级基础，走上虚假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危险路线。在斯维亚堡[1]起义后，赤卫队的一些残余人员堕落为强盗团伙，他们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敲诈勒索、强夺钱财。党觉得自己有必要反对这类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行径。它在一份公开决议中要求各组织必须将所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强盗团伙活动的党员开除出去。这些秘密团伙被解散了，先前曾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出现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消失了。

在科特卡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不得不商讨党的策略。代表大会于1909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下述决议总结了大会讨论的结果：

> “代表大会宣布，鉴于阶级敌对状况的不断恶化，芬兰工党将毫不停顿地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便为无产者争得新的权利和利益，并将他们引向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即消灭资本主义压迫。由于芬兰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特别遭到试图限制芬兰自治权的俄国沙皇专制的威胁，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为保卫和扩大他们已经争取到的权利而斗争。”

该决议接着强调了议会活动的重要性并明确地谴责了反议会政治的企图。[2] 它劝告社会党议会党团不要忽略阶级斗争的原则，并“禁止同那些可能损害我们独立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任何联盟”。

决议接着指出经济组织（工会）的必要性，表明可以在无产者争

---

① 今芬兰林纳。——编者注

②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党的少数机关报刊发表了近似反议会政治的短文。这种工联主义并不表明各工人中心中存在的趋势，而只是几名新闻记者的书生气的产物。

取其权利的斗争中引导他们宣布举行总罢工。决议在结论中指出，代表大会认为唯有俄国的解放运动才能保护芬兰的公民权利。因此，它重申了联合俄国解放者运动的于莱奥堡决议的精神，同时又保留了芬兰社会党议会党团的独立行动自由。

党的章程受到修改。党现在这样组织起来，即各协会和地区联盟选出一个共同的委员会，由它领导政治运动。策略问题也在年度选举会议上进行讨论。该会议除筹备选举外，也解决同党有关的种种现实问题。党的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随后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下一次代表大会前着手起草党的纲领，特别是关于农业问题的纲领。

我们再列举一下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说明我们党的活动的更多的事实。

1908 年，各市镇议会中有 351 名社会党代表（1906 年是 183 名，1907 年是 201 名），他们或者独立地，或者在其他政党的帮助下取得席位。我们的同志在各地都参加了教育委员会和税务委员会。我们确定的原则要求是：援助失业者，支持工会（阅览室和图书馆），市政机构应支持工人住宅、幼儿园、托儿所，等等。但如前所述，多元选举制使我们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

社会党的报刊和印刷品

赫尔辛福斯的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发行27000 份。我们拥有 4 家日报：塔墨尔福斯的《人民报》，阿尔博的《社会党人报》，维堡的《劳动报》和于莱奥堡的《人民意志报》。此外还有 11 家每周出版 3 期的报纸，即：

比扬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科特卡的《前进报》，塔瓦斯特许

斯的《塔瓦斯特农村呼声报》，瓦察的《自由言论报》，于韦斯屈莱的《被压迫者的力量报》，拉蒂的《先驱报》，库奥皮奥的《萨翁工人报》，索尔达瓦拉的《边境卫士报》，圣米歇尔的《自由报》，威尔曼斯特兰德的《人民呼声报》，博尔戈的《劳动者报》。

各报印数均为1.1万份，总份数约为10万份。

讽刺报纸《俱乐部报》发行了6000份。除上述诸报外，还有争取女权的社会运动的机关报《劳动妇女》，该报在赫尔辛福斯出版，发行4000份。学术评论杂志《社会党评论》于1906年至1908年出版。此外，还有以瑞典语出版的报刊：拥有1000名订户的学术评论月刊《人民论坛》，奥布出版的拥有1000名订户的《劳动》，拥有1500名订户的《奥斯特伯斯人民报》。①

我们党竭尽全力促进对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的理论教育。一系列社会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已在芬兰出版。例如，出版了一些篇幅较短的著作：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②、《社会主义的发展》③ 和其他著作，拉萨尔的《言论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④、《社会革命》、《基督教的起源》、《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关于非公开的著作，我们要提及乌尔辛博士的《工人问题》、《德国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著

---

① 讲瑞典语的工人组织构成了芬兰社会党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党的委员会和分支机构中有其代表。该组织包括25个支部，成员约1000名。在最近的选举中，其候选人获9000票（全部瑞典裔选民的8%）。讲瑞典语的工人联合会于1909年在博尔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但各联合会的代表也参加党的全体代表大会。还有两个俄罗斯工人协会，只是俄国官吏使他们活动极为困难。

② 应该是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③ 应该是指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④ 考茨基是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的起草人，这里也有可能指的是他撰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编者注

作。于宁博士有关“洛普主”状况的研究也出了大量小册子。党每年出版图文并茂的年历，印数为40000—50000册；还出版了几本有关五一的文选，每本印数为12000—15000册。我们现在正致力于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为芬兰文。该翻译费用由芬兰国家（通过一家文学俱乐部）支付。

妇女运动

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代表，它由150个同地方工人联合会联合在一起的分会组成。联合会约有3000名会员，主要是没有参加党的地方联合会的已婚妇女。它不包括妇女的同业支部。组建妇女支部主要是为了在妇女中进行宣传工作。它主要处理有关教育、宗教和军国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在一般的妇女会议上讨论。妇女联合会在其代表大会上为几个立法问题（其中有生育保险、遗弃儿童的抚养、义务教育、已婚妇女的地位、废除对杀婴行为的野蛮惩罚等问题）作了准备。该联合会也关注儿童主日学校。儿童联合会有其自己的报纸《理想报》。

青年运动

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始于1904—1905年。在1906年代表大会时，这些协会组成了一个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在瓦萨召开，拥有2500名成员的45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0年在科特卡召开，拥有1万多名成员的106个组织参加了大会。青年联合会不是党的正式组成部分，但被党所承认和支持。该联合会拥有其机关刊物——《火炬》月报，该报正打算办成周报。青年联合会

的纲领同党的纲领是同一个纲领，特别强调自由思想。几个瑞典人青年团体也属于该联合会。党的各协会还包括195个戏剧协会（赫尔辛福斯工人剧场受人民欢迎的戏剧作品得到了25000芬兰马克的国家资助）、60个合唱团（歌唱队）、79个体育团体（这些数字来自1909年的正式统计数字）。1906年各工人协会的图书馆藏书22593册，1907年藏书30444册，1908年藏书66522册，价值约10万芬兰马克。青年运动的档案馆经议会同意得到了3000芬兰马克的资助。今年秋天，党校将开学。每个选区都组织了宣传班，今年将不乏演说、讨论和集会。今年四方角逐的竞选运动强有力地促进了政治进步。党常设四名拿薪金的干部；此外每一选区均有一名常务书记和宣传员。选举斗争期间，各宣传员理所当然要在不同的选区进行工作。

当必须支持工人的抗议，尤其是要表达出他们的要求时，党几度成功地举行公开的示威活动。

当政府想剥夺铁路工人的结社权时，当第二届杜马解散之后，当俄国革命者在芬兰境内遭到迫害之际，在西班牙屠杀之时，在迟迟未能通过禁酒法、地方选举法、劳动保护法、农业法等等之时，他们都组织了示威活动。五一节时，全国各地都停工了。芬兰迄今一直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国际性节日。唯有去年，在尊严的大会上通过了强烈反对俄国暴力行为的抗议书时，警察在几个地区试图干涉。

我们正是在那时，由于在维堡举行的五一集会才第一次被起诉叛国。我们的几名记者因“叛国罪”而受到监禁（6—10个月）。

我们芬兰同志因参加工人运动而受到的各种处罚，1907年是3060天监禁和3315芬兰马克的罚金，1908年是2011天监禁和8365芬兰马克的罚金。

党也组织了每年度的纪念日活动：1908年纪念马克思的活动，1909年党延辰10周年和首批工会建立（从此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工人

运动）25 周年纪念活动。为此，有许多著述问世。

党竭力履行了它的国际团结的义务。芬兰社会党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工党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代表出席了他们的代表大会。我们党也参加了俄国的解放者运动。当争取芬兰自治的斗争开始之际，我们在议会中的同志为遵循同样的议会斗争的策略，和俄国杜马中的社会党议会党团保持了一致。

我们谨此向社会主义国际表示觉悟了的芬兰工人阶级的最深切的谢意。国际大胆而有力地支持了芬兰的自由权利，反对俄国沙皇专制。我们仍希望未来的斗争能得到国际的大力帮助。

工会运动

1905 年事件后的时期也是工会运动的黄金时代。在 1906 年筹备后，中央工会联合会于 1907 年在塔墨尔福斯代表大会上建立。该年年底，加入它的已经有 18 个联合会（拥有 429 个分会和 23419 名会员）和 5 个地方中心（共拥有 41 个分会和 1778 名会员），共有 25197 名会员。

1908 年，它拥有 27 个联合会，拥有 608 个分会和 24009 名会员（2889 名妇女和 698 名徒工）。1908 年中央基金的总收入达 405138 芬兰马克，支出为 396289 芬兰马克，其资产达 271739 芬兰马克；各分会的基金总收入、开支和资产分别是 351774、348196 和 245304 芬兰马克。

1907 年至 1909 年的经济危机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当各种民族组织将工人拖进艰难的斗争中时。因此，777 名造纸工人为争取他们先前曾争取到的 8 小时工作日而在 1908 年 11 月至 1909 年 5 月 1 日进行了罢工。罢工失败了，他们不得不再度每天工作 12 小时。1908 年，4000 名遭到同盟歇业的冶金工人为维护集体合同和反对

削减工资进行了斗争；1909 年年初，2000 名赫尔辛福斯遭受同盟歇业的冶金工人进行了同样的斗争。前者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后者的斗争徒劳无益。

工会组织 1908 年的斗争经费为：用于自己斗争的经费是 103000 芬兰马克，为支持其他组织斗争而使用的经费是 24000 芬兰马克；1909 年分别为 154000 和 17000 芬兰马克。这不包括 1909 年为支持瑞典的罢工者而援助的 63000 芬兰马克。由于我们与瑞典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芬兰工会因此现在不得不经受塞叶恩总督的报复。

每年发行 4000 份的中央联合会报纸名为《全国工会联合会中央协会》。木器工人、印刷工人、铁路工人、码头工人、装订工人、油漆工人、泥瓦工人、面包工人、锯木工人和冶金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发行总量为 20000 份。现在多数联合会有支付薪金的干部和宣传员。

我们希望讲讲下述情况，即参政院已请求中央联合会对一些法律草案（劳动保护法、养老保险和伤残保险法）提出建议。工人联合会在其回复中提出了几项改革要求，劳动局已经同意使有关各手工业联合会的声明适用于工人联合会。

1909 年年初，一项有关工作小时数、工资状况和其他劳动条件的调查得以展开。这一调查是由中央工会发起的，国家承担了工作费用。调查获得了有关失业、工作日（9—9.4 小时）、日薪（3.75—4.37 芬兰马克）、小时工资（42—47 芬尼）[①]、房租占工资的比例（赫尔辛福斯是 18.1%，其他城市平均为 14.1%，乡村为 7.2%，全国平均数为 12.1%）的引人注意的资料。

隶属于中央工会的联合会是：玻璃工，制革工，修路工和运河工，

① 该资料不涉及参加工会的工人。

装订工，木工，成衣工，马具和裱糊工，潜水员，锯木工，造纸工，制靴工，金银匠，面包工，采石工，码头工人，纺织工，制衣工，翻砂工，砌砖工人，陶工和窑工，冶金工人，北部农村伐木工，制管工，电工，社会党新闻工作者，白铁工，印刷工人，钢铁工人。

不属于中央工会的有：佣人协会（50 个分会、2500 名会员）、徒步旅行者协会（约 1000 名会员）、漆工协会（约 700 名会员）和农民协会（“洛普主”协会，刚刚成立）。老芬兰人党的各种工会是黄色组织，一般都是些无足轻重的立宪组织和基督教组织。

关于工会同工党的关系，党的代表大会在 1909 年 9 月通过了下述决议：

> “在芬兰，唯有社会民主党代表着并且可以代表立法领域内的真正的利益，因而行业联合会必须给社会民主党予一切帮助。但是，鉴于下述事实，即行业工人运动必须尽可能单一，人们唯有基于信仰才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党党员，代表大会认为：只有那些真正是社会主义者的行业联合会的会员才能加入社会党，而且行业联合会可以自愿加入社会民主党。”

合作运动

该运动在芬兰有 10 年历史，合作社问题在工人组织中被提上议事日程已有一段时间，但仍未实现。1899 年，人们为保护农村居民的利益成立了“佩莱沃协会”。1901 年，一项有关合作社的法律生效。“佩莱沃协会”得到国家的资助，并发表了大量文献。该协会建立了许多合作企业和批发商行（出口黄油、向农民收购产品、合作信贷）。这也推动了食品商店的发展，目前有一个为食品业协会服务的批发商行。1909 年年底，全国有 1812 家合作企业（506 家食品业联合体，384 家信贷

社，354 家农业社，169 家生产脱粒机的工厂，70 家泥炭销售合作社和 329 家其他类型的企业）。1908 年合作组织成员数超过 18 万。地方联合会的营业额共计约 8900 万芬兰马克。赫尔辛福斯的面包工人合作组织在其建立后的第 3 年，营业额达到 130 万芬兰马克，净利润逾 10 万芬兰马克。

合作运动是中立的，1903 年社会党作出一项决议，党在决议中将合作运动视为一种社会改革并且建议资助它。不管怎么说，人们曾希望合作社联合会将既在物质上也在道义上支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这几乎完全没有实现。少数合作社或多或少受工人控制（其中多数是食品合作社）。创建生产合作社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工人阶级正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正日益强烈），要么分配固定的红利，要么就建立完全属于工人的合作社。

挪威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报告

政治运动

众所周知，挪威有完全民主的一院制政体，强有力的议会制度，并且实际上不存在国王否决权。凡年满25周岁且不领取救济的男子，不论其纳税情况如何，均享有选举权；而且在1907年，那些有稳定的应纳税收入或者与已纳税的男子结婚的妇女也得到了选举权。一项旨在将妇女选举权的范围扩及与男子相同范围的议案刚刚得以提出。为了使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普选权，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当然提出了种种议案；不过，其他党大多数也支持这项改革。

议会选举在单一选区举行，假如首轮选举中候选人无一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则实行自由的重选；重选制在这个国家导致了如下结果：所有政党在首轮选举中均有其候选人，它们把之当做正式的预选；倘若某个社会党人得票最多，其他政党便彼此结盟，推出共同的候选人，以排挤社会党候选人。

在最近的选举中，这一伎俩在许多选区被采用，这正是我们之所以比以前仅仅多获得一个席位的原因，尽管我们得到了两倍于前的选票（1906年：43000票；1909年：90000票）。

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谴责了在首轮选举和随后的选举中结盟的

---

* 即挪威工党，下同。——编者注

做法。这一策略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激进党派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

1909 年议会选举的结果可从下述与 1906 年选举相比较的统计资料中窥见。

1906 年的议会选举

城镇的有效选票总数是 79203 张，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其中的 22558 张，或者说占 28.48%。6 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

农村地区的有效选票总数是 190078 张，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20235 张，或者说占 10.64%。4 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

因此，社会民主党在全国获得的选票总数为 43793 张，并且有 10 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议员。

1909 年的议会选举

城镇的有效选票约为 145000 张，社会民主党获得其中的 48000 张，或者说占 33.1%。6 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

农村地区的有效选票约为 200000 张，社会民主党获得其中约 42500 张，或者说占 21.2%。5 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

因此，党在全国获得的选票总数约为 90000 张，并且下列 11 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任期为 1909 年至 1912 年的议会的议员：

安·布恩（特隆赫姆）

亚·埃格德-尼森（瓦尔德）

奥·恩布雷特森（索洛）

路·恩格（萨尔普斯堡）
阿尔弗雷德·埃里克森（特罗姆瑟松德特）
迈耶尔·福绍格（塞尼恩）
O. 古尔达尔（古尔达伦）
霍·克努森（克里斯蒂安尼亚）①
马格努斯·尼尔森（克里斯蒂安尼亚）
伊萨克·塞巴（东芬马克）
拉·塞博（卑尔根）

我们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总是热切希望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原则，他们在一切场合都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在关于社会改革、军国主义等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起草并提出了几个议案，例如：关于病人护理工作由社会承担的议案，关于国家管理药房的议案，关于八小时工作日议案，关于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普选权的议案，等等。

议会党团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几项议案都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有力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家工作人员的低薪状况得到了改善，八小时工作制已在一些国家工厂推行。

在关税政策问题上，我们的议会党团为降低生活必需品税作了努力，而且议会也决定降低食糖关税。议会党团致力于反对增加军费，并建议削减军需品。增加直接税和遗产税的问题，同彻底改变我们的整个关税制度的问题一样，已被议会党团提出来。

最后，我们的议会党团提高国家给失业基金的资助，为改善公立学

① 今奥斯陆，下同。——编者注

校，为渔民和伐木工人的事故保险等等作出了努力。

市 镇

在市镇选举中，不论男女，凡年满25岁者都享有选举权；然而在1910年前，妇女的选举权仍然受到上述限制。不过，根据今年通过的议会法案，妇女获得了同男子一样的无需考虑纳税情况的选举权。该议案是由社会民主党议员同其他诸党的议员共同提出的，而且所有政党都投票支持了这项改革。市镇选举表明社会民主党在我们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也具有多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的影响在全国日益扩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标志。

在1904年市镇选举中，330名社会民主党人被选进各市镇议会。其中一半在城市当选，而另一半在农村地区当选。

在1907年市镇选举中，农村所有地区共选出10876名市镇议员，城市选出1980名市镇议员，总计12856名。其中农村地区有578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城市中有295名，社会民主党市镇议员在1907年总数为873名。

在市镇的各个委员会中，我们党一直在为各种问题努力工作，例如：改善公共学校，发放免费课本，使学校在“五一”放假，市镇雇用的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电车道工程由市政承担（煤气和电气工程通常是市政承担的），等等。

社会主义报刊

社会主义报纸在最近3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有了几家新党报，并且订户数一直在迅速增加。我们出版的社会主义报刊如下：

日　报

名称	出版地	发行量
《社会民主党人报》	克里斯蒂安尼亚	14000
《劳动报》	卑尔根	9000
《新时代报》	特隆赫姆	6200
《五一报》	斯塔万格	2700
《未来报》	德拉门	4200
《斯莫莱内纳社会民主党人报》	腓特烈斯塔	3500
《南部地区社会民主党人报》	克里斯蒂安桑	2000
《布拉茨贝格民主党人报》	希恩	1500

周三刊

《民主派》	哈马尔	1200
《索洛人报》	索洛	1500
《时代》	阿伦达尔	1200

半周刊

《罗默里克报》	杰塞姆（私人出版）	1400
《北极光》	特罗姆瑟	1500
《芬马尔克人报》	瓦尔德	1200
《前进》	纳尔维克	1400
《新时代》	特隆赫姆	2450
《时代的要求》	克里斯蒂安松	900
《敦讷兰河谷报》	海尔格兰	850

周　报

《鼓动者》	阿克什胡斯	1500
《蚂蚁》	勒罗斯	?
《西福尔工人报》	腾斯贝格	700

半月刊

《戒酒者》	卑尔根（社会党禁酒刊物）	1000

月　刊

《阶级斗争》	克里斯蒂安尼亚（青年社会党人机关刊物）	2500
《妇女》	克里斯蒂安尼亚（工党妇女联合机关刊物）	1200

小册子

社会主义小册子在我们鼓动工作中的作用正在增强。每年出版一些新的小册子；各种老版小册子再版发行，销量在迅速而稳定地增长。

鼓动工作

在我们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巡回演说家的鼓动工作相当困难；要抵达我们想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所有地方，并非易事。

协会及其成员

大批新协会建立了，其成员人数一直在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在农村地区最快；在那些过去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活动的地方，现在建立了协会。

交纳党费的成员人数如下：

1907 年 12 月 31 日：在城镇约 16000 人，在农村约 7000 人，总计 23000 人（其中 1800 名妇女）。

1908 年 12 月 31 日：在城镇约 19000 人，在农村约 8500 人，总计 27500 人（其中 2000 名妇女）。

1909 年 12 月 31 日：在城镇约 20500 人，在农村为 6000 人，总计 26500 人（其中 2500 名妇女）。

1907 年年底，党有 499 个支部；1908 年年底，党有 602 个支部；1909 年年底，党有 637 个支部（其中 339 个在城镇，298 个在农村）。

挪威工党的收支状况

年份	收入	支出
1907 年	10123.44 克朗	10118.67 克朗
1908 年	10257.41 克朗	10033.25 克朗
1909 年	18515.71 克朗	18474.64 克朗

党的书记：

马格努斯·尼尔森

1910 年 5 月于克里斯蒂安尼亚

工 会

挪威工会的会员人数近年来一直在迅速增加，组织活动的成效令人非常满意；会员人数的稳定增长使各组织的力量增强。工人在同雇主的各种冲突中显示了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证明工人对组织的必要性的认识正在迅速提高。尤其是在 1906 年、1907 年和 1908 年，会员人数猛增，虽然隶属工会中央组织的一个联合会的人数在 1909 年曾一时稍减。

挪威工会由各全国性联合会和一些地方协会（不隶属于任何联

合会）组成。各联合会和协会联合成一个中央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

该中央组织于1899年4月1日建立，因此在1909年能庆祝其十周年纪念日。截至1899年年底，大约10000名工人加入了各联合会，其中约3000名参加了该中央组织。后来几乎所有的联合会的协会都加入了该组织；到1909年底，唯有3个较小的组织：金饰工人组织、石印工人组织、斯堪的纳维亚马具工和裱糊工联合会挪威支部没有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总数约为700人。

到1906年年底，12个全国性联合会和19个地方协会参加了中央组织，其会员总数为25288名，分属444个不同的分会（工会）。到1909年底，18个全国性联合会和11个地方协会（成员总数为43194名，分属694个分会）参加了中央组织。因而在1907—1909年的3年间，增加了17855名会员和250个分会。

该中央组织在不同年度的会员人数、收入、支出和现金余额情况如下表。

年份	会员总人数	收入总额（克朗）	支出总额（克朗）	会员人均金额（克朗）	现金余额（克朗）	会员人均金额（克朗）
1906	25288	537792.59	372723.49	17	470028.19	18.63
1907	38765	1076584.23	779332	21.88	767003.34	19.1
1908	47155	1128867.23	1071303.1	23.85	822779.31	18.34
1909	43199	1437231.97	1356752.59	29.59	903263.79	20.45

可以看出，会员人数在1909年年底降到43199人，这种下降发生在该年9—11月间，当时必须为瑞典的总罢工交纳大笔特别会费。1909年6月，会员人数为47399名；1909年的会员月平均数是46144人，

1908 年为 45118 人。在 1910 年的头一个月，会员人数再度增加（1910 年 2 月是 44108 名）。因而可以希望，人数下降仅仅是暂时的，近年来令人满意的增长状况将会继续下去。

根据 1908 年年底的报告计算，在农业、林业、渔业、航海业、手工业、工业、运输业、商业和交通业中，可以组织起来的工人总数是 229260 人，其中有 203590 名男子，25670 名妇女。然而，这些人中有许多尚未加入组织，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几乎不能用像产业工人一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农业工人、海员和渔民尤其如此，并且前景也不太令人乐观。因此，假如要使百分比正确的活，就要减去这些部门。

可以组织起来的工人同加入组织的工人的比例见下表。

	男工	女工	可组织起来的工人总数	加入组织的工人总数	加入组织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重
Ⅰ. 所有部门的工人	203590	25670	229260	48157	21.01
Ⅱ. 减去农业工人	172590	22170	194760	48157	24.73
Ⅲ. 减去渔民	164590	21680	186270	48083	25.81
Ⅳ. 减去海员	138090	21680	159770	47833	29.94

最后一组数字包括手工业、工业、运输业、商业和交通业的工人，因而所有这些部门均有现代组织。然而，可以看到，这些部门中也有一些完全缺乏组织的行业。凡组织起来的行业，组织程度的百分比一般都比较高。该项百分比在不同的行业中的情况如下：

加入组织的工人在不同行业中的比例

农业和林业	0%	土石方工业	21.30%
造纸工业	59.16%	金属工业	40.50%
渔业	0.87%	化学工业	42.61%
制革业	25.81%	电力工业	14.28%
海员	0.94%	纺织工业	22.64%
木材工业	24.47%	食品和娱乐业	21.23%
内陆运输和商业	12.48%	服装业和清洁业	16.11%
建筑业	20.92%	理发业	0%
营造业	40.30%	復写业	82.38%
矿业	56.58%	其他工业	0%

一份关于1909年各组织的成员人数、收支和资产情况的更明确的图表，可见第161—162页。

上述报告中也包括一些没有参加中央组织的小组织，其成员总数是753名。

劳资协议

直至1906年年底，在雇主组织和雇员之间或者工会和不同的公司之间极少订立过劳资协议。在那之前，这类协议几乎都是在手工行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同它们的工匠之间制定的。对工资和劳动条件作出规定的劳资协议在制造业中非常罕见。

但是，从1906年起，尤其在1907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各种劳资协议迎难而出，挪威雇主同盟立即放弃了对以劳资协议的方式来规定劳动条件的做法多少有点消极的抵抗。

各联合会缔结的劳资协议如下：

各联合会缔结的劳资协议数

组织名称	劳资协议份数	劳资协议涉及的工人人数
工人联合会	161	21282
面包和点心工人联合会	15	1009
装订工人联合会	5	524
印刷工人中央协会	34	2487
铸造工人联合会	9	876
码头和搬运工人联合会	3	531
钢铁、冶金工人	65	10600
石印工人联合会	1	200
油漆工人联合会	15	1335
砌砖工人联合会	24	1189
细木工联合会	20	737
马具工和裱糊工联合会	2	108
制革工业	5	165
制鞋工人联合会	24	1602
缝纫工人联合会	15	929
屠宰和制肠工人	3	154
石工联合会	7	1320
电车司机联合会	1	263
烟草工人联合会	1	133
纺织女工联合会	3	132
木材工人联合会	33	2676
各种单个的联合会	7	645
合计	453	48917①

① 数字有误，原文如此。——编者注

按公司分类的劳资协议份数如下：

公司类别	劳资协议份数	劳资协议涉及的工人人数
建筑业等	4	2501
面包点心制作业	15	1009
矿业	23	3800
白镴器皿制造业	8	253
图书装订业	5	524
印刷业	34	2487
酿酒、蒸酒业	6	619
制桶业	8	248
电气化学和化学工业	20	1409
钟表业	4	545
煤气和电力工程	3	377
建材工业	8	485
金器业	1	13
港务和运输业	16	1778
罐头制造业	2	990
平板印刷机制造业	1	200
装潢业	14	1304
机械厂	51	11219
砌砖业	22	1118
建筑业和石匠业	11	535
细木家具制造业	19	705
面粉业	1	70
水暖业	3	247
锯木厂和木材厂	12	454

（续表）

公司类别	劳资协议份数	劳资协议涉及的工人人数
制革工业	12	491
制鞋业	24	1602
缝纫业	15	929
屠宰和制肠业	3	154
铁匠铺	6	191
乳制品业	4	217
木工行业	18	1627
石工行业	8	1380
纺织工业	12	1904
烟草工业	2	206
纸浆、纸张和纤维素工业	52	7062
木制品工厂	6	274
合计	453	48917①

按期满时间分类的劳资协议大体情况如下：

月份	1910 年		1911 年		1912 年		1913 年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1 月	—	—	14	1617	10	670	4	430
2 月	—	—	2	81	1	210	1	189
3 月	4	604	62	12258	4	579	2	180
4 月	11	607	41	2514	3	208	—	216
5 月	17	2751	53	3623	6	1070	—	—
6 月	20	2540	10	2730	3	75	—	—
7 月	10	635	18	2215	1	40	—	—

① 数字有误，原文如此。——编者注

（续表）

月份	1910 年		1911 年		1912 年		1913 年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协议数	涉及工人数
8 月	14	3227	22	1962	—	—	—	—
9 月	17	398	4	101	3	630	—	—
10 月	13	577	2	330	—	—	—	—
11 月	15	918	3	133	—	—	—	—
12 月	11	1156	4	182	33	2352	—	—
共计	132	13413	235	27746	64	5834	9	1015

上述报告不包括锯木厂和木材厂在 1910 年签定并将于 1913 年期满的劳资协议，这些协议涉及 2000 名工人。

工会组织状况一览表

组织名称	会员人数	收入（克朗）	支出（克朗）	现金余额（克朗）	人均资产（克朗）
工人联合会	20983	522237. 86	473869. 43	175223. 17	8. 35
面包和点心工人联合会	756	23908. 70	23667. 72	3438. 85	4. 55
装订工人联合会	509	14697. 60	7976. 67	17017. 57	33. 43
印刷工人中央协会	1882	112602. 50	80890. 01	169889. 88	90. 27
铸造工人联合会	1023	53644. 73	56837. 74	64102. 48	62. 66
金饰工人联合会	428	5154. 87	932. 76	4222. 11	9. 86
港务和运输工人组织	1189	29802. 24	28889. 77	5545. 08	4. 66
钢铁、冶金工人组织	7960	404201. 96	456412. 46	303585. 61	38. 14
石印工人联合会	225	11322. 76	4984. 96	14160. 38	62. 94
油漆工人联合会	908	27405. 20	26565. 31	11615. 06	12. 79
砌砖工人联合会	964	27179. 83	20874. 42	25428. 79	26. 38

（续表）

组织名称	会员人数	收入（克朗）	支出（克朗）	现金余额（克朗）	人均资产（克朗）
细木工联合会	702	25991.69	16884.44	24787.27	35.31
制革工人联合会	194	3164.80	2229.84	934.96	4.82
制鞋工人联合会	1227	26752.08	23939.57	10969.27	8.94
缝纫工人联合会	794	14093.57	13799.97	5052.26	6.36
屠宰和制肠工人组织	180	3563.05	3387.07	587.17	3.26
电车司机联合会	277	3417.70	3057.16	498.27	1.80
石工联合会	974	21544.04	17943.82	16769.15	17.22
纺织女工组织	120	1180.56	743.26	437.30	3.64
木材工人联合会	2400	95463.27	84160.09	36756.12	15.32
烟草工人协会（克里斯蒂安尼亚）	157	3757.44	3529.80	4270.27	27.20
镀金工人联合会（克里斯蒂安尼亚）	14	502.79	246.96	923.35	65.95
制绳工人组织（腓特烈斯文）	12	162.49	190.70	127.38	10.61
克里亚制帽工人协会	90	1751.30	1691.50	2768.40	30.76
克里亚软木塞制作工人协会	49	—	—	—	—
克里亚编带工人协会	8	89.10	30.38	58.72	7.34
克里亚制绳工人协会	30	459.75	404.96	797.60	26.58
克里亚粉饰工人协会	20	268.00	227.93	58.76	2.94
克里亚甜饼工人协会	70	1455.82	1275.45	1927.47	27.54
克里亚烟草工人协会	78	1461.27	1108.44	1311.09	16.81
总计	44223	1437236.97	1356752.59	903263.79	20.45

工资运动和工资斗争

1908 年和 1909 年的工资运动状况如下：

年份	未停工		停工		总数		支付补助金总额（克朗）
	斗争次数	参加工人人数	斗争次数	参加工人人数	斗争次数	参加工人人数	
1908	112	7958	61	9643	173	17601	528560. 37
1909	88	6209	76	3640	164	9849	219713. 59

在 1907 年至 1909 年 3 年里，我们同雇主进行了几次激烈的斗争。1907 年尤其可称为战斗的一年。1909 年主要是我们邻国瑞典发生的那场大规模的斗争，该斗争也吸引了挪威工人的注意。为援助瑞典的那次总罢工，挪威支援了 535865. 65 克朗。

本报告只是简略地概述了挪威工会 1907—1909 年间的活动情况。在驻柏林的国际书记每年发表的工会国际的各种公报中，人们可以找到关于挪威工会运动的更详细的报告。

代表挪威全国工人联合会

主席：**奥勒·O. 利安**

1910 年 5 月于克里斯蒂安尼亚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
向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我们在1907年提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解释了瑞典那年的政治运动以及政府和保守党人不顾下院多数反对强行通过的选举法案。

瑞典工人阶级反对旧的选举制度的斗争已在1902年赢得了对下院普选原则的承认，但这种普选权是与某些担保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随后几年，反对这些担保条件的斗争如火如荼。保守党与自由党把选民年龄定在24岁，同时还须纳税3年并不欠济贫委员会任何东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单独进行着反对把工人阶级的权利打折扣的斗争；1906年，它还将妇女的选举权也列入他们的动议中。关于选举制，保守党主张只对下院实行比例选举，而全部由资本家控制的上院则不应受到打扰。自由党主张下院选举实行“单一议员选区”，上院则按老办法。社会民主党从1906年起主张**彻底修改宪法**，实行纯粹的民主原则。

认识到这一纲领不久就会像1902年前要求在下院实行普选的主张一样得到支持，保守党内比较清醒的人不得不赶紧提出解决方案。首相林德曼提供了比1906年倒台的首相、自由党领袖斯特夫更多的东西。林德曼提出了他称之为下院“普选”的方案（附有上述折扣），对两院都实行比例选举，把地方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富人统治机构——选举改为每位选民最多40票，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

将平均拥有5—10票，富人则有约25—30票。这一改革主要将改变上院的代表制，在现在居支配地位的保守党人身边，将会出现自由党人和社民党人。

面对保守党这一尽管进步颇大，但含有许多危险的反民主的内容的方案，自由党更接近我们赞成彻底修改宪法的建议，从而获得了比较得人心的地位。但它的领导人徒劳无益地坚持反对比例代表制，顽固拒绝让改革在扩大下院选举权之外更进一步。结果，在关键时刻，自由党的力量分裂了。社会民主党因林德曼的改革不彻底而一致投了反对票，但林德曼在许诺放宽新上院参议员的候选资格和提高其酬金后，靠着自由党的保守派，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票数。在上院，保守党强烈地反对这一方案，但不得不服从本党政府。

这样，在将近10年中一直是瑞典政治焦点的普选权问题，在1907年春暂时由一直反对它的保守党，而不是由它的斗士解决了。因此，这种结局意味着一场争取鲜明的民主选举新法案的斗争必将在不久后开始。

林德曼先生1907年还成功地解决了一个重大经济问题：政府对北部边远地区的大矿业公司的态度。一年前，斯特夫先生失败了。林德曼先生与格兰格斯堡公司的协议所达成的解决方案得到议会批准。根据这一方案，瑞典国家得到基律纳和盖尔利瓦拉矿的一半，不过，在未来的30年，国家所占份额将保持在50%，而公司将进行改革以增加出口，同时使年收入提高一倍。此外，未来赎买公司另一半的条件将对资本家股东特别有利。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一点，主张限定赎买的最高金额。但自由党与保守党都拒绝跟着社会民党为国家争取国家的财产。斯特夫先生声称，我们针对资本家的建议是“一种掠夺”。

尽管如此，国家在这个开发国民财富的大矿产公司中拥有所有权是走向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开端，也显示了社会党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力量。

经过斯德哥尔摩和歌德堡的新选举，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议员从1907年的15名增至17名。在这份提交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必须提到他们就切尔尼亚克事件进行的质询。这一事件揭露了我国密探警察头目斯滕达尔先生——后来被保守党选为参议员——与他的俄国同僚的亲密关系。尽管我们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对切尔尼亚克的引渡，但他却在前往安特卫普的途中去世，死因可能是吸入由含硅的铁放出的毒气。1907年夏天，瑞典工人抗议当局不让俄国人在哥本哈根举行代表大会①（代表大会最终在伦敦举行）。俄国警察的魔爪后来又伸到了瑞典。1909年我们的党在议会——单枪匹马地——抗议沙皇预定的来访。夏天，这一访问还是得以实现，全国各地工人阶级举行集会进行了抗议。作为对访问所做的应有的准备，当局在斯德哥尔摩逮捕了几名受俄国坐探奥内特指控的俄国人。然后，当在这一不受欢迎的来访中一个瑞典无政府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向一个瑞典将军开枪射击时，警察利用这一骚动的机会，不经审判就将这些被捕者驱逐出境。奥内特根据自己的请求也回到了俄国！由于这些事件，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提出了更好地保护在瑞典的外国人的安全的建议。

在1908年的议会会期中，我党在大多数自由党人的支持下，成功地否决了一个限制我们的报刊揭露劳资冲突中的工贼的权利的建议。这一被称为“希尔德布兰德法案”的决议以107票反对和103票赞成未获通过。我们的主动行动没有那么成功。我们对处理失业保险问题、在价格昂贵时暂停征收谷物关税以及废除保护工贼的法律（“阿卡普斯法”）的主张，我们要求调查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减少新国王的王室费等等主张，都遭到否决，但在宣传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意义。

---

① 应是指1907年5月13日至6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 * *

党于1908年5月28日—6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130个党的地方组织的320代表出席。经过激烈的讨论，大会以227票对69票批准了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将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的编辑欣·贝耶格伦和施勒德开除出党的要求。大会从此确定了一个原则：党将坚持其久经考验的政策，将同上层阶级的政党及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以便通过议会道路增加影响力，通过在国家和地方委员会中取得更多的权力，保护劳动人民在各方面的利益，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工人阶级要实现的历史使命——做准备。

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代表大会宣誓粉碎联合在“反社会主义阵线”口号下的反动派的进攻，这首先通过在一切有可能赢得胜利的地方加强我党在议会的力量。（在瑞典，取得相对多数票就赢得选举）但在我们没有机会赢得自己席位的地方，我们只得把票投给反对阶级立法和不断增加军费负担的自由党候选人。

关于组织形式，大会否决了不让任何工会加入党的提议（单独的议题）；相反，允许每个工会会员有权通过提前通知退党，不交纳党费。

关于党当前的政治纲领，通过删掉一切关于“人民防卫制度”的文字，反对**军国主义**的段落变得更为尖锐。这段话现在是这样写的：

> “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断减少军费负担，支持裁军。
>
> 支持强制仲裁、斯堪的纳维亚中立，支持工人组织进行的强有力的反战国际行动。”

关于**酗酒**问题，纲领的下述结论比以前更为尖锐：通过在所有公共学校讲授酒精对个人的影响和实质，通过立法在地方发布禁令或采取其

他有助于解决酗酒问题的有效手段来与酗酒作斗争。

此外，大会注意到人民教育的问题（例如，它批准每年资助布伦斯维克业余大学 5000 瑞典克朗，并向各种学习课程提供相同数目的资助），并决定出版一种社会主义学术月刊。

1908 年，这一月刊——《时代》——得以出版。编辑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的主席、前《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亚·布兰亭。

* * *

在代表大会举行时，各行各业中开始爆发重大冲突。在斯德哥尔摩，建筑业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在斯科讷，食糖加工厂爆发了冲突，但在码头发生的大冲突最为危险。航运公司到处雇用工贼，装载着工贼的船只驱散了所有港口的冲突。航运公司甚至雇来了成百上千的英国工贼和各海港的暴徒，他们在警察的保护下支持瑞典船主镇压瑞典劳工。

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自然肯定会导致暴力的行动，一小部分人试图举行暴动。一些属于“青年社会党人”的狂人企图在工贼登岸的地方马尔摩港用炸药炸掉轮船“阿玛耳忒亚号”；所幸仅一人在爆炸中身亡。但全国所有的报纸都众口一词，保守党忘掉了“爱国的船主”负有最严重的责任，把爆炸的责任归咎于整个社会民主党。一名爆炸者被判处死刑，但在 1909 年春行刑前夕，当人们愤怒的情绪平息时，社会民主党同议会其他一些议员一起向国王递交了要求拯救他们生命的陈情书。国王把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这样，冲突完全激化，雇主组织找到了一个以“闭厂”来威胁的好机会。保守党领袖为什么不在那时让他们开战，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在选举中自由党人同社会党人会互相争斗，这有利于保

守党；可能是因为新国王期待着外国君主的来访，这时在让国内爆发社会战争会是不合适的。无论如何，政府真诚地尝试和平解决。一个以瑞典驻哥本哈根的大使君特为主席的人数众多的仲裁委员会得以组成。在克服了种种巨大的困难之后，1908 年 7 月 19 日劳资双方在斯德哥尔摩的议会大厦达成了协议。从当时的经济形势看，协议对工人是有利的；首先，它在萧条最严重的时刻保全了他们的力量。

这是林德曼政府在社会战争中最后一次表现得不仅仅像雇主的政府，而且还像人民的政府。现在，它所宣布的“超越党派的政府”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话，这特别是由于对反军国主义鼓动者的起诉——以司法部长的名字命名的“彼得森禁制”，由于内务部长关于五一示威旗帜内容的“敕令”——它严禁任何“非法”字眼。这位部长甚至起诉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因为他们没有在五一节对这样的旗帜采取足够野蛮的行径。

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下院竞选的开始的标志。政府提出“反社会主义阵线”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而保守党人对“社会党人的暴行”感到吃惊。但总体上，自由党人对保守党的恐吓和甜言蜜语都采取了相当不错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组织了一次强有力的鼓动，这使他们的党第一次在政治上与老的政党处于平等的地位。

9 月举行的选举表明了一个显著的大变化。保守党丧失了约 20 个席位，议席在新的下院降至 85 席。自由党增加了一些席位，达到了 105 席，其中包括一些不太保守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胜利最辉煌：我们保持了所有 17 个席位，还增加 16 个新席位，因而共有 33 席（下院共有 230 席）。而且，这种选举制迫使许多社会党选民的小团体把票投给自由党或激进派的候选人，以抵制主张阶级立法和军国主义的保守党人。

在最近几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所得选票情况如下：

1902 年在 12 个选区获 8751 票

1905 年在 27 个选区获 26083 票

1908 年在 36 个选区获 54004 票

根据大体的估算，在最近两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的实际得票数如下：

1905 年	约 4 万票
1908 年	近 7.5 万票

1908 年的选票共计 30 万票多一点；由此可知，社会党的得票占所有选票的 24%。1897—1902 年在下院仅有一名议员的党取得了辉煌的进展。

在其他议会制国家，激进集团在选举中的胜利早就使保守党内阁下台了。在瑞典不这样，拥有预算权（当上下两院对收入和税收不能达成一致时，上下两院的表决票是加在一起计算的）的上院，凭借其作为最强大的上层阶级的政治象征的地位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保守党和国王提出了这样一种有争议的理论，即不是人民通过下院选举显示的多数，而是整个国会的多数决定内阁的政策。以这种理论为依据，1906 年组成了林德曼内阁，尽管 1908 年的选举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政府与下院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保守党作为整体在整个国会中仍然拥有多数，在就预算问题投票表决、两院的票数相加计算后保住了内阁。当上院因林德曼选举法案的实施而不再仅是保守党的堡垒，重心回到下院时，这种情况将首次改变。

然而由于选举结果，自由党开始讨论组成自由党内阁的机会，一至两名社会党人将作为“人质”加入内阁。但我们的党坚决拒绝了这样的建议。没有证据表明形势特别有利于我们加入一个资产阶级内阁。但

我们解释说，我们愿意在议会中支持可能出现的自由党内阁，只要它遵循一种明显激进的方针。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

对“反军国主义者”的迫害现在变残酷了。一个出版了一份托尔斯泰所写声明——这早些时候在克列孟梭的《震旦报》上发表——的“青年社会党人”被罚一年苦工，并褫夺公民权一年，散发者也受到相应惩罚。司法部长还按“渎神”法令行事。一位叫维克塞尔的隆德大学教授因猛烈攻击耶稣诞生的迷信教义，被判处两个月监禁。

因此，在1909年的议会会议期内，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清算“彼得森禁制”的账，不久我们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辩论中林德曼先生使人们明确知道，他想把我们当做“二等公民”。

前后矛盾的是，他在此前选择了我党同志托尔松为掌管军队行政的“文官委员会”委员，还把一些社会党人选进各个委员会。林德奎斯特和佩尔松被选入负责新行业争端法案的委员会，布兰亭被选入“养老金”委员会，等等。

由于斯德哥尔摩市市长林德哈根先生——以前因非常有力地支持被锯木公司赶出自己农场的北方的贫苦农民而闻名全国——的加入，党在议会中的议员增至34名。尽管受到几项针对思想自由的反动迫害的法律提案的干扰，党在下院中也不无成就，但上院显然认为现行的反动立法妙极了。

只有我们拒绝最终接受林德曼的选举法案以及加重惩罚“教唆犯罪”——按照这一法令，劝告铁路员工加入总罢工要惩**干苦工**！除了自由党，我们也主张立即实施新选举法——保守党很想拖延，以便尽可能长期地利用他们在议会的反动多数！我们坚持议会的权力，反对政府企图禁止它的文官向议员提供直接消息的某些做法。就这两件事，下院进行了直接的信任投票——这种制度在我们的议会中尚未成为惯例，它引起了一场小危机，内阁中3名较开明的成员因此辞职，其中有“国王委

员会的第一个农民”——帕博达的彼得森先生。但林德曼先生依然留任，用保守党人填补了他内阁的空出的职位，让国会的多数不顾下院的多数投票支持把间接税用于大笔军事拨款。

完全独立，但在自然需要合作的一切问题上同自由党人并肩反对保守党人——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个议会会期的立场。但是，随后爆发了关于劳动市场的重大斗争，这在很长时间里使资产阶级各阶层在政治上和议会中暂时抛开对立。他们的大力干涉使工人明白：在关键时刻，他们只能信任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党。

* * *

雇主组织中好斗派只是牢骚满腹地服从了1908年7月的协议。他们坚持利用萧条的市场向工会发动致命的打击。在基本上覆盖了瑞典工业领域的三个最大的雇主组织——工厂协会（162名雇主，有25000名工人）主要包括建筑业的中央雇主联合会（约2000名雇主，有40000—45000名工人）及瑞典雇主协会（除了机械厂外的主要行业，1423名雇主，有约163000名工人和成员交给协会的1700万克朗的活动经费）——中，最后一个尤为经常地抓住最微弱的机会以同盟歇业来威胁工人。然而，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成功解决了1908年的各种冲突，1909年春的另两次冲突也被劳工领袖令人满意地解决了。

然后在1909年7月，瑞典雇主协会——它的领导人现在是前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亚·冯·叙多——发出了如果小冲突不按雇主的主张解决，就举行总同盟歇业的新威胁。他们在通报中说，工人不顾景况艰难要求提薪，这是公司无力满足的。事实真相是，只有一个制造厂的632名工人为薪水标准斗争，而且那些人希望维持原状，他们要求增加的工资比同行业通常支持的还要低5%。相反，雇主为了**降低薪水**，对5729

名工人闭厂停工。这样来看，雇主以工人干扰劳资和平为幌子而以总同盟歇业相威胁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虚伪行为。

同盟歇业的威胁最初涉及约 8000 名工人，然而也影响到在瑞典雇主协会控制之下的其他 83000 名工人，而其他雇主支持同盟歇业又进一步使约 100000 名工人有可能被卷入。这样，雇主把他们同盟歇业的傲慢策略发挥到了极致。工会将逐渐被接二连三的总同盟歇业所粉碎。

工人一方现在已经领教过闭厂策略。因为两年前，所有的协议都是在同盟歇业的阴影下签订的；显而易见，雇主希望一场公开的冲突。如果工人投降，承认一系列不利于他们的修改，同样的局势不久就会重演。如果工人不想丧失对自己劳动条件的一切影响，就必须制止同盟歇业的总威胁。经济形势依然困难，但最坏的危机已经过去。不战而降意味着工会的破灭。但就范围来说，这场艰苦的自卫战在进行时不会像平常一样得到未参加罢工者的帮助。唯一的出路是**用总罢工来作为对总同盟歇业的回答**，这将使雇主估计会逐渐转回上班的所有工人立即加入斗争，而且还创造了一种使社会其他人士必须为达成合适的解决方案而介入的形势。

根据对形势的这一看法，工会代表决定，万一同盟歇业如所威胁的那样扩大了，就号召 7 月 26 日在纺织、锯木行业举行总罢工，8 月 2 日在钢铁业举行总罢工，“以此来迫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迅速结束这场大战”。工会代表发表的宣言说，一直以同盟歇业相威胁的雇主的残忍无情的做法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的野蛮行径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制止。城市的病人看护、动物管理员、街道清洁工人、水电工人一定不能参与总罢工。罢工工人应平静、沉着自若而不发生暴乱；这关系到工会在瑞典的存在。

全国的工人热烈接受了总罢工的号召。当雇主在 8 月 2 日完成了他们最后的打击，8 万工人被停工时，**总罢工**于 8 月 4 日全面开始。所有

工业基本上停工了，部分地方的运输工具也停运了，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跟着行动，人数之多让人意想不到，工人在非常遵守秩序的精神下大规模从瑞典工业中撤离。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没有断，所有命令中不举行罢工的部门都没有举行罢工，但同盟歇业和罢工在第一天一共卷入了约30万名工人，其中有9万名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和和1万名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

当局进行了重大并且部分是挑衅性的军事调动，但工人保持平静。**报刊暴跳如雷地反对罢工**。它们不提大规模的同盟歇业，只对通过总罢工“打击了社会”的工人大加谴责。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一些按照规定不参与罢工的市政服务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加入了他们自己的阶级，这导致报刊气急败坏的抨击，并使自由党报刊借口“以受到攻击的道德的名义”同他们的保守党同仁联合反对工人。但是当不属于劳工联合会的印刷工人也加入8月9日的罢工以催促问题的解决时，“破坏了规则”的叫唤声更强烈了。

在罢工之初看来保持了相当中立的立场的政府，现在开始表现出对工人的更多不加掩饰的偏见。当局试图用一切手段来恢复报刊在大街上——尤其是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的售卖，并在指挥电车和出租马车的“资产阶级卫士”——来自上等和中等阶级的自告奋勇的工贼以及各种各样的暴徒——的帮助下逐渐取得成功，大多数报刊不久就能重新出版，这些报刊的书记员、记者及其他人员，自然对工人“制止新闻自由”的企图感到更加愤怒。凭借这些手段所得以恢复的报道，其真实性在下述事实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整个新闻界在正值总罢工最高潮的第二个星期里每天发表“总罢工在消失”的消息！瑞典雇主协会要求它的成员提供“适宜发表”的消息，在各种倾向的报上任意剪裁发表。

“社会”就这样联合起来反对斗争的工人，当局、警察和法院尽最大努力表明自己是“阶级社会”尽职的仆人。引用“阿卡普斯法”的

迫害肆行，工人遭到逮捕，为了最微不足道的违法而受到严惩，集会、演说遭到禁止，公共道路和工作场所被宣布“受法律保护”。但工人不理会这些挑衅，工人们自己要求的“禁酒”对于这一幸运的结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报刊发行逐步恢复时，他们时刻不丧失自己的耐心。面对他们的敌人的联合力量，他们可以相信自己的纪律、自己的坚持不懈及对作出牺牲的心甘情愿。

这场巨大的斗争就这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进行，没有任何变化发生。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们都团结在海尔曼·林德奎斯特的统率下，地方的指挥都掌握在549个罢工委员会中。工会领导同群众之间的良好纽带是总罢工的正式报纸《回声》，它由格尔哈德·芒努松编辑，在8月10日—9月6日出版。当其他工人报刊停刊时，《回声》在这个月中单独代表了斗争着的人民的心声。

尽管资产阶级报刊每天都声称罢工在消失，官方8月18日对罢工者的统计表明，罢工人数同第一周相同；现在官方估计，8月10日的参加人数为29万人，到20日为27.5万人。

这种斗争具有长期性；正如人们预先所计划的那样，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工会早就采取措施，呼吁工人的国际团结，以在必要时帮助斗争中的受害者；现在，为了斗争的继续进行，我们需要这种帮助了。有着无比团结的精神的一些国家的同志们已经给予了这样的援助，它将永远铭刻在瑞典工人的记忆中。我们最邻近的挪威和丹麦的同志们显示极其动人的慷慨之情，甚至芬兰人也尽力提供帮助。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外，德国的工人也伸出了有力的手，这使斗争绝对可以坚持下去。我们还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得到了不能忘怀的支持。但在工人联合会国际局的宣言发表后的不同的反响仍然表明，为了国际团结还要做大量工作——瑞典代表把这个问题提交哥本哈根大会的理由就在于此。从瑞典国内外所得到的资

助使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中发放了150多万瑞典克朗——大部分是以分配来自工人的合作企业的食品的形式。外国工人总共为进行这场斗争捐献了300多万瑞典克朗；瑞典工人同样——主要通过自己的联合会——募集了300多万瑞典克朗。

工人阶级的持久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的预期，最后导致越来越高的**和解**呼声，以便停止这场日益破坏着全国的经济状况的大规模阶级斗争。8月19日，官方的“调解人”已建议政府像1908年那样出面干预，但曾是“激进分子”的内务部长汉密尔顿伯爵对所有的请求充耳不闻，甚至把已提出的建议秘而不宣！其他建议的命运同样如此，其中有一项几位知名的妇女提出的和解协议。不久，自由党领袖收到了汉密尔顿伯爵的回音，意思是由于“社会的关键职能”受到了工人的打击，因而政府不能“作出或提出任何妥协”！政府选择了“**同盟歇业政府**”的立场；冯·叙多先生相信饥饿会使工人大军停止下来，这就是不接受任何和平协议的原因。

为了挫败他们的计划，斗争必须改变，因为在经历了一个月的斗争后，工人的支持手段已枯竭，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已作出了最后的努力。9月3日，工会同瑞典雇主协会**之外**的一切雇主协会达成的一个协议。这一被称作“合理分担”的协议使10万名工人立即上班，这扫除了政府自己制造的解决问题的障碍。当某些不顾预先规定参加罢工的工人组织反对这种协议，拒绝屈服于他们雇主的选择时，政府找到了拖延的又一个借口。但当这种拖延及“黄色工会”的工人回去上班——这受到政府的热情称赞——都不能破坏工人的组织时，政府于9月12日被迫请自己的“调解人”把工人联合会和瑞典雇主协会的代表召在一起协商。9月27日，谈判陷入僵局，首先是由于雇主主张的一些“原则”，而这些原则会确立他们决定劳动条件的至高权威。斗争继续着，但范围缩小了，10月底时，主要在钢铁厂。随着时间的流逝，雇主益

加残酷，他们不仅宣布在同盟歇业还在正式进行的地方开除工会联合会会员，而最无情地侵犯了他们自己保证过的联合权，还开除了年已六七十岁、一生辛劳冶炼的老金属工人，把他们及其家庭抛弃在冰天雪地。这时，甚至资产阶级的意见也被这种制造战争的态度激发起来。然而，达成协议的尝试又一次在11月3日触礁了，但同一天，瑞典雇主协会不得不宣布**取消钢铁厂的同盟歇业！**

这明确承认了雇主不能把他们的斗争进行到底。从这个角度看，如下事实并不重要，即这场大战不仅没有正式结束的迹象，而且这一天在不同的工厂还有坚持同盟歇业的假象。这些地方的工人被迫签署了脱离工人联合会的规定，但在没有发生抗议或新的同盟歇业的情况下，这个规定又被明确宣布废除了。

* * *

瑞典工人阶级进行的这场无可比拟的最大规模的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它的范围与规模同这个国家的居民人数相比，在近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斗争双方都不能声称自己赢得了胜利。工人是被迫进行这场作为**自卫战争**的斗争的。我们知道这带来了重大牺牲，工会组织的会员人数和资金都受到损失。

但这场斗争的最重要的目的显然实现了：使同盟歇业的武器失灵，打消雇主不断地用它来进行威胁的企图。雇主肯定已经明白，这个武器不像他们中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有效，工人组织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中，事实上在整个社会的其他一切人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能不顾所有这一切团结一致，甚至在这样的斗争中取得部分胜利，他们对劳动条件的重大影响不能被剥夺。

因此不用惊奇，工会的敌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一开始自吹的“社会

对总罢工的胜利”特别不够充分，他们准备用政治的方式给工人阶级套上锁链，这是雇主协会在他们反对工会的斗争中所无法实现的。

同盟歇业的政府将继续发挥其在罢工中的作用，这是十分清楚的。总罢工基本结束后不久，内务部长就要“行业争端立法委员会”提出法案，当委员会回答说它不可能在1910年议会会期前完成这一立法提案时，他解散了这个委员会（其中的社会党委员定然不受他喜欢），并同司法部长一起保证将亲自提出一项关于行业争端的新法案，以使社会避免1909年发生的事。

在11月底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工人经过讨论后对罢工领导人在履行要求他们承担的义务时所采取的方式投了明确的信任票。阶级斗争的重心——在1909年下半年是工会总罢工——现在移到了政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以政治方式反对同一个资本家敌人、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的使命落在瑞典社会民主党肩上。

1910年的议会会期一开始，我党就立即对政府在总罢工期间的不公正做法进行了抨击。在斗争中膨胀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庞大身躯，在斗争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一点在那时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自由党领袖斯特夫先生自然宣布不同情和不赞成工人阶级的团结，他用抽象的、模棱两可的社会团结来反对这种团结。但在瑞典主要由普通人和小农支持的自由党不可能对雇主在用驱逐及针对工会的禁令来追击工人阶级的做法中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感到满意。令保守党人不快的是，自由党人在议会中——以后在他们的报刊上——拒绝再做赞成政府对我们进攻的共同卫士。随时光流逝，总罢工事件逐渐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普通自由党人的思想再次更清楚地与保守党人的愚昧无知区别开来——尽管这个国家已经经历的社会动荡比以往更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动摇性，这些老党在总罢工前存在的不同意见再次复现了。

我们的议员在议会中数次提出了使当局和雇主难堪的总罢工及其一

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成了两项重要的动议的基础：一项是针对阶级法案的，这在骚动的几个月中被用来反对工人；另一项针对那时的行政仲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目前在瑞典议会里都不会取得任何直接结果，但却提供了使全国人民明白在“受攻击的社会”一词背后隐蔽着什么样的阶级暴政，以及让工人的敌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机会。事实上，在上一个秋天的骚动之后，法院证明重新审议了判决，那时，判决宣布之后在高一级法庭上被迫宣布无效。不过，后来在瑞典还存在反动的阶级判决的事例。一个青年同志亚·古斯塔夫松因号召铁路员工参加罢工，被判处两个月苦役，也被高级法院宣判有罪。在瑞典，铁路员工属于公职人员，号召他们离职是“教唆犯罪”。

不过，1910 年议会会期的重大问题是关于**行业争端法案**的斗争。内务、司法部部长执行了冯·叙多先生的命令，提出了许多涉及集体契约、劳动法庭、私人契约和加强反对“威胁社会的罢工”的立法等法案。所有这些法案的特征是不公正，它们一字不差地包括了瑞典雇主协会在去年秋天徒然无功地压制工人联合会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的“原则”。

现在当局又想强迫他们接受这个法案。法案中**包括集体契约生效时同盟歇业**（和罢工）的权利，这是对集体契约思想的一种荒唐的解释，但雇主却以此来确立他们同盟歇业的策略。

自由党人对上院不言自喻会马上批准的这个法案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小农依据正当权利提请注意，上述“原则”一旦合法化，会随时使另一场巨大的冲突爆发；这种缔造“劳工和平”的方法他们不能接受。

然而，尽管雇主决不愿意放弃这一点，最后这些法案在议会全部被社会民主党和大部分自由党人组成的多数所否决。司法部长提出一个限制工人权利的新联合法的努力也徒劳了。

雇主用立法来获得同盟歇业所不能夺取的东西的努力就这样完结

了。用呼吁社会恐慌来对付总罢工的政治手法彻底破产了。工人在冲突期间的优异行为使自己避免了更多的阶级立法；如果在罢工的推动下发生骚动，这些法律肯定会被批准。不过，司法部长仍待在内阁中，明年将会提出新的法案。因此，斗争将继续，但我们希望能否决这些将会证明对工人非常不公平的法案。

* * *

此外，我党在1910年议会会期中成功地继续了反对巨额的军事经费的斗争。如果议会保持现状，看来保守党明年将全力以赴地作出最后一次努力，把新的军费负担，特别是海军的军费负担压到我国人民肩上。我党要求减少这些拨款的有力主张迫使自由党人也加强反对，自由党的委员后来还宣布退出所谓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林德曼先生任命，实际目的是增加国家的军费。就为这个原因，亚·布兰亭在委员会成立时拒绝了这一任命。这样，社会党人的合理意见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党甚至对自由贸易问题也采取了行动，主张为推动废除我国的谷物法而进行普查。关于这个问题，只有少数自由党人敢跟随我们。

然而，除了行业争端法案失败以外，使1910年春天值得记忆的另一个政治事件是第一次按照新的40等级的选票制和比例代表制选举郡议会。斯德哥尔摩的郡议会选举率先按比例代表制举行。只有一半的郡议会议员——即50个——需要改选。从前，社民党在100个等级的选票的规定下经自由党帮助得到100席中5席，现在我们自己得到了16席（自由党12席，保守党22席；如果平等投票，我们会得到22席，保守党只有16席）。如果明年的选举照此进行，社民党将拥有斯德哥尔摩郡议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届时在上院有3个代表斯

德哥尔摩的席位。

在总罢工结束后不久的艰难时刻取得的这一重大成就，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同志们在郡议会选举中进行强有力的活动。但是，在一些地方，工人不可能交纳所有的税；成千上万的工人选民在林德曼的“普选权”条文被排斥在选举之外（在新的选民表中，这一条文显得更清楚。有些城市有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没有投票权，有的城市甚至是一半）。

结果和斯德哥摩一样（尽管选举在1910年3月结束，结果在6月才完全公布）。以前只有几个郡议会议员的社会民主党现在一共得到125个席位，而自由党赢得424个席位，得到40等级选票制帮助的保守党保住了668个席位。

用数字来表示，这些郡议员分别由61000名、173000名和158000名选民选出。如果把在郡议会没有代表的大城市算上，这3个党的选票分别为85000票、190000票和175000票。这125名社会民主党郡议员分散在各郡，因此只能选派9名或10名到上院去。加上大城市的代表，**约有12名至15名社会民主党人**将担任上院议员，那里以前只有地主、富裕的工厂主和高级官僚的代表。然而等到约50名自由党人加入时，过去强大的保守党人将丧失些地盘，他们同时还丧失了两院总数中的多数。无疑，林德曼先生和保守党人会希望尽可能推迟这一痛苦万分的时刻的到来——这意味着他们在两院中权力的终止。因此，在这些郡议会选举之后，他们毫不动摇地反对显然忠于宪法的要求：上院**全部改选**。

* * *

最后是一些统计数字报告。

党员人数

瑞典社会民主党计有：

1889 年约 8000 名党员
1900 年约 45000 名党员
1905 年 1 月 1 日在 112 个地方组织中约 64835 名党员
1907 年 1 月 1 日在 170 个地方组织中约 101929 名党员
1908 年 1 月 1 日在 239 个地方组织中约 133388 名党员
1909 年 1 月 1 日在 296 个地方组织中约 112693 名党员
1910 年 1 月 1 日在 296 个地方组织中约 60813 名党员

1909 年期间党员人数严重减少，但是现在正在增加。

在过去几年里，地方联合会已合并为党的 **20 个区**。这些区在 1910 年按新的选区组织。

党的收入在像 1908 年那样的好年份是 87000 克朗。党的金库可以提供 33000 克朗鼓动费，此外，15000 克朗用于（竞选）小册子，代表大会经费 19000 克朗。工人出版社同年收到 29000 克朗资助。

不言而喻，经济危机和总罢工产生的困难影响了党的财政状况。1908 年代表大会决定的部分开支因而必须延期，但我们相信较景气的时期也会顾及这些。

我们的同志 C. G. T. 维克曼自 1901 年以来是党的书记和司库。

工人的工会全国联合会在 1891 年初有 22 个工会联合会，46000 名会员。过去几年的情况如下：

时间	联合会数目	会员人数	联合会的总收入
1906. 12. 31	1690	136413	1994000 克朗
1907. 12. 31	2144	186026	2732000 克朗
1908. 12. 31	2172	162391	4703000 克朗
1909. 12. 31	1829	108079	—

这里也有危机和总罢工的明显标记，但无疑这种标记正在消失。

1909 年年初加入工人联合会的工会联合会为 27 个。最大的联合会是非熟练工人联合会（40000 名会员）、钢铁和冶金工人联合会（34000 名会员）及木材工人联合会（12000 名会员）。

计有 7000 名农业工人会员。

不属于工人联合会但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数瑞典铁路员工联合会（25000 名会员）和排字工人联合会（6000 名会员）。

1909 年有组织的工人总数为 20 万名（10000 名“黄色的”瑞典工人联合会会员及独立工会的数千会员除外）。

这大约占制造业、矿业和交通业（农业、伐木除外）工人的**50%**。

因劳资冲突损失的工作日数字 1903、1904、1906 年三年不到 50 万天，重大的同盟歇业 1905 年上升到 250 万天，1908 年上升至 184. 2 万天，1909 年共计 1166 万天，其中单总罢工就为 715 万天，**与此相连的**同盟歇业为 420 万天。

社会主义的劳工出版物

党批准如下**8 种日报**为自己的机关报，即：

《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德哥尔摩；《晚报》——马尔摩；《新时代》——哥德堡；《工人报》——耶夫勒；《东约特兰人民报》——诺尔

雪平；《斯莫兰人民报》——延雪平；《斯孔斯卡社会民主党人报》——赫尔辛堡；《新社会》——松兹瓦尔。（1909 年全部印数为 103000 份）

1904 年，这些报纸只有 3 家是日报，总印数约 35000 份。

5 种报纸每周出 4 期、3 期或 2 期：

《人民报》——埃斯基尔斯蒂纳；《厄勒布鲁信使报》——厄勒布鲁；《布莱金厄人民报》——卡尔斯克鲁纳；《北极光之焰》——吕勒奥；《韦姆兰人民报》——卡尔斯塔德。（共印 23000 份）

除了这 13 种党报外，社会民主党还资助：《曙光》（日报）——于斯塔德；《吕瑟希尔信使报》（每周两期）——吕瑟希尔；《新北方》（周报）——海讷桑德。

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总印数**约为 140000 份。

此外，党出版了《时代》月刊，每年还出一次《五一》和《圣诞火炬》这两种大型刊物。

还有上文提到过的总罢工的正式报纸《回声》。

社会党青年联合会出版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月刊《先锋》和政治周报《警钟》，前者致力于社会主义教育和大众教育，后者有时认为其职责是代表运动的比较激进的一翼。这两份刊物皆由社会党青年联合会朝气蓬勃、热心宣传的会员广为散发。这个联合会现在已经压倒了名叫“青年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后者在 1908 年的党代会开除其领导人后建立了自己的党，出版两份正式周报——《火花》、《新人民意志》。这两份报纸都具有反议会主义和反宗教的思想。后来，贝耶格伦先生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鼓动导致了一项反动的立法，这被他们称为一个“革命的胜利”。这个党费尽苦心，但只拉来寥寥几个党员。

在工会方面，这个党打算建立一个“工团主义”的组织。

社会民主主义妇女有自己的月刊《晨风》。

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会报刊的总数为 30 家，发行量为

205000 份，其中大多数是月刊或季刊。排字工人的刊物每月出版 2 期，钢铁工人和铁路员工的刊物每周出版 1 期（总共 57000 份）。

此外，《合作社》杂志每月出版 3 期，印数达 15000 多份。

* * *

在向上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人民之家**和**人民公园**的总资产估计达 300 多万克朗。此后，人民之家和人民公园的数字大为增加。

特别要指出的是，哥德堡的工人现在拥有一所漂亮的会议楼，大楼的大厅是瑞典有组织的工人拥有的最大的会议厅。在各公园中，马尔摩人民公园总是独占鳌头。

* * *

合作运动终于获得大力发展。合作社联合会在 1909 年的代表大会上庆祝自己成立十周年，有力地表明其思想是与工人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紧密相连的。1909 年，联合会有 391 个组织，65652 名会员。1908 年营业额达 440 万克朗，净收入 6.8 万克朗。联合会工作人员在 1909 年为 47 人。一些合作社还未加入这个庞大的联合会。瑞典合作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合作社》编辑松德尔先生于 1910 年去世。

* * *

我们的**五一示威**——伴有盛大的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近来有人提出了问题：这种连续重复是否削弱了其重要性？有关集会值得一提的是：

1907 年 5 月 1 日出售了 189415 枚党徽。

1908 年 5 月 1 日出售了 225092 枚党徽。

1909 年 5 月 1 日出售了 227940 枚党徽。

1908 年全国各地有 132 处举行了示威游行，1909 年有 136 处举行了示威游行。

* * *

瑞典的**社会立法**仍然很落后。

根据我党的提议，下院在 1908 年提出对有关雇主在意外事故造成伤害时的赔偿义务的令人不满的法案作些改进，但内务部长拖延了这个问题，他期望负责普遍性的养老金、伤残抚恤金的委员会拟出草案来。

另一个委员会修订了老的预防职业危险法，但预计政府最早将于 1911 年提出法律草案。1910 年，议会仓促通过了一个有关医疗基金的新法案。这个法案是由自愿性的医疗基金机构热切要求的，法案把对这些基金机构的公共拨款提高到每年 100 万克朗，但连下院都拒绝接受我们向强制性的医疗保险过渡的建议。我们关于失业保险问题的主张在 1910 年被下院通过，但遭上院驳回。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议会在 1910 年批准瑞典加入有关减少妇女夜班的伯尔尼公约。但社民党有关全面考虑夜班问题的另一个提案被否决了。

* * *

简短的结论

1907—1910 年对瑞典工人运动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07 年

的选举法尽管实际上有许多令人反感的不足之处，但还是给瑞典工人参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郡议会**、**上院**（通过一小批议员）有了代表，**下院**的代表也增加了。1910 年的郡议会选举使我们一次有了 125 名郡议员，这是我们后来取得的有关胜利的证据。使我党议员人数翻一番（目前是 35 名）并使我党的选票增至 75000 票的 1908 年大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有了强烈印象。随后，我们在 1908 年成功地推迟的大规模斗争，于 1909 年以总同盟歇业和总罢工的形式爆发。由此，瑞典工人运动胜利地渡过了最艰难的考验。我党使 1910 年的议会会议粉碎了利用总罢工来争取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立法的努力。

但是，工人在这个旧社会中冲得越远，斗争就越激烈。甚至我们的资本家对手也领略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没有两方面的发达组织[①]，我们在 1909 年是不可能进行这场大规模的斗争的。

因此，今后对工人阶级来说更重要的将是同时运用所有适当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解放：通过政治组织进入国会和郡议会，通过工会组织增加自己在劳动条件上的权力，这方面，还借助于合作社改善生活水平，同时让工人越来越多地吸收社会主义的团结精神和社会主义意识。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将前进，即将到来的更大斗争在等着我们；我们坚信伟大的国际组织中的瑞典支部将在全世界范围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中履行自己的义务。

代表瑞典社会民主工党

亚·布兰亭（主席）

① 两方面指经济方面（工会）和政治方面（社民党）。——译者注

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由于有关丹麦组织创建的详细情况已经向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作出了报告，所以下述报告只打算突出那些有助于对我们的活动作出正确评价的要点。

建立于1866年的组织“国际”[①]的一个支部于1871年在丹麦组成，这开创了丹麦的工人运动。巴黎人在街垒上战斗时，丹麦工人首次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团结起来。从那以来，我们的组织一直保持着一个国际协会的特征。

从中央组织开始，行业支部形成了，这是现在的工会的基础。这样，丹麦工人运动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它遇到那些当权者的猛烈抵抗；尽管如此，它的一般特征和原则始终一如既往。

1873年，警察的一纸禁令解散了国际协会的丹麦支部。领导人被捕入狱，但尽管如此，运动没有停滞。行业支部变成独立的、全国的工会，以后合为总联合会，以各种方式同社会民主党连接在一起。它们的活动一直遵循本党的原则，我们的行业组织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仍然未变，政治职能现在专门由成立于1878年的“社会民主联盟”执行。这个联盟担负着直接的政治宣传，行业工会过去一直是我们的运动的主要基础，现在仍然如此；我们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它

① 国际指的是第一国际，但原文中其成立之年有误，应为1864年。——编者注

们还是我们的报刊赖以建立的基础。

政治组织

因此，我们的党是通过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所以，不能凭借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的人数来正确衡量我们的力量，行业工会的会员人数也必须考虑在内。

不过，以社会民主联盟为基础，一系列政治性的社会民主协会发展起来。在所有城市和四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地区，现在都建立了政治组织。360 个这一类的组织（4.7 万名成员）属于联盟。其中有 2 万名成员居住在哥本哈根及其附近地区。

社会民主协会是我们宣传工作的起点，它们在地方上轰轰烈烈地展开的活动，对我们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作出了非常有效的贡献。

我们的政治组织的财政收支状况，很难给出一个大体的数字；社会民主联盟的上一个财政年度表明的现金余额为 55317 克朗（1 丹麦克朗约合 1 先令），但这些数字只体现了我们的部分活动，因为 15 个地区的特别委员会担负了地方的宣传工作。在这些委员会的指导下，举行了 500 次社会主义集会，除去竞选经费用掉了约 5000 克朗。

在 1909 年，我们获得的自愿捐款约为 3 万克朗，被用做我们在大选中的经费；此外，我们提出候选人的选区的协会提供了 1.5 万—2 万克朗。关于 1910 年的大选，尚还无可奉告。

议会活动

丹麦的宪政制是两院制，一是福克廷（众议院），一是兰德斯廷（参议院）。在两院中只要获得简单多数的支持票，法案即告通过。

福克廷有114名议员。除了佣人、领取贫困救济金者、被法庭判刑者以及无力偿还债务者，任何年满30岁的男子都是选民。

通过直接选举，114个选区每区选出一名议员；不举行第二轮投票。

兰德斯廷（参议院）有66名成员，12名由国王（即内阁）指定，27名由全体选民选出的选举人间接选出。剩下的27名由纳税最高者按一个相当复杂，对哥本哈根、外省城市和农村地区有不同规定的制度选出。这样，纳税最高者拥有双重选举权，一是选举选举人的权利，然后是直接选举27名参议员的权利——这种制度当然给参议院涂上了一层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但他们还有更大的特权，因为在每一个农村地区，纳高税者（地主之类）都是法定的选举人。这一特殊的选举人阶级拥有的影响力同农村地区所有其他选举人合在一起的影响力一样大，比外省城市的全部人口的影响力大一倍。选举法的这些规定进一步给参议院打上了鲜明的农村烙印。

选民总数为45.8万名。在上次大选中，78%的选民行使了选举权。

我党在活动的初期提出了一些候选人；自1884年起，党参加了福克廷大选。该年我们成功地在哥本哈根第五、第九选区选上了两名候选人。首先提到的第五选区从此一直是我们的选区。

我们的选票一直在增长，只是偶尔丧失某些席位。

下列数字表明了我们参加大选的情况。

年份	候选人	席位	选票
1878	1	0	767
1881	2	0	1689
1884	3	2	6806
1887	4	1	8406

（续表）

年份	候选人	席位	选票
1890	10	3	17232
1892	15	2	20094
1895	21	8	24508
1898	23	12	31872
1901	30	14	42972
1903	55	16	55593
1906	62	24	76566
1909	73	24	93079
1910	54	24	98721

上面提到的不举行第二轮投票的选举制是为什么丹麦社会民主党有时与其他民主政党合作以防止最反动的候选人当选的原因。在上次大选中，我们同那时执政的激进党共事。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获得支持取消参议院特权、修正新通过的军事法（以便把陆军和海军的年度经费减少一半）的多数。

但由于不合理的选举法，支持军队的党获得了胜利；然而，如果没有上述合作，他们的会取得更大的多数，更难以在将来被打破。

下列为我们近年在议会展开的主要活动。

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下述法案：

八小时工作日

小学生免费午餐（费用部分由国家承担）

取消贵族封号、等级

病人免费照看

21 岁以上的人均享有投票权

妇女、佣人享有投票权

公共机构照管孤儿

取消封地和家庭庄园

陆、海军中司法管理改革

公立学校改革

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些法案，但我们还以其他方式成功地对立法——不论是预算还是其他法律的通过——施加了影响，如：

提高邮政、电报和铁路职员以及林业工人的工资。

放宽想得到土地的农业工人的贷款条件。

针对农业、林业工人的意外事故保险。保护外国工人。

此外，还有给私生子营养补贴的法律，关税法，等等。

在社会民主党的建议下，一个审查有关孤儿和弃儿问题的委员会得以任命。有关孤儿院和整个教育体制的法案将会被提出。我们希望能影响有关这些问题的重大改革。

虽然我们的法案极少获得通过，我们的议会活动还是给立法打上了明显的烙印。下列改革也可以顺便一提。

养老金法：所有60岁以上男女，部分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者，能得到国家和地方当局发给的津贴而又不被剥夺选举权。此项支出现在每年为约800万克朗。

国家给医疗储金会发放补贴，由其成员管理：每年200万克朗。

国家给由工会建立、管理的失业机关发放补贴（每年约60万克朗）。

国家给济贫办的辅助机构发放补贴，每年25万克朗，领取救济者不丧失选举权；此外，还对1908—1909年间的失业者发放特别补助。

雇主支付意外事故保险费，包括机械工人、建筑工人、农场和林业工人。

因此，我们的活动不无成果。不过，其主要作用是：我们批判了资

本主义制度，指出了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所要遵循的道路。这样，人民得到了政治教育，选民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使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精神在工人阶级中滋长起来。

裁军及军国主义

在上届议会会期辩论的问题中，军国主义占据重要位置。

这个问题已经被一个议会委员会审查了数年。当报告发表时，社会民主党建议解除武装，取消陆海军，拆除堡垒。如有可能，军事设施转为民用，操练场、营房出售，等等。丹麦国家必须宣布中立，争端问题由外交机构解决，或由国际仲裁法庭裁决。此外，提出了规定在学校中扩大体育和使用武器的教育的法案。

这项法案是按上届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的，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建议产生的影响感到满意。在 1909 年大选中，军事问题首当其冲，社会党人建议解除武装。我们的候选人得到 9.3 万票，尽管选区分配不公平，我们未失一席。我们自豪地指出我们的政治活动取得的这一成就；我们知道，这个建议是向选民提出的一个最重大的主张；我们确信，这一成就显然意味着野蛮的军国主义最终将被消灭，人权和文明将得到彰显。

兰德斯廷（参议院）

我们也参加了参议院的选举。

1890 年，我们赢得了两个席位；1898 年，我们保持了这两个席位。1906 年，我们在保持了原有的两个席位外，还成功地获得了代表西兰的城市与农村地区的一个席位以及代表了日德兰的市镇一个席位。目

前，我们在参议院拥有四个席位。

地方委员会

与议会活动相一致，我们努力争取在触及人民日常生活许多方面的地方管理中施加影响。在丹麦，25 岁以上、年收入不低于 800 克朗的男女现在在地方选举中都有投票权（1909 年前为 1000 克朗，而且妇女没有投票权）。已婚妇女只要丈夫纳税，就有投票权。

哥本哈根市议会由两院组成："市民代表院"和"行政长官院"。有 48 位代表按比例制选出。行政长官院人数为 9 人，主席由政府任命，4 名是选出的终身市长，4 名是选出的任期 6 年的参事。

在 1909 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 95329 票中的 44849 票。在行政长官院中，两名市长和一名参事是社会党人。我们的代表中，17 名是男子，3 名是妇女。市民代表院的主席是一名社会党人。在外省市镇里，我们现有 300 名代表；在农村地区至少有 600 名。如果加上市检查员，我们在地方机关中一共有约 1000 名代表。1895 年我们有 94 名代表，1900 年为 374 名，现在——如上所述——约 1000 名。我们在估税委员会及一些辅助性的机构中也还有许多代表。这些机构给穷人发放现金津贴，而领取者的选举权不受影响。当然在这里无法提供我们在地方委员会的全部活动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济贫制度与养老金制度，此外还有学校改革，建造医院，由地方委员会管理煤气厂、发电厂、屠宰场，给公务员提高薪水，八小时工作日（在哥本哈根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煤气厂推行），等等。

我党在所有这些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显而易见。工人阶级的地位得到改善，穷人与病人受到更好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和价值比以前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更经常的考虑。

我们的报刊

在丹麦社会民主党建立的同时，我们的第一份报纸出版了。它的名称是《社会主义者报》，后来改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尽管存在一些十分重大的困难，我们成功地坚持了报纸的出版，特别是通过工会的直接捐款。行业工会与社民党现有的密切联系主要归功于我们的报刊的发展。

这份报纸是我们其他报刊的基础。它由哥本哈根协会和社会民主联盟共同拥有。这些组织选出的代表组成了我们的报刊的最高权力机构。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编辑和经理及一个担负着这份报纸和外省报纸的日常管理责任的管理委员会是由这些代表选出的。在我国社民党目前有30家日报，但只有13家是大报。每天发行量为12万份。其中5.6万份是哥本哈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每天的发行量。

还出版了讽刺周刊《乌鸦》；此外，有一家农业工人的周刊和一家季刊《社民党文库》。后者的发行量为1万册。

由上可见，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地位同我党的总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且，我们的报刊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它对党的团结贡献颇大，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独立的宣传。它的目标是使我党稳步前进，获得对我们活动所必须的手段。

总体教育状况

除了上述宣传之外，我们的组织同其他相类似的机构合作，开办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问题的讲座。而且在大学生协会（一个自由的大学毕业生的联合会）的帮助下，我们还组织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普及讲座，并为失业工人举办音乐会。

社会党出版了许多小篇幅的著作。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发行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的学术季刊，我们希望能增加出版周期，扩大版面。今年秋天，我们将尝试开办一个夜校，讲授社会经济、社会主义史、劳工法、统计等课程，尤其是向我们从事宣传工作的党员讲授。这样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也能获得对扩大这项自然是非常可取的工作的必要经验。

社会民主联盟和合作工会还建立了一个档案馆，置放有关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行业发展和合作社发展的历史的所有出版物和其他文件。这样，我们将收集到大量不仅对历史重要，而且对我们计划建立的工人业余大学的学生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的材料。

工会运动

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活动，不少报告已经被提交给国际书记处。而且，我已在本报告的开头提供了有关行业职工会起源的细节，这里仅补充一些其他问题。

行业组织的大部分都属于中央组织："合作工会"，它拥有 53 个工会（1241 个分会）和 9 个独立的协会，会员共计 98643 人。

在合作工会外有 10 个工会和 23 个独立的协会，会员共计 21552 人。这样，行业工会一共有 12 万名会员。

1871—1878 年间建立了 31 个工会，会员达 3189 名；此后，它们不断发展，会员人数达到上述数字。

工会组织的经济力量可从下述数字中看出：

1900 年年底，这些组织拥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为 2316254 丹麦克朗（1 克朗约合 1 先令），债权和股份等为 1203703 克朗。失业救济机构的结余为 646107 克朗，医疗储金会和殡葬互助会的结余为 77136 克朗。

在1907、1908和1909年，关于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新协议分别由40、43和47个组织进行了谈判，这些谈判分别涉及93328、27423和31371名工人，结果分别有39274、19259和14279名工人得到条件更好的新协议。

这三年的冲突不算大：分别有6264、1646和2600名工人卷入罢工或同盟歇业。

根据上面提到过的有关失业机构的立法，这种受政府承认的机构与行业工会有联系。1909年年底，共有44个办事机构，83836个组织。账目表明，这些组织每年捐助了100多万克朗，丹麦国家拨给了约60万克朗的津贴。各城市对这些机构的津贴估计约为每年20万克朗。上一个财政年度的支出为1448538克朗。

从1908年冬到1909年初，失业人数特别多。我们在全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以帮助那些已不得不用完了从这些机关的获得津贴的人。我们募集到267441克朗，都给予了那些最贫困的人；在这次募捐期间分配了14次现金、食品等。

瑞典的总罢工

在1909年春，众所周知，工人运动引起了瑞典的同盟歇业，这随后又引起了有30万工人参加的总罢工。

丹麦工人十分理解这场重大冲突的重要性，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来帮助我们的瑞典同志。通过募捐、增加党费和工会拨款等手段，我们得以向瑞典工会送去了838341克朗。

仲裁立法

因1908年印刷业的一次冲突，丹麦报刊的排字工人决定发动声援

罢工，这一事件引人注目。

内务部部长首先提出了一个协议，后来又建议选举一个从主要的组织中选出的雇主与雇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为防止今后的冲突而提出永久的仲裁规则。各组织同意了该委员会所建议的规则。在最近的议会会期中，两个有关这一问题的立法得以通过，它们在许多方面具有巨大意义。

第一个法律规定建立一个常设的仲裁法庭，由两个中央组织选出数目相同的成员组成。这些成员指定一名主席。

在通过其他途径不可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所有涉及违反现有协议的申诉都将由这个法庭裁决。这样，争端各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通过暴力达成协议。只有在不存在协议，或协议在警告期满后失效时，各方才可以自由采取其他手段。

这个法庭不仅能就现行协议是否被违反作出裁决，而且还有权判处赔偿金，不过并不是依据丹麦其他法庭所遵循的关于损害的一般性的法律规定。它只能施加一种介乎于罚金和赔偿金之间的“处罚”。形势的缓和可能使这一处罚减轻，或完全被取消，这同一般的法律实践相反。

这个法律还规定，各组织只对它们直接参与的停工负责。仲裁法庭的裁定是不能上诉的。各组织有权发布不违反协议的停工通报。

根据第二个法律，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应任命一名调解人。他由政府按仲裁法庭的提名任命。如果谈判陷入僵局，或者在停工警告已经发出时，他将召集各方举行会议。他可以在各方的同意下提出一个调解方案，但各方没有接受其建议的义务。

合作运动

丹麦有广泛开展的合作运动，但它不全归功于社会民主党。很早以

前，丹麦农民就奠定了合作社的基础，并按这种体制建立了奶牛场和屠宰场。但社会民主党也建立了一些同样的企业，并准备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现在，我们在哥本哈根拥有一家面包厂、一家酿酒厂和几家肉店，此外还有一家由丹麦国家保险局再保险的人寿保险公司。在一些外省城市，有类似的面包厂、酿酒厂、煤店，等等。我们还在所有较大城市中拥有会议厅。

这些企业是由工人出资建立的，由选出的代表管理。盈余按照各企业的专门决议拨出部分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经费。

哥本哈根的“工人面包厂”是我们最老的合作企业。建筑、发动机、磨粉机及土地价值51万克朗。目前股份为1.4万克朗。去年面包厂和肉店的利润是1万克朗。

哥本哈根的“星”酿酒厂拥有价值1259966克朗的建筑和机械。由于失业和夏天不热等原因，去年没有利润，但前些年利润相当多，有一年达10万克朗。买卖现在又好了起来，今年肯定会取得可观的盈余。

这两个事例或许足够表明我们在合作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当然，社会民主党也参与了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我们的党员是这些合作社的社员，好多人是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但如上所述，这些合作社最初是由农民建的，它们是旨在彻底解放丹麦农民的农业运动的一部分。

社会民主党将继续重视工人运动的这一重要方面，我们希望在今后能向大家报告更多的成果。

由上所述，人们可以对丹麦目前的社会民主义运动形成一种认识。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非常小，我们不能要求被算做领头人之列；然而我们感到，我们的行动也将有助于社会主义原则的不断传播，它将有助于加强新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新社会建立之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灭亡。

在丹麦，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我们始终努力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保持一致，我们的党创始于欧洲大国的强大的革命潮流中。我们自豪地显示出我党的团结。我们的报刊和组织都属于社会民主党。我们的协会的目标到处一致。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是我们一切努力的基础，协和一致是团结我们的力量向光辉的目标前进的口号！

因此，在丹麦只存在一个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我们期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组织团结起来，可以胜利地用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博爱之上的新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代表丹麦社会民主联盟

斯陶宁格，书记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1907—1910年间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形势和发生事件的报告

党的规模

在用一些数字表明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到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这三年间的荷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进程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荷兰运动的组织形式。

我们这个被称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政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党。任何组织，如选举团体、合作社、工会和工人协会，都不能集体地加入我党。党员的加入都是个人行为。每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党的支部存在，除非是那些拥有一个以上选区的市镇，在这些市镇，每个选区（每个选区的居民平均约为55000名）可以有一个党的支部。

因此，工会与党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合作社同样如此。

各支部的人数情况如下：

1907年1月1日	167个支部	7478名党员
1908年1月1日	176个支部	8423名党员
1909年1月1日	194个支部	8748名党员
1910年1月1日	205个支部	9504名党员

党员人数的这种持续增长同样在其外部力量的扩大上表现出来，

1909 年举行下院大选提供了这方面的数据。

在对选举数据作出评判时，人们应该看到，荷兰的选举权一直受到限制。选民只能是表现出具有法律所规定的“财产和能力标准”的男子。由于这种法律限制，1909 年只有 29.2% 的男子是选民；如果实行普选权并且如今享有选举权的年龄（即 25 周岁）保持不变，那么选民人数将达到 47%。1909 年，25 岁以上的男子人数不低于 135 万，但选民只有 84 万；这就是说，将近 50 万成年男子——自然全都是无产者——被剥夺了选举权，这里还不包括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在拿我们的选民人数与其他国家的选民人数进行对比时，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获得的选票数约为：

1905 年	65000 张
1909 年	83000 张

在这两个选举年中，均有 7 名社会党人当选。①

选票的增幅并不太大，这是因为部分农村选区的选票流失了。我们在两个农村选区和范科尔同志领导的一个工业选区失利。但在两个大城市选区（阿姆斯特丹第九选区和海牙第一选区）和另一个工业选区（赞丹）获得的胜利抵消了这个损失。

农村的失利引起了高度重视，党提出了一些重新占领阵地的办法。在荷兰这样一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农业工人的国家，如果不能保住农村赢得的阵地，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损失。由于我们党初期正是在这些北方农村人口——他们一向是这个国家最有民主思想的力量——中得到有力的支持，这种损失对于我们来说就更为痛苦。一个最

① 1905 年的 7 名当选者中的 1 人不是党员，1909 年 7 人全都是党员。

主要的困难是，能够担任社会主义运动领导的活跃人物极少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在荷兰相当严重。同样，许多农业工人转变小农也导致社会民主党选民的减少。农业产业中工人的增加并不能完全弥补这种减少，尽管这种增加的幅度相当大。

1890—1899 年间荷兰自由职业者和雇员的百分比变化如下：

自由职业者

	1890 年	1900 年
工业	28.62	25.63
农业	30.75	31.85
打猎和渔业	36.97	34.58
商业	51.03	50.66

雇员

	1890 年	1900 年
工业	71.38	74.77
农业	69.25	68.15
打猎和渔业	60.03	65.42
商业	48.87	49.74

只有农业中的自由职业者的百分比上升了，也就是说，小农阶层人数增加了，增加的人数来自工人阶层。我们党在农村选民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而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解决。

我们在党内也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其他原因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 1897 年我们党因当时一部分工人首次获得选举权而第一次认真地参加议会选举时，党提出了一个土地纲领，其要求如下：地租应根据土地的产量计算，只能来自赢利；佃农应因改良土壤而获得酬劳；

市镇应给农业工人出租足够的土地，使他们能够靠耕种土地的收获维持生计。

在1897年和1901年的选举中，党当时在农村取得的出人预料的胜利无疑部分应归功于这个纲领。然而纲领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党内受到激烈反对，因为它们不符合党内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主流观点。1905年的党代会删除了该纲领的第一条和最后三条要求。

土地纲领因此被取消，至今未有新的纲领出台。很难估计缺乏在土地方面的要求对农村地区的选举有多大的影响，但在土地问题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积极的主张显然会产生影响。重新提出土地问题的需要依然存在，但重新提出1905年删除的要求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政治策略

在这方面，过去的几年对荷兰社会民主工党来说很有教益。同样，由于有必要纠正在国外散布的有关这个策略的一些错误议论，我们打算在此较为详细地讲一下这个问题。

1905年立法议会选举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能否推翻当时以著名的教权派政客亚·克伊波博士为首的政府。此人在1903年粗暴地干预工人运动，剥夺铁路工人和公共服务人员罢工的权利，并在斗争结束后把工人阶级反抗他剥夺权利的行动骂为“颠覆活动”。人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政府。执政党——联合起来新教和天主教党派——在第一轮投票中没能获得多数；于是在自己的候选人没有进入决选的选区，社会主义工人在决选中一致把票投给资产阶级左翼政党的候选人。结果，联合执政党沦为少数派，在100个议席中只获得48席。我们的近期目标——推翻教权派政府——得以实现。

然而，这种局面造成了特殊的难题。教权派失去了多数，但没有任

何派别能够成功组成新的多数派取而代之。新政府依靠全体支持自由思想的政党，其中既有保守党，也有民主党。但这些党派在100个议席中总共只拥有45个席位。新的自由派政府只能在社会民主党或部分教权派中寻找支持。新的自由派内阁在一些方面支持了人们对克伊波政府的抗议，它对工会的态度即如此。它很快着手修改宪法，以消除宪法中阻挠普选权的障碍；它甚至小幅削减军费。但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不仅教权派，而且反对政府实行普选权的持保守思想的自由派也想推翻进步的政府。这样，并没有预计到这种情况，也没有与执政党达成任何协议的社会党人只能支持政府抗击反动派的进攻。然而，政府很快就表现出它在社会改革方面无能为力，在军事方面也无法实现其起初的削减计划。因此，政府在1907年年底因军费预算遭到拒绝而被推翻；几乎所有教权派都投了反对票，社会民主党和一些持自由思想的政党也投票反对。

社会民主党议员有时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在政府一边反对议会中的反动派，这种做法遭到党内一部分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的猛烈攻击。他们将此视做向资产阶级靠拢。此外，党内的一个反对派一再指责党内多数派否定阶级斗争，因为党在决选时总是作出这样的决定，即支持赞成普选权的自由派，而不是反对普选权的教权派。

特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中，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政策经常被说成是向资产阶级政党不断妥协的政策。包含这种说法的报告，是由那些把仅仅在决选中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做法视为否定阶级斗争的人撰写的。我们党没有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有过其他合作，也没有向他们提供过任何帮助。这样的合作从来都没有成为过讨论的话题，在党内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从头至尾且从未例外地执行了完全独立的策略**。党内的极少数同志和极少数领导人谴责党背离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而在党看来，这些谴责

建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刻板的公式，也不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都适用的灵丹妙方。正是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考虑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状况，要求社会民主党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而不是推行使之成为宗派、脱离群众的政策。我们的党一直本着这种精神完全独立向着纯粹的社会主义目标奋斗。

党内分歧

在此该详细谈一下 1909 年春由一个退党的小团体——所谓的社会民主党（SDP）——发布的名为《致国际》的德文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加入社会党国际局的要求，并对社会民主工党进行攻击。

在对这本小册子作出评论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社会民主党及其产生的历史，这同时也是对几年来在我们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分歧的概述。

自然不可能一一回顾伴随党内分歧出现的所有争议问题。但由于所有这些问题在社民党《致国际》的小册子中已经得到详细说明，我们在此仅作简短说明，希望国外的党员同志通过这些说明了解真实情况，形成与我们同样的看法，即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小团体的分裂活动是一种并非因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造成的可耻的行动。

首先必须指出，分裂分子将自己封为原来社会民主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大多数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员在分裂时仍然留在老党内。目前，只有 3 名前党的执委会委员加入了这个团体。因此，这些分裂分子称自己为“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更为恰当。我们马上将补充说明，多数党员同样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行动。

在所有国家社会党内部出现的原则和策略之争，也在荷兰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在两派的领导人看来，这场争执的土壤不像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有利，因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没有人追求工团主义，也没有人考虑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分裂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实践基础。

党的原则纲领并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完全采用了这个纲领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修改纲领在我党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委员会中还必须就可能的修改作报告，并且在委员会中有很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造成分裂的原因。因此，必须在党内讨论的实际问题中去寻找原因。

在这些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上已经提到的**土地问题**。

在此仅需对这一问题作简短说明，因为它在 1905 年的党代会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并且是一致通过的决议。如上所述，主要问题是党在其竞选纲领中支持向农业工人出租市镇的土地，而这些农业工人可能因此变成小农。另一个问题上党在这个纲领中提出的这样一条规定，即佃农仅需按照赢利的比例支付地租。对纲领的这些条款提出反对意见的不仅仅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1900 年，党内一位著名的“修正主义者”也对此提出过批评。如上所述，负责修改土地纲领的委员会（其委员既有“修正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决议案，该决议案在 1905 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因此，这个几年前就已经解决的问题绝不可能是造成党内持续分歧，甚至分裂的原因。

另一个引起较大争执的问题是**学校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1902 年对党有关学校问题的立场作出规定的“格

罗宁根决议”在国外常常造成党倾向于支持向教会学校提供国家补助的印象。事实上，我们的议会党团正是根据该决议一直拒绝支持这样的补助；而在该决议通过之前，会议党团支持过几个补助草案，但党内从未有过任何反对声音。

希望了解荷兰党在学校问题上的态度的外国党员同志有必要考虑一下如下几个因素：

1. 荷兰公立学校已经完全脱离了教会的影响，这引起了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应。

2. 除了公立学校外，私立学校也在发展。这些私立学校大多数由宗教教育协会创办，起初完全由父母交费，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在那里上课。荷兰围绕学校的斗争仅仅涉及一个问题，即国家是否应该补助这些学校的开支。

3. 围绕学校的斗争直至1889年一直是荷兰政治的主题，对于自由派来说，这是它为了以反教权主义的口号来保持执政，并且尽可能长时间地使我们时代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权问题和社会政策）不引人注意而使用的手段。

4. 教会政党，即人们所说的“反革命”政党（保守主义新教政党）借助各阶层人民的宗教情感，通过这场斗争加强了力量。一大部分工人对政治的关注被转移到宗教领域，他们因此不能与他们不信教的同志一起为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而斗争。

5. 因此，在1887年选举权根据宪法扩大之后产生了一个教权派内阁，它于1889年使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原则上保证了对私立学校的并不充裕的补助；1901年，一个自由派内阁进一步修改了这一原则，使之有利于私立学校。

6. 由于担心1901教权派政党获胜后可能完全修改这一原则，党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如上所说的“格罗宁根决议”就是

这样做的，它声明只有当私立学校的课程在技术标准上达到对公立学校的同样要求时，才允许给私立学校提供补助。依据这一决议，我们的议会党团始终拒绝教权派提出的补助要求，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宗教或者反宗教的考量，而是出于对课程质量的考量。借此，我们党将这场斗争的矛头从反对私立学校的宗教背景转向普通课程的技术标准上，使教权派不再能在教育问题上挑动信仰宗教的工人反对自己的社会党阶级兄弟。

关于这个策略，不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安·潘尼库克博士——站在党的多数派一边，因此，人们同样不能把“格罗宁根决议”说成是改良主义思想的标志。决议并不涉及政教分离的问题，因为补助不是发给教会，而是发给普通的民间教育协会，而且由无神论者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接受无神论教育而建立的教育协会也能申请这种补助。

“新党”[①] 以“中立的国立义务教育学校”的要求取代了这个决议。这一要求非常激进，它在一个小鼓动团体的纲领中不可能带来任何麻烦；但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政党来说，如果接受这种要求，原来被自由派视为过时而放弃了的围绕学校的斗争将在工人阶级中更为猛烈地展开，这非常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使工人摆脱资产阶级的政治。我们党不愿意采取这种做法，也是因为我们是社会民主党，我们的政策立足于社会关系的现实，而不是意识形态。

至于**决选策略**，我们已经作出过说明。迄今为止，我们党在决选中一直支持赞成实施普选权的政党，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在 1905 年的大选中，社会党选民在保守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教权主义政党中给前者投票，完全是为了把 1903 年镇压工人运动的“强人”克伊波赶下台，这是无产阶级的责任。1909 年，党宣布

① 指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在决选中投弃权票，这种做法成就斐然，它使保守的自由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势力所剩无几。

把决选采取的这种策略说成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的结果，把它解释为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近，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至于**劳动合同**，在社会民主党小册子的第 11 页中，下院议员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草案”时的做法被说成议员们犯下重罪。

有关于此，我们仅作如下说明：

教权派内阁 1904 年提交的法律草案含有限制工会运动的规定，激起了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怒火，他们与我们党一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领导反对这一草案的鼓动工作。

同样吸引了信教工人参加的鼓动取得了成果，政府在法律草案中删去了最令人愤怒的条款。然而，仍有一些条款得以保留，例如，收取“保证金”（扣除工资的一部分留做违反合同时的罚金）的规定并没有按照我们议会党团的建议取消，而只是对此作了一些限制；把罢工视为解出合同的重大理由的规定同样与我们党团的建议背道而驰。草案的这些规定以及其他许多不利的条款，使议会党团投票反对这个法案。

当时，我们的议会党团与鼓动委员会在这件事情的主要方面意见一致。但议会党团不能同意委员会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由于把劳动合同放到民法领域来作出规定，因此应在原则上拒绝这一法律草案。委员会的这种看法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德国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看法相悖，在这些国家，我们的兄弟党要求或赞同在民法典中加入对劳动合同的规定。当我们在议员的对手狡猾地利用这一分歧时，我们的党团不得不遗憾地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对鼓动委员会的看法承担责任。用这件事来断言我们的议会党团存在与资产阶级政党靠拢的倾向（这是一种一直有争议的、从未被证明的说法）是不公正的。它在议会进行的其他斗争——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几乎都没有像讨论劳动合

同法草案时进行的斗争那样激烈。

这一问题无疑不是造成持久分歧的原因。

因此，无论是在党纲的原则性看法，还是在有关实际政策的问题上，都不存在那种因重大分歧而使退党能有正当理由的原因。

分裂分子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主要从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工党内受到的对待去寻找主要借口。这使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在《致国际》的小册子中提到的**乌得勒支决议**和**哈勒姆决议**。

在1905年前后，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主要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组成——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党非常听从他们。

他们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做法引起人们的不满。他们把所有的分歧夸大为原则分歧，不断对许多党员同志，特别是议员提出批评，攻击这些同志不配做社会民主党人。

此外，这样的批评导致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要求党将政治行动建立在可能陷入死胡同的基础上。这不仅在1905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年轻人建议党不应参加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进行的决选；而且也在这些党员同志的这样一种做法中得到证明，即他们在议会内外提出我们的要求的方式，常常十有八九会让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中提出的任何完整的要求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并且完全不注意广大工人群众的感情和看法，从而使群众与我们疏远，而是不使他们在运动中与我们一起与资产阶级作斗争。

这种情况使党在议会的领袖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向全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希望被领向何方。特鲁尔斯特拉甚至敦促在党的机关中受托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想把党领向何方。由于缺少这样

的声明，党的代表在面对党内同志、面对其对手在报刊上和议会中对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不断进行的诽谤性攻击时，不能采取足够有力的立场，而这样的立场对于其工作发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却是不可或缺的。

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在1905年完成了这一任务，但他的严厉方式激起了党内反对派的怒火。由于如下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原谅这种怒火。社会民主党的《致国际》通篇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在国际黑他，不过，这本小册子在另一个意义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它使党认识到这些侵蚀党的生命的分歧的意义，同时，它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党内少数派懂得不要再以削弱党的力量和破坏党的团结的方式，而要以促进党的工作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批评和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

在取得这样的成果之前，两派的斗争在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在党的1906年乌得勒支代表大会、1907年哈勒姆代表大会、1909年阿纳姆代表大会和1909年代芬特尔代表大会上，两派都展开了斗争。尽管内部斗争激烈，但党的选票在最近举行的选举中由65000张增至83000张，这表明党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但它是党在最激烈的内部斗争中一直注意使自己始终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领路人，每天都在努力捍卫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的结果。

党的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仅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鉴于，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然而在争取实现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具有战斗力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它使用这个社会给它提供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

因此，党由不同分子组成，其中一部分主要致力于理论和原则的宣传，另一部分主要致力于开展直接的改革行动和使现实朝着我们原则的方向改变的

行动；

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言，这两个部分都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双方之间应该互相补充，以良好的同志般的友谊共同开展工作；

社会民主党工党代表大会声明，它反对任何旨在使这两种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表现形式相互对立的行动，反对贬低某一种形式而单方面地抬高另一种形式而以此破坏党的团结的做法。

二

鉴于，近些年来党内有这样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一些党员同志被另一些同志有计划地打上不坚持原则、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标签，后者以为自己有特别的权力和责任来防止党弱化和脱离原则；

这激起另外一方的反对，在争吵中也与对方恶语相向；

党的团结因此必然面临危险；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对于这种滥用在我们党内不受任何质疑的批评自由的做法表示遗憾；

大会责成党员同志把这样的批评保持在尊重其他党员同志的尊严和维护党的团结的限度内。

这两个决议的目的是，在明确承认批评自由的情况下，使反对派不要再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批评意见，即经常有计划地攻击党内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声称他们的思想毫无价值。这个目的至今尚未实现。党代会试图使党不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分成两个阵营的做法反而导致相反的结果。反对派领袖中的大多数人放下了党的工作。党的执行委员会中的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了执委会，受到了拒绝为党工作的批评。这是党内激烈斗争的一年。

1907 年的哈勒姆代表大会缓和了当时笼罩的紧张气氛。反对派针对党的多数派和党的领导机关提出的、在赫·戈尔特博士撰写的小册子中得到概括的攻击，促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敦促戈尔特博士在党的代表大

会上对其指控作出详细说明。这种做法再次证明，党的执行委员会不仅没有打算禁止反对派的发言权，而且愿意使他们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陈述，党在听取陈述之后才作出决定。戈尔特博士接受了要求，在大会上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说，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回应了他的讲话。大约有25名党员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宣传员和组织员，他们都对反对派个人及其观点表示尊重，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反对派的做法破坏了党内关系，不支持他们有关党的策略的看法，党与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关保持一致。

党内同志所作的这些严肃的声明并非没有效果。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以反对派的名义表示他们注意到批评应选择适当的时机的评论，放弃撤销乌得勒支决议的要求；她以这样一句受到人们鼓掌喝彩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们知道我们在荷兰不可能成为党内的多数派，但为了实现我们的思想，我们愿意在党内以平等的党员所具有的智慧、耐心而温和地进行工作。"

大会以227票支持、6票反对、18票弃权通过了如下决议：

> 在听取了有关一些党员同志提出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多数同志的背离了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策略的批评的讨论之后，鉴于提出批评的同志未能提出证明其批评正确的证据，大会驳回这些批评，并认为把党划分成两派的做法不正确，不存在正确掌握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的一派和滑向资产阶级的另一派。
>
> 大会完全信任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完全赞同迄今为止所执行的策略。
>
> 最后，大会呼吁全体党员同志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总的斗争中相互信任、精诚合作。

这样，党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再次明确宣布乌得勒支决议不折不扣地坚持了批评自由，但它要求在批评时不要恶语相向并充分考虑

党的利益。

如果不是一些对反对派领导人的和解态度感到不满的青年党员自行其是地坚持进行反对活动，创办了一份在工人中宣传这种反对活动的周刊，党内本来会因此恢复平静，其力量也会不断加强（在这次党代会之后的第二年党员人数增长13%）。尽管反对派领导人对此没有表示支持，这些青年党员还是实现了他们的计划。1907年10月，《论坛报》问世，J. C. 塞东、戴·J. 怀恩科普和威·万·拉维斯泰因博士担任编辑。拉维斯泰因近些年来一直在《莱比锡人民报》报道有关我们党的情况，我们在此明确指出他的报道谎话连篇，希望国外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要采用他的恶毒攻击之词，而是采用我党党员提供的消息来报道我们党的情况。

《论坛报》

出版一份由几个不负责任、不受党的任何机关影响的个人编辑的专门报道党内斗争的刊物，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会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内部都遭到谴责。在编辑工作由没有表现出任何责任感的极端分子进行的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

社会民主党在《致国际》的小册子中给出了下面两个创办《论坛报》原因。

1. 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即未能得到自由派多数支持的具有民主思想的自由派执政，议会党团诱骗党支持这个政府的一些措施，特别是其修宪草案和试图削减军费的措施。（《致国际》第24页）

我们已在本报告的第6页[①]阐明了党对这届政府的立场。当我们党

① 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

在1909年年初要求《论坛报》表明态度时，自由派政府已经在一年前被教权派政府取代，这一事实完全说明《致国际》中的说法是错误的。

2. 党的机关报《人民报》的修正主义观点（据说是在评价导致德国社民党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失利的原因时表现出来的），并据此断言党的机关报不能发表与之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当然有权在有关这些选举的意义方面更多地持有德国社民党少数派的看法，而不是多数派的看法。说党的机关报不能发表与之不同观点的文章是无稽之谈，谎话重复百遍也不可能成为真话。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提供不出任何表明党的机关报对他们和其他任何党员不一视同仁的证据。这一点在党的哈勒姆代表大会、阿纳姆代表大会和代芬特尔代表大会上得到最明确的说明，当时党的机关报《人民报》编辑部的断言，从未拒绝过刊登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文章，无人对此表示异议。

为了防止党与民主自由派结成联盟，或者为了揭露民主自由派虚假的争取普选权的运动而有必要创办《论坛报》，这样的说法同样必须予以驳斥。说我们党或者说其议会党团丧失了它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是不对的。在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况下，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某一小地方的市镇选举和在某一农业县的省议会选举中结成过联盟，这样的做法遭到了全党的一致批评，证明我们党坚决坚持它独立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在议会中，这种策略也一直得到认真的坚持。

我们不需要《论坛报》教训我们说依靠自由派并给它注入活力，将削减我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情况恰恰相反，在党成立之后，它一直靠削弱自由派而获得成长，具有自由思想的选民都无一例外被我们争取。这样的政治形势，其走向符合我们的原则性观点，即始终揭示自由民主派的缺点和不诚实之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略过真相不提。真相是，两个政治团体（自由

派联盟和自由民主派联合会）尤其是在我们的推动下才把普选权写入了它们的纲领。真相是，自由民主派议会党团提出了一个我们并非不可接受的实行普选权的法律草案。真相是，被推翻的自由派政府尽管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其纲领，但坚持实行普选权的诺言并为此付出自己的政治生命。真相是，我国资产阶级政治的情况决定了自由民主派有必要支持普选权。

《论坛报》谴责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的同志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抱有不切实际的信任，谴责这些同志认不清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明白的事实，这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根本不懂政治。

他们甚至因议会党团主席说希望荷兰政党建立的基础从宗教（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政党）变为社会（保守派与民主派）而对他进行批评，这一事实说明他们不懂政治到了何种地步。当有人表示希望根据社会阶级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建立政党时，社会民主党人竟然对此表示谴责！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致国际》不提议会党团主席在表达这种希望的同时，补充说在建党的基础获得改善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工党仍将保持完全独立。人们从这种做法能够再次看出所谓靠拢资产阶级政党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创办《论坛报》的做法与在哈勒姆代表大会上达成的和解直接背道而驰，发布《致国际》小册子的做法同样如此，而这种和解本来应该使党最终能集中自己的力量与敌人作斗争。因此并不奇怪，党觉得这份新报纸令人反感，视其创办为破坏组织的行为。

当那些老一些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论坛报》已经问世而以党的多数派认为违背哈勒姆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利用这份报纸时，新的争执出现了，这种争执导致人们在 1908 年的阿纳姆代表大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没有形成决议。尽管党非常不支持这份报纸，但它几乎没有表现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的倾向，因此《论坛报》编辑把这次代表

大会视为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攻击党的一切做法。

后果可想而知，党分成敌对的两大派。少数派聚集在《论坛报》周围，由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领导。他们认为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切行动都是资产阶级腐化的结果；他们通过他们单方面的、针对党的消息向广大党员散布令人厌恶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起不到黏合剂的作用，反而成为行动的绊脚石。他们使党的会议成为相互指责的场所，使人们将日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搁置一边。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党员人数自建党以来首次出现了下滑。

“特殊的一帮”出现了。不仅论坛派建立了只允许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加入的、以在党内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为目标的团体，而且在报纸周围还集结了一帮党内的少数派。赫·戈尔特博士明确承认，这份报纸是这个“党内之党”的中心，在党满足这个团体的要求之后，也就是撤销《论坛报》反对的大会决议之后，它停止活动。

这种局面显然必定会导致党内危机。当《论坛报》对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在下院针对失业问题的质询时发表的讲话进行卑鄙恶毒之极的攻击时，危机爆发了。这个在各阶层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的讲话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我们党的议会领袖在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派人士特勒布教授讨论时，对在本党内存有争议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持保留态度，采取了一切社会民主党所共有的立场。这种攻击在党内引起了广大党员的愤慨，在由我们的议会党团卓有成效地领导的坚决揭穿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资产阶级对当前的困境所负责任的斗争中，在向全世界如此清楚地揭露资产阶级的无能和险恶的斗争中，议会党团在自己的党内遭到暗箭，宣传所取得的成效因此化为乌有，而我们的敌人却从中得利。

认识到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大选，人们渴望无论

如何结束这样的局面。

当党的执行委员会试图让《论坛报》发表一个让党满意的声明无果之后，党举行全党公决，决定于1909年2月13—14日在代芬特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代芬特尔代表大会

大会召开前夕，党的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宣传工作者的会议，研究能否找到改善当前状况的基础。

几年来隔空争吵的党员同志们在会上面对面地陈述了各自的意见。会议表明：首先，这些党员同志都真诚地希望继续作为同志留在党内并通过党继续为社会民主主义努力奋斗；其次，有可能找到实现这种愿望的权宜之计。

为使两派的合作得到组织上的保障，会议决定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代芬特尔代表大会上提出创办一份周刊的建议，刊物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报》的副刊，但由“马克思主义派”的党员同志编辑，这些同志可以自行决定编辑事宜，仅需与《人民报》编辑部协商以避免无益的争执。大家普遍认为，如果这一建议最终得到同意，《论坛报》就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在《论坛报》停刊是否符合党的利益这一点上，意见分歧并不大；而对于代表大会是否应提出停刊的要求，少数强硬分子认为必须将《论坛报》编辑开除出党，另一些党员则并不赞同提出停刊的要求。

党的执行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之后召开的代芬特尔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如下建议：

1. 党创办一份周报，由罗兰-霍尔斯特和维博担任编辑。周刊将作为党的机

关报《人民报》的副刊发行。周刊编辑部成员在工作中保持与日报编辑部进行协商，为使周刊与《人民报》保持一致，他们同样有权在协商中对《人民报》发表意见。

2. 大会声明上述决议执行的结果是《论坛报》停刊。

3. 如果出版《论坛报》的党员同志不愿意停刊，大会声明将宣布取消他们的党员资格。

在大会上，范德格斯、维博、罗兰-霍尔斯特夫人等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宣称《论坛报》继续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范德格斯说：“我承认，《论坛报》的继续存在威胁到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周刊的存在是不正常的，任何一个正在进行斗争的党都不能长时间容忍它”。

这三条建议中的第一条被一致通过。

仅有 9 个支部投票反对《论坛报》停刊。

当大会质问《论坛报》编辑与出版人员对表决有何意见时，他们表明自己对党的这一几乎全体一致的愿望不屑一顾。因此，大会以 209 票对 88 票通过了将怀恩科普、塞东和万·拉维斯泰因开除出党的决议。直接对党员进行的意见征询确认了这些决议。

那些喜欢借这些决议来说压制民主的人，应把批评指向那些表明不能将自己的个人主义情感置于服从党的决议这一无产阶级的民主义务之下的人，而不是指向社会民主工党。

社会民主党

由于代芬特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被开除的编辑的支持者退出社会民主党工党，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共有 493 名党员退党，他们可能绝大部分都加入了新成立的党。

新党马上要求允许它加入国际局。国际局执行委员会认为应当借此

机会认真进行恢复团结的尝试。它派遣国际局书记卡米耶·胡斯曼前往荷兰向两党提出建议。执行委员会曾就此次尝试作过详细的报告，我们不再赘述。在此我们只想提醒大家，胡斯曼同志认为老党准备接受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但社会民主党**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不过，社会民主党中少数党员支持接受这些建议，其中一部分重返社会民主工党。

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人们可以在社会民主党《致国际》的小册子中看到，那就是“荷兰社会党的分裂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建议我们的外国同志们不要被这些夸大的词语吓倒。新党存在如今已有差不多一年半时间，事实清楚地表明，除了成为一帮对老党的无力的批评者，他们什么也成不了；他们对我们的斗争只会在荷兰无产阶级中引起气愤；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人对分裂完全不感兴趣。事实证明，荷兰社会民主党将同样会克服这些暂时出现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障碍，一步步成长壮大，而“新党”将摆脱不了宗得崩得分子的命运，最终堕落成为无益的宗派。

新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的成果证实了这一断言。他们当时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四个选区，两个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在鹿特丹，一个在莱顿。在这四个选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姆斯特丹第三选区，《论坛报》的两个编辑在此长期领导选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受到他们长期激烈反对的特鲁尔斯特拉同志是这个选区的下院代表。他们进行了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候选人的顽固的宣传，几乎我们候选人举行的每场活动，怀恩科普必到场搅局，同时，论坛派还散发以尽可能蛊惑人的方式歪曲和共计我们党的目标和行动的传单。尽管如此，在这个选区的 10518 票中，特鲁尔斯特拉获得 4680 票，而怀恩科普只得了 159 票。

鹿特丹第四选区的结果也引人注目，长期以来万·拉维斯泰因一直与我们的同志斯皮克曼竞选，但他只获得 69 票，而斯皮克曼获得 1525 票。

大学城和工业城莱顿的选举更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在这个城市，我党多数支部倾向“马克思主义派”，大部分党员在代芬特尔代表大会后退党。“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潘涅库克长期在这个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其他知识分子也在此不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它自然成为新党的希望所在，他们并不期望战胜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教权派占据主导的城市），而是希望自己的选票超过社会民主工党。结果是新党得到123票，我们这个老党获得388票。

另外，在阿姆斯特丹第九选区，论坛派获得191票，我们的弗利根同志获得4421票。因此，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新党获得我们大城市社会主义工人多少支持。

在此后举行的市镇选举中，结果也同样如此。

在成立一年半之后的今天，社会民主党意味着什么？在最近选举其执行委员会时，仅有320名党员投票，而党员总数仅为500名。这个事实清楚地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表明，《论坛报》反对我们党的斗争并不以荷兰工人阶级的情感为基础，它是一小撮年轻的半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完全无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感情而开展的造作的行动。

现在，社会民主党不仅与社会民主工党处于对立状态，而且同工会闹翻了，而工会中心与社会民主工党之间关系友好。新党经常吹毛求疵地教训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从挪威的党到意大利的党，从北美的党到俄国的党。似乎各国社会民主党都不知道该如何领导阶级斗争，只有聪明的荷兰社会民主党才知道最终答案。

社会民主党脱离之后

关于“分裂”后老党的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在本报告首页已经得

到回答。

我们党仿佛摆脱了阻碍自己成长的疾病，在这些人离开之后立即获得了力量。

资产阶级报刊起初大肆报道论坛派的攻击，但在看到选举中我们得票的情况后，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工人们只会在新党的一些党员来到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集会时才会听到新党的声音，这些党员的目的是在大会上重复那些已经千百次被驳倒的、老套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用工人向他们发出嘘声的事实来指责社会民主工党“压制言论自由”。

即使社会民主工党始终独立自主地坚持阶级斗争，也始终会听到社会民主党的指责声，它就像是一台只播放一张唱片的留声机。

我们向国际的朋友保证，深深扎根于阶级斗争之中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将遵守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将竭尽全力为成为工人国际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强大的党而奋斗。

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

W. H. 弗利根　主席

J. G. 范奎科夫　书记

1910 年 7 月于阿姆斯特丹

荷兰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报告

在代芬特尔决议[①]经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的投票而得到批准之后，荷兰社会民主党（S. L. P.）于1909年8月14日在阿姆斯特丹“工人之友”大厦正式成立。

成立时，它有9个支部[②]，387名党员及32名候补党员。候补党员中有5名在国外。因此，在成立时它共有419名党员。

在成立大会上，老党（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被接受，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纲领。

随后，大会确定了党对目前下院、市镇议会的定期选举的态度，指出要参加选举。同时，一个有关普选权的动议得以通过。[③] 最后，大会宣布《论坛报》为党的机关报。

---

① 这些决议包括：要求停办《论坛报》；如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则将3个编辑开除出社会民主工党。

② 即阿姆斯特丹（158名党员）、鹿特丹（64名党员）、莱顿（56名）、海牙（43名）、乌得勒支（22名）、比瑟姆（14名）、兹沃勒（13名）、韦斯特勒姆顿（10名）、代尔夫特（7名）。

③ 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行动——正如社会民主工党于1895年在代芬特尔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在不仅以获得满足工人的直接需要的立法措施为目标，而且以将使工人阶级成熟到担负起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使命的方式进行时，才能始终有利于工人阶级；当党在选举中强调自己的最终目标，即夺取政治、经济的权力工具时，更是如此。

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大会认为：在荷兰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代表机构的民主化，即实行国会、市议会、外省代表机构等的直接和平等的普选，是争取一切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条件；唯有工人阶级追求这些纲领提出的改革。（转下页）

除了这次代表大会，我们还召开了下述代表大会：

1909 年 3 月 21 日，召开了讨论社会党国际局执委员会提出的合并动议的紧急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明确地拒绝了这个建议。①

（续前注）

大会认为，针对各种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自由党的丛林战术（其目的是：通过实行一种有组织的或多元选举制，或者通过给予一部分妇女选举权，或者通过维持和加强不按照普遍、平等的选举权选出的上院，或者通过实施审查权，来推行一种无论如何都会置工人阶级于一个相对其他阶级，特别是相对于小商人和小农来说不利的地位的普选制），工人阶级的任务将是揭示这种丛林战术的真正本质，并有力地同它进行斗争。

大会决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在这方面开展争取男女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斗争。

① 反对接受这个建议的鹿特丹决议以 257 票赞成、127 票反对和 14 票弃权得以通过，决议全文如下：

社会民主党鹿特丹支部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局旨在社会民主工党与社会民主党实现合并的建议。

鉴于只有当**两党**都公开表示了合并的愿望时，两党合并才能实现；

鉴于在两党发表这样的声明之后，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承认在社会民主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即接受执委会的建议中臭名昭著的 b 和 c 条（见本卷第 224 页注释①）；

鉴于《论坛报》从未放弃过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相反，它始终以最纯洁的语言宣传这一原则，因此，该报的 3 名编辑决不能作为优秀的社会民主义者被开除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鉴于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部，思想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应当不受限制、不受阻挠地得到维护；

鉴于对领导机关或受托人的原则意见和有关行为的批评并不是攻击私人名誉，社会民主党鹿特丹支部宣布在荷兰只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向往的愿望。

社会民主党鹿特丹支部向代表大会建议：授权执委会在下列条件下解散社会民主党：

第一，社会民主工党举行全体党员投票通过决议，撤销开除三名《论坛报》编辑和取缔《论坛报》的决议。

第二，社民民主工党在明确措词的决议中承认其任何党员或党员团体以各种书面的或口头的形式公开宣布体现在党纲中的原则和进行批评的自由；

大会决定授权执委会只有在国际局准备拟定并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符合本决议要求的建议，从而使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合并有可能真正建立在符合国际社会民主党利益的实现基础上时，才继续同国际局进行谈判。

1909 年 5 月 23 日，召开了确定纲领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同时委托党的执委会起草一个市政纲领①，并在一项决议中进一步确定了党有关工会的观点。

1910 年 1 月 30 日，召开了确定党章和有关规定的代表大会。

年度第一次大会——党的第 5 次代表大会——将于 5 月 28 日和 29 日举行。

按照上述成立大会的决议，我们于 6 月在阿姆特丹的两个区、莱顿和鹿特丹的各一个区参加了大选。在这 4 个区中，我们的候选人共得 542 票。除了上述支部外，海牙、比瑟姆、韦斯特勒姆顿和韦斯普的支部在 7 月和以后数月参加了市议会选举。在韦斯普，从 7 月 9 日到 11 月 16 日连续举行了 5 次地方选举；我们的候选人 2 次进入第二轮投票。在比瑟姆，我们的候选人也进入了第二轮投票。

我党在国会和市议会的选举中所得票数共计 1888 票。这一票数是我们在下列参加选举的地区所得的最高票数相加的总和：阿姆斯特丹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九选区，鹿特丹第四选区，海牙第一选区，莱顿，韦斯普韦斯特勒姆顿和比瑟姆。

1910 年 4 月，党的支部增加到 17 个，党员增加到 505 名。选举之后，它们开始了缓慢的增长，从此一直持续增长。

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第一年里党开展的其他宣传工作。全国各地，即格罗宁根、阿尔默洛、恩斯赫德、亨厄洛、弗拉辛、米德尔堡、吕伐登和哈勒姆，新建立了 8 个支部，举行了 65 次以上公众集会、25 次以上选举集会及 107 次讲座。在有讲座的集会中，有一些是连续进行的，通常有 150 名男女参加；在公众集会中，有的参加者达 350—500 人。除了解释我们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原因外，我们的集会专门涉及瑞典的大

① 这一市政纲领发表于选举开始前。

罢工、费雷尔事件[①]和德国的重大政治和经济斗争，涉及在我国各地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阶级斗争事件——如王后的演说、关于预算的讨论、阿姆斯特丹建筑业的罢工、教育问题上的反动。此外，我们还纪念了达尔文，讨论了穆尔塔图利[②]对工人运动的意义。我们的所有支部所宣读的演说大部分是关于我们的原则的论述，它们在这些场合阐明了阶级对立的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不可调和性。

为了准备选举和启蒙，我们散发了成千上万份传单、小册子和《论坛报》。仅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散发的宣言达112000份。

赫·戈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③] 售出了5000本。他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修正主义》售出了2100册。截至1910年3月31日，我党的机关报《论坛报》有订户1057个，16000份通过报贩出售。

过去的一年——即成立的第一年——对党所起的作用在于：

1. 通过选举活动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党；

2. 证明党的存在对阶级斗争，进而对社会主义是必要的；

3. 把自己介绍给了荷兰劳动人民。

代表委员会：

维恩科普 主席

M. 门辛 书记

---

①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1859—1909），西班牙政论家和教育家、启蒙主义者，1909年7月被捕，后被当局以参加解放运动和巴塞罗那起义的罪名判处死刑。——编者注

② 穆尔塔图利（1820—1887），荷兰作家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的笔名。——编者注

③ 这个小册子出版了德文本，由德国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出版。

比利时工人党的报告

有关数字。1906 年 12 月底，党员人数为 145781 人；1909 年 12 月底，党员人数为 161239 人；1908 年，党员人数为 183997 人；1909 年，党员人数为 185316 人。

组织数目 1906 年为 803 个，现在有 906 个，其中包括合作社、慈善团体、工会和政治组织。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资金非常有限，因为地方联合会每年上缴的党费仅为每个党员每年 10 生丁，因此，我们每年用于社会主义宣传的经费为 2000 法郎。

除了专职干部的薪水外，领导机构的经费每年为 1000 法郎左右；党的委员会出版发行的印刷品、小册子、通知、宣言等每年约为 10000 法郎，剩下的资金用于罢工、同盟歇业或工业危机中资助我们的工会和职业协会。

选举。比利时的选举制对保守阶级最为有利，因为它允许纳税者、地主、大学文凭持有者和股东有额外的选票。

因此，在市镇选举中，有拥有 1 票、2 票、3 票，甚至 4 票的选民。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一个困难，即工人很难长期在同一社区定居，至少在大城市如此，由此而来的是他们因居住时间不足（市镇选举要求 4 年）而丧失选举权。

立法机关选举每两年在国内一半地区进行，因而在这三年里我们只参加了一次选举，即在 1908 年。所以我们不得不加上前两次连接的选

举来说明社会党人在比利时的得票总数。

1909 年大选	433676 票
1902—1904 年大选	463967 票
1904—1906 年大选	469094 票
1906—1908 年大选	483241 票

选票的这种增加反映了进展，尽管步子缓慢，但它肯定了我们的思想的影响。这些选票部分来自于选民人数的增加，另一部分是我们工作的成果。此外，1906 年我们有 30 名众议员，1909 年为 35 名。参议员人数仍然在 110 名中保持了 7 名。

社会党在外省的活动主要是创办、组织和发展由地方政府当局提供的高等教育；这种教育在我国相当薄弱，执政 25 年的天主教政府根本不鼓励它。

我们的 850 名当选社会党市议员——但其中仅 700 名加入了全国市议员联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捍卫和扩大市镇管理上。因此，当根特的自由党人反对设立一个向所有儿童开放的学校饭馆时，天主教政党和社会党都赞成这一改革。此后，根特组成了没有自由党人——他们辞职了——的市议会。教士的政府为挫败或阻止实现由民主的市议会决定的措施，用尽了一切手段。

尽管《人民报》、《前卫报》、《沙勒罗瓦报》和《煤矿工人未来报》发行量大，但我们的报刊看来在读者总数方面停止不前了，不过，似乎这一点由地方小报的读者弥补了；日报的发行量约 14.2 万份。

学校。比利时工人党以德国为榜样，开办了一所社会主义学校，1908 年每周上课，1909 年隔周上课。我们最卓越的理论家和积极分子在阐明许多对教育想入党的青年人来说十分重要和必要的问题。学校创办者的目的主要是，在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及其他社会主

义工人组织中招募能够在积极分子中拥有一席之地的青年。此外，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在根特、于依和列日被仿效，那里也开办了一些课程。

代表大会。每年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最重大的问题以及内部组织问题。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①]通过的数月后，由于比利时接管了刚果，我党面临着殖民地问题。

1908 年 4 月，我们的代表大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辩论，最后通过了下述决议：

> 鉴于社会党人只能在如下条件下才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殖民企业发生关系：政府必须承担某些开发的责任，而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必然是这种开发的受害者；
>
> 另一方面，将于工党宣布的原则赋予社会党人不分种族保卫一切受压迫的人的义务；
>
> 大会宣布没有对吞并刚果的提案投反对票的社会党议员背离了社会党全国和国际代表大会多次确认的原则；
>
> 大会向工人揭露现在正肆虐于刚果的从事掠夺和奴役的可耻的政府；
>
> 如果吞并成为现实，大会要求社会党议员一点一点地进行斗争，确保承认比利时议会的权力，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和强迫劳动，建立一个有效保护土著居民的政权；
>
> 代表大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在国内开展广泛的鼓动，以唤起舆论反对吞并刚果。

1909 年的代表大会审查了我们的议员在投票赞成改革兵役的法律时的态度，出席大会的代表几乎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

---

① 指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见本书第 22 卷第 161 页。——编者注

大会重申工人党纲领第10条："废除军队，暂时代之以全民武装"，要求工人党各组织加强反军国主义宣传；

至于社会党议员的态度，大会宣布支持对兵役法的民主改革，即在不增加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废除预备役和征兵制，这种改革将是走向全民武装的一步；

大会宣布社会党议员绝不支持仍然大幅提高军费而加重国家负担的提案。

最后，我党在1910年2月6日和7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确定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了许多社会党的问题——即参加政府的问题——的立场。

比利时工党以202票对100票通过下述两个决议：

总的政策

鉴于工人党不可能在不损害它所维护的利益的情况下完全支持资产阶级内阁，也不能预先去阻止建立一个决定实施工人阶级所要求的迫切的民主改革的政府；

大会宣布，推翻教权派的多数，不让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成为议会的多数，是比利时工人最大利益之所在；

大会警告工人阶级注意这样一种政策，它以反教权派联盟为借口攻击工人党的独立性；

大会提醒党的积极分子注意，在反对党获胜之后，工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宣布将保持充分而完全的行动自由，宣布它的政策——阶级政策——将一如既往；它对待将会组成的一切政府的态度，将仅仅由无产阶级的更高利益所指引，并特别取决于政府对工人阶级争取实现的普选权及其他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态度。

参加政府

鉴于由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宣布：

1. 根据这两届代表大会的决议，首先拒绝承认某些社会党人在未经工人党同意的情况下参加政府的做法；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上述社会党人必须辞职。

2. 此外，参加政府的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巴黎代表大会决议），这个问题将在实际出现之日由党的代表大会加以解决。

3. 工人党的政治使命（主要是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和那些最接近他们改造社会的革命理想的方案）——现在已经得到履行，尤其是在批判和反对政府方面，但它必须在建设和执政方面履行自己的政治使命的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工人党将能执掌权力，将能越来越完美地实现它的最低和最高纲领。

比利时工人党同其他国家的组织维系着最友好的关系。它一直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法国和德国社会党的代表大会；除了给俄国反动派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外，它还派代表出席了著名的革命者格尔舒尼[①]的葬礼；它主动为西班牙朋友创办社会主义日报而募捐，并以同样的方式支持了阿根廷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工人党还竭尽全力介入了瑞典的重大经济冲突；如果说我们送去的资金不算多，那是因为我们的基金因资助比利时国内长期、频繁的罢工而枯竭了。

工会组织。加入工人党和独立工会的工会委员会的会员组织的数字每年持续增加。

在 1906 年，有 42490 个会员组织。

在 1907 年，有 57840 个会员组织。

在 1908 年，有 67418 个会员组织。

在 1909 年，有 72000 个会员组织。

---

① 格里戈里·安德列耶维奇·格尔舒尼（1870—1908），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该党战斗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编者注

参加阶级斗争的工会会员人数为：

在 1906 年：127166 人。

在 1907 年：138763 人。

在 1908 年：125943 人。

1908 年工会会员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比利时工业在那年发生的大危机造成的异常的失业。

我们已经能够断定，工会的力量在稳定地增强；会员缴纳的平均会费在不规则地增加。

1907—1908 年，会员缴纳的平均会费为：

行业	每月	每人
食品供应	1.60	—
建筑	1.02	1.48
森林	1.23	1.36
客车制造	2.42	2.57
制鞋	1.23	1.40
冶炼	2.02	2.05
烟草	2.61	2.91
纺织	1.63	2.03
运输	1.57	1.60

在过去三年中，大多数加入我们的全国工会中心的工会已在努力改造他们的组织基础。联邦制在不断地让位给全国统一的工会。

我们正在向现代工会前进，其目标是集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反对雇主的联合力量。

合作社。合作社联盟越来越在我们这个小国中获得进展；1909 年

12 月底，它有 174 个组织，140730 名社员，这些社员共出资 1942266 法郎 17 生丁。

合作社的食品店每年销售额达 40655358 法郎 84 生丁，实现利润 3855443 法郎 90 生丁。

合作社的分销店拥有的土地资产为 14837114 法郎 28 生丁，它们雇用了 2128 名工作人员。

由于各合作社必须支持各地的地方组织，它们中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尊重提供 1%—2% 的利润用于报刊宣传的决议；但是，它们已在前一段时间决定赞同由合作社出资让消费者免费订阅报刊；也就是说，它们除了提供物质福利外也提供精神福利。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告

我们要指出，在我们党于1906年向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提交报告之后的三年中，塞尔维亚的政治生活比较平静。但是，1908年底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在国内使全体人民义愤填膺，几乎导致战争的爆发。幸运的是在这场危机结束时过去的平静又恢复了，但是军国主义大为加强。

我国资产阶级的政策近来主要是由两种力量决定。一方面，两个激进党在1908年6月的议会选举期间悬而未决的冲突，导致联合政府的建立，它得到议会中势力强大的多数的支持。另一方面，同奥匈帝国的关税分歧使这个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的威胁。

我们党这次在一些城里参加了1908年的议会选举，再次在议会保住了席位；党不停顿地进行着一个社会民主党所必须时时处处进行的斗争，但它尤其重视自身的发展与加强。党组织的数量增加了，党员人数也增加了两倍（1909年为1950人，而1907年为615人）。奇怪的是，在5000个按职业组织起来的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略多点属于政治组织。下述事实解释了这一点：直到四年前，工会组织实际上还未同政治组织分开。因此，除了知识分子以外，工会组织的成员资格也意味政治组织的成员资格。由于我党与工会联系密切，前者以往的做法仍在沿用着。

1908年底和1909年初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将社会民主党置于极其困难的处境。不提党的具体活动，我们只想指出，在反对这场危机中的王朝—军国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我党尽了一切努力。这场斗

争在议会会议中、报刊上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众所周知，我们的议员卡茨列罗维奇同志受到了攻击。党在吞并危机中的地位更为艰难，自然，在我党各组织的基层群众中可以感到对吞并表示的强烈的革命抗议，这产生了一个困难，即我们的成分将被爱国主义的激流冲走。但是，在整个鼓动战争的运动中，我们党成功地消除了源自一种自我保护、自决和所有混杂的感情的民族本能的自发的民族感情，因此在危机过去之后我们的组织没受到任何削弱和损伤。

必须记住，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因此，它对巴尔干的和平会带来严重后果。在吞并危机中，我党将这事通知了社会党国际局，他们现在决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意见。**巴尔干的和平只能是暂时的**，灾难的威胁**不仅仅**是由于塞尔维亚极其困难的经济处境。这一信念引导我党试图组织巴尔干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反军国主义与战争的共同的和有组织的斗争。在 1909 年圣诞节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的首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这个问题是唯一的讨论对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它还被刊登在《社会党国际局公报》和《新时代》上。

我党的议会活动是持续的、有力的，但它不得不主要局限于批评和质询上，这是由于结社权受到侵犯，尤其是因为工人遭到迫害，罢工被镇压。我们的议员的确承受着这种工作的重负，在一个日益觉悟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同时为各种立场斗争的国度里，这是预料中的事。

我国没有社会立法。70 年前投票批准的行会仍在起作用。自然，它不能处理现代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党自成立伊始，就把通过政府实行劳动保护立法和强制保险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同时，党必须同一个试图确认手艺人的古老特权的法案斗争。直到目前，这场斗争仍在进行。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为上述法案不得不被撤销，在工会中央联合会的一名议员的参与下，一个同样体现工人保护和保险

的新法案得以拟订。尽管无产阶级不可能对这个法案感到十分满意，但它还是包含了大量有助于工人保护的条款，并体现了比旧法案的一个重要的、几乎可以说是巨大的进步。法案的出彩之处在于它包含了许多来自最现代的欧洲劳工立法的条款。这一法案现在正在议会受到讨论，很可能将于6月通过。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旧的无用的法案的撤销和新的较好的法案的精心制定是我党顽强、持续和有力的行动的结果。也正是这种行动使新法案得以如此迅速地提交到议会。党仍在这方面继续行动，以防止这一问题被搁置（这是经常发生的），并尽力争取改进这个新法案。因为这个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法案中有一两项条款后来在内阁中被人改坏了。

除了劳动保护的条款外，新法案还包含了对结社权和罢工权的充分保证。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权利和保证。组织建立了，罢工举行了，但都没有任何有关的立法可以援引。这些事情的出现都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当局不仅用严厉的警察手段和刑法条令来对付组织和罢工，而且还诉诸残忍的暴力。警察几乎在每次罢工中都对工人进行逮捕、流放、虐待。为对付东塞尔维亚的矿工罢工，当局召来了士兵；而贝尔格莱德制糖工人大罢工是被用射向工人的子弹镇压下去的。

在过去三年中，进行了三次选举；一次是国会选举（1908年6月1日），两次是市镇选举。市镇选举中党只参加了几个城市的选举。它取得了下述成果：（1）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3056票，有一名议员当选（代表克拉古耶瓦茨市）。（2）在1907年的市镇选举中，共得到了2070票，18名议员当选；在1910年，共得到2849票，22名议员当选。

我国是一个农业与小私有的国家。党还没有尝试在乡村开展工作。在选举中，它局限于几个城市，因为它们都还落后。最大的城市贝尔格莱德只有12000名选民，大多数城市仅有几百个选民。议员在城市选区是这样选出来的：每个选区按选民人数的比例选出一定人数的议员，每

份向一个选区公布的选举名单必须包括人数确定的议员。选举类型是比例制的。如前所述，每个城市自己举行选举。这样，贝尔格莱德按比例选出4名议员；克拉古耶瓦茨和尼什各为2名。在这三个城市，在名单中无人获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得票最多的两份名单各获一个席位。其他城市由绝对多数选票各选出一名议员。如果在第一天各名单都未获得绝对多数，那就在第二轮选举中把席位给予得到选票的相对多数的名单。投票是秘密的和直接的。

我党的竞选因那些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获得启蒙和教育的工人不断向国外移民而变得十分困难，对缴纳15第纳尔直接税的统计对我们尤有损害。直接税相当于全部税收的37.20%，而间接税（它根本不在考虑选举权的因素之内）相当于62.80%，有许多障碍使得到选举权更为困难。工人经常收不到交税的通知书，于是，他们成为故意不及时申报应纳税收入——选举权取决于此——的人；此外，投票权会因居住地的改变被取消，等等。

在塞尔维亚有1153458名成年居民（不包括妇女），其中只有548167名有投票权。为此，从1906年以来，我党通过报刊集会掀起争取普选的鼓动。1908年，一份要求普选权的陈情书被递交给了议会。从1908年以来，我们的报刊也取得了进展。党和工会中央联合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每周出版三期，每期5000份；《工人》（克罗地亚文）每周出版一期，每期12000份；《印刷工人信使》每月出版一期，每期600份；1910年年初起，党出版了《战斗》，每月出版两期，每期1200份。

除了这些期刊和日报外，党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经典著作的译本；它还出版了鼓动性读物。党不时出版其他社会主义读物。

塞尔维亚的出版较为自由。既没有新闻检查，也没预防性措施。最严厉的约束措施是：叛国和煽动人民暴动者没收财产。尽管如此，社民

党的报刊经常受到迫害。根据党的委员会在上届代表大会上递交的报告，仅《工人报》的编辑人员就被判处了6年零2个月的监禁和5900第纳尔的罚金。

党员的教育是通过报刊、讲座和党校提供的。课程从10月1日持续到次年3月1日。讲座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自然科学。

自建立之日起，党就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局。

工会组织在1906年有5350名会员，1907年增至5434名，1908年减少到3238名。这种减少是由于同奥匈帝国长期的关税战、吞并危机以及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这一切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失业和物质贫困。1909年会员人数再次增加，因为那年年底会员人数为4800名。

工会参与了下述罢工：

年份	罢工次数	罢工人数
1907	27	3009
1908	18	1538
1909	?	?

工会组织与党的亲密关系使它们在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一种有机的纽带把政治和经济组织联合在一起，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是十分有益的。我们还必须补充的是，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不仅在贝尔格莱德，而且在其他一些城市，以完全停工来庆祝“五一”节，并举行了争取普选权的专门的示威游行。

以委员会的名义

D. 拉佩维奇

N. 科沙宁

于1910年5月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报告

总形势

保加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在450万人口中，工人不到30万，其中大部分在小工厂中。不管怎样。工业在这里还是迅速发展着。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那在保加利亚有203个由国家扶持的工业企业，投入的资本达43489689法郎，16783名工人受雇于这些工厂。一般来说，工业企业的数目与在那里受雇的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官方的统计。我们来用农业和商业部中的工业部门提供的数字来说明我们工业的发展：仅1909年一年，就建立和开办了19个工厂，投资于机器、劳动工具的资金为1411500法郎，雇工643个。

由于这样的经济形势，在保加利亚，社会阶级的划分并不严格。存在着与各个不同的阶级对应、代表它们利益、组织良好的政党，政治组织具有政治集团的性质——对于保加利亚个别人的统治的成功来说，这是个十分合适的基础。尽管宪法——国家的基本大法——具有完全民主的性质。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活动的。

它的工作十分艰难。很难组织分散在小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在新建的招募了大量妇女与儿童的企业中情况同样如此。另一方面，社会党有责任反对政治小集团的倾向，有责任反对限制保加利亚公民的自由和权

力的私人统治的倾向。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我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在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取得了成就。

工人运动的分裂

阻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良好成果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工人和社会主义力量中存在着分裂。保加利亚的党在诞生伊始（1891 年）就分裂了。1893 年，社会主义力量统一为一个总的党。1903 年，由于我国工人运动的孱弱，由于个别人对党的一些组织的个人影响的结果，这个党分为两派：社会党“宽广派”和社会党“紧密派”，党的分裂立即导致了处于党的庇护下的工会分裂。1905 年社会党紧密派中又出现分裂，变为两个集团：“保守派社会党”和“自由派社会党”。社会党紧密派集团的工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致使小小的保加利亚有一个更小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三个社会主义宗派及其三个工会集团。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以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分裂造成的损失重新使运动倾向于社会主义宗派与工会集团的统一。1908 年，在“宽广派”和“自由派”庇护下的工会统一在总工会之下。1909 年初，“宽广派”和“自由派”统一，产生了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这样，目前在保加利亚有两派社会主义者：统一派和保守派，各有自己的工会同盟。1909 年初，又有一个集团脱离保守派，称为社会党进步派。它加入了统一派的党及其工会同盟。

社会主义宗派之间和互不相干的工会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部分篇章。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我们首先绊倒在其他派别的社会党和工会造成的桎梏上。在政治斗争中，我们的保守派阵营的同志宣布，似乎我们是工人的最大敌人。在经济斗争——罢工——中他们经常背信弃义。在保加利亚印刷工人、制鞋工人和铁路

雇员的大罢工——其中有广大职业工人参加——中，社会党保守派经常找来一些人支持它反对针对专门的资本家或国家的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大部分瘫痪了，保加利亚进行社会主义行动的可能性也因此微乎其微。

在社会主义两个派别和两个工会同盟中并不存在原则分歧。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策略分歧，比存在于国外的我们的兄弟组织中的要小，并在日益缩小。社会党保守派人士在工会斗争中的口号“获得一切，或者一无所有”，目的完全在于夺回在争取**逐步**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中日益失去的影响。社会党保守派有限的政治活动（表现在为了无产阶级的“教育和组织”而紧密团结，为了更广泛地吸引群众、为了“巴尔干问题的解决”而召开喧闹的集会）使得此时的社会党保守派不同于彼时（它不久前还发现在两派中有重大的原则分歧）。

以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础，考虑到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不同的国家中社会主义派别统一的决议，我们一直准备就保加利亚工人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与社会党保守派合作，保守派则极其粗暴地拒绝朝着统一的所有进展。他们用十分粗俗的语言对付我们，并清洗他们党内那些关心统一问题的党员。

今年，我党利用著名的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博士（他在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得到保加利亚所有社会主义者普遍的尊敬，也非常了解我国的工人运动和保守派分子）在保加利亚逗留的机会，邀请他为社会党的两派统一进行调解。我党要求社会党国际局委托拉柯夫斯基公民以国际局的名义为统一进行会谈。我们高兴地得到了拉柯夫斯博士的同意，也十分感谢社会党国际局应我们的要求授权给了这位同志。现在，拉柯夫斯基博士为两派社会党的重新接近作了最初的努力。我们期待着看到我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力量尽可能早地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和为了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而统一起来。

党员状况

自1908年以来，我党党员人数增长如下：1906年有36个小组，**1014**名党员。1907年为33个小组，**1063**名党员；14个自学会，会员299名；12个体育俱乐部，会员705名。1908年为40个小组，**1221**名党员。1909年两个组织合并，宽广派有47个小组，1347名党员；自由派有24个小组，452名党员。在1909年的索非亚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有64个小组，**2427**名党员；38个体育俱乐部，会员821名，其中有176名党员，561名工会会员。

党员成分在去年是这样的：（1）按性别：男2341名，女86名；（2）按年龄：21—25岁1114名，26—40岁1150名，40岁以上163名；（3）按婚姻状况：已婚1161名，未婚1306名；（4）按民族：保加利亚人2315名，其他民族112名；（5）按职业：小工场工人（受雇的手工艺人）720名，工厂工人139名，教师和国家雇员774名，商店职员285名，自由职业者196名，农民151名，手工艺人156人；（6）按教育程度：受过初等教育638名，受不完全中等教育1032名，受完全的中等教育645名，受高等教育102名，文盲10名。

党的活动

去年党的活动主要是：地方委员会集会675次，地方小组集会615次，公共大会、会议253次，晚会、演出192次。

党在1908—1909年的政治活动体现在下述政治事件中：

（1）**市镇选举**。在这些选举中，卡赞勒克的党组织通过妥协，获得4个市议会席位，1名同志当选教育委员会委员。我们基层的同志康

斯坦丁·波兹维利耶夫在他的同胞中受到普遍尊敬，被选为保加利亚第一个社会党市长。

（2）**关于王国内的公国的宣言**。由于这一反宪法的行动，我党向保加利亚工人和公民发表了一份宣言，号召他们在国内日渐有力的反君主专制的斗争中举行各组织的集会。

（3）**反动立法**。政府进行一个针对联合权的反动立法的企图在工人和国家雇员中激起了一个强大的运动，人们举行了一系列抗议集会，因此，在议会一读后，政府就撤回了这一法案。

（4）**关于俄国提出的清偿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所欠债务的建议**。这个建议同样在巴尔干小国中挑起了一场不和，使俄国的势力再次浸入保加利亚。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工人和公民发出了一封呼吁书，号召反对大国在巴尔干争霸的野心，并发出了巴尔干国家联盟的呼声。

（5）**立法机关补选**。这使我们得到相当可观的选票——4410 票，而激进党只获 2200 票，社会党保守派仅 320 票。

（6）**保加利亚国王任意设立勋章**。这种做法不顾宪法条文的规定，引起公民的愤怒。我党利用这一事件，以集会和会议的方式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力。

选举胜利

1908 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如下：

民主党（执政党）	272776 票
民族党	76866 票
农民党	68059 票
进步党	51213 票
拉多斯拉夫党	40836 票

斯坦博洛夫党	27721 票
社会党宽广派	10260 票
无党派	8017 票
激进党	7548 票
顿切夫党	7188 票
社会党保守派	1809 票
社会党自由派	397 票

社会党宽广派提出的2—3名候选人中，有3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因此，我们得到的纯社会主义的选票为9000张。尽管如此，党未获一个席位。因为国内实行多元选举制。人们可以从如下事实来判断这种选举制的反动性：执政党获272000票，得到170个议席，而反对党总票数与它相同，但在国民议会中只有30名议员。

当立法机关选举补选在今年进行时，如果官方提供的数字为实，我们获得3100票（按我们自己的计算为4410票），而社会党保守派只得320票。在最大的工业中心索非亚，我们赢得了814票，社会党保守派只获143票。

人们可以根据议会选举结果来判断社会党保守派在保加利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市镇和教育委员会选举中，我党通过与其他党妥协，获得了7个市议员席位，2个教员委员会委员资格。其中4个议员、1个教育委员会委员及保加利亚的第一个社会党市长（康·波兹维利耶夫公民）在卡赞勒克，3个议员、1个教育委员会女委员——保加利亚第一个享有这一荣誉的妇女公民基娜·科诺娃——在塞夫利耶沃。

党的出版物

党有中央机关报《保加利亚工人》，订户为2960户。党没有自己的

专门期刊，但《当代》、《当代思想》、《事业》等3个刊物由党员编辑并属于他们个人。除了宣传鼓动小册子外，党的出版社出版了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回忆录2000册；1910年的《红色人民日历》20000本，这是第14年编辑这种鼓动的普及小册子。一些组织有自己的地方报刊。如加布罗沃的《斗争》、哈斯科沃的《我们的呼声》及普罗瓦迪亚的《觉醒》。

党的收入在1908—1909年度为32138.82法郎，支出为31161.87法郎，结余为1025.95法郎。

工会运动

下列工会和行业组织思想上靠拢我党，与我党保持联系，并在党员的庇护之下。

1. **工会总同盟。**会员3020名，这个同盟中有产业工人、工艺美术工人、运输工人和码头工人，总同盟的收入1909年达36202.45法郎，支出为35208.35法郎，在1909年举行了71次罢工，其中42次成功，31失败[①]。支出中有1036.85法郎用于救济病人、失业者和流浪者。

这个同盟把党的机关报——《保加利亚工人》——作为自己的机关报。

2. **国家职员组织。**

（1）保加利亚中小学教师联合会，4349名会员。

（2）铁路员工联合会，2241名会员。

（3）邮政、电话、电报职员联合会，1119名会员。

（4）国家职员及市镇职员联合会，1279名会员。

① 数字有误，原文如此。——译者注

（5）金融职员联合会，1100 名会员。

这些职员组织的会员共计为 10088 名。

工会出版物

上述行业联合会和属于总同盟的工会组织有下述行业刊物：（1）《觉悟》，教师联合会机关刊物，发行 4000 份；（2）《铁路员工觉悟报》，铁路员工联合会机关刊物，发行 3000 份；（3）《邮政电报职员觉悟报》；（4）《团结》，国家和市政管理机构职员的机关刊物，发行 2000 份；（5）《保加利亚排字工人》，印刷工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发行 800 份；（6）《成衣工人斗争报》，发行 750 份；（7）《细木工人》，细木工人联合会机关刊物；（8）《鞣革工》，鞣革工和制鞋工联合会机关刊物，发行 600 份。

去年，国家职员的组织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各联合会的联合会”，开展了反对（由政府代表的）国家的经济斗争。鉴于国家职员的状况需要改善，为了挫败实施现政府提出的反对国家职员的组织的反动立法的企图，“各联合会的联合会”准备举行总罢工。它的斗争获得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及工会总同盟的有力支持，并取得了成功，反动立法被撤回。国家职员的物质条件得到部分改善。而且，在集体斗争的压力下，当局任命了一个调查国家职员的总体状况的专门的议会委员会。

社会党保守派在它的几十个无法列举的职业的党员的影响下，进行了一场运动。这一运动的确有力！但它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他们的同志和伙伴，反对国家职员的大规模的运动。

劳动委员会

1905 年，由于一份向议会提交的有 300 名工人签名的陈情书，议

会制定了一个关于女工和童工的立法，规定了最起码的改善。为了实施这一立法，在任命劳动监督员之前，劳动委员会得以成立，它由有关的市长、地区学校的审议员、地方医生和工程师、工业法庭书记（在有此机构的地方）及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1 名）组成。

在这些委员会中，最积极的成员是工人代表。是他们在工厂、车间进行了调查，并作了关于女工、童工立法的违犯者的笔录。去年，我们的工会有 18 个代表参加了劳动委员会。

合作运动

我国的社会主义合作运动还年轻。尽管如此，工人银行在工人斗争的领域里获得了一些成就。有 **10** 个受我们的一些地方组织指导的合作社：**3** 个面包店，位于索非亚、亚姆波里、和普罗瓦迪亚：**7** 家商店，在卡赞勒克、哈斯科沃、亚姆波里（2 家）、普罗瓦迪亚、兹拉塔里察、下克雷梅纳。这些合作社有 2500 名社员，30000 法郎资本，每年再转账 500000 法郎。

这些合作社用一部分收入资助党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活动，它们还资助工会联合会、罢工者、病人及找工作的流浪者。

代表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会

司库：**H. 赫里托斯夫**

1910 年 5 月于索非亚

1907—1910 年间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

一、政治运动

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无论如何都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在过去十年里，资本主义尽管面临许多内部和外部的障碍，但已在我国取得了不少成就，在工业、企业、建筑与信贷方面成就更多。

一方面，现代工业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以及信贷机构——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并还在继续增加。另一方面，政治越来越具有清晰的资本的特征。它的机构是自己根据资本主义化的需要和新的踩在小私有的废墟上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调整并加以完善。简言之，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迅速地获得了统治权，它的扩张导致了小私有者的毁灭和悲剧，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生产，成了资本生产大军中人数越来越多的一部分。

由于社会主义旗帜对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具有的吸引力（它使他们意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共同理想），这些新生力量致力于反对改良的做法和设想，他们对社会作出这样的规划，即夺取政治权力并最终消灭这种权力。简言之，社会党在保加利亚所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斯图加特大会后的四年里，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它克服了许多障碍，取得了很大进展。党所起的实际作用的程度取

决于党的有效资金及客观条件。这一进展具体表现为党员人数的增加、联盟力量的增强、出版物的扩大以及反对资本和战争的活动的加强。

此外，它的成就更鲜明地反映在工会组织数量的增加上。工会由于它组织指导工人联合争取直接的改善的职业斗争的能力而日益巩固，在工人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强。这个组织也是工人获得同样的知识的重要学校，它用阶级团结来教育工人。

党的组成

年份	地方支部	党员总数	工人	农业工人	职业工	自由工人	男	女
1907	38	1595	1079	250	40	226	1583	12
1908	40	1665	1134	248	48	235	1648	17
1909	45	1870	1306	260	64	240	1846	24
1910*	56	2286	1680	280	69	257	2260	26

*1910 年的数字是头三个月的。

此表显示了过去四年中党的成分。最后一个数字只是头三个月的统计，年底党员数可能会增加。

上表还表明，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总起来看，工人是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因素。

党内有：17 个工人体育俱乐部，420 名成员；16 个社会主义教育协会，成员约 450 名；而主要的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机构 56 个地方小组，800 名党员。它的机关报《火星报》每周出版一次，有 9000 个固定订户。农村雇工的组织共有 25 个地方小组，350 名成员。它的机关报《雇工》每月出两期，固定订户是 800 个。

财政状况

年份	全党		中央金库		收入来自	
	收入①	支出	收入	支出	党费	党员证
1907	22252.5	21881.5	4135.55	4120.45	1596.85	290
1908	26318.5	26251.5	4315.5	4292.14	2078.14	300
1909	28881.12	28340.85	4663.8	4270.47	2347.47	462
1910*	56540.24	46780.7	4973.44	4639.57	2400	560

*1910 年的数字是头三个月的。

上表说明了我党在这一段时期的财政状况。党的图书馆的经费——总共有 30 万法郎——没算在内。在最近的三个月里，党的处境也十分好。

党的活动

年份	大会、会议	出席人数	群众大会	出席人数	其他活动	出席人数	传单	书籍	立法议会选举得票
1907	218	4293	486	27250	417	21505	12816	8145	—
1908	281	4460	521	32800	483	26850	34890	9300	4360
1909	202	9960	543	30450	560	28370	14800	7350	—
1910*	695	18060	623	117425	496	90400	117920	15005	—

*1910 年的数字是头三个月的。

上表显示了党在这段时期活动的大体情况，这表明，我党原则上很重视教育工作和工人的成长。党也很重视娱乐，花了一大笔钱，以便让工人享受文化平等，因为党迫切需要进行宣传工作，接纳新党员。

① 原文如此，缺货币单位。从下文看，应为法郎。下同。——编者注

党的报刊

（发行量）

年份	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	党的期刊《新时代》	《红色日历》	五一传单
1907	2000	960	13956	—
1908	2350	1000	14680	7500
1909	2400	1150	15300	10000
1910	3500	1426	18000	15000

上表显示了党的报刊在过去四年中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上表中党的机关报的数字是它从今年年初开始每周出版三期后的发行量。我们希望两三年后能使它变成日报。为了使这份报纸印刷精美，几个月前，我们在机关报工人的努力和兄弟的德国党的资助下安装了印刷机。印刷机的价格是以现在的标准定的，为35000法郎，这使党报能满足党的实际需要。

过去四年间，在政府扼杀了宪法规定的自由，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可缺少的结社权之后，我们的工作止步不前。这场斗争现在还在继续。两年前，民主党被召去代替民族自由党——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党——组阁。民主党人为了执政而大肆蛊惑，在激进分子首先是“社会党宽广派人士”的道义支持下，诱惑了广大群众，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

从一开始起，他们就一直不愿从事社会、民主的改良，而是走前任的老路。

他们自然没有忘记支持者——“社会党宽广派人士”，给了他们许多收入高、有大红地毯办公室的职务，并出钱让他们到其他国家执行特别使命。

所有这一切，使民主党的政治举措在一开始便引起人民群众，尤其

是工人的失望、义愤，这种失望、义愤随后又变成不满。最后，大家都明白他们成了蛊惑性煽动的受骗者，他们的这种正当的不满转向了这些煽动的帮手——“社会党宽广派人士”。这时，他们尝到了错误行动的恶果，因为他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对“社会党宽广派人士”——我国“高贵的民主党”的朋友——来说，这次背叛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今天，这个社会党正在死去，因为事件简单地走向反面，它正在彻底瓦解。它丧失了威信，激烈的斗争打击了它，窒息了它的组织的全部积极的主动性，它根本无法活动了。由于被一些曾暂时受它影响、跟随它的工人摒弃，社会党士气低落，组织陷入涣散之中。将不可避免地变为“光杆司令”的党的领袖——妥协的头子，成了高贵的民主党的工具，现在还在竭尽全力扶大厦于既倾。因此，他们鼓吹“联合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力量”，想以此拉拢“社会党国际局”。但是，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力量并没分裂。事实真相是，有一个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完全从一个政治集团分离出来的集团，它偶然地加入了国际，并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威望，使工人分裂，使他们对自己的解放斗争丧失信心。幸运的是，在我党的努力下，对我国工人阶级利益的这一戏弄告终了；说谎者必定会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回击。我党反对同思想完全不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重要性的政治集团联合。我党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利益，党的地位允许它把一群确切无疑的妥协者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更不能把他们纳入他们曾出卖过的工人运动的行列中，让他们再干腐蚀的坏事。我党的任何让步都会导致有觉悟的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完全了解了——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社会党宽广派人士”的作用。事实上，这个党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代表像其他国家那样的所谓的“改革倾向”，它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是政治商人和精神麻木者的混合物。

只有我们党——坚信无产阶级独立行动的策略——完全不会被民主

党人及其工具的甜言蜜语和保证所打动。

它坚定地保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因此而获得了工人世界的普遍同情，这种同情立即表现在我们组织中工人的巨大影响上以及我们的行业机关报和党的机关报的订户的增加上。一句话，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中间顺利发展了。今天，我们高兴地收获了我们社会主义者工作的果实，工人受到了关于工人、工人运动的问题和策略的教育。当他们认为，在保加利亚，我们是唯一的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大威望的党时，那成果就更丰富了。因为断然拒绝加入所谓的“民主党”——民主激进分子与社会党宽广派人士——的事业（其目标是在群众中加强政治腐蚀，使他们永远为资产阶级效力）和王朝的野心，我党对工人阶级利益忠诚不容置疑。在这种情况下，它始终捍卫着无产阶级的利益。

简言之，党认为，它的成就主要来自参加政治斗争并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

两年前，奥斯曼帝国成了一系列事件的舞台，这对东方，总的说来对我国十分重要。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尤其是俄国和奥地利——在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表明，巴尔干国家面临一种严重危险。如果它们依旧保持分裂，这对俄国与奥地利来说是不利的。蒙受过巴尔干民族内战的最坏后果的我们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明白了这种危险。我们根据自己的力量组织了群众示威，党的这一行动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积极反对政府政策的行动，这一政策完全出自王朝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完全效劳于俄国沙皇和奥地利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同塞尔维亚的朋友一起在贝尔格莱德召集了巴尔干各社会党会议，讨论巴尔干问题。会议于4月7日召开，巴尔干所有战胜国的社会党都派来了代表，他们通过了3月24日的决议，基本内容是五一在所有巴尔干国家同时举行抗议集会。这些共同行动大大有助于巴尔干的社会党的处境，向工人阐明了巴尔干问题。下一次大会将于明年在索非亚召开，它将制定巴

尔干无产阶级的更广泛的行动纲领。

如上所述，我们参加了一场日益深入并在宪法改革问题——政府内部正在讨论的问题——上达到高潮的斗争。我们坚信，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会有利于无产阶级。他们希望把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可能还有普选权写进宪法。然而，政府对此毫无兴趣。鉴于我国各种力量的地位：君主实际上至高无上，它与资本家阶级的暂时联合在一起，民主党派和工人阶级目前在组织上很软弱，因此存在这样的巨大危险，即君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会剥夺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力。我们也十分明白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小市民——的民主情感，他们在此时此刻的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我们一如既往地依靠自己，忠实于自己的使命，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相信，我们将赢得目标，并用它来动员无产阶级大众，看清危险，这种危险震惊我们，使我们焕发出所有的能量和战斗力。这就是我们所争取的。我们全部的组织力量表现在无产阶级战斗力的增强和党的组织上。增强我们的组织，加强在工人群众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这就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使命。我们坚信，只要条件有利，我们将完成这一使命。

二、工会运动

在我国，工会运动刚刚兴起。一开始它表现为各地的工人小组；其中有少量工会，但它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争取工作条件的改善。

联合这些小组是由几个工人首先倡议的，这些工人受到了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他们的理想是对其拥护者进行阶级教育。因此，那些联合起来的小组是指导团体。这些工人学习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而他们的小组开始相信，通过它们一些力所能及的行动，能稍微改善一下工作条件。同时，当这些小组增加时，建立今后行业工会的基础的思想出现

了。在1904年，所有的小组合并为一个大规模的、集中的工会。我们必须指出，通过社会党的阶级教育，这些新的行业工会投入到阶级斗争的战场，并同社会党——其重要性在提交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已经谈到——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的报告是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共同报告，这对两方面的支部都有益，它们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总工会的组成

年份	支部数	缴费会员
1907	55	1689
1908	93	2084
1909	120	3424
1910*	155	4600

*1910年的数字是头三个月的。

上述数字表明，在过去四年中，加入总工会的支部增加了两倍，成员增加了三倍。

工人组织分类

年份	产业工会	行业工会	运输工人工会	农业工人工会
1907	676	899	114	—
1908	970	897	215	—
1909	1884	1007	521	12
1910	2420	1205	960	15

从1907年至今，13个行业工会的172个地方支部加入了总工会，即：

名称	支部数	会员数
1. 矿工工会	8	360
2. 烟草工人工会	7	590
3. 冶金工人工会	14	350
4. 纺织工人工会	5	250
5. 木工工会	14	300
6. 制革工人	28	590
7. 缝纫工人工会	27	420
8. 印刷工人工会	8	200
9. 铁路工人工会	17	360
10. 邮政和电报电话职员工会	14	200
11. 码头工人工会	2	250
12. 商业雇员工人	6	120
13. 织布工人工会及其他	24	610

这些工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担负起捍卫工人的职业利益的使命，这可以从这三年中它们的活动看出。

下列数字表明这些工会开展的互助服务的进展：

年份	资助罢工工人数	资助金额（法郎）	资助患病工人数	资助金额（法郎）
1907	434	2055.20	74	692.95
1908	694	3139.15	122	949.39
1909	793	4726.45	344	1425.10
合计	1921	9920.80	540	3067.44

下列为近几年罢工的数字：

年份	罢工总数	防御性罢工	进攻性罢工	罢工人数	损失劳动日	资助金额（法郎）	成功	失败	取得部分成功
1907	82	33	49	3496	43842	10180.12	29	34	20
1908	75	36	39	7914	39845	4804.65	15	39	21
1909	79	42	37	5660	75901	10448.40	10	51	18
总计	236	111	125	17070	159588	25433.17	54	124	59

总工会和我们的行业工会的财政状况令人满意，它们的组织都尽可能增加自己的资金。为了加强总工会的力量，每个行业工会每月都向工会委员会的中央金库上交会费，每人一个比塞塔。

过去四年间中央金库的收入为：

1906 年	3250.60 法郎
1907 年	3339.30 法郎
1908 年	4449.50 法郎
1909 年	5360.80 法郎

下列为 1909 年行业工会金库的总收支：

收入	42386.63 法郎
支出	38589.55 法郎

同年（1909）总工会的金库的收支为：

收入	10034.84 法郎
支出	8483.37 法郎

工会报刊是随着工会的发展同时发展的，我们现在有如下专门的机关报：

1.《矿工》，矿工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600份。
2.《冶金工人》，冶金工人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800份。
3.《木工》，木工工人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800份。
4.《排字工人》，排字工人工会机关刊物，双周刊，发行600份。
5.《缝纫工人》，缝纫工人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1000份。
6.《织布工人公报》，织布工人工会机关刊物，发行16000份。
7.《纺织工人》，纺织工人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800份。
8.《烟草工人》，烟草工人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800份。
9.《制革工人》，制革工人工会机关刊物，月刊，发行1000份。
10.《铁路工人》，铁路工人工会机关刊物，双周刊，发行1200份。
11.《邮政职员新闻报》，双周刊，发行1200份。

将来，我们会出版商业雇员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的机关刊物。

* * *

我们有自己的工会，但还有另一个由一些工会组成的、在“社会党宽广派人士”影响下的联合会。我们不清楚这些工会有多少会员。我们假定送到国际工会书记处的报告是准确的——但它们同该联合会委员会在这里出版的报告不同。例如，对于同一时期该联合会的会员人数，国际书记处公布的消息一次说有1500名，一次说有5000名，一次说有2500名，一次说有1900名。后来，该联合会说这个数字是3000。他们在一个月前召开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又说，所有会员共为2000名。这是因为，由于危机，他们的地方金库完了，他们总工会的金库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不知道国际书记处最近公布的有关他们的消息，但我们很清楚这些消息是不真实的。

他们创建的那些工会的形式像俄国人的大村庄。这些处于“社会党

宽广派人士”影响之下的工会同“社会党宽广派”一样，将会走向彻底瓦解。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因为那些工人幻想他们将会成为开业的手艺人。不难看出，这种统治着那些工人及其组织的思想将使他们受到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影响而士气涣散。我们可以预言，那些组织今后将成为罢工的庭园。现在，他们共同的思想是反对壮大着的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总工会领导的所有罢工中，许多不利的事情给了我们看清工厂主与他们团结一致的极好机会。例如，在斯利文纺织业的大罢工中，他们的头子与工厂主一起建立了一个有 20 名会员的工会，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代替罢工者工作。在科斯特涅茨的大罢工中，瓦尔纳的工人也如法炮制；在许多小城市的罢工中，这样的事继续反复上演。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社会党宽广派人士”在受他们影响的工人队伍制造的腐败和破坏。最有害的是，这些坏蛋的做法已经系统化，这对工厂主有利。这些组织堕落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下面这点看出来，即在“社会党宽广派人士”的影响下，他们成了反对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政府的工具。

法律照顾工厂主的行动。在上次选举由所有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时，我们的工会参加了选举，我们的候选人在一些主要城市有幸成功。政府拒绝批准许多选举结果，违法地以“社会党宽广派人士”来作为工人的代表。

这种粉饰“工人之友”和他们的“工会”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工人的组织反抗。我们必须牢记，在工人组织处于“社会党宽广派人士”影响下时，所有这些行为是绝不可能得到纠正的；只要“社会党宽广派人士”仍然不时从加入国际书记处得到好处，他们将继续利用这一点继续他们的叛卖活动。国际书记处没有我们总工会自己的代表，但我们所有的工会都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团结一致。

的确，形势是十分不正常的，但如果国际书记处更注意东方不同的

工会的申请，如果它得到关于这些工会性质与力量的更真实的情报，情况将幡然一变。我们始终相信，这一不正常的形势不会再继续下去，我们的总工会和工会将会找到我们的拥护者，他们会捍卫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党，他们将为了社会主义者的自由而争取这一点。我们坚信，随我们工会力量的增强和社会主义教育广泛开展，我们将取得胜利。

由此，我们将有可能靠我们的工会成为保加利亚无产阶级的一个年轻而又坚强的组织，它将十分明白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成为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成员。

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财务书记：**G. 克尔科夫**

1910 年 10 月 6 日于索非亚

波兰人的社会主义组织
向1910年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波兰无产阶级面临一种特殊的形势：它不能以西欧的自由人民的党的方式进行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这是因为波兰人民没有自己的国家，处于三个强大征服者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瓜分下；它没有独立的政治实体。根据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给每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绝对权力，这三个大国统治下的所有波兰人社会主义者都为波兰的统一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努力。波兰无产阶级此时此刻面临着德国人民在为德国统一而斗争时所面临的境遇。但是波兰无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针对沙皇俄国，它侵占了波兰最大的部分，并用野蛮的办法凌辱和压迫波兰。

一、波兰社会党（PPS）的报告

（俄属波兰）

在俄国，虽然有虚伪的立宪议会，但没有最起码的能让工人阶级以缓慢的改良方式征服国家机器的民主自由。争得这种最低程度的民主自由，这就是落在俄国工人阶级身上的任务，这就是落在处于沙皇暴虐统治下的这一部分波兰工人阶级身上的任务。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波兰社会党代表觉悟的波兰无产阶级投身于全俄帝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和社会主义行动。它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波兰无产

阶级的直接使命是推翻今天属于俄国的波兰土地上的俄国人统治；只有打碎外国人的枷锁，才能为波兰无产阶级开辟通向自己的彻底解放的道路。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人们不能把俄国未来的革命看成是国际范围内其他问题的结果。作为军事大国的俄国的虚弱、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亚洲冲突的威胁及沙皇政府遵循的其他政策——包括煽动俄国人的沙文主义感情，所有这一切表明，俄国迟早将卷入一场新的战争。同俄日战争一样，这将是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波兰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赢得独立，俄属波兰社会党的任务是掌握领导整个解放运动的权力。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负起了准备和组织那些能对俄国在波兰的统治加以决定性打击的力量的责任。这样，俄属波兰社会党的任务应当是，准备与能指导这一斗争的人相称的斗争的技术手段。

我们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报告过，波兰社会党分为两个部分：革命派和温和派。从那以来，温和派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这一派批判了波兰社会党纲领的基本要点，通过了一个新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它放弃波兰人的独立。鉴于此，革命派在其 1910 年的会议中决定抛开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名称，单称：波兰社会党，这个名称表明，它是老的波兰社会党的主要思想的唯一代表。此外，温和派人数大减、它的追随者没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状况，也有助于这一决定的通过。

组织状况。政府的反动继续变本加厉，沙皇政府用骇人听闻的政治压迫和不断的镇压竭力扑灭整个社会中，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切较为激进的运动，这对我们所有的组织带来了十分明显的影响。党被迫改变了所有的组织系统，缩减它的干部，以适应新环境。有组织的同志的人数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的 22720 人减少到 3500 人。有组织的同志的减少没有严重削弱党应有的影响。相反，我党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内无论

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的无产阶级中都显著加强。这个因警察迫害导致变化的数字无疑超过了向上届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数字。

报刊。在所报告的时期内，出版活动开展得十分广泛。警察屡次发现并没收我们的出版所，1909 年 9 月，他们发现并没收了我们的一个有电动机的中央印刷厂。党要使自己的出版活动方式适应如此严重的新局面。

在芬兰境内出版的期刊如下：

期刊名称	出版期数	印数
《工人》，中央机关刊物	32	296000
《矿工》，扎格勒比机关刊物	14	40000
《罗兹日报》，罗兹机关刊物	7	35000
《革命》，华沙机关刊物	4	8000
《黎明》，琴斯托霍瓦机关刊物	4	6000
《召唤》，卢布林机关刊物	2	3000
《阶级斗争》，拉多姆机关刊物	1	1200
《凯尔采杂志》，凯尔采机关刊物	1	1200
《北极光》，普沃茨克机关刊物	1	1000
《人民》，农民的机关刊物	1	12000
《红色信号》，铁路员工机关刊物	3	3000
《前线》，士兵机关刊物	2	2500
共计 12 种报刊	72	408900

由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编的呼吁书和传单在所报告的时期内有 130 种，因而总份数达 678000 份。

俄国边界那一边的编辑物：

期刊名称	出版期数	印数
《拂晓前》	27	42600
《工人》	22	11700
《新波兰社会党》（俄语）	2	2000
《波兰社会党十大报告》		3000
《波兰社会党十一大报告》		3000
《波兰社会党纲领》（波兰语）		1200
《波兰社会党纲领》（德语）		1000
《波兰社会党纲领》（法语）		1000
《波兰社会党纲领解说》		2000
外国支部的印刷品		3000
	总计	70500

经济斗争。1905 年事件的进程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在专制的政治统治下取得的经济成果是难以维持的。在 1904—1905 年罢工期间，无产阶级在各处都使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工资大幅度提高，有时增长超过 50%，每年达几百万卢布。在专制制度重新得势后，资产阶级进行了报复。近 1906 年年底，资本家开始了同盟歇业，资本家开始向工人夺回他们曾作出的让步。同时，他们开始解散公司，拆散工人联合会，工人阶级的一切经济斗争和互助都不可能了。在经济领域里，沙皇政府公开表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资本家剥削的支持者。这向所有还没意识到这些的人表明，俄属波兰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持久改善，只有在夺得基本的政治自由后才有可能。在相对自由的时期内，波兰社会党让工会领导所有的经济运动和工会的运动。随着政府反动的变本加厉，工会被解散了，与这种经济斗争有关的责任落到了作为唯一有组织的工人政党身上；波兰社会党在许多情况下还负起了领导无产阶级的内部斗争的

责任。应当指出，在所报告的这段时期内，干预经济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决定性。无产阶级面对在士兵刺刀保护下的资本家加剧的剥削和对工人在革命时期的经济斗争中取得的成果的逐步剥夺，捍卫着自己的利益。

战斗组织的活动。战斗组织的活动向四个方向发展：（1）防止最危险的政府代理人（如警察、宪兵、密探）；（2）进行针对在波兰王室中沙皇政府的最明显的代理人的政治恐怖；（3）瓦解国家机器（对政府机构的武装攻击）；（4）准备今后的武装活动。在所报告的时期内，我们的战斗组织取得的活动成果如下：

消灭了：
1 名警官
1 名“保安队”队长
1 名监狱长
1 名乡村警察官
1 名警卫队士兵
70 名警察
18 名宪兵
67 名密探和告密者
6 名士兵
9 名匪徒
共 175 人。

战斗小组没收了 8 笔数额较大的财产以及一些通行证。我们同侵略者政府继续斗争着，如在一切战争中一样，我们夺取了敌人的生命和财产。

1905 年革命时期的经验表明，在运动当中，人们没有时间及时使

无产阶级做好武装斗争准备。因此，一个考虑到将来武装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的党的一项主要的斗争任务是做好必要的准备。正是这一精神指导着战斗组织的特殊工作。这工作包括在同志们中普及军事战斗常识，在专门的学校中培养未来斗争的指挥官，以及收集武器和其他作战工具。

运动的受难者。我党代表了最不妥协的反政府倾向。当局的仇恨的报复都集中在它身上，军事法庭照例对我党同志审判得最严厉，毫不吝惜地作出处死或处以几十年强制劳动的判决。在所报告的时期内，在军事法庭的判决中，我们的41个同志被处死。我们还没提及对我们的同志所判的数年强迫劳动、数年监禁、行政起诉及流放，因为不可能收集到确切反映政府迫害和报复的这个难以填满的欲壑的数字。

与杜马的关系。在所报告的时期内，波兰社会党忠于自己的原则，坚决抵制杜马。根据我党的意见，杜马不会给波兰工人阶级带来点滴利益，不会保证它的丁点权利。我们不能把杜马作为革命目标的合适的讲坛，相反，它会十分有利于沙皇反动政府，使它在议会的庇护下巩固其强大的地位。鉴于杜马的反革命和蹂躏人民的罪行，波兰社会党宣布一直抵制这一机构，并表示它对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有害的。大部分波兰无产阶级在选举中听从了我们的声音。

在第一、第二届杜马选举中间实行了抵制策略的温和派（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①]）参加了第三届杜马选举。在波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中，所有参加杜马选举的人是多么不得人心，下述数字就是证明：在工友中，大部分工厂放弃选举权；而在华沙的普通人中，在19325个选民中（代表69875登记的选民），参与选举的温和派集团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只得400票。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抵制杜马的口号在此时在波兰社会党范围内得到的支持，不亚于与它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得到的

① 即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下同。——编者注

支持。

分割海乌姆土地的问题。政府分割出波兰王国东部海乌姆一地，建立海乌姆国，这是其俄罗斯化政策的结果。由于实行这个计划再次把政府的沉重负担加在所有劳动人民身上，侵蚀他们的民族利益和发展，同时有利于加强国内人民中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套上羁绊，我们党坚决宣布并且反复表示反对政府的这一计划，并运用它在革命活动中的一切力量同它斗争。分割海乌姆土地的计划是政府反动的产物，政府力图转移俄国社会对真正重大而不可或缺的政治改革的注意力，并且通过散布从内部征服了芬兰和一部分波兰王国的谎言，把这种注意力引向大俄罗斯帝国沙文主义的极致。

党与新斯拉夫主义的关系。在政治鼓动的领域里，我们十分激烈地宣布反对资产阶级力图向无产阶级大众反复灌输的新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为波兰王国和圣彼得堡杜马宣传的破产的国家民主党的政治家们狂热地宣传新斯拉夫主义，竭力说服波兰社会党相信，这个思想将成为波兰社会与俄国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国家民主党的政治家们表示，以俄国人和波兰人的种族共同体名义，波兰将浸透一种为了发展俄罗斯国家力量而共同行动的思想，而俄国政府应给予服从国家力量的波兰臣民某些宽慰。在我们的鼓动中，我们阐明，新斯拉夫主义不会给波兰无产者大众带来任何利益，它只是有产阶级的平衡术的一个标志。我们证明，新斯拉夫主义把所谓种族利益与国际利益对立起来，由于这样，反革命的思想使舆论道德败坏，延缓了波兰大众意识到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沙皇专制的时间。

波兰社会党与抵制俄语学校活动的关系。在 1904 年和 1905 年革命时期，广大年轻的波兰人离开了国立的俄语学校，要求用他们的母语上课。这一要求未被政府接受，俄语仍是国立学校的用语。年轻人不愿服从学校的俄罗斯化，转入了私人的波兰语学校，抵制俄语学校。在华

沙，作为已开展了6年的革命行动的余波，对俄语学校和大学的抵制至今仍在继续，在形势越来越严峻时，随着沮丧情绪一点点蔓延到社会各领域，终于使平衡政策的党（“国家民主党”）发起了一次十分强烈的宣传活动，目的是使年轻人重返俄语学校。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这一声音。波兰社会党最坚定地抗议并仍在抗议这一妥协倾向，支持抵制俄语学校。它认为俄国人的官办学校仍是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只有波兰人的民主学校，向一切人开放的小学、中学，才能满足波兰工人阶级的文化兴趣。

党的财政状况。组织委员会和国外委员会的报告一起提供了截至1909年4月1日的状况。实际上每个委员会——包括党的组织——的账是公开的。下述报告中组织委员会和战斗委员会财政状况截至1910年4月1日，国外委员会的截至9月1日，报告以卢布为计算单位。

收入

组织委员会 国外委员会	结余，截至1907年4月1日	502.00
	收入，1907年4月1日—1909年4月1日	79203.23
战斗委员会	收入，1907年4月1日—1909年4月1日	123294.77
组织委员会	收入，1908年4月1日—1910年4月1日	38846.00
战斗委员会	收入，1908年4月1日—1910年4月1日	83114.53
外国委员会	收入，1908年4月1日—1910年4月1日	10195.36
	总计	355155.89

支出

组织委员会 国外委员会	1907年4月1日—1909年4月1日	
	用于组织方面的支出	49231.20
	用于合法和非法出版物的支出	24315.59
	用于对囚犯的资助	4318.96

（续表）

战斗委员会	1907 年 4 月 1 日—1909 年 4 月 1 日	123294.77
组织委员会	1909 年 4 月 1 日—1910 年 4 月 1 日	38846.00
战斗委员会	1909 年 4 月 1 日—1910 年 4 月 1 日	77747.22
国外委员会	1907 年 4 月 1 日—1909 年 4 月 1 日	10195.36
结余		7206.79
	总计	355155.89

二、波兰社会民主党（PPSD）的报告

（奥属波兰）

为争取普选权，加利西亚和西里西亚社会党和奥地利其他国家各兄弟党一道，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无产阶级获胜、并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普选权时，我党成功地主持了 1907 年的竞选活动。在 1907 年的**竞选活动**中，这项法律首次付诸实施。在波兰，社会党得到了 90000 票。在议会里，波兰社会党党团有 6 名议员。其中包括，4 名加利西亚议员，他们是海尔曼·迪阿曼德博士、约瑟夫·胡德茨、海尔曼·利伯曼博士和安德烈·莫拉切夫斯基；2 名西里西亚议员，他们是伊格纳齐·达申斯基和理查·库尼茨基博士。

奥地利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划分为 5 个鼓动区，由 120 个地方组织组成。全体党员每周交纳 5 赫勒的固定党费，由党的领导机构、选区组织、选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分配。

近年来，**工会组织**和党密切配合，开展斗争。但由于爆发经济危机，工会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报告所述时期，加利西亚组成工会的工人人数从 12800 名上升到 17500 名。也就是说，工会人数的比例达到33%。在报告所述时期，加利西亚工会分会的数量从 183 个上升到

233 个。在西里西亚，加入工会的波兰工人人数达到整整 10000 名，由 67 个分会组成。因此，在加利西亚和西里西亚，加入工会的波兰工人总数达到 28000 人，共有 300 个分会和 14 个工会书记处。

在报告所述时期，加利西亚各工会处理了 80 件劳资纠纷，其中 18 件不需要通过罢工来解决。在 62 次罢工活动中，有 57 次大获成功。参加罢工的工人总数达到 9185 人。有 2602 名工人没有通过罢工就改善了工作条件。罢工天数达到 160504 天。在此期间，在西里西亚，罢工次数与加利西亚相当，几乎所有罢工都取得了胜利。

在加利西亚和西里西亚，**合作运动**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我们有 37 家合作社食品杂货店，3 家工人面包店，1 家工人储蓄和贷款银行，25 家工人俱乐部。

党的报刊包括 5 种出版物，其中有 2 种日报：克拉科夫的《前进报》和伦贝格的《声音》；2 种周报：克拉科夫的《人民权利报》和切申的《西里西亚工人报》；1 种妇女专刊《妇女之声》。还有 10 种工会刊物（排字工人、铁路员工、冶金工人、矿工、建筑工人、木材工人、纺织业工人、烟草工人、裁缝师和糖果工人等）。总发行量达到 45000 份。

在最近几年，也成立了一个**妇女政治组织**。目前，该组织拥有 1500 名工人妇女会员和自己的机关报。

在加利西亚的一些乡镇和西里西亚的许多乡镇，我党都有代表。

有组织的波兰工人掌管着 36 个**医疗储金会**，分布在 16 个城市中（利沃夫、克拉科夫、波德戈尔泽、博赫尼亚、新松奇、热舒夫、雅罗斯瓦夫、普热梅希尔、德罗戈贝奇、斯特雷、斯坦尼斯拉夫[①]、科洛梅亚、别尔斯克、切申、弗里茨塔特、奥德贝格等）。

① 即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编者注

近年来，我党在**大众教育**方面非常活跃。除了伟大的“业余大学”（亚当·米茨凯维奇[①]业余大学）——主要从事综合教育（讲座、授课、图书馆等）——以外，我党还举办了一些讲座俱乐部，主要是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觉悟，丰富他们的社会主义知识以及他们的总体看法。

除了面向广大群众的讲座和讨论以外，我们还在克拉科夫、伦贝格和莫拉瓦俄斯特拉发开办了一些专业党校，开设了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等课程，分别由懂专业的同志讲授。

目前，我党正在**为争取在加利西亚和西里西亚议会**以及**市镇选举**中**实现普选而斗争**。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边境，我党正在为争取**大众教育**而斗争。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捷克资产阶级——把波兰工人拒之门外。

我们正在和奥地利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道，为争取**工人退休金**而斗争。在工人们施压下，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在议会中，社会主义议员的任务是完善和纠正政府草案的不足之处。

在加利西亚，经济发展的不足是由于人口大规模移居国外而造成的。我党非常重视这个现象。作为时令工，波兰工人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找到了工作。这些移居国外的人大部分都是无组织、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造成了各移民接收国工资水平的下降。假如波兰移民群众目的地国的同志们愿意找到他们、给他们讲讲有关阶级利益和工会组织方面的知识，我们会以极大的热情把我们的党报和动员力量交给他们，供他们支配使用。

为此，我们特提供下列通讯地址：

波兰社会主义者刊物地址：克拉科夫菲利帕街 11 号《前进报》编

---

① 亚当·米茨凯维奇（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波兰 19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革命家。——译者注

辑部。奥地利波兰社会民主党党部地址：克拉科夫波德戈尔泽米茨凯维奇街24号埃米尔·博布罗夫斯基博士。

加利西亚工会委员会的通讯地址是：克拉科夫茨维叶尔奇尼卡街10号西吉斯蒙德·茹瓦夫斯基。

在提交给奥地利议会的报告中，社会党议员协会提供了有关**我们的议员在议会中的斗争**情况。在这里，我们只提及波兰社会党议员开展斗争的两个代表性事件。为确保加利西亚的选举活动的公正性，为避免出现臭名昭著的竞选腐败问题，波兰议员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们的议员和鲁塞尼亚议员一道，极力支持和保持波兰人民和鲁塞尼亚人民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去年，由于俄国社会党党团在杜马所采取的态度，波兰社会主义团体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杜马就司法部预算问题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波兰议员迪姆扎递交了一项提案，即："今后，属于波兰民族这一事实不再继续对在波兰王国的法庭中占有一个席位构成障碍"。俄国司法部长舍格洛维托夫反对这项动议。他声称，不应该允许波兰"垃圾"充斥俄国的司法部门。格格奇柯利议员也以社会党党团的名义反对迪姆扎的提案。为他的态度，他辩称："其一，迪姆扎的提案只考虑到波兰人的利益；其二，社会党人全面反对预算案，因此，要否决一切相关提案。"在杜马，俄国社会党党团和民族主义右派的党团一起，投票否决了这项提案。

在奥地利议会中，波兰社会党党团是波兰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就这个问题，波兰社会党党团给杜马的社会党党团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已进行的投票和格格奇柯利的声明与社会党关于民族平等的任务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接下来，杜马审议了波兰的首要问题，特别是关于把海乌姆地区从波兰王国分离出去的政府草案——这是针对遭受残酷压迫的波兰人民的又一暴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俄国社会党议

员努力弥补他们先前的态度，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错误。相反，杜马的俄国社会党党团多次并强烈地表示，反对政府的这一新暴行，采取了和社会主义原则完全相一致的态度。

三、波兰社会党（PPS）的报告

（普属波兰）

德意志帝国的波兰居民总人数达到400万人。多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都在进行迫害活动，以期消灭波兰人。普鲁士政府推行强硬的日耳曼化政策，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满脑子都是德国沙文主义思想。

1908年，普鲁士政府在议会强行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我们还可以有20年的时间使用波兰语，而且只能在波兰人占总人口60%的街区使用。普鲁士国会还通过了一项财产征用法。根据这项法律，波兰人的财产可能被剥夺。另外，还有一项特别法已经讨论了将近十来年：那就是定居法。根据这项法律，波兰农民将不允许在已获得的宅地上建造茅屋。

不久前，波兰人在普鲁士统治下进行的政治斗争仅仅局限在国家利益方面，而阶级斗争的思想很难深入到波兰的无产阶级当中。普鲁士政府的这项野蛮迫害政策对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煽动家来说再合适不过了。直至今日，波兰工人依然处于他们的领导之下。由乡绅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政党组成的“波兰俱乐部”对波兰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

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无产阶级当中，波兰社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还相当薄弱。然而，波兰社会党却成功地在煤矿资源丰富的上西里西亚赢得了相当强大的一席之地。在波森公国，波森市居首要地位。在

西普鲁士，可以说，波兰社会党并未触及这个地区。在我们的移民目的地国中，我们更关注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以及柏林、不来梅和汉堡等几个大城市。

有40个地方协会属于波兰社会党，共有成员1500名。在结社法实施（1908年）以前，只有10个地方协会，成员只有300—400名。波兰社会党的收入是每年5000马克，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给的。在我党的鼓动和努力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名市议会代表在上西里西亚的扎博兹附近的巴甫洛夫（保罗斯多尔夫）当选。

在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工人报》每周出版三次，是波兰社会党的机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每年给我们的机关报资助1万多马克。另外，还有在波森出版的《教育》和在波鸿出版的《矿工报》等行业机关报。根据一项互助协议，波兰社会党作为独立组织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报告所述时期，波兰社会党分别在1908年和1910年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两次都是在上西里西亚的扎博兹召开的。

波兰社会党（PPS）的报告

和对整个俄国一样，对我国来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一时期是反革命势力高歌猛进的时期。但是，反革命事业并非简单地复辟和全面恢复旧有的官僚体制和君主专制体制：政府的政策是对它在1905年所遭受的失败和屈辱的**反攻倒算**，是针对与革命有关的一切——特别是工人运动的所有游行示威活动——的一项疯狂破坏政策。而在这次反攻倒算中，政府不再像革命以前那样，仰仗几近孤立的官僚机构；而是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个强大的乡绅集团和庞大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基础，政府在11月份颁布了著名的沙皇赦令，借此走上了发展反革命农民资产阶级的道路。它在1907年6月的政变公布的选举法中找到了合乎其目的的政治形式。该选举法选出了一个政府占绝对优势的杜马，专横跋扈地执行着它的一切旨意。

这些情况左右着整个沙俄帝国的政治形势，也决定着波兰的总体形势。然而，这一形势是有其特点的。在这里，当局除了进行全面迫害以外，还推行全国性的压迫政策。

因为，反革命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这是“犹太人大屠杀”政策经过美化以后的延续。前不久，对芬兰的暴行使得这一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波兰，这一政策体现在全面压迫形式的强化（如戒严等），以及一系列针对波兰民族的特殊政策上。而这一切全然置波兰资产阶级无限忠诚的态度于不顾。让我们把这些政策列数一二。

对波兰私立学校和所有业余大学展开了殊死战；在杜马，波兰议员的人数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华沙这个拥有90万人口的城市选出两名议员——一名由人民选举产生，一名由占少数的俄国人（全部都是政府官员）选举产生；臭名昭著的海乌姆草案：从俄属波兰的土地上割让一部分出来，用于建立一个“俄国”新政府；还有，在前不久，斯托雷平向杜马提交了一份波兰市政机构法案，其中的选举法极端反民主，以民族“选民团”原则为基础，异乎寻常地偏袒极少数俄国人，把犹太议员的人数减少到极其可笑的地步；另外，该法案还要求波兰未来的“自治政府”机构都使用俄语。

波兰政治形势的另一个特征源自其更加成熟的社会组织机构。阶级对立更加突出。波兰资产阶级虽然自身不得直接参与政权并受到全国性欺压，却卖力地支持政府反工人的反革命政策。另外，它还极力通过建立“民族”工人组织和“基督教”工人组织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如果说反革命形势在诸多方面都比全面复辟革命前旧制度更糟糕的话，那么，据此认为哪怕在当前时期革命也只有消极后果，就大错特错了。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揭露了社会矛盾，创造了开放的政治生活，甚至连反革命罪行大白于天下以后，也有助于志在消灭现行制度的力量成长壮大。

这些在政治生活总机制中所发生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政党中不无影响。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从革命前的宣传队转变为革命进攻时期的群众性政党。而当反革命反攻倒算、使其丧失了绝大部分人力时，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其关心、抉择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却保留了投身伟大斗争的政党的特性。它们代表着一个立志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庞大的社会阶级。

我党列入议事日程的大部分问题都已经在**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

会（在1908年新年举行，与会人数53人）和1909年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与会人数25人）上进行了审议。通过对波兰社会党政治生活的总结，我们可以把这两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各项决议当做指引。

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给党提供了一个**新纲领**，从而结束了历时近三年的纲领修订时期。

各工人政党是斗争的政党、行动的政党。各工人政党认为，当出现言（纲领）行（策略）不一致时，就应该对纲领进行修订。而当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要求制定某一项策略而纲领则提出另一项策略时，当这样的分歧越来越加剧时，纲领的修订就不可避免了。

自进入1905年以来，在俄属波兰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旧纲领——又称《巴黎纲领》——为党的宣传工作服务了整整12年，要成为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指路明灯已显力不从心。按照这一纲领，斗争原本应该采取波兰全国性暴动的形式，把波兰从俄国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波兰国家。然而，1905年1月的革命罢工以及之后发生的大规模运动，只不过使波兰革命成为整个沙俄帝国全面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自由的诉求是全波兰人民的共同诉求，这种诉求似乎取决于全俄国的民主化进程，与成立独立波兰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就在“一月风暴”的次日，波兰社会党在华沙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第七次代表大会奠定顺应历史形势的策略基础、并提出党的政治纲领时，《巴黎纲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新纲领的制定工作开始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新纲领。这是一个以对俄属波兰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环境的分析为基础的纲领。

按照这一思路，纲领把俄属波兰争取政治自由和在全俄国推翻专制制度以及建立共和制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共和制度只有通过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才能建立。但是，俄国民主化进程就是要使各种政治形式与社会生活的内容相适应，应当给予由专制主义创造的官僚集权

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给予这个庞大帝国的各国人民以自由发展的保障。这将促使国家权力下放。权力下放的方式和界限由各族人民的生活本身决定，由他们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特别是，波兰是建立在特殊的综合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整体，具有更先进的社会结构，人民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特质各异，因而应当成为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殊属地。

党对所有“策略”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始终坚持把“工人群众”视为党的工作目标，在宣传方面如此，在组织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要最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开的（**合法的**）和地下的（**不合法的**）组织形式和宣传形式。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涉及杜马、行业工会、合作社和教育协会等问题。另一方面，第十次代表大会还确定了在现阶段党对待各种关于（党从革命进攻时期传承下来的）武装斗争问题的态度。

我们先来谈谈杜马问题：

第三届杜马。在第二届杜马解散和六月政变以后，党再次面临参加选举和抵制选举的策略选择。1907 年 8 月，党召集了一次专门的代表会议。经过各方深入探讨和全体党员投票表决后，会议宣布参加选举活动。会议认为，抵制选举的策略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即：抵制选举的策略是（旨在直接消灭旧政权和召集制宪会议的）革命进攻策略的组成部分。在非暴动形势下采取抵制竞选的策略，必然会演变成一种弃权、被动和赌气的态度。会议之所以选择参加选举活动，目的就在于利用选举活动时期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把当局的种种罪行公之于众，并揭开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面具。尽管政变选举法在波兰排斥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议员、戒严使得竞选宣传工作变得异常艰难，会议还是决定要参加选举活动。

党没有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在竞选活动期间，在工人当中，再次激起了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我们的候选人所得到的票数相当可观。

下面是工人“选民团”中“工厂代表”的选举结果：

	波兰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	民族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	抵制等
华沙（市）	39	39	20	—
华沙（省）	36	14	18	—
罗兹（市）	25	52	73	—
彼得库夫省	40	28	57	12
拉多姆省	24	1	1	1
总计	164	134	169	13

在竞选活动开始两个月后，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一项特别决议中，大会认为，选举法和警察恐怖政策不允许波兰无产阶级向杜马选派其直选当选者。有鉴于此，大会表示，大会将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视为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代表，并希望它能够把无产阶级的血海冤情带到杜马的讲台上去，为无产阶级大声请愿，加深资产阶级各派和反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报纸上，我们利用杜马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增长工人阶级的政治经验，并使之日臻成熟。我们还利用这些事件和政治上与日俱增的麻木不仁作斗争。我们与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取得了联系，并向它提供了大量材料，其中包括关于迫害工人工会的材料，作为进行大规模质询的基础。最后，当1909年4月某党在奥地利议会遭到若干波兰社会主义议员大肆无端的攻击时，我们采取了拥护该党的立场。

鉴于**工会运动**成为特别报告的内容，我们只想说，党要不惜做出重大牺牲，大力支持无产阶级的有识之士以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发展势头。第十次代表大会议程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一致的。这个议程鼓励每一名党员都加入工会，积极参加工会生活，在工会组织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以便把阶级觉悟贯穿于整个工会工作中。这个议程还号

召“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崩得”的同志们不要再另行设立加入这些党派的工会团体，在工会组织中制造分裂。

由于关于**合作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被列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议程，我们抄录了第十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决议内容如下：

“在工人阶级为实现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合作运动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合作运动可以把工人阶级从中间商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直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合作运动是一所组织学校和管理学校；合作运动可以在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中成为一个新的环节。但是，这一组织形式的作用本身主要取决于它和其他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各种形式的紧密关系，而这就要求一个政治自由的环境。然而，即便是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只要满足下列条件，合作社仍能给工人阶级帮上大忙：（1）合作社应当成为阶级团结的课堂，避免在各会员当中助长贪婪和追逐利润的心理；（2）合作社的章程及构成应当完全民主，即：全体社员应当人人平等，不管其份额多少，社员的利润分成主要取决于总出资额；（3）一部分利润要用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4）合作社职工应当享受各自工会确定的劳动条件，职工和合作社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应当通过工会来解决；（5）合作社社员要防止‘合作主义’幻想。合作主义理论认为，只要通过合作社，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并使工人们相信，通过这个方法，他们能够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

最后，要提醒工人们，支持由工人的阶级敌人成立的、并由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政党管理的合作社，是很危险的；要反对草率成立那些既没有扎实商业基础、也没有管理能力的‘马虎’合作社。”

第十次代表大会有多项决议探讨了各种有关**武装斗争**以及负责筹划和领导武装斗争的专门组织的问题。根据过去一段时期的革命经验，并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判断，代表大会否决了在当前阶段采取一切武装政治斗争的形式，特别是**剥夺**国家资金和**恐怖行动**。大会也表示，要反

对各种常设作战组织、武装民兵、教官学校等，以及由党来为将来的武装暴动进行任何“技术”准备；并提出一项原则，即：只有在革命政治形势使得群众暴动成为可能和必要时，才能给他们配备武器，而一切“事先”做的准备工作只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运动极其有害、挫伤士气和混乱不堪的后果。

社会党的统一问题。我们第十次代表大会把社会党的统一问题提上了波兰社会主义的议事日程。代表大会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势头都视为革命时期的政治教育之一。

实际上，尽管分分合合、争论不断，在整个革命时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对社会主义形势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群众实际上是铁板一块；在所有重大策略问题上，他们实际上观点是保持一致的；在跌宕起伏的局势面前，社会主义的主力部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并号召统一行动。分歧只停留在运动的表面。尽管在很多方面确实存在分歧，但这无法证明，多个对立政党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在政治纲领方面，大家都承认，要把俄国的民主化和波兰的自治作为指导原则。意见的分歧只存在于自治的广度、波兰立法会相对于中央议会的权限等。有的人希望严格限制，有的人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些。在策略方面，大家都把在整个沙俄帝国中的革命统一原则作为行动指南，把组织起来成立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唯一斗争原则作为指导方针。

但是，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党的统一的思想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我们还未来得及通过统一组织的形式来巩固因革命而实现的事实上的统一局面；因为统一局面最终被反革命的氛围摧毁了。一方面，在革命**之后**成立的“革命派别”重新制定了分裂主义纲领和冒险策略。另一方面，针对社会党统一的思想，“社会民主党”强化了传统的宗派主义思想，主张一个政党要“小而纯洁”，而口头上的

革命主义又导致了新的分歧层出不穷。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这一态度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内部制造了一种新的风气，即在一个名为“工人团结”的专门机构中宣传统一思想。

在波兰，社会党统一的思想也得到了**崩得**各机关的支持。崩得在波兰也有多个团体，直接致力于实现团结事业。

对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同志也表示支持。在上次党代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党甚至还提出了请求中央委员会直接参与统一事业的议程。可惜的是，有人成功地使这个问题成为俄国各不同派别之间争论不休的主题，从而导致其被一个“先决问题”彻底否决。

所有这一切并未使我们放弃捍卫统一思想。我们坚信，当如今因反动派而陷于瘫痪的工人运动重新向前迈进之际，就是统一思想展现基本力量之时。因此，我们最近通过小册子专刊的形式，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在捍卫我们对于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所持的特别观点的同时，宣传我们关于统一问题的思想。

下面是波兰社会党党代会（1909 年 2 月召开）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对我们对于统一问题的看法进行了总结：

“沙俄帝国各民族工人阶级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在革命时期尤其明显。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的所有有识之士团结起来，组成唯一的一个工人政党。在专制制度的集权统治下，在沆瀣一气的资产阶级面前，即使存在种种地区差异，也应当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对于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对于政府的种种野蛮煽动，对于统治国家有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各被压迫国家资产阶级疯狂而招摇撞骗的民族主义思想，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斗争，争取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为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提供自治保障。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这一保障要求被笼统地提了出来。我们的纲领是符合本国国情的，是本国历史发展和工人阶级需要的具体表达。在纲领

中，这一保障要求采取的形式是争取波兰高度自治，设立立法会作为领导机关。

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要实现团结，就要具备一个条件，即在每个民族内部实现所有社会民主主义人士的统一。

在我国，唯有在纲领及策略的基本原则方面才能实现统一。在过去的革命时期，这些基本原则就已经成为整个觉悟了的无产阶级斗争真正和共同的基础。换言之，在纲领方面，就是要在俄国实现民主，在波兰实现自治。在策略方面，就是要把形式多样的群众斗争作为唯一有效的斗争方法，实现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

要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实现社会党的统一，最大的障碍来自广大工人群众的消极状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薄弱性。”

迫害。要全面描述波兰工人阶级——尤其是有组织的成员——在反革命年代所遭受的种种迫害，是绝对不可能的。被处决的人数高达600人。近4万人被流放，相当于全国工人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那么，波兰社会党本身所遭受的迫害达到了何种程度呢？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统计数字来作出判断：在参加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08年1月）的39名代表中，到年底前，其中有半数以上已被关押在狱中；有3名被绞死，1名被流放，2名流亡。仅仅因为是党员，我们的同志被战地法庭判处的最高刑期可长达15年苦役。

在极其野蛮的反革命报复的条件下，在每天都有新损失、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崩塌的情况下，波兰社会党的工作无法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在组织方面，我们首先把幸免于难的人们组织起来，找到能够使波兰社会党和工人群众保持联系的组织形式，拥有一些发挥影响的中心。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报章和政治上与日俱增的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作斗争，向群众说明当前发生的政治事件，向他们指明道路，以粉碎表面上无比强大的反革命力量。我们全力支持无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成立工会，支持通过系统的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在这一方面，这一切都是

以“合法”的形式进行的。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原因不言自明。最后，由于大批有组织的同志不得不越过边境线，波兰社会党专门建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移居国外人员组织，名为“波兰社会党国外分部”。

总之，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波兰社会党的工作主要是保持能够挽救的一切，并为开展新的斗争做准备。

与社会党国际局的关系。我们向社会党国际局派了代表（Z. 马雷克公民），与社会党国际局一直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在1909年6月，应俄国政府的要求，比利时政府逮捕了我们的同志米克拉舍夫斯基，并随时准备把他交给沙俄刽子手。在这里，我们谨向社会党国际局表示感谢，感谢它在这一事件中所做的积极努力。众所周知，这一首次在比利时境内逮捕政治侨民的企图以俄国大使馆的可耻失败而告终。比利时法院认为引渡请求毫无根据，否决了引渡的请求。

几个月以前，我们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了一个重大问题：

就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波兰社会党（革命派）采用了我党的名称“波兰社会党”作为其名称，然后使用了我们的档案材料。

对于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上述行为，我们的所有组织进行了多次抗议。同一名称的两个政党同时存在，而纲领和原则却各异，这造成了完全不正常的局面。为结束这一切，我们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了仲裁申请。

社会党国际局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申请，并和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进行了谈判。直到现在，谈判仍未促成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确定仲裁的具体日期。

文献：

《1908年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

《1908年波兰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俄文版。

《1909 年波兰社会党代表会议报告》。
《社会主义思想》杂志第 4—7 期；《工人》第 211—222 页。
《论社会党的统一》，小册子，1910 年。
波兰社会党新纲领《斗争》，维也纳，1908 年 8 月。
《俄属波兰战地法庭》，1909 年。

波兰社会党
工人中央委员会代表
F. 亚诺夫斯基
H. 瓦列茨基

俄属波兰工会委员会
关于俄属波兰工会运动的报告（1905—1907）

俄属波兰的工会组织是新近成立的。

工会组织的基础是在1905年年中的革命时期打下的。

革命前，政治组织领导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随1905年1月的政治总罢工而来的巨大的罢工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并清楚地表明了专门的行业工会组织的必要性。立即解除政治组织对经济运动的领导，把这一领导权转交给专门组织的任务提到了党的面前。

鉴于目前产生了新的必要性，波兰社会党理事会在1905年6月的会议中通过一项决议，要党员投身于创建职业工会中去。在波兰社会党看来，这些工会应以阶级斗争为基础，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时，它们应明确承认平行的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把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中的代表。这个“社会党”是复数形式的，由于波兰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波兰社会党拒绝把分裂带到经济领域，不接受工会集团加入某个党的思想，而宣布自觉的无产阶级不分党派团结一致的原则。

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工会——我们称为“自由工会”——立即吸引了各行业的广大工人；在胜利的十月总罢工——“立宪”时期的序幕——后，尤其如此。到1906年年中，工会有20个行业的40000名会员。我们自然不可能叙述工会运动的历史，尽管这样，我们要指出，在它成立10个月后，自由工会已打算进行反对罗兹的棉纺业巨头——他们宣布对他们雇有25000名工人的工厂实行同盟歇业——的斗争。由于

工会的行动，工人对雇主抵制了4个月。在同盟歇业期间，自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及“崩得”的工会之间有一个行动协议。

这样强大的工会组织的突然出现，令人回想起19世纪30年代时英国的类似现象；不幸的是，我们工会随反动派的重新得势而出现的衰退时期同样如此，这种衰退同那时英国工会的衰退一样迅速。

但是，在这期间，矗立在阶级斗争地基上的无产阶级经济组织的团结原则没有实现。以一种狭隘的和技术的方式对待经济和政治运动的统一的俄国波兰第二号社会主义派别：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于1905年11月决定，建立与自由工会不同的直接附属于其政治组织的行业工会。根据他们的统计，这一与自由工会竞争的组织有26000名会员。

自由工会公开按自己的目标行动，在活动的第一时期不进行任何登记，没有任何合法地位，这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总精神，并且在一开始没有任何不便之处。然而，1906年3月17日，政府颁布了《关于结社、联合的临时规定》，意在使行业联合的基点放在合法的基础之上。此外，当局对所有“秘密”组织日益加剧的迫害，以及反对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心脏内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倾向的必要性，对自由工会提出了合法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我们在简短的讨论后，决定工会合法化。

这一决定是在1907年4月出版的工会运动的机关报《工会会员》周报第一号的开篇文章中公布的。文章在解释了制订适应“1906年3月临时规定”的“正式规定”的必要性后写道：“我们很明白，这些规定会给工会组织的发展套上羁绊，规定对工会带来了许多困难和麻烦，只要俄国不存在法制，官僚的专横将对工人组织制造更多的麻烦。但在没有其他满足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的手段时，当被荒弃的田野覆盖着由工人阶级的敌人播种的莠草时，除了在这些临时的、有缺点的、不完善的、令人不舒服的规定内创建组织，以便扩大我们的力量，为争取更好

的立法而斗争外，别无他法……”

《工会会员》提出的思想在这时“非法”存在的工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受到讨论并获通过。不久以后，俄属波兰第一批建立在阶级斗争原则的基础上的登记的工会出现了。

社会民主党没有遵循这个榜样，它决定丝毫不改变附属它的、不得不进行秘密活动的工会组织的章程。

登过记的自由工会的章程标志着工会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在1907年年底时，15个自由工会拥有100个地方分会，会员共达45000名。

第一批登记的自由工会出现在1907年年中（食糖加工、制鞋及类似行业的工会，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的工会等），其他一些之前建立的工会（砖石工工会、粉刷工工会）拥护这些工会。但从同年起，当局开始对工会活动制造麻烦，此后只有两个工会得到登记。

我们的工会组织已经能够利用西欧工人阶级的经验。工会的组织基础是所有国家工会组织实行的**集中制**，工会不按特殊的职业，而是按**工业的大分支**（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等）组织，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工人**合并**在一个工会中，实行**代表制**及间接选举领导机关，活动集中于**经济斗争的要求**，因此，由于工会的发展，互助会组织暂时被搁在一边。

基础广泛本身未增加组织的困难，正如人们通过我们后面提供的图表可看到的，一开始会员人数众多。我们的工人阶级没有足够数量的人能有条不紊地领导如此大的集团，甚至在人们有时间确保工会正常发挥作用前，就要着手同时进行反对政府、教士、资本和由工人阶级的敌人建立的工会的斗争。

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只要政府与资本的联合不粗暴地扼杀我们的工会，它就能得到充分发展。

在过去三年中，俄属波兰行业工会的历史是他们的**烈士蒙难史**。迫害都针对自由工会；当**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团**（1909年10月）就

对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工会的迫害发出质询时，在杜马高耸的讲坛上利用的事实大部分与波兰工会有关。

这里只是简单地列举打击我们的工会会员的镇压措施：

三年以来，20 多个工会被当局暂停活动和解散；同一时期内，没有一个工会获得登记；在解散的工会中，冶金工人工会有 21 个地方支部，纺织工会有 12 个。没有一个自由工会逃脱搜查与逮捕。

在本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罗兹市的迫害十分突出：在 1907 年 11 月，30 名工会会员在纺织工会会所被捕，其中 11 名（几乎全是领导机关成员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被关了 9 个月后，通过“行政手段”，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8 年 3 月，新的领导机关成员也相继被捕，在关了数月后，也被投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

在卡缅斯克的林业工会的地方组织中，在 1908 年初有 237 名会员；同年底，只有 10 名还自由着。

搜查、逮捕一直持续到今天。在 1909 年夏，在华沙的砖石业的工厂中，工会委员会的 3 名成员被捕。同一时期，面包业“波兰人”工会（民族主义者）会所的 15 名会员被捕。在 1910 年 3 月，罗兹的“波兰人”工会——“团结”工会——被解散后，它在城里的几乎所有机关都遭到搜查。同年年初，在华沙的印刷工人工会会所，92 人被逮捕。

在食糖加工工人工会中，有数名会员（其中包括 4 名领导机关总书记）在 1908—1910 年先后被捕。

1910 年 5 月，在华沙的犹太面包工人罢工期间，几乎天天有罢工者被捕。

当局还迫害工会报刊。自由工会中央机关报《工会会员》被暂停；当它以新名称（已存在 12 个月了）出版时，当局逮捕流放了发行者，先后关押了 4 名编辑及编辑部、管理部的成员。另一些与特定的行业相关的工会机关报同样被一再暂停和罚款。

尽管从自由工会存在的第一天起，当局就对它的活动制造了障碍；尽管禁止工会代表进入工厂——这使工会无法积极干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冲突，自由工会仍然能迅速发展。它们没有屈服，在猛烈、残酷的镇压打击下只是更加坚强。下面的图表显示了自由工会在1907年年底时发展、在1908—1909年间逐渐衰退的状况。

自由工会	登记时间	领导机关所在地	支部数和会员数					
			1907年年底		1908年年底		1909年年底	
			支部	人数	支部	人数	支部	人数
中央工会：								
纺织工人工会	1907. 8. 7	罗兹	12	约20000	解散			
冶金工人工会	1907. 8. 4	华沙	22	16924	解散	3662	25	1360
食糖加工工人工会	1907. 5. 12	华沙	41	约3500	40	2141	解散	
矿工工会	1907. 12. 12	索斯诺维茨	—	—	7	422	11	500
林业工人工会	1907. 8. 11	华沙	10	约2000	11			
制鞋工人工会	1907. 7. 18	华沙	12	约950	解散	420	5	1000
泥瓦工人工会	1907. 8. 24	罗兹	1	约400	5	420	1	400
粉刷工人工会	1907. 8. 11	华沙	1	约400	1			
地方工会：								
缝纫工人工会	1907. 11. 10	罗兹	1	约300		100		62
缝纫工人工会		苏瓦基	1		解散			
泥瓦工人工会	1907. 9. 23	卢布林	1			214		
泥瓦工人工会	1907	拉多姆	1		解散			
制鞋工人工会	1907	苏瓦基	1		解散			
鞣革工人工会	1907	苏瓦基	1		解散			
鞣革工人工会	1907	拉多姆	1		解散			
建筑工人工会	1907	苏瓦基	1		解散			

1907 年出现的向当局登记过的自由工会取代了 1905—1906 年革命期间创立的“非法工会”。由于反革命的进攻，在革命和政治斗争领域里受到抑制的战斗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集中到了经济组织中。这是 1907 年工会运动迅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几个月内，整个国家洒满了工会小组的网，其数目达 100 个，**成员共 45000 名**。尽管如此，在政治领域的某种“和平”建立后，政府血腥镇压的目标指向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随之而来的程度不一的工业危机（从 1908 年以来直到今天），进一步恶化了工会的总状况。

雇主阶级不满足于把成千上万失业者抛上街头，他们还依赖警察机关和军队的支持，在工厂里恢复“旧统治”，以同盟歇业为要挟延长劳动时间，常把工资压低到低于革命前的水平。他们用大量名目繁多的津贴来报答政府的反革命对他们的帮助，因此从 1907 年起，罗兹的工厂主一年支付约 **100 万卢布**，以维持一支对付工人的特别警察部队。当局以给雇主充分的组织和联合自由作为报答。最近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工厂主同盟，它包括了波兰工业的各个部门。

在“非法”形式下把被当局解散的工会一直维持到出现更有利于它们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时的尝试，招来了工人群众日益加剧的冷漠。重新变成“非法”的旧冶金工人工会的华沙支部在 1909 年年中只有 512 名会员，纺织工人工会的华沙支部总共才有 107 个会员。此后，由于新的逮捕，这个数字进一步减少。

但是，免遭当局解散的登记过的自由工会能进行（甚至在衰退时期也能进行）活动，这留下了持久的痕迹。他们的存在本身阻止了雇主自由地对工人进行猛烈的压迫。例如，在食糖加工业，要不是存在一个集中制的、相当坚强的工会，工人就无法成功地捍卫大部分在革命时期中争取到的改善。1909 年，在罗兹以包工头的失败结束了一场持续了数月的斗争，林业工人在斗争中是由他们的自由工会领导的。当同一年夏

天，华沙建筑业的包工头在工厂主组织的支持下宣布总同盟歇业，要求用九小时工作日代替革命中获得的八小时工作日时，工人在砖石工自由工会的领导下接受了挑战。经过数月的抵制后，工人获得了广大公民的同情，迫使包工头接受由工人和工厂主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法庭的仲裁。这个在去年春天于华沙开庭的法庭，是我国**这类法庭中的第一个**；尽管它没导致任何实际结果——包工头拒绝在工厂主组织的压力下对工人作出让步，但它使工人在今后的斗争中拥有了一种新的、有力的道义武器。

自由工会通过总结经济方面的直接斗争的经验、建立图书馆、组织会议等，帮助他们的会员**提高知识水平**。

有些工会还对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职业中的现状进行了**调查**。食糖加工工人工会通过系统的调查，汇集了有关这一工业的**2 万名工人**劳动条件的详细资料；这一调查的结果即将出版，它是波兰无产阶级的这一部分的重要专题著作。

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像自由工会一样，也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它们尽管没达到自由工会的人数和影响，但是也有自己的充分发展时期。根据它们的资料，近 1908 年年底，它们拥有 15 个工会，35 个支部，会员达 26000 名，在 1907 年 2 月甚至达到 30000 名。在这些工会中，只有罗兹的纺织工人工会，华沙的食品加工工人及建筑工人工会在 1906 年和 1907 年年初的工会运动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同一类的其他工会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到 1907 年年底，附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几乎完全失去作用。根据社会民主党自己报告，12 个工会中交会费的会员此时仅有 3000 名，而这正是自由工会特别辉煌之时。在 1908—1909 年间，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再也没有存在的迹象。最后，在去年夏天，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它以前的策略，接受登记的、不附属于某个社会主义政党、精神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会的原则。显然，

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导致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工会一开始的要求，在自由工会中工作。不幸的是，这一策略转变选择的时机根本不能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新路线进行验证，因为当局有步骤地拒绝接受工会的登记。

在工会运动的“非法”时期，“崩得”建立了附属于其政治组织的犹太工人的工会组织。但与社会民主党不同，从登记和工会的合法活动成为可能时起，它就把这些组织转成与登记过的自由工会类似的组织。

有关工会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原则基础上，**反对由工人阶级的敌人（民族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建立的工会**，具体情况如下。

还在革命高潮时期——1906 年年中，“国家民主党”的代理人极力用创立仿效其他国家的“黄色”工会模式的“波兰人”工会，来分裂无产阶级的统一队伍。最初，这个运动的组织者自己傲慢和厚颜无耻地要求“黄色”这一名称。然而，它立即意识到，这样的“卖身”投靠的组织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于是，它们用虚伪和诡诈的策略代替厚颜无耻的策略，打算把各种人吸收到他们的组织中去。他们竭力用反犹和教权主义的宣传吸引一些人，在另一些人中则煽动民族主义感情和对外国的仇恨；最后，他们愚弄工人模糊的阶级本能，用笼统的语言来讲不公正和剥削。他们向恶贯满盈的整个上流社会保证，他们确实保护“爱国的”雇主；他们以交纳最少的会费，以不仅救济失业者，而且在生病死亡时给予津贴来引诱人们；他们甚至创立财产基金证券等等。此外，他们还廉价出售马铃薯和炭，并且讲要赎买工厂以帮助生产合作社。

这样的政策使不觉悟的无产者晕头转向。反革命的不断前进——它摧毁了阶级组织——经济危机以及工人群众的道德沦丧，都会给“波兰人”工会带来一定的力量。根据“波兰人”工会的机关报发表的统计数字，在去年初有 28 个“波兰人”工会，含 96 个地方支部，包括了 24 个职业。这份机关报供认，这个工会的三分之一处于“沉睡”状态，

实际上几乎全都生长不良、步履艰难。其中最重要的即罗兹的纺织工人工会——“团结”工会，根据它自己的统计，近1907年年底时有23000名会员，近1908年年底时有10000名会员，在1910年年初——在它被当局暂停时——只有约6000名会员。其他组织避而不公布有关它们的实际人数的详细报告，或是提供根本不符合实际人数的数字。从公布的报告中，似乎可以推断出，目前每个“波兰人”工会的成员不到1000名。所有工会中的交费会员的人数不足5000名。这个数字不值得考虑，鉴于工人群众的总的涣散状况，如果“波兰人”工会现在大体上还拥有同一性和对工人阶级运动的顽固敌对态度，那么它表明自己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那些完全不“沉睡”的“波兰人”工会会员描绘了在他们的领导机关和会员大会之间的内部斗争的情景，在斗争中用一种或多或少自觉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阶级本能。例如：在栋布罗瓦流域的冶金工人工会已经正式不承认“波兰人”工会的机关报《工人生活》。在老的排字工人的“波兰人”工会（7个支部，800会员）中，在大量有觉悟的工人参加后，其（最重要的）华沙支部拥有一个完全反对民族主义的多数派，这个工会的机关报《排字通讯》也根据他们的精神编写。

在这些工会旁边，成立了**基督教徒**的组织，目的同样是使工人摆脱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些组织是**专为此事**从国外而来的传教士、神职人员积极协助建立的。[①] 实际上，**基督教工人协会**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有几千名会员，大部分是老年工人和女工。可以说，这不是职业组织，而是

① 在1906年初，波兰总督的官方喉舌《华沙日报》发表了下列告示：“在过去两个月中，俄国驻外领事签署了40多本俄属波兰的天主教传教神甫的护照，即4名圣贝尔纳教士、2名谴使会会士、1名最小兄弟会修士、1名嘉布谴会修士、12名赎世主修会会士、5名方济各会修士、4名共济会修士及12名其他教派的传教士。”

宗教协会，或带有慈善性的互助会，由作为雇主的神甫来领导。它办了一些“人民之家”，在那里组织各种节日活动等。为了使工人离开那些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事情，“基督教徒”一开始便帮助建立浸透着小店主思想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建立时未经任何认真的商业考虑，现在一个个接连破产。目前，在“基督教徒”的组织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毋宁说带有地方的面貌，另一种更接近西方“基督教民主党”的组织。但一涉及诽谤和谴责社会主义者时，它们就统一起来了。

亚美尼亚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楚纯）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概　况

在土耳其亚洲地区的亚美尼亚建立了国际的一个支部。

该支部作为亚美尼亚名为“达什纳克楚纯”[①]（联合会）的党而为人所知；它外高加索地区的代表作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下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在提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简要报告[②]中，已经介绍了这个已有20年历史的组织的基本情况，如今它的委员会以其巨大的网络覆盖了我们国土的所有三个部分——土耳其亚美尼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波斯亚美尼亚。

我们在下面介绍一下自1907年以来党的活动，特别是土耳其的形势和工作。

---

① 也被称为“德罗沙克”，因其18年前在日内瓦出版的中央机关报《德罗沙克》（《旗帜报》的中文音译——编者注）而得名。

② 即《俄国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的报告》，见本书第23卷第385—390页。——编者注

波斯和高加索地区

近三年来，党在革命斗争的气氛中活动和成长。

在土耳其，它努力支持青年土耳其党与马其顿的革命者20年来独自进行的反对哈米德专制政权的斗争。

在波斯地区，它是制宪运动的先驱；在革命斗争的中心和根据地阿塞拜疆省，我们的党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它与著名的领袖萨塔尔汗并肩战斗并在斗争之初向他提供了建议、物资援助和英勇的士兵。

当前和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革命军领袖我们的同志叶夫列姆穿越无数边远省份，英勇抗击反对新政权的波斯保皇党，赢得全国的尊敬。

我们的许多同志牺牲在波斯的战场上。这是两个民族团结的颂歌，是从前互不往来甚至敌对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民和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民的革命谅解的颂歌。

当今波斯的两大力量的谅解取得了巨大成就，恶毒的暴君穆罕默德·阿里沙阿被推翻，逃亡俄国避难。经过漫长曲折的斗争，尽管沙皇政府的反对——它撕毁与英国签署的协约并全力阻挠年轻的制宪运动，但是革命还是胜利了。当然反对我们的活动至今并未停止。

我们党是哥萨克政府的主要对手：从德黑兰、梯弗里斯[①]到圣彼得堡的所有反动势力，从臭名昭著的利亚科夫到圣彼得堡皇宫的奸党，都反对“达什纳克楚纯”，将其视为东方、波斯、土耳其、高加索制宪斗争的首领……1908年帝国杜马提出关于高加索事件著名的质问时，我们党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当时，高加索政府的发言人诺尔德男爵在右派

① 即第比利斯。——编者注

反动势力的疯狂掌声中公开声称，人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危险的“达什纳克楚纯”。

在波斯革命爆发前夕，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令人羡慕地团结在自由教义的周围，共同反对专制主义，而在边界另一侧的沙皇帝国，不同种族之间互相厮杀，在巴库、舒莎、纳希切万、埃里温和其他地方的大街上尸体横行，火光冲天，整个俄国波斯笼罩在恐怖中。

如果鞑靼互为对手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如同波斯地区这两个人民那样团结，革命洪流在高加索地区肯定会成为主要力量，现在政府已将这个地区视为俄国革命最危险的根据地。

使我们和整个高加索人民不幸的是鞑靼群众被不谨慎和错误的“思想”引导，迅速地被反革命事业拉拢过去①，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阴险恶毒的专制主义者使用各种阴谋伎俩，致使形势发生“逆转”并导演编排了这场自我欣赏的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虽然“达什纳克楚纯”面临着鞑靼暴徒和反革命政府的这两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但经过18个月的浴血奋战，它以超人的力量最终击退了鞑靼保皇党。

今天这个噩梦逐渐消失，狂热的激情开始淡化，两派群众重新开始缔结原有的睦邻友好关系。

然而，反动势力已经得逞并且在那里肆无忌惮地活动。如同芬兰、波兰和其他地区一样，它们开始在高加索采取报复行动，追杀革命力量，全面禁止社会主义和革命文学，一切再次进入地下状态。

---

① 这里指俄罗斯官僚精心组织的针对被他们划为“危险人士”的亚美尼亚人的著名的鞑靼大屠杀，整个事件虽然只持续短短18个月（1905—1906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家毁人亡。

高加索的反动势力以百倍的凶狠对付“危险的国际联合会——达什纳克楚纯”。成千上万被怀疑参加我们组织的知识分子——作家、教师、医生等社会精英——被投入监狱。近两年来，他们用前政权发明的酷刑折磨他们，试图把他们斩尽杀绝。

新切尔卡斯克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审判。

社会党和高加索的民主势力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危机。俄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联合起来与反动政权，与更具危险性、蛊惑社会广泛群众阶层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行动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内部缺乏凝聚力、围绕教条无休止的争论引发的内耗对俄国革命事业有害无益。

为此，在最近于1909年在瓦尔纳举行的“达什纳克楚纯”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社会主义和革命组织团结起来。十分幸运的是欧洲社会主义同志此时也发出同样的要求，我们希望上述政党经过长期的内部争斗后，能够携起手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沙皇专制。

请允许我们在此强调一下在最近一次全体代表大会[①]上我们就在俄国必须遵循的策略表达的几点意见。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我们的同志强调了可能对我们的运动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些事实。

首先是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深刻对立。

其次是**社会主义或经济方面的考虑**对其策略的影响再次压倒了**政治革命的考虑**（这一事实部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情况）。

“达什纳克楚纯”全体代表大会声明：（1）尽管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还不足以推翻专制政权的

---

① 出席瓦尔纳代表大会的有土耳其、高加索、波斯和我们欧洲及美洲殖民地的代表。

暴力机器；（2）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即为了对抗反动派的刺刀，**准备进行革命或军事斗争**。

群众——至少部分群众——必须被武装起来：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并接受军事训练，这既是为了进攻，也是为了防御。

这是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经验。[①] 这个最需要关注的一点，我们的俄国兄弟党在运动初期制订的纲领中没有及时地予以重视。俄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消极抵抗策略（局部罢工或总罢工），可能在组织和纪律方面能够取得可贵的效果，但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只能取得短暂的胜利。

在以好战精神和尚武习俗著称的高加索这个“革命之家”，“经济解决方式”的无能为力表现得更加明显。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多年来培训的古里亚的无产者和农民革命军，面对反动派的进攻不作任何抵抗就束手就擒，致使阿利克哈诺夫将军[②]率领的部队烧杀掠夺，革命者陈尸遍野。

这是我们最近一次大会的意见和结论，是我们在土耳其、外高加索和波斯三个战场长期斗争的经验总结。

正是“达什纳克楚纯”和我们完全能使用武器的群众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武装抵抗，击退和抑制了1905—1907年间沙皇发起的令人恐怖的反革命行动。也正是通过武装斗争，波斯和土耳其才从亚洲专制政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可能还要多说一句，即在俄国进行类似的反对强大野蛮的专制政权

---

① 当然，在革命者和政府军之间有过交火，但都是短暂和零星的，不是大规模的。

② 格鲁吉亚的“穆拉维约夫”（沙俄国务活动家，在担任维尔纳总督期间残酷镇压波兰起义。——编者注），1907年被“达什纳克楚纯”的敢死队队员刺杀。

的斗争时，不能忽视团结所有反对这个政权的力量。我们正是广泛团结了形形色色的力量，才成功准备和完成了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在这场斗争中，是“达什纳克楚纯”即社会主义政党向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国际所致力的目标的青年土耳其党和波斯的组织伸出团结之手。马其顿的斯拉夫党也与青年土耳其党进行了合作。从梯弗里斯和巴库出发抵达波斯的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为萨塔尔汗击垮穆罕默德·阿里沙阿也作出了贡献。

由于俄国没有民主的、革命的党，社会主义组织还要承担这样的党的部分工作。我们不能为保持自己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而放弃在拒绝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群中开展宣传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人决定着我们革命的成功与否，如部队的军官。在这一点上，土耳其革命的教训同样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工人群众与资本家和经济剥削者进行的斗争中，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在坚持自己的理论见解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进行**政治斗争**，争取基本自由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也是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决定。

土耳其1908年7月革命的起源

我们党在这个正在进行变革和革新的地方开展了丰富的活动。20年来，我们在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和耶尔德兹宫的山脚下为争取自由进行了斗争，为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首都的崛起作出了诸多贡献。在宪法颁布后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君士坦丁堡、士麦那[①]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在公共广场上欢呼雀跃，所有的民族——基督徒、穆斯林——都

① 即伊兹密尔。——编者注

在战争进行曲中以兄弟相待，这证明了上述事实。

从1895年开始，我们致力于使热衷于“合法演变”的青年土耳其党转向革命和颠覆的信仰。为此，我们每年都与单打独干的斗士和青年土耳其小组举行会谈，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1902年在巴黎举行了反对党（基督徒、穆斯林）的代表大会，与会的有三个举足轻重的组织：统一进步协会（也被称为梅希弗勒特[①]派）、萨巴赫丁亲王的组织和“达什纳克楚纯”。

几天的会议之后，代表们没有达成任何实际结果，分道扬镳。一个原则问题导致大家无法达成共识。后两个组织坚持主张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而第一个由现任奥斯曼国会议长艾哈迈德·里扎领导的组织是颠覆手段的坚决反对者，坚持“演变论”。为恢复1876年奥斯曼宪法，该组织再次向欧洲舆论发出呼吁。

在此次聚集反对力量的首次重要尝试之后，土耳其帝国发生了重大事件。内陆省份穆斯林群众的思维方式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阿卜杜尔·哈米德的腐败体制，税收政策，苛捐杂税，官僚的胡作非为，所有这些最终使穆斯林群众义愤填膺。

1906年，人们可以看到这些长期被专制统治和狂热的教士（众所周知，这些教士通过伊斯兰教教法与世俗的专制政权勾结在一起）摧残、精神完全萎靡不振的群众开始躁动起来。

四处响起造反的呼声。埃尔祖鲁姆省第一个揭竿而起。骚乱在土耳其群众中爆发。民众纷纷聚集到公共广场，反对征收新的杂税；他们冲锋占领了凡城总督的府邸，处死了他和另外一些官员。在这些独立的事件发生伊始，我们在埃尔祖鲁姆省一直与穆斯林群众领袖保持联系的同志就已经准备与他们联合。但他们为了避免给耶尔德兹宫的暴君提供

① 统一进步协会的机关报《协商报》的音译。——编者注

“亚美尼亚密谋”的借口，决定单独举事。

其他起义事件也在帝国边远的地区发生。比特利斯、迪亚巴克尔、卡斯塔莫努人民纷纷起来造反。部分起义被扑灭，起义领袖被关押或流放。

这是世俗奴隶的首次反抗行动。它也给“神学家们”敲响了警钟。穆斯林政党领袖受到很大的触动。最坚决的演变论者的立场也转变了。反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武装革命成为人们的口号。

“达什纳克楚纯”利用部分穆斯林群众的觉醒，推动土耳其青年组织起来。我们的同志与这些青年中有觉悟的分子建立了联系。在我们的努力下，土耳其委员会于1906年在凡城和其他省宣告成立。它采纳了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政治和经济行动纲领。凡城的土耳其青年创办了介绍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机关周报《沙巴早报》。关于帝国未来的组织形式，他们和我们的同志一致同意实施**权力下放**和各民族自治的原则。

两个组织——亚美尼亚人组织和土耳其人组织——开展了丰富和形式多样的活动。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散发传单，要求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专制政权。他们散发从国外运来的译成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的地下革命刊物。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共同通过自己的言行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社会寄生虫——放高利贷者、大地主以及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使奴役和盘剥自己的农奴的库尔德和土耳其奴隶主。我们组织机动敢死队[①]，跟踪库尔德强盗这些贫困地区的祸害，夺回他们抢走的牲口并还给当地农民。他们的真诚和勇敢迅速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

① 一开始就做好牺牲准备的人。

两个组织如同一家人，他们不仅开展反对政府的宣传，而且付诸政治行动。他们处死了众多政府派来的间谍和压迫者。他们还宣布判处杀人不眨眼的凡城总督阿里·贝死刑。当他想避开敢死队逃往高加索时，我们的敢死队员执行了凡城委员会的判决，于1907年在巴统将其击毙。

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人的联合行动在安纳托利亚的其他中心地区组织了起来。所到之处，只要可能，我们的同志就深入到穆斯林群众中招募同盟军，开展播种工作，同时夺取武器，武装我们的青年，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

在国外

安纳托利亚的这种有力的播种工作促使在国外建立的奥斯曼国外委员会思考。统一进步协会最终认识到救国应该是帝国所有革命力量的协调行动。

该协会的知识分子领袖决定抛弃前嫌，亲自到日内瓦与“达什纳克楚纯”进行谈判。这是最终达成一致的先兆。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在这种“内部”的压力下，很快主动接近了。

土耳其人要求我们向他们传授革命行动的方法，这是我们18年来实施的唯一有效方法，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反对我们的是哈米德专制政权的强大武装、极具攻击性的狂热的穆斯林暴徒和欧洲各国当局的默契。

1908年1月，在我们党的倡议下，第二次奥斯曼帝国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时间的推移和发生的事件使大会完成了上次大会未尽的工作。会上一致同意宣布采取暴力革命的原则和推翻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

各派达成的这种一致具有重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共同行动应该在

更广泛和更坚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我们应该在指定的时间内在安纳托利亚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土耳其人则应该把土耳其欧洲部分（马其顿）的力量组织起来。

这个庞大的计划可惜未能全部实现。在我们的两个大的活动中心凡城和士麦那，我们的计划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1908 年 5 月在土耳其革命爆发前夕，由于一起叛变，政府在凡城收缴了我们 1000 支枪械、100 万发子弹和大量炸药。在听到这一噩耗之前，我们在士麦那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在君士坦丁堡准备实施的一次刺杀苏丹的行动[①]失败后，当局进行了大审判。审判从“达什纳克楚纯”开始，我们在士麦那进行的计划的文件和材料被收缴。哈米德政府在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了我们准备用来炸毁政府大楼的炸药库。

巴黎代表大会之后，事件迅速接二连三地发生。“欧洲病夫”突然成了资本主义大国关注的真正焦点。马其顿问题在欧洲大国领导人于雷瓦尔会晤之后出现逆转。哥尔查科夫[②]提出的“自治或安纳托利亚化”的陈旧原则被重新拾起，自信的青年土耳其党立场出现变化。受到革命影响的马其顿军队决定“进军”并向耶尔德兹发出最后通牒。后续的情况众人皆知。

新土耳其

阿卜杜尔·哈米德被废黜。土耳其仿效西方建立了议会制度。奥斯曼的议会制度自然有许多差强人意之处。土耳其人在国会占据统治地

① “达什纳克楚纯”制造的大炸弹在被装车运往耶尔德兹的途中发生爆炸（1905 年 6 月 8 日），炸死了 40 多人（警察、官员等），但未实现真正的目标。

② 沙俄外交家，1856—1882 年任外交大臣。——编者注

位，可以说这是一个专制委员会，是继地狱般的哈米德政权后又一个疯狂制度，尽管过去血流成河、暗无天日的地区吹过了一阵自由清风。但从改革角度看，这届政府目前没有什么大作为。法律只承认非土耳其民族为“宗教团体”。

持狭隘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应在奥斯曼帝国建立第二个奥地利）的新政府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表现得傲慢和强硬。由不公正的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其议员绝大部分是大地主和富有的神职人员，他们在各项决议上打上了他们阶级特有的印记。统一进步党领导委员会对社会要求很少关注，纲领中对此几未提及。

这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体制的强硬做法在国会一次著名的关于结社自由的辩论中表现得非常露骨。我们的欧洲同志肯定不会忘记，宪法颁布后社会问题立即成为头条新闻。在前体制下受到压制的阶级对立突然再度被唤醒，当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工业区响起“自由”这个咒语时，罢工就如失控的风暴一样全面席卷而来。工人群众，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无论是制造厂工人、烟草厂工人还是造纸厂工人，无论是矿井的无产者、铁路职工、无轨电车工人、码头工人还是印刷工人，尽管他们大部分都还没有组织起来，但都停工要求改善自己的状况。这些罢工使土耳其青年党的领导大吃一惊，他们在 20 年来辗转欧洲各地，居然没有学到先进国家的经验，始终无视甚至逃避新国际[①]所致力的运动。

作为无产阶级力量的这种突然爆发的后果，许多中心城市，特别是奥斯曼光荣的革命摇篮萨洛尼卡（我们的斯拉夫同志多年以来在这里传播社会主义和国际团结的思想）成立了行业工会组织。

立宪政府很快对这个“新潮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结社问题交

① 指第二国际。——编者注

国会决定，法里德帕沙部长在唯唯诺诺而又对这一问题知之甚少的多数派的支持下，禁止成立工会和其他经济组织。罢工自由同时也受到限制。

不幸的是，只有我们的3位同志在国会谴责了这些严厉的规定（国会中共有6名社会主义议员，全都不是穆斯林；1名是保加利亚人，5名是亚美尼亚人。后5人中有4名是我们组织成员，1名属于社会民主党[①]）。

绝大多数穆斯林议员，其所属各党目前差异不大。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国会几乎没有资产阶级，更谈不上资产阶级**民主**。

在立宪之初，有一个名叫“阿哈里舍”的自由党，它由各民族的代表组成并有一个令人喜欢的纲领。这个党希望把所有视权力下放的组织为土耳其救国之道的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在这样的组织中，习俗、语言、历史和文化程度迥异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广泛自治。

令人遗憾的是，该党的几位不知廉耻的党员与耶尔德兹宫的刽子手有联系，并且其参与1909年的政变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因此它名声扫地，很快就消失了。

土地问题

由于土耳其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热点问题，它不仅在当前形势下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引人注目，因此制宪政府对它持保守态度。现代工业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已经有些发展，而安纳托利亚在极大程度上仍是农业地区。那里的经济生活相当落后，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劳动工具异常

① 我们党在波斯议会中同样有代表。

原始，许多地方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这个地区的整体情况相当糟糕。哈米德政权不但没有促进当地生产力的解放，反而通过实施掠夺、抢劫、屠杀、人为制造饥荒以及强制迁移的政策破坏和阻止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在该地区占据多数（95%）的亚美尼亚人祖祖辈辈从事农业，是这个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受到盘剥和掠夺，在经济上陷于瘫痪，大大拖累了安纳托利亚的繁荣。

土地问题因民族问题而变得更为复杂。1895—1896 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后，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移民国外（主要是外高加索和美国），库尔德封建主在哈米德政府的同意下将移民的土地占为己有。今天在自由的土耳其，那些强占者不愿意将土地归还从前的主人；重返家园的亚美尼亚农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我们为此向立宪政府提出的抗议直到现在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自称为“自由”和“平等”奋斗的青年土耳其党不愿意为此触动依然强大，并且被土耳其政客视为抵挡“亚美尼亚主义推进”的最佳缓冲力量的库尔德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在 20 年来发表的明确的声明中都坚决反对所有的分裂主义思想，但土耳其现在的领导人在对待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上不愿意完全放弃哈米德政权的旧政策。

不过，我们希望情况的发展和我们的努力最终将克服阻碍土地问题解决的所有困难。如今在穆斯林民众中已经出现了反对库尔德“贵族”的运动。根据我们从凡城和穆什得到的最新消息，这两个省的库尔德农民群众都表现出对他们的世俗头领的强烈不满。这部分直到现在被当做牲口对待、遭受中世纪农奴般折磨的群众开始以争取到的政治自由为旗帜进行反抗，他们的要求最终肯定会实现。受一小撮封建主和寄生虫剥削和压迫的库尔德、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已经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在埃尔祖鲁姆省已经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宣传

长期以来，民族问题是土耳其国内政治的主要问题，这使得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宣传异常困难。土耳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落后状况也是一大障碍。在未来几十年后，我国的情况将会因铁路铺设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而发生显著变化。但是目前总体文化水平很低，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积怨和敌对也不容忽视。

不过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中，我们现在是用语言和行动高举和支持劳动和国际社会主义旗帜的军团。在安纳托利亚，社会主义思想和对我们的最高和最低纲领的宣传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知识分子圈子，正在走入群众。在没有文化、经济落后而食利阶级——贵族地主、神职人员、官僚、放高利贷者等——通过贪婪剥削和压迫致富的地方，开展反对贫困的伟大斗争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土地社会化——我们最低纲领的柱石，在那些还残存原始共产主义的痕迹的地方（土耳其亚美尼亚）具有较为有利的基础。

我们在最近三年间出版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民主组织问题的小册子。

我们在土耳其和波斯享有相当广泛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使开展宣传大为方便。

在国会有关工会问题的辩论中，我们希望深入讨论的同志甚至发了言。他们在发言中第一次谈到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为劳动者的事业进行了有力辩护。他们在目瞪口呆的议员们和保守的政府面前赞扬无产阶级和工会，法里德帕沙部长代表政府宣称："我们国家不需要这些东西……"

群众并不买这个土耳其部长的账。在萨洛尼卡举行的抗议对工会的

镇压的大型集会就是证明。工会和工人组织将继续在地下进行活动和壮大。

最近还有一份土耳其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团结》在君士坦丁堡问世。

当前的工人运动主要在土耳其欧洲部分展开，随着经济发展，它将会扩大至整个土耳其，我们亚美尼亚、土耳其和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者迟早将会像我们奥地利同志那样成立小**奥斯曼国际**。

组织与活动

“达什纳克楚纯”因此是一支团结而又谨慎的队伍，它在土耳其、波斯和俄国这三个比邻的国家持续开展斗争，成为这三个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重视的力量。

为保障制宪政府的存在、国家的正常发展和反对土耳其旧专制政权卷土重来[①]，我们党去年与“统一进步党”奥斯曼委员会去年缔结了防御联盟。

在俄国亚美尼亚，绝大部分工人群众在斯托雷平反动势力进攻前站在“达什纳克楚纯”一边。可以说，我们党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这个成为各种黑暗和强暴势力的猎物的民族的命运。

我们党在群众中获得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影响，使我们在最黑暗的1903—1907年能够取得与强大敌人斗争的胜利，使人民重新获得了在普列韦当政期间全部被取缔的文化机构和设施——学校、资助学校的教会产业、出版社、慈善机构。

---

① 反革命在苏丹帝国新的反攻回潮不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列强正在梦想酝酿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土耳其亚美尼亚，也存在同样性质的群众组织。在比特利斯和凡城这两个亚美尼亚最大的省，所有组成政治小组的能够作战的农民在1908年前都受我们领导（这些小组至今还在，只是人数减少了）。

这些小组肩负着防御和进攻的工作。在每个村子里，我们都会选举5—8名经验最丰富、最勇敢而又信得过的人——一般在45—50岁之间，让他们承担最重要的指挥工作。这些小组是**机动队**，负责向敢死队提供和运输各种物资，在他们被追捕的情况下掩护他们逃跑，解救被库尔德匪徒威胁的邻村群众。

除了这种机动队，每个村庄还有其他活动小组：

1. 由30—50人组成的**战斗小组**，他们受命始终留在村里，在村子受到攻击时进行防御。

2. **辅助小组**或称“**财政小组**”，受命寻找必要的物资。

3. **军事小组**，负责弄到武器。

4. **妇女小组**，负责传递信件和各个据点之间的联络。

在广阔的穆什平原（大约100个村庄），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在萨松、瓦斯普拉康和其他地区亦如此。

一直到1908年，我们党的活动都在地下和夜晚进行，因为同志们白天不敢出门。运输武器、宣传活动、武装群众、射击习都在夜晚开展。

这些活动主要是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

这些活动如今仍在进行，但已经以公开的方式。在所有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居住的中心和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党都建有机动队，机动队的目的是警惕反动势力抬头。在执行这个艰巨和必要的任务时，这些机动队是“统一进步党”委员会的同盟军。

在反革命暴乱的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我们党在埃尔祖鲁姆、穆什、比特利斯和凡城的委员会为恢复在耶尔德兹宫反动势力的鼓动和指挥下被君士坦丁堡的士兵粗暴地破坏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刚刚在埃尔祖鲁姆附近遇害的托普齐安同志，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就在这座城市宣传立宪思想以及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的兄弟情谊。

甚至在阿达纳——在那里疯狂的暴徒在垂死挣扎的政府的煽动下再次对我们发动攻击，我们的同志组织了抵抗这些被反动派武装和支持的暴徒的斗争。在头一些天，我们成功击退了这些暴徒的进攻。如果政府派出的军队没有背叛和平使者的使命，不向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民众开枪，我们的伤亡将会更低些（500 名美尼亚人和 500 名穆斯林遇难）。

我们在土耳其城市和省区的组织目前划分如下：

1. 政治或战斗小组；
2. 农民联合会；
3. 职业工会；
4. 合作社（消费合作社）；
5. 知识分子联合会。

知识分子联合会负责口头和文字宣传工作。他们出版报刊，创办阅览室和图书馆并组织集会，土耳其青年党的民主人士经常参与这些工作。棘手的**种族问题**一直是众多集会的议题之一。面对持续的反革命危险，同志们不停地呼吁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所有真正的宪政制度的支持者的和解。

但社会问题也绝没有受到忽视。“达什纳克楚纯”坚信，社会和土地改革、改善广大穆斯林民众的命运是赢得这些对宪政一无所知的群众和粉碎反动派阴谋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在我们的出版物和我们举行的大会上不断阐明这个观点。

在农民协会、合作社和工会联合会，我们的宣传员努力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动员他们做好未来斗争的准备，教导他们不要只顾及眼下利益和满足日常需要，要看到和理解解放斗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

在 1908 年的首次立法议会选举中，“达什纳克楚纯”的竞选纲领提

出了以下经济方面的要求：

1. 将所有皇室领地社会化；

2. 彻底改革税收制度，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

3. 由国家出资的自然灾害保险；

4. **规范工作时间：**

确定工厂和作坊工人的工作时间；取缔妇女和儿童夜间工作；禁止15岁以下儿童工作；15—18岁的青少年的工作时间限为6小时；由国家和雇主出资给工人上事故、养老和失业保险。

这也许不是欧洲国家那样的纲领，不是庞大的社会改革计划，但它是黑暗的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尝试。

报刊和书籍

“达什纳克楚纯”出版如下报刊：

1.《旗帜》，月刊，党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在日内瓦出版。

2.《解放斗争》，在君士坦丁堡每天发行的大报。

3.《前进》，每周两期，在土耳其埃尔祖鲁姆出版。

4.《黎明》，每周两期，在波斯特布里兹出版。

5.《祖国》，周刊，在美国波士顿出版。

在最近三年间，我们的印刷厂印制了许多书籍和小册子。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1. V. 阿拉拉茨基：《俄国政党》。

2. V. 阿拉拉茨基：《社会主义者信札》。

3. 阿贝格：《民主选举制度》。

4. 阿克努尼：《论斗争》。

5. 安德拉尼克：《军事教育》。

6. 杜曼：《自卫组织》。
7. 杜南特：《瑞士的人民立法》。
8. L. 席施科：《土地纲领与科学社会主义》。
9. L. 席施科：《最低纲领》。
10. 让·饶勒斯：《资产阶级财产和未来对之的剥夺》（演讲摘录）。
11. 卡·考茨基：《俄国民族问题》。
12. 卡亚克：《联邦》。
13. 斐·拉萨尔：《宪法的本质》。
14. 尼古拉耶夫：《合作》。
15. 沙哈图恩：《联邦主义和民主主义》。
16. 塔杰沃斯：《大革命》。
17. V. 切尔诺夫：《阶级斗争理论》（俄文翻译本）。
18. V. 切尔诺夫：《无产者与农业工人》。
19. 托普齐安：《工会》。
20. 埃·王德威尔得：《比利时工人阶级状况》。
21. 瓦伦迪安：《民族的重生，我们的作用和责任》。
22. 瓦伦迪安：《人民军队》。
23. 瓦伦迪安：《鞑靼保皇党》。
24. M. 扬尼斯：《达什纳克楚纯（纲领和策略）》。
25. M. 扬尼斯：《从现代世界观看斯宾塞主义》。
26. 扎克：《土地与资本主义》。
27. 扎瓦里安：《权力下放》。

所有书籍都涉及我们的纲领和策略问题。

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正在君士坦丁堡和日内瓦出版。

M. 瓦伦迪安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
向1910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各国同志们：

由于我们在财政方面的困难，不能直接派代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所以，我们只好向你们提交从革命的角度出发的有关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下述报告。我们感到很遗憾，路途和花费的原因使我们还不能直接派代表出席任何国际代表大会。那些为了私自的腰包而分裂这个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寄生虫和投机分子应对目前这种状况负主要责任。这种状况以后将会改善。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和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它由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同盟——建立，是同盟的继续。十年前，我们党在第一次联邦选举中踏上了政治舞台，在新南威尔士州提出全数候选人参加参议员的选举（整个新南威尔士州是一个选区，实行成人选举权）。我们连续四次参加了的参议员的竞选，因为这些选举提供了衡量该州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信念的最好尺度。选票在变化，在最近一次选举（今年4月13日举行）中，我们的候选人所获得的最高票数是13601张，最低票数是8432张。我们一致推举了3名候选人，我们认为，我们获得的最低票数大致是该州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的选票，我们的纲领只有一条：社会革命。在选举中我们将努力团结工人的政治力量以达到一个最高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毫不妥协的。我们仅仅是从那些完全地、

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原则和同意我们的理论的人们中争取选票。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最低选票便是体现。在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联邦里，其他州都没有提名任何社会党候选人。

我们的组织仅仅是由工人阶级的分子组成，尽管我们的原则显然并不排他。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小资产阶级的“工人”党和各种离奇古怪的假社会主义组织吸引着更为激进和多愁善感的拓荒者派别。尽管我们的党员为数尚少，到目前为止也仅是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个州里组织起来，但是，我们的党员却是积极活跃和矢志不渝的。我们党的机关刊物《人民》完全归党所有，由党控制，每周出版。

与美国、大不列颠和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我们党也主张基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序言的革命产业工会主义，并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澳大利亚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不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发生联系。世界产业工人澳大利亚俱乐部进行了出色的宣传工作，这些俱乐部成功地使联合会序言和革命产业工会主义原则在澳大利亚广为人知，在各行业工人中间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在与日俱增。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但是，我们通过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只能由为了革命目标而在工厂中有意识和机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实现，他们拥有的经济力量能投票支持实行集体所有制和管理生活资料。

直至三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作为澳大利亚无可争辩的、一致公认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坚守着阵地。但在三年前，一个名为澳大拉西亚[①]社会主义同盟的新组织成立了。这个由两三个乌托邦主义者和伤感主义者的分散组织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在两三个利用他们来达到自

①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般指大洋洲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编者注

己个人的物质目的的颇有影响的演说家和作家的控制之下。成立这个势必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敌对的组织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原则、理论和策略被一致公认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而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幕后操纵者只是想靠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人去夺取多年持之以恒的鼓动工作的成果。现在这些工人发觉，这些无耻的老手及其蒙骗者向工人们的头脑中灌输了新的混乱不清的东西。这样的描述并不过分，下面这段所谓的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关于政治行动的正式决议（1909 年 7 月）的引文将向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证明这一点：

> “出于政治或市政方面的立场，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任何盟员只能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行动，给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投票或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除非在选举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为此而召开的特别大会提出另外的建议**。”

于是，这个党的幕后操纵者便可随意利用这个决议来支持非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支持反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对于这样一个“党”的主张还有评论的必要吗？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将记得，维克多·克勒默先生代表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出席了上次国际代表大会。这位绅士的诸多怪癖，包括他在大会发言时所作的种种唯心的预言，简直是对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讽刺。据说，今年汤·曼和 H. 博拉两位先生将代表该组织出席国际代表大会。这两个人都不能宣称自己代表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或者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不居住在这里，他们目前可能还不是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而是他们居住国的其他组织的成员。这两个人倒的确非常适合代表这个名声败坏的、荒诞的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但是，我们抗议他们在任何意义上自诩为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

能否承认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这样大杂烩直接派出的代表，对国际代表大会来说是一个问题。

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一再谴责和反对“总罢工”的狂热，特别是那些无组织的工人们的“总罢工”狂热。然而，去年年底，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执行委员会却号召该州工人阶级“以暴制暴”，并宣布“总罢工”。此时，宣布这项极为愚蠢的政策的发言人十分清楚，如果它被付诸行动，那么只能导致响应总罢工的工人们遭受资本家的血腥屠杀。事实上，一些误入歧途的狂热者响应“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号召，在各地进行了孤立无援的发动。由于这种完全徒劳无功、为害匪浅却直接有利于当局的示威游行，他们现在被捕入狱了。但是，这项政策的主要鼓动者、联盟执行委员 H. E. 霍兰先生却躲开由他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当他的追随者在大路上反抗警察、遭到逮捕并受到惩处时，他却在人行道上或路旁漫步。国际代表大会怎么能允许这种组织的代表出席大会呢？那些应由“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策略来负责的行动玷污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狂热地宣传总罢工，对于如此重大的行动却不作组织和准备，表明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同盟，代表大会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组织是不合适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了解澳大利亚的情况，以上我们只是叙述了真实的情况，它们应该已经足够供我们的国际同志参考。汤·曼和 H. 博拉这两位先生作为代表出席你们的大会，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老奸巨猾之徒能在大会上宣称他们联盟的国际地位，从而阻碍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长。国际代表大会将肯定不容许别人利用它作为圈套而损害社会主义的事业。

至于澳大利亚总的情况，尽管工业发展的规模相对较小，但是，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尽管人们一味企望并竭力宣扬“工业和平”，但是，阶级斗争仍激烈地表现出来。尽管这块广袤的大陆面积近 3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不到 450 万，即每平方公里不到 2 人的密度，或者说大约为欧洲人口的六十分之一。尽管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

是，逐利机制的经济作用与别处却无两样。托拉斯和康采恩也以与人口相适应的规模发展起来。工资在降低，而生活费用却在上涨。在澳大利亚各地建立的诸如“强制仲裁”、“工资委员会”之类的灵丹妙药，正如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预言的那样，已被证明是毫无用处和十分荒谬的。由于所谓的“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和行业工会同盟宣扬这些有害的方式，工会主义的生气被削弱，以致今天的工会乖乖地屈服于当局对罢工领袖的镇压，甚至把一些替当局制订反对罢工和罢工者的法律开辟了道路并且把实际上应对此负主要责任的“工人政治家”选入领导机构。工会通过签署单独的协议与雇主勾结起来，从而阻碍了联合行动。罢工也通常只是偶尔发生，由反对“资本主义工人代理人”的普通工人发起；当罢工爆发时，工会官僚也总是抢先出卖这些人，然后平息罢工。在新南威尔士州，罢工是犯法的。在最近的煤矿工人罢工期间，议会在几小时内匆忙通过了一项补充刑罚条例，即众所周知的“强制条例”，它跟俄国和爱尔兰的80年代的法律别无二致。一些罢工领袖被捕入狱，更多的则被罚以重金。工业法也被认为是对资本家实行“同盟歇业”的处罚，但实际上这个法律并没有被执行，当局也不打算使它行之有效。还没有一个资本家因此锒铛入狱，只有一个资本家被处以罚金——一笔极为轻微的罚金。各种阴谋炮制的法律在这里被肆意歪曲，被解释为适用于罢工的组织者，被捕的罢工者被戴上镣铐，仿佛他们是残暴的亡命之徒。警察可以进入工会的会议室，搜走工会的文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澳大利亚民主的名义而进行的，我们其他国家的同志可以依靠的民主在这里完全是幻想和欺骗。

幼稚单纯的工会及其混杂的政治代言人——澳大利亚工党——应对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这种不幸状况负主要责任。澳大利亚行业工会与不列颠的工会同属一类，而与欧洲各国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会主义却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酷似在一些国家专门组织起来的阻碍社会主

义发展的天主教工会。劳资之间的兄弟关系，阶级之间利益的一致，承认剥削的权利并附带“公平”工资的要求以及改善工作条件的微小让步，这些便是那些驯服的雇佣奴隶组织的信条和纲领。在不得不进入政治领域之后，这些奴隶般的组织便很容易为资产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所俘虏，眼前的这个工党便是他们的战利品。这个由政治懦夫和趋炎附势之徒组成的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那些不以社会革命为目的的工人运动的命运。20 年来，分散地组织在行业工会但尚未在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广大澳大利亚工人，通过工党来努力实现政治上的联合。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在今年 4 月 13 日的联邦选举中，工党在议会两院以压倒的多数再次成为执政党。这个党主张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改良主义纲领，而强制仲裁必定包含了反对罢工者的立法，否则，强制也就失败了。

价值 5000 英镑以下的土地免征税的提案完全是根据少数资本家农场主的利益制订的。这些资本家农场主对他们的雇工总是百般虐待、残酷盘剥。

征兵在这里被说成义务军事训练。工党十分可耻地在这块大陆开始推行义务兵役制；通过对被麻醉、被欺骗的工人们施加的政治影响，工党在这里犯下了这个社会公罪。

这些“工人”领袖们不顾其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言论上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与资产阶级新闻界沆瀣一气，装作实行“权宜之计”的社会主义政党来竭力保持对工人的控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不懈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觉悟，迫使这个工党宣布了一个冒牌的国有化政策——国家资本主义，然而他们却力图劝工人们相信这是社会主义！工人们对诸如铁路、邮政等国家垄断的亲身体验，足以表明这个医治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是徒劳无益的。但与此同时，一些见识较少的工人却被这个诱饵所惑而投票赞成他们的目的。下面的

事实充分证明了工党的虚伪：他们宣布当工业被垄断时它们将（在严格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变成国有；而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却呼吁采取立法与行政手段避免工业变成托拉斯！

所谓澳大利亚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说法，日后将被证实纯属欺人之谈。实际上，它比其他资本主义政党更加反动。与工党或多或少暗中有联系的澳大利亚天主教的主要机关刊物《天主教新闻》在评论工党时写道：

> “它是真正堪称保守党的唯一政党，它可以独自对革命力量设置无形的障碍。”

这个所谓的工党的政策其实是企图减缓资本主义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便继续控制工人，并培养和维护作为反对社会革命的资本支柱的少数财富占有者和剥削者。这种政策当然是毫无希望的政策，为工人们接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观点开辟道路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注定这一政策必然失败。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提请大会注意，正如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工业社会改革试验遭到的极为愚蠢和可耻的失败所证明的那样，改良主义是无用的。我们认为，议会“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危险表明需要国内的和国际上的革命产业工会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剥夺剥夺者的组织，需要作为革命的武器帮助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行动，而不是用来改良或者管理资本主义的政治行动。我们也极力主张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重要性。我们反对所谓的爱国者；我们声明，在世界各地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们。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会，一些欧洲社会党领袖的爱国言论在澳大利亚已被工党征兵法案的支持者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过去德国党的某些选举、倍倍尔的某些言论、布拉奇福德的反德著作、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对全民武装和国民军队

的辩护、饶勒斯等人在法国散布的民族主义言论，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运动身上生长起来的怪异的赘瘤，在这里被利用来欺骗、蒙蔽工人阶级，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剥削者利益的栓下鸟、弹中靶。我们要求大会发表一个反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强有力的声明。我们真诚地支持，并且只要有机会就会效仿我们尊敬的古斯塔夫·爱尔威同志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伴所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伟大运动。他们宣传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法国。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工作和思想将再次激励这里的革命运动。我们也希望看到国际代表大会本着摧毁资本主义的法律、秩序和财富所赖以依存的物质力量的目的，采取这种积极、进步的政策，并在同时为了在最近的将来进行有效的革命行动建立工人阶级的经济联合。

向革命工人致以问候。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总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西悉尼乔治街 16 号

总书记：**J. O. 莫罗尼**

1910 年 6 月 17 日

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报告

（1907—1910 年）

1907 年以前，主要从事宣传活动的一些彼此分离的组织代表了澳大利亚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组织大多数在政治上忠于工党，只有一两个是独立的。在这些早期组织中，最为著名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同盟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一些小规模的组织仍分散在各州，如果说它们在感情上还一致的话，那么，在行动计划上仍是分散独立的，因此，它们越来越感到彼此之间应该联合起来。于是，1907 年 6 月，相隔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现存七个组织的代表们来到墨尔本，举行了澳大利亚首次州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汤姆·曼、M. E. 霍兰、亨·海·泰平和 H. 斯科特·贝内特便是其中的代表。

这次代表会议以联合大会著称。广义上，它包括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联合，另一种是非工党和反工党政策的联合。所有的组织都要求联合，一些则要求在与既定的工党政策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实行联合。会议通过了名为《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时候到来了》的决议。为了容许新西兰的组织参加，会议选定组织的名称为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会议的其他决议还解决了与社会党国际局的联系问题。无论如何，下面这个决议说明了形势的关键，即："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既不能作为澳大利亚工党的候选人，也不能作为其他任何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候选人为了谋取议会或是市政机构的职位而去捞取选票"。这个决议得到贯彻执行，并使

得这次大会作为重要的开端而值得纪念。

代表们向各自的组织作了汇报，不久我们得知，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不参加联盟。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的组织认为不应该与工党断绝关系。统一的组织不复存在。剩下的维多利亚社会党、悉尼国际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和布罗肯希尔的巴里尔社会主义者小组三个组织组成了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在1908年6月在悉尼召开的首次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上，南澳大利亚社会党加入了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新西兰社会党也决定加入该联盟。在1909年布罗肯希尔大会和1910年墨尔本大会时，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由四个澳大利亚的组织和新西兰社会党组成。目前澳大利亚的盟员大约有1000人。

事实愈来愈证明，现在大大膨胀起来的工党并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党，在工人们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工党的不满。由于人们对工党政策的抵触，没有加入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其他组织的人数将肯定会慢慢增加起来。

澳大利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工党的原因由来已久。让我们先作一简要的回顾，然后再说明目前的形势。

工党既没有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宣传社会主义。它不像世界上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它没有开创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出版社会主义的书籍，没有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不是国际主义的党，不是反军国主义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打着新的招牌，在政策和实践上行自由主义之实，在言论和思想上搞资产阶级的一套。在澳大利亚，未来的冲突将是工党政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

在联合大会与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第一次年度大会期间，悉尼分支组织在议会选举中推举出一名社会主义者与包括工党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竞争。他就是霍兰。在总共4822张选票当中他获得了746张。直到这时，联盟的其他分支组织还与工党保持和善的关系。然而现在，对

立是不可避免的了。悉尼大会因此作出决定，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不能同时参加工党。在以后的几周里，维多利亚州进行了选举，该州的分支组织提出了两个候选人，两个都丧失了他们的保证金，总数为100英镑。在维多利亚，议员候选人在按照法律参加竞选之前必须交付50英镑的保证金。如果他得不到当选的候选人所得票数的五分之一，那么他便丧失保证金。在某些州则不需要保证金。联邦选举的保证金为25英镑。悉尼分支组织在最近的联邦选举中提出了一个候选人，他的保证金也丧失了。在维多利亚州的选举中，该州分支组织的领导机构主张在缺乏社会主义候选人的情况下投工党候选人的票。这在各阶层中引起了一场风波。

随后召开的代表大会决定，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盟员只能投票给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盟员们当中于是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这个问题也在上个月的代表大会上受到了激烈的讨论。在各成员组织中，现在仍争论不休，因为上个月的大会重申了以前的立场。

这便是我们行动的策略路线。

我们在这份报告后面附上经过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修改过的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原则和政策》以及《组织和章程》。应该指出，大多数工会与工党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也不要求其盟员是非工会分子，因此，它坚持一个工会成员不必是政党成员的原则。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关于选举的争论，如果不能说仅仅是因为的话，那么，主要也是因为缺乏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引起的。

另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是产业工会主义问题。起初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赞同产业工人联合会（美国）章程的序言，但它于1909年决定仅支持产业工会主义，而避开这一序言以及争论。无论在讲坛还是讲台外，无论在工会内还是在工会外，它都热情地宣传这个思想。

事实上，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工作的最出色部分在于它对工业

纠纷的参与。毫不夸张地说，它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强大起来了。在最近三年的大风暴中，它走在最前列。这场风暴包括了悉尼电车工人罢工（这些电车为政府所有）、布罗肯希尔矿工歇业和纽卡斯尔煤矿工人罢工。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盟员参与了悉尼电车工人罢工的领导；汤姆·曼是布罗肯希尔矿工的组织者；H. E. 霍兰在同一事件中因勇敢的言行被控以煽动叛乱之罪，被关进监狱。其他受审和被宣告无罪的人也是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五个月以后，霍兰被释放（原被判为二年），他迅速投入到著名的纽卡斯尔大罢工之中。这次大罢工的发展令人震惊，州政府颁布了阻止罢工、逮捕罢工者的法令——《补充条款》，某些工党党员竭尽其能破坏罢工，迫使矿工投降就范。煤矿雇工联盟的主席彼得·鲍林以及其他人因这次罢工仍被羁押在狱中。

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以前强烈地反对臭名昭著的罢工立法，作为强制仲裁的必然结果，它把工人阶级“反叛”和“停工”的鼓动定为“罢工”。现在，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也非常坚决地支持释放罢工者的运动。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者研究一下过去三年澳大利亚的工业风暴及其与“劳工立法”的密切关系，或许会大有裨益。来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曾过高地、但片面地赞美这个“劳工立法”。

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自成立以来已经出版发行了由自己的作者撰写的六种小册子。在澳大利亚，它的报纸有：《社会主义者》（墨尔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者》（悉尼）。在新西兰，它的报纸是《公益》。

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走在反对失业的最前列，它支持社会主义主日学校运动，它是一个反对在澳大利亚甚为盛行的军国主义的组织，它对于强制仲裁和工资委员会必然毫不留情，它至今一直摈弃折中调和的纲领，它进行反对在州立学校中讲授《圣经》的鼓动，它也反对那些禁止星期日在联邦的一些州里散发宣传材料以及举行社会主义者集会的立法。它的一些盟员因为坚持言论自由和散发宣传材料而被捕入狱。

它的历次大会都发表了有关当时国际问题的声明，并对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失职行为提出抗议。

最后，我们想表达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对《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的赞赏，它在这个遥远的国度是一份十分必要的出版物。我们相信，这份《公报》将是促进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有力武器。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够，世界各国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来自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的建议。我们希望下次国际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举行，这样，来自欧洲的演说家将作为宣传家来到这个“落后国家”。

澳大拉西亚社会主义同盟
全国执行委员会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敬礼：

社会主义工人党给出席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全世界的同志们的报告，在回顾了这个国家的形势后，用下述语言总结了这种形势的诸方面：

> “长期愚弄我国人民的所谓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最美好、最稳定的幻想正在破灭。关于建立在劳资友好关系基础上的纯粹的、朴素的工联主义之功效的幻想，以及关于纯粹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即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经济组织的力量而孤军奋战的社会主义）的幻想，二者都从人们的思想中消失了。”①

在这份提交给今年聚会于哥本哈根的同志们的报告中，社会主义工人党感到，不必再提三年前有关这块国土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美好、最稳定的梦想的论述。那时之前在这方面出现的发展不管多么显著，同在这短短三年中出现的有关其他梦想的发展相比，就相形见绌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相信，对外国同志理解美国的事态趋势所能提供的最好帮助，无非是充分显示引起纯粹的社会主义梦想在人们头脑中消失的种种事实，并由此阐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本报告将仅限于此方面，鉴于社会党通过其1909年8月寄自芝加哥的一封信，要求在国际局中占据

---

① 见本书第23卷第44页。——编者注

美国的席位并排斥社会主义工人党，本报告就更该如此了。

美国正经历着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时代。应当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道德力量正在瓦解。在欧洲，人们到处看到政府和其他统治集团中道德沦丧的丑行。在美国，这种现象每天都发生。这个国家的一些最高层的金融和商业机构干着欺骗政府的勾当，另一些机构则干着欺骗消费者的勾当；统治阶级的一些知名人士丑闻缠身，以自杀来摆脱耻辱的重负者不乏其人；“高贵的”政府官员正被揭露为受贿者、挪用公款者和或大或小的罪犯；所谓的资产阶级道德守护神的“家庭”，每天都在用往往不能公之于众的离婚案件来揭去罩在其身上的帷幕；生活各个场合中的背信弃义行为每天都被揭发出来；意味着更刻薄行为的“聪明”猖獗一时。

在上层的标准如此的地方，下层的标准不会更好。丑恶的例子到处泛滥。不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无知和一种与这种无知相称的举动成了工人大众的特征。在过去两年中陆续发表于斯图加特《冶金工人报》、由这份大胆的报纸的特约通讯员“查格林”① 所写的一系列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精彩的信所描绘的情景没有任何夸张。工人阶级自身极度无知，缺少团结，他们的组织中没有阶级觉悟，他们中间弥漫着空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雇主的控制，腐败堕落侵蚀着他们的躯体——所有这些都是上层阶级道德标准的一个反映；它们在“查格林”的信中，被以一个亲身经历的观察家的准确描述而忠实地再现出来。

社会主义工人党用一种毫不妥协、始终如一和坚持不懈的鼓动、教育和组织政策来把握由这一事态所产生的问题。这一政策被坚定地推行着，而不管它离开流行而吸引人的错误有多远，不管它在簇拥于这种错

① 原文为“Chagrin”，意即悔恨、懊恼；此处是按读音译出。——译者注

误周围的物质利益中引起多大的敌意。从众多事例中举出一个将阐明这一点。

在美国民众的头脑中，几乎没有哪种迷信比对反移民的迷信更吸引人；而这对无产阶级运动来说，也是最使人麻木的迷信。这是种富有迷惑力的迷信，它用那种高于所有外在民族的优越感迷住了全体人，甚至移民。它通过向他们提供似乎解释了他们处境恶化的原因的理论，以及阻止这种恶化的似乎有理的办法，迷住了无产阶级；它迷住了资本家阶级，因为反移民法的呼声向无产阶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移民给劳动力市场每带来一个过剩劳动力，生产不断改进的工厂的私人所有制就给这个市场带来十个过剩劳动力，这种效果是其他方式所做不到的。而且，反移民的呼声因另一个更势不可挡的理由迷住了资本家阶级，这个理由特别适用于美国。

在英国、德国、法国，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一个直接或间接暗示种族分歧的问题会导致国家分裂。在那些国家里几乎都没有移民，民族的主体可以说是同一的，实质上也如此。在美国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里所有民族，几乎所有的种族都大量而不是少量地存在着。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引人注意，那就是使现在这块国土上的每一个民族的那种潜在的、长期培养出来并且吸引人的那种自认为比其他所有种族优越的迷信会立即开始震动人心的问题。移民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依靠这样一个原则，即本土的人口优于外国人，前往这个国家的移民就无法受到控制。这是个上帝的选民的神话，一个在每个民族的摇篮边上哼唱的神话，一种存在于所有民族的肌体中的毒素——这个神话会开始在耳朵边嗡嗡作响，这种毒素会立即在目前存在此地的一切民族的血管里活跃起来。这个神话首先会在全体美国人的耳边嗡嗡作响，这种毒素会在全体美国人的血管中表现自己；优于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法则，神话马上会在每个单独的民族的个人耳边嗡嗡作响，毒素马上会在每个单独的民

族的个人血管里流动。最后的结果是把这个国家分裂为组成它的各个民族和种族，分裂为无法融合的民众。显而易见，反移民法破坏了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同样显而易见，反移民法鼓动是所有论点中最中资本家下怀的。

社会主义工人党不顾反移民的论点在各地受到欢迎，采取并坚持一种反对它的坚定立场。就像对待这个问题一样，对于所有其他根植于迷信、逐利的问题——“契约”、“课税”、“成员限制”、“昂贵的入会费”等等，社会主义工人党坚持认为，根除这些东西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块土地上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就选票的检验而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并不成功。相反，它最近的总统选举得票从 1904 年的 34000 票跌至 14000 票，大大低于四年前的总统选举得票；尽管在去年的选举中它的选票在某些地区又增加了，但在另一些地区减少了。使它的选举地位未变。

那么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错了，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人们应该抛弃它？

如果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事实都支持这个结论，那么社会主义工人党会以它至今为止在高举自己的旗帜时所有的那种克己的态度，将这种政策收起来，放在一旁，采取一种更充满前途的方针。但是，过去三年的事件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们贡献了珍贵的材料。

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是其对手社会党的政策。就在这个向美国移民的问题上，正如上两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所记录的那样，社会党反对移民自由的态度同工会的绝大多数对这个问题的错误态度是一致的。在移民问题上如此，在其他关键问题上也如此。社会党是这样对比自己的政策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是“不宽容的”，而社会党的政策是宽容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是“狭隘的”，社会党的政策是豁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是“与

工会敌对的”，社会党的政策“获得了它们的同情”；总之，社会主义工人党使自己“孤立于”无产阶级，而社会党“吸引他们”。社会党的理论听起来似乎有道理。至少它值得考查一下。不过，考查推翻了这个理论。

一开始——在1900年到1904年之间，社会党的选票似乎给社会党开拓了一条正确道路这一信念提供了一个口实。在这块国土上它的选票上升到40多万张。因为本报告的目的是向国外的同志们传递一幅有关美国情况的可信的画面，在这里有理由引用恩格斯就喧闹而虚假的美国选举说过的话。这是恩格斯在一艘将1893年苏黎士国际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载到乌弗瑙岛去的蒸汽轮上同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我们不引用恩格斯的原话，以免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评论成了徒然地激怒我们的社会党对手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仅仅说，熟悉美国事务的人根本不会严肃对待这种“大选”。自那以来，一年年再三选举的结果一直在提供更确切的消息。从纽约市的大工业中心开始，社会党的选票在这块国土的几乎所有工业中心都暴跌了下去，在1908年的总统选举中更加如此。但是这些具体数字所带来的重要的社会学教训被总得票数（大约12000张，主要来自无足轻重的农村选票）所掩盖了。去年的选举撕去了这一掩盖物。其在社会学及数学上的教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总票数在全部工业州和这块国土的中心地区都严重下降了。下降的幅度可从如下情况中看出：在1908年的国会选举中，在纽约第九选区，社会党整整丢失了1000票，掉到12年前仅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家所得票数的一半以下。在纽约第十六选区也如此。该区总票数为2300多张，1898年在社会党诞生前，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得票约为1000张。自社会党诞生以来，两党的候选人合在一起在此选区仅获得从前得票数的三分之一不到。一个更有意义的事例是社会党在纽约市的选票。这里，在这个本国主要工业中心纽约本市，在这个除了一份犹太语日报和

一份英文日报外社会党还拥有一份德文报纸《纽约人民报》（约一代人之久了）的地方，社会党在1904年创造了16472票的最高得票记录后，得票逐渐下降，直到去年跌至6811票。在纽约本市，去年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票数合在一起为7624张——或者说，比社会主义工人党11年前单独得到的票少2469张，那时它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除在细节上不同外，纽约本市所发生的一切在这块国土的其他工业中心也发生了。社会党没有得到美国无产阶级的支持。社会民主党于去年4月在密尔沃基市选举中赢得的大胜利也根本起不了作用。促使在密尔沃基出现突变的条件纯粹是地方性的、倏忽即逝的，完全是由于资本家的政治分裂，社会民主党在该市的地方选举中的立场可以从选举后此党的维克多·路·伯杰先生发表的声明来判断："在社会党执政时，甚至金融利益也不用有任何恐惧；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待遇"。今年举行的其他所有春季选举，从芝加哥选举到其他城市的选举，都证实了社会党的选票在减退的定律。

尽管选举数字可能看起来是决定性的，但它们像所有数字那样经常会导致不同的结论。不过，有一件事是不容怀疑或讨论的，即在最了解社会党的形势，又肯定不会胡说八道的人中，有长期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A. M. 西蒙斯先生。仅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西蒙先生是其委员之一）公开（在该委员会向国际局申请美国在国际局的两个席位的信中）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既无支持者又无影响"，并声称只有社会党单独拥有这些美德的三个月之后——仅仅在三个月之后，就是这个西蒙斯——仍然担任他的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去年11月19日写给威·英格利希·沃林的信中（发表在今年1月号的社会党机关刊物、芝加哥《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用这些话私下概括了他自己的党——社会党——的地位："社会党已成为美国真正的雇佣工人的嘘声对象和笑柄。它成了一个两种极端

分子的党。一方面是一群知识分子，像我本人及斯帕戈、汉特和希尔奎特；另一方面是一群‘从不劳动者’、煽动家和未来的知识分子，一种名副其实的‘流氓无产阶级’。真正的雇佣工人——确实进行阶级斗争的人——在外面。”这个意见由另一个社会党党员自己在基尔·哈第最近访问美国期间向他所说的一个尖刻的事实所证实。基尔·哈第在去年4号月的伦敦《社会主义评论》中引用了这一事实，即在过去的10年中，在这个城市存在的工会会员中，没有一个人加入社会党。

换句话说，根据西蒙斯先生的由选举结果所证实的证词，以及根据由西蒙斯先生大加解释的选举结果的证词，社会党的政党在过去10年中所遭遇到的，它的理论也会遭遇到。由社会党的错误造成的反响和对龚帕斯工会主义的迷信没有导致无知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反而导致他们认为社会党是龚帕斯工会主义的；它没导致龚帕斯的工会会员在选举日走向社会党一边，反而导致龚帕斯的工会会员期待看到社会党在选举日走向他们一边，与他们一起支持他们的某些资本家，或他们的独立“工党”的候选人；但在看到社会党未如所愿并且竟在选举中反对他们时，龚帕斯工会会员向社会党发出鄙视之语，认为它抛弃了他们，尽管没有找到它的岔子，他们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鉴于所有这些事实——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不妥协政策看来没有在选票上得到体现的事实，以及社会党的妥协政策同样使自己“被孤立”的事实，是否现在的事实所导致的结论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陷于绝境呢？根本不是。人们必须考虑第三个事实。这第三个事实是一种可能其他国家从未见过的形势。

当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这块国土上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时，这个党拥有83000票以上的选票。对资产阶级报刊来说，提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字完全是件稀罕的事情；而如果一旦提及这个党时，不带敌意的更是罕见。当社会党确立了它的不同纲领时，资产阶级报刊突然改变

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继续遭到忽视，或被敌对的语言所攻击；相反，社会党成为一个流行词。它不断地被人讨论。日报、杂志载有对它捧场的文章；其领导人的照片受到刊登；对社会党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至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某一铁路线刊登了一条大幅海报，宣布搞特价以诱惑公众去听社会党的演讲。这些文章不单是些“新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报导强调社会党是“工会之友”，而社会主义工人党被愤怒地斥为“工会的破坏者”。在社会党及其报刊与资产阶级的报刊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它们都表示反对一切工会主义，这种反对直接指向了全国市民同盟当做自己的宠物所庇护的工会主义体系；社会党被资本家的出版物纽约的《华尔街日报》坦率地称赞为“美国资本的屏障”，而被柏林的《前进报》在一年前（1909 年 8 月 8 日）公正地称为“枯木”（迪累斯·霍尔茨）。无需争辩就能证实，在这块国土的条件下，替社会党所作的这种显著的宣传必然会产生什么影响。

社会党与龚帕斯工会主义的紧密联系是由社会党自己表现出来的：如以移民问题为例，它接受龚帕斯工会主义观点——而不提及其他观点——的做法并没有受到质疑。社会党在社会主义的色彩下持有这种观点，这使龚帕斯工会主义分子确信其观点是合法的、健康的。总之，资产阶级报刊替社会党所做的大量广告加深了阶级意识麻木的群众的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党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立场是反社会主义的。人们已经指出了所有这一切的一个主要影响：无产阶级变得固执于自己的错误，他们或者通过像羊群那样跟着反移民的雇主走向投票箱，或者通过像在加利福尼亚那样，建立反移民的或是有资产阶级气味的“工人党”，在政治领域里按照这些错误来行动，而且在所有场合，都谴责社会党不同他们在一起。另一个主要影响只可能使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作更加艰难。在过去 10 年里，社会主义工人党冒着一场真正的暴风雨——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报刊替社会党宣传时掀起的风雨

声——而努力前进。

这一显而易见的形势乍看起来似乎证实而不是消除了这样的担心：社会主义运动已陷入**绝境**。如果深入地思考事实，人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资产阶级报刊将不得不采取些新花招，老的花招不能重复了。如果没有一个扛着社会主义色彩的旗帜并且在此同时只是因为模仿无产阶级的错误而受他们尊重的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组织，资产阶级的花招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西蒙斯先生亲自承认自己的党“已成为美国真正的雇佣工人的嘘声对象和笑柄”，再加上重要的选举结果，这一切都确切地证明，一个拥有这样的品质的党不再存在了。而且，人们也许不用抛弃这样的期望，即社会党已在 10 年的经历中了解了自己的策略的后果，它会抛弃这些策略，从而结束这一不管起初用意多好、实际上只引起美国的运动停滞不前的分裂。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没有吸收社会主义工人党失去的选票。结果告诉人们，许多人离开了这两个党——有些人是迷惑不解、有些人垂头丧气，人们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那时冲突的尘埃将已散尽，局势将豁然开朗。

由在社会上建立在 16 世纪似乎已支离破碎的秩序这一崇高理想所推动，又担心在那时普遍的社会堕落中严格遵循道德标准会被孤立，因而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耶稣会在诞生时使自己适应人民的放荡的标准。类似的担心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着社会党的政策。社会党担心严格恪守社会主义原则会孤立自己，从而不能组织群众争取社会主义，便使自己适应流行的低标准。耶稣会的政策遭到破产；它的不道德的标准不仅没唤起大众，反而害得他们更加堕落，它自己也瘫痪了。人们一定不要抛弃这样的期望，即社会党将会避免重蹈覆辙，及时使自己摆脱最初的轨道。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相信，社会党出现了好转。社会主义工人党据此信念行动。这个信念来自于社会党在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上的态度。直到那时，社会党在工会主义使命上的态度是“纯粹”政治性的，在移民问题上是反动的。社会党关于工会主义使命的观点可以从工会在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概括出来。社会党在那个决议中宣布，工会的活动——这类组织的活动是以**“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友爱关系”**理论为标志的——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崇高战斗”，社会党一贯按工会是渔猎选票的水池这样一个唯一的原则行动，从不遵循工会主义的革命使命的原则。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社会党支持了大会通过的有关工会问题的决议[①]，该决议明确地提出了在实行革命行动中工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至于移民问题，社会党在斯图加特重新提出了它在阿姆斯特丹草拟并遭到否决的实质上反对移民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再次遭否决。社会党通过它在国际局的代表莫里斯·希尔奎特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保证遵守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移民问题的决议[②]，尽管他承认这个决议不符合他的观点。根据这两个理由，社会主义工人党相信，社会党在斯图加特的改变方向会在美国得到贯彻。因此，在1908年1月举行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后的首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社会主义工人党向社会党建议，以国际代表大会的原则——少数民族代表权、自由移民、承认工会在实施革命行动方面的基本职能——为基础无条件地合并。**社会党拒绝了这一主动要求**。

上面概括的历史事件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坚信自己的职责——在上述环境下坚守无所畏惧地坚守阵地。它因自己报刊——英语的《人民报》和《人民周刊》，还有以其他几种语言（德语、瑞典语、犹太语、拉脱维亚语、匈牙利语、南斯拉夫语）出版的刊物——发行量的增加而受到

① 见本书第22卷第177—178页。——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22卷第187—188页。——编者注

鼓舞，因对自己的鼓动出版物的需求显著增加而受到激励，因自己在全国的党员人数的增加和他们的热情而感到振奋。社会主义工人党确信，正是由于普遍的道德沦丧，妥协只会促使精神和道德的力量下降，而恪守最明智的情感、原则和正直标准有助于引回使道德和精神高涨的潮流。社会主义工人党注意到在美国的运动的现阶段上，衡量社会主义组织力量的唯一标准是它所从事的基本工作的巩固；它自觉地以形势所要求的深思熟虑开展这一工作，并尽忠于国际的运动；它沉着、自信地工作着，等待着。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

丹尼尔·德莱昂

受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之命

保尔·奥古斯丁 全国书记

1910 年 5 月 9 日于纽约

美国社会党向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政治运动

对于美国社会党人来说，自上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以来的三年是同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利局面进行艰苦斗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党经受了许多的挫折和失望，但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和成就；总之，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社会党朝着进步的方向迈出了显著的一步。

1908年的政治竞选运动

我们曾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报告说，美国社会党在1906年的国会选举中，得票从408230票（1904年投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票数）减少到330158票。

1907年秋季的地方选举得票也没有显示出比上一数字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

然而，这一小小的挫折并没有使美国社会党人丧失信心。他们在1908年的总统选举中以比以往更大的精力投身到竞选运动中。同年5月10日，社会党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来源是已经登记的交纳党费的党员。每2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基于此，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为219人。大会开了8天，再次提名尤金·维·

德布兹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本杰明·汉福德为副总统候选人，并为参加即将到来的竞选运动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当时的政治形势对社会党最为不利。1904 年的总统选举是保守主义的天下，社会党实际上是激进主义的唯一拥护者。然而，社会党不仅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合法力量，而且从老党派阵营中那些感到不满的激进分子身上获得了许多选票。与此相反，在 1908 年的选举中，所有的政党相互竞争，他们均发表激进主义的声明。共和党人发誓要继续贯彻罗斯福总统的“激进政策”，包括“惩罚富有的作恶者”的计划、限制托拉斯和大公司、扩大雇主们在联邦政府管辖区域内的义务以及其他几项受到欢迎的改革措施。民主党由于在前次选举中因其保守的候选人和政纲而失败惨重，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次，它重新提出了其早期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所宣扬的一切口号，并恢复了激进主义的宣扬者威廉·J. 布赖恩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民主党的“激进主义”远远不及赫斯特先生所领导的独立党的激进主义，后者的激进主义又逊色于人民党的激进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选票从一开始就局限于社会党人本身。

但是，其他政党的激进主义在选举中并不是妨碍社会党获得成功的唯一因素。社会党的大部分选票一直来源于工人阶级。当时处于最严重的工业萧条导致大批工人为寻找工作而迁移，这使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并失去了参加投票的资格。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员所进行的支持民主党的直接和公开的签名活动以及他们呼吁有组织的工人积极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这对社会党的竞选运动必然是不利的。

社会党人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时候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努力去克服这些困难。社会党的竞选运动从 5 月 17 日党代会闭幕起，直到 11 月 8 日选举日止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知疲倦的社会党宣传

人员在全国差不多所有城镇中的成千上万的会议厅里和街头巷尾向投票人演说，并大量散发社会党的宣传品。仅社会党全国总部就印发了300百多万份竞选传单。社会党在各州和地方的组织散发了至少4倍于上述数字的传单。

“红色专列”

竞选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尤金·维·德布兹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巡回演讲。为了使社会党能说善辩的候选人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讲，党的书记J. 马伦·巴恩斯先生拟出包租一辆特别“竞选列车”的计划。这辆列车由三节车厢组成，一节车厢供德布兹先生及他的同事、演讲人、记者和企业经理生活起居用，一节车厢装运竞选的宣传品，一节车厢为那些自愿伴随德布兹先生一行去铁路沿线各个地方的人使用。德布兹先生及其一行将乘这辆列车从国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天在较小的地方停一下以便从车尾向汇集起来的人们进行演讲，并在听众中散发社会党的宣传品。列车每天晚上在沿线的某个重要的地方停车，在那里大型集会已事先安排好。列车在夜间继续行走，以便第二天一早就能到达目的地。这项计划看起来似乎不错，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一大笔资金，而社会党的经费业已告罄。

但是，这一障碍并没有阻挡住不屈不挠的社会党人。党的官员凭借着社会党人永不衰退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包租了一辆列车，并把它命名为“红色专列”，呼吁社会党党员自愿捐款以支付包车费用。自7月18日呼吁发出后的3个月中，社会党全国总部一直不断地收到捐款。原计划包车仅需费用约35000美元，但实际上收到捐款40000多美元。这笔钱是社会党党员个人及社会党和激进的劳工组织捐献的。捐款从几美分到数美元不等。个人捐款数额大约不下15000美元。按照社会党的宣传观

点来看，“红色专列”是一个成功的信号。从8月30日列车出发到11月2日旅行结束这一期间，尤金·维·德布兹和他的同事们在300多个城镇和33个州中进行了演讲。他们在沿途一直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红色专列”，德布兹在旅行初期说，“无疑显示了它作为一台宣传机器的巨大力量。从它出发的那一时刻起，它每走一时都得到了百倍的补偿。我相信，凡是看到这辆列车在发挥其作用的同志，没有谁会为其捐款以便使这辆列车能够成行而感到遗憾。它在各地所激起的热情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迹。即使别的不说，这辆列车对运动的贡献要比其本身的代价高10倍。”整个旅行期间都陪同德布兹的斯蒂芬·M. 雷诺估计，80万名人听过列车上社会党候选人和其他演讲者的演讲。

对竞选投入的这种精力和热情使社会党人期望他们的选票将大大地增加，甚至全国非社会党的新闻部门也直言不讳地预言，大约100万左右的选民将投尤金·维·德布兹的票。但是，在这次选举中，投德布兹票的选民仅有421520人，仅比上次社会党最高纪录的1904年的选票数略有增加。

美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

社会党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但在国内的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有许多社会党党员当选参政。社会党的大本营设在威斯康星州，更确切地说，设在该州最重要的城市——密尔沃基。在那里，社会党的力量稳步而快速地发展着，其实力最后终于超过了两个老的党派。在1909年的市议会选举中，密尔沃基市社会党人使该市选举名单上的第一个候选人为代表整个市的市议员。今年春季，在密尔沃基市进行的最近一次市议会选举是社会党同其资本主义的对手之间的力量的最重要的较量。双方的竞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完成对选票的统计后，竞选市长的社会党候

选人埃米尔·赛德尔同志以27622票当选，比最接近他的对手多得约6000张选票。社会党人还成为市参议会和监察会的多数党，这样，它完全控制了美国第十二个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社会主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胜利，它必将对社会党在美国进行的普遍的政治斗争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威斯康星州，约150人当选议员，其中有1名州参议员和3名州众议员。在马尼托沃克县，1名社会党人当选了县长。最近几年，社会党的候选人在马萨诸塞州、蒙大拿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多次入选州和地方的政府。

社会党的组织

不过，如前所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绝不能只用其政治力量和成就来衡量。到1907年1月1日为止，社会党在全国39个州设有正式的州一级组织，这些组织由大约1900个地方组织组成，党员总数为26784人。目前，社会党在42个州组织健全，其地方组织已增加到3200个。1910年上半年，交纳党费的党员平均人数为53375人。

社会主义刊物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力量不断增长的另一个迹象是社会主义刊物的发展。1907年，社会党得到了大约50种不同文字刊物的支持。当时还没有英语发行的日报。最近几年，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刊物已增加到差不多70种，其中英文刊物占一半以上：3种日报，12种月刊，其余的是周刊。29种社会主义期刊是用外国文字发行的：德文7种（其中3种为日报），芬兰语、期拉夫语、犹太语各3种，波兰语、波希米亚语和拉脱维亚语各2种，法语、意大利语、丹麦语、匈牙利语、俄

语、瑞典语和挪威语各 1 种。社会党第一份最重要的日报于 1906 年秋季在芝加哥创办，名为《芝加哥社会主义日报》，接着《纽约呼声报》于 1908 年 5 月在纽约创办。创办这两家报纸的方法很不得当，令人可笑。这两家报纸在创办的初期每天都忙于为其生存而进行着可怜的、似乎是毫无指望的挣扎。到目前为止，出版人员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以及在慷慨解囊和无偿工作中所体现的那种通常的社会主义热情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几乎是不能克服的困难。今天，《芝加哥社会主义日报》实际上已能够自立，《纽约呼声报》有希望在短期内达到自立的目标。英文刊物中，周刊《诉诸理性》和月刊《威尔希尔杂志》各发行 25 万份，而《犹太人前进报》据说每天售出 10 万份。在社会主义的月刊中，《进步妇女》主要进行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福音传授给妇女。另外两份刊物——《教育进步杂志》和《小小社会主义者》——是以教育青年学习社会主义哲学为目的的。

社会主义和有组织的劳工

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最近在国内有组织的工人中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年会上，社会党的代表放弃了大部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讨论是不合时宜和毫无结果的。与此同时，劳工联合会中的单独组织的确对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多次毫无保留地宣称赞成社会主义的纲领，或者至少是赞成该纲领中最重要的观点和要点。1907 年，代表总数为 330800 名工人的 16 个全国工人组织就这样赞同了社会主义的纲领。1909 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最强大的组织——美国矿工联合会——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该组织赞同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即所有物质生产工具社会化。各种地方工会组织所取得的进展甚至超过了全国劳工组织所取得的进

展。目前，国内没有几个重要的劳工组织不在其会员中组成或大或小的社会主义小组。

1908 初，社会党试图对该党登记的党员进行一次普查，查清他们的社会地位、民族、工会隶属关系，等等。不幸的是，普查结果非常不理想，仅有 6310 名党员，或者说占党员总数不到六分之一的人填了表。但是，鉴于填表党员分别来自至少 37 个州，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们的状况是代表了作为整体的社会党党员的状况。从所收到的表格来看，66% 的党员或者说大约 33000 名党员是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其中，62% 或者说大约 21000 名党员分属于不同的工会。登记的社会党党员和全国社会党的选民之间的比例大约是 1∶10。可以这样断定，有 20 万以上的工会会员投了社会党候选人的票。从有组织的工人中除去所有妇女、未成年者、外国侨民以及其他无投票权的人，我们估计在美国有组织的工人的总投票数不足 100 万。其中 20% 多是社会党员。这绝不是什么好的迹象，但是较之过去几年，这已是很大的进步了。

况且，产业工人还不是社会主义最近从中得到拥护的唯一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已深入到美国农民当中。1904 年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了 5 位农民代表。1908 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积极的、有代表性的农民占代表总数的很大比例。在前面提到过的社会党普查活动中，17% 的党员填写的职业为“务农”。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几个完全是农业的州收到的社会党选票比一些以制造业著称的州的社会党选票还要多。

妇女宣传

社会党在最近几年很重视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和在妇女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1908 年社会党的代表大会在其党纲中作出了明确保证，保

证全国的社会党人为争取男女之间不受限制和平等的选举权而进行积极的活动。党的代表大会还成立了一个全国妇女委员会以便在妇女中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社会党还决定每年用一个星期天作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日子。全国妇女委员会现在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正迅速获得民心和力量。

青年教育

最近几年，美国社会党开始重视教育青年人理解社会主义哲学的重要使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社会党组织了许多少年“社会主义主日学校”和青年社会主义研究俱乐部。这一运动还很年轻，但前途无量。

最近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

今年5月，美国社会党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党明确抛弃了从前的做法。过去，社会党像国内其他所有政党一样，每四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提名美国总统候选人。最近召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没有为竞选政治上的公职而进行提名，与此相反，它以欧洲社会主义者召开的代表大会或会议为榜样，讨论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在讨论的议题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外国工人移民的问题。对美国工人来说，鉴于每年有大量外国工人到达美国沿海各地，对这一议题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更尖锐的一方面是从西海岸来的亚洲工人的移民。美国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深信，这些移民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并反对允许亚洲工人进入美国。这样，美国社会党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不得不在维护本国工人阶级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和恪守社会主义国际大团结的原则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之中。

党代表大会在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下列决议：

“美国社会党赞成采取一切合法措施以防止因雇主阶级为达到削弱美国工人组织和降低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目的而从国外移入破坏罢工者、合同工以及大批工人的做法。

社会党反对以种族或民族的借口排斥任何移民，要求美国在任何时候都应是一个自由避难所，收容所有因其政治、宗教或种族关系而为其所在国的政府迫害的男女。”

国际关系

我们党同社会党国际局及其所属支部的关系一直是最愉快、最友好和最真诚的。我们的所有刊物都按时送到国际局。我们党主动把必要的情报传送给所需要的各个国家，能提供财政援助时也是有求必应。

下列数据也许能最好地显示出美国社会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阶级团结的重视：

1907 年美国社会党向国外提供的援助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流血星期日基金（截至 1908 年底）	3312.01 美元
政治流亡人员保护基金	354.51 美元
意大利地震基金	74.20 美元
瑞典罢工工人基金	6318.91 美元
西班牙囚犯基金	305.35 美元
共计	7052.97 美元

工会运动

美国最重要的劳工经济组织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我们在1907年所作的报告中曾估计，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工人约为150万人。去年工人的数字变化不大。去年，严峻的工业萧条像往常一样对工会运动产生了一点阻碍作用。不过，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总的来说受工业萧条影响甚小。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09年11月召开的最近一次年会的报告中列出了其附属工会的数字如下：国际工会（横跨美国和加拿大）177个，州联合会39个，中央劳工团体590个，地方工会联合会551个。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

在上次提交的报告中，我们叙述了1906年国会选举中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政治领域里所做的首次努力。这是由有组织工人的全国最大团体所从事的最不适当、最荒谬可笑的竞选运动。劳工联合会参加竞选运动既没有纲领也没有自己的候选人。同时，它也不支持社会党。劳工联合会仅仅呼吁工人们根据他们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的两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候选人对工人的个人友谊在他们当中进行选择。

这样进行的竞选运动并没有给国家的政治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要不是那时发生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事件，劳工联合会很有可能今后将不再进行类似的竞选运动。

“雄鹿炉”禁令

通常，劳工联合会在其机关报《美国联合会员报》的专栏中公布那

些有组织的工人对其感到特别不满的雇主的名字。这些名字公布在“我们不光顾”的标题下，构成了劳工联合会的所谓“我们不光顾名单”。

1907 年，圣路易斯市的雄鹿炉灶公司企图延长本公司雇员的工作时间。这些雇员是国际铸造工人兄弟会的会员，他们抵制了这一延长工作时间的企图并举行了罢工。国际铸造工人兄弟会和劳工联合会为调解纠纷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由于该公司董事长 J. W. 范克利夫先生的固执己见而付之东流。J. W. 范克利夫先生还是全国制造工人协会的会长，他是有组织工人的声名狼藉的敌人。雄鹿炉灶公司的名字因此被列入《美国联合会员报》的“我们不光顾名单”中。该公司向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克拉博法官告了一状，诉说为什么应禁止劳工联合会及其官员继续在其名单中公布公司的名字。这一上诉看起来如此违反个人出版自由的原则，同以往的判例如此相悖，以至劳工联合会的官员并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但是，古尔德法官在 1907 年 12 月 18 日不仅批准下达了判决，而且使该判决成为美国一家法院所发布的这类文件中传播最广的文件之一。该项判决禁止一切无论是作为官员或个人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所有的附属组织的官员和会员、他们的代理、朋友、同情者和法律顾问通过印刷、书写或口头的形式提及雄鹿炉灶公司和其雇员之间的长期纠纷，特别是禁止他们提及有组织的工人对该公司所采取的抵制行动。劳工联合会停止发表“我们不光顾名单”，但《美国联合会员》的社论专栏和劳工联合会的官员在公开场合的演说中都不受限制地讨论和评论了这场诉讼案和禁令的影响。由于发表这样的文章和进行这样的演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副主席约翰·米切尔和书记弗兰克·莫里逊诸位先生于 1908 年 7 月被传讯到法庭，为他们违反古尔德法官的禁令提出可以不受惩罚的理由。申诉非常彻底、充分。被告人所说的或所做的同雄鹿炉禁令有关的每句话或每一举动都得到仔细严格的

审查，甚至龚帕斯先生的政治演讲和在《美国联合会员报》上刊登禁令都成了罪上加罪。诉讼持续了几个月。1908 年大选后不久，莱特法官签署了一项判决，结束了这场诉讼。该判决尖锐地指责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其主要领导成员龚帕斯、米切尔和莫里逊被判处 6 个月到 1 年的徒刑。

劳工联合会一直把法院的禁令看做是对工人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劳工联合会为废除在劳资纠纷中使用特别代表权而进行了几年轰轰烈烈的运动。现在，当自己的组织遭到如此严厉、如此无理的打击时，劳工联合会的官员将其组织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同禁令作斗争之中。在美国国会，有人提出了一项旨在废除对劳资纠纷采取禁令这种办法的议案。尽管劳工联合会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和宣传鼓动，但是议案在议会委员会中遭到了扼杀，未能在众议院进行讨论。

再次投身于政治领域

劳工联合会执委会为此召开了一次由所有其附属的国际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不属于劳工联合会的铁路兄弟会和几个农民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于 1908 年 3 月 18 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份致国会的抗议书和一份告工人书。在抗议书中，劳工领导人敦促国会加速制定立法以便对由于法院最近所作的决定和通过的判决进行更正，以及对雇主和工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不分青红皂白地颁布禁令而使有组织的工人蒙受不白之冤进行平反。在告工人书中，他们呼吁所有的工会在全国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并通过决议敦促国会制定这样的法律。群众大会举行了，决议被表决通过了，但是照龚帕斯的话，国会“休会了，多数党狂傲地宣称对工人的恳求和正义的要求不感兴趣”。此时，1908 年总统选举在即，所有的政党都在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提名总统候选人。美国劳工联合会执委会向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两个最主要的政党各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他们分别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保证遵循劳工联合会所拥护的反对禁令立法政策。当时，共和党还很强大，完全可以不依赖劳工联合会那种多少有点靠不住的支持来赢得竞选的胜利。共和党断然拒绝了劳工联合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民主党比共和党软弱得多，需要社会上较为激进的那部分人的支持，它欣然接受了劳工联合会提出的要求。这决定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员在1908年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在这次选举中受到报答的“朋友”全部是国内的民主党候选人，受到惩罚的“敌人”全部是共和党人。龚帕斯先生和劳工联合会的其他重要官员为民主党候选人进行了公开的、持续不断的活动。他们散发了几百万份传单和文告以支持民主党的竞选运动，呼吁劳工联合会附属的工会为民主党筹措资金和捐款。美国劳工联合会几乎是突然投身于一场政治运动之中，只不过它不是按照其代表大会过去几次通过的若干决议所规定的那样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而是作为一条资本主义老党派的风筝尾巴参加了这场政治运动。

龚帕斯先生支持民主党的政策似乎并没有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队伍中激起许多热情。已允诺的工人投票人数，如果都兑现的话，并不是很多；在任何情况下，这一投票人数都不是多到能挽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赖恩先生免于落选，或阻止共和党候选人中任何声名狼藉的工人的敌人参加国会议员竞选。美国劳工联合会再次失去了一次表明自己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极好的机会。这个拥有150万会员并在劳工界有着巨大影响的美国最大劳工组织初次登上政治舞台就表现得如此不明智、如此令人惋惜。

其他劳工组织

美国劳工联合会并不是美国劳工经济组织的唯一团体。许多工人

（据估计约为75万人左右）参加了不属于任何组织的全国工会和地方工会以及一般的、不太重要的劳工团体。后者中有曾经很强大的劳动骑士团和几年前才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宣传自己拥有大约1万名党员，分布在100或100多个地方工会中。该组织到目前为止完全证明不了其组织者提出的那种不大可能实现的期望——即该组织将重新设计美国劳工运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是否正确。从现在的迹象来看，期望该组织将来取得更大的成功并不很现实。在过去的3年中，一场旨在建立工人合作企业的运动不时在全国各地出现，几个规模不大的合作商店已经建立起来。这场运动还太年青、太脆弱，人们甚至都不能对其今后在美国的土地上能否获得成功作出预测。

以兄弟般的情谊奉上此报告。

国际书记：**莫里斯·希尔奎特**

维克多·路·伯杰

全国书记：**J.马伦·巴恩斯**

“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向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同志们：

妇女闯入工业这种世界各地都存在的、产生于现代工业发展过程的现象，现阶段在美国可能比在其他国家都更普遍。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最近25年，整个妇女无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工业大军的一部分。这给本来已经很复杂的美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带来了新的复杂因素。

妇女闯入工业给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第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就是在男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抗。对无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从来都很敏感的各大资本主义报刊杂志首先发出了这种叫嚣。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绝大多数工会也纷纷进行了性别对抗活动。它们在妇女的竞争会降低其会员工资的地方都声嘶力竭地反对妇女的竞争。因此，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这一领域表现了其对保住某类挣工资的工人的饭碗的关注，并随时准备在工人中为促进资本主义偏见而效劳。那些十足的女权论者、“妇女的拥护者”和“主张妇女应享有参政权者”的大声呐喊加剧了在工人队伍中由此造成的混乱。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喧嚣、呐喊和混乱，社会和工业的发展还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如今，真正的美国工人运动将不得不正视这些挣工资的工业女奴。

与此同时，许多妇女被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她们不理睬女权论者的那些喧嚣，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部门和教育团体里同男同志们一道工作。

不过，专门的“妇女活动”直到1905年才开始。这时，特别是在大纽约[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女党员们开始意识到，为了影响挣工资的妇女大军，有必要作出一些特殊的努力。她们为此创建了众所周知的“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的组织，目的在于影响和教育该市的妇女无产者并逐步把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各地。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她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种理论行动并不为时过早。

“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出版自己的刊物，要完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但从妇女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以此来吸引挣工资的女工并引起她们的兴趣，以便在她们当中开展一场广泛和系统的教育运动。

劳工新闻公司出版了由《人民报》编辑丹尼尔·德莱昂翻译的倍倍尔的杰作——《妇女与社会主义》。这部著作连同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的起源》[②] 以及其他经典著作足够用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教育。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创办一个能影响群众的刊物。

随后，我们在1907年发出了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出发撰写有关“妇女”方面的文章的号召并提供奖励（100美元）。此举的目的是获得一本或更多本富于鼓动性的小册子。这一活动在讲英语的国家中进行，并且特别规定文章不应带有任何偏袒，即不应拥护任一特定的政党或工会。我们推选著名的女作家夏绿蒂·珀金斯·吉尔曼、当时兰德“社会科学学校”的秘书W. J. 根特和当时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的弗兰克·博恩作为这次活动的评委。我们自以为组成了一个完全能够评判社会主义这一题目的代表委员会，并期待着重大结果的产生。然而，意想

① 大纽约指的是纽约市和纽约市周边各城镇共同组成的一个都市群。——编者注

② 原文如此，应是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不到的事发生了，它使我们看到妇女运动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使我们看到确实存在着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原来预料有许多无产阶级妇女会响应这一无产者发出的号召。但是，我们感到很失望。响应主要来自几类资产阶级妇女，反映出她们对这一题目有着不同的糊涂观念。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写得精彩的文章。但是，偏偏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原来预料会做出令人满意评判的评委会首先决定颁奖给一位写半单一税、半政府所有制和十足女权论的糟糕的文章。这个决定给了我们一个很珍贵的教训，即如何看待那些自命不凡地装作是美国无产阶级导师的人的能力。当我们的“头面人物”的认识不过如此时，我们的运动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工人相互之间意见分歧就不足为怪。这次评判遭到了“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强烈抗议。为了不让评委会不光彩地靠边站，确实需要重新评奖。在我们党施加了一些压力后，奖金最后被颁发给了一篇完全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即英国伦敦的约翰·H. 霍尔斯撰写的《妇女与妇女解放》。这篇文章后来还被印成小册子发行。这次活动中另一篇奥利芙·M. 约翰逊写的精彩的文章《妇女和社会主义运动》也被我们选中出版。尽管这篇文章是一名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所撰写，但它丝毫没有半点偏袒，许多社会党地方支部用它在妇女中进行宣传鼓动。随后，这篇文章被译成俄语、犹太语、德语和瑞典语。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广泛的宣传，并因此意识到我们必须同大量的无知和偏见作斗争。

“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以讨论会、讲座、露天会议和在会上、街上及工厂门口散发宣传品的形式进行了有系统的教育宣传活动。成千上万的妇女收到了我们的信息。1906 年在莫耶、海伍德和佩蒂博恩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在美国第一次站出来参加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呈现出有组织、有阶级觉悟的妇女同她们的无产阶级兄弟一道肩并肩地反对资本主义暴行的状况场面。

尽管“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主要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女党员组成，但是她们严守中立，千方百计地避免带有任何根深蒂固的偏见，为争取并支持美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不受现在盛行的自取灭亡的分裂政策的干扰而忘我地工作。因此，在1907年国际无产者事实上接到国际代表大会下达的、要求首先争取实现各国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团结的命令后，“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通过讲座、宣传品和演讲开展了一次积极而有气势的“宣传团结”的活动。我们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并广泛散发了社会党国际局成员丹尼尔·德莱昂同志所作的《团结的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是他开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返回后在一个犹太人组织——社会主义工人俱乐部——发表的。这本小册子现在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珍贵的历史文献。然而，尽管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放弃所有既得利益以保证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团结和同共同的资本主义敌人进行切实可行的斗争，但是觉得它对这一主题无动于衷，以其党的规模自诩、嘲笑，甚至蔑视我们所作的努力。确实，我们为团结和中立所做的努力太少，以至被我们的行动所激怒的社会党女党员组织起一个“妇女委员会”并开始了行动。她们支持一家私人办的名为《社会主义妇女》的月刊，随后将其名称改为较温和的《进步妇女》。这个名称听起来温和得多，可能更有“吸收力”，以便从在我国的舆论中引人眼球的各界妇女那里获得对该刊物所有人的支持。社会党妇女组织不管怎样还是暴露出其母党的特征，反映出其资产阶级妥协的态度、其组织的弱点和其奋斗目标的虚无缥渺。

因此，“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懂得中立和妥协不是它的义务。它必须完全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为教育美国妇女无产者理解鲜明的、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路线而竭尽全力。这样，我们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同舟共济。纽约市的《人民报》星期日版现在常常用一个整版来刊登妇女问题，该报传播了许多消息，如运动的一般进展情况，妇女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工业部门的今昔地位对比和境遇，等等。

使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机关报的这一部分能在不远的将来具有许吸引力、令人感兴趣和有教育意义是我们的目标和希望。我们完全懂得一个团结、强大的党办报的价值。我们将为建设一个美国无产者为之骄傲的刊物而努力奋斗。

过去几年，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宣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很大比例，所有的阶级都进行这样的宣传。然而，宣传主要是围绕资产阶级妇女和职业妇女的问题。对于“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来说，鼓动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发展中开辟了新时代——一个**所有人**都要求在政府事务中有平等的发言权的时代。况且，争取平等选举权者撰写的《妇女的觉醒》一文旨在激励她们参加公共事务，以便在社会主义宣传中能够影响她们，引起她们的兴趣。但是，作为一个问题，妇女选举权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我们深知我们处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处在**性别斗争**中，我们发现在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有一种实际上企图抹杀阶级斗争的主要倾向，这使劳工界乱上加乱。通过争取选举权运动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最高层女士们把自己置于争取自由、博爱和平等运动的前列，在正直的、没有阶级觉悟和无知的美国挣工资的女奴隶的昏花眼睛前挥舞着“妇女要投票，人人要平等”的旗帜。英格兰的潘克赫斯特夫人1909年12月对制桶工人工会作告别演讲时，虽不是有意但清楚地强调了掩藏在这一“问题”中的危险。她说：“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它系紧了作为同一性别而不管其阶级或身份如何的所有妇女之间的姐妹关系的纽带。”这一争取虚假平等的运动使我们对争取选举权问题更加审慎。看来似乎我们这些狡猾的资产阶级女士们在不能愚弄、哄骗美国的男性无产者时，把被“所有妇女的平等和姐妹关系”的观念愚弄的妇女投票者大军置于政治舞台上并以此抵消有阶级觉悟的男性投票人的影响，就成了她们那不可实现的愿望。如果她们真

的抱有这样的愿望的话，她们确实会发现这是一个幻想。为此，我们应以不懈的努力在女性无产者中开展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我们应该对这一主题保持清醒的头脑，非这样不可，因为社会党的妇女党员倾向于先是主张妇女享有投票权，其次才是争取她们成为社会主义者。她们甚至走得更远，谴责我们是“主张妇女享有投票权的对立面”，因为我们更多地强调**无产者的工业解放**而不是**妇女的政治解放**。

为了在妇女选举权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关联的问题上阐明我们的立场，我们于1909年5月在制桶工人工会所在地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邀请丹尼尔·德莱昂同志就“妇女选举权”这一题目作演讲。这个讲话把妇女运动放到种族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合适位置上，揭露了支持和反对主张妇女享有选举权的人的愚蠢之处。简言之，讲话就这一争论不休的题目提供给我们一个经典之作。它目前已经被印刷成册并且广为流传。

美国劳工联合会成为吸引所有大大小小的具有资产阶级本能的资本主义辩护士的中心绝非偶然。由于本能地害怕社会革命，他们很可能寻求在被资本主义的最高喉舌《华尔街日报》称为美国反对社会主义的最强大堡垒的那类工会中得到保护和安全。劳工联合会公开拥护劳资间的调和。社会党正尽力使劳工联合会永久存在下去，并秘密劝说工人参加合作共和国。社会党的妇党员公开迎合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该运动努力在剥削和被剥削妇女之间“系紧姐妹关系的纽带”。这种矛盾和糊涂的策略导致的结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不得不起来对付这些结果。

1909年下半年，纽约女用衬衫工人举行了一场大罢工。罢工波及面很广，并扩散到其他城市。由于这场罢工，女工令人震惊的工作条件被广泛地揭露出来。这下群情激愤了（这种情绪任何时候都非常廉价）。罢工一爆发，“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就站出来履行自己的

职责。我们在罢工工人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不断散发宣传社会主义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的宣传品。一个两人委员会差不多天天去克林顿大厦，向姑娘们发表演讲，就她们的阶级利益问题启发开导她们，指出进行恰当的联合是她们解放的先决条件。社会党的妇女党员也很活跃；但是，她们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姑娘们的工人阶级精神高涨了一些时候。显然，这里有所谓的“所有妇女之间姐妹关系的纽带”的情况。但是，这种精神高涨的时间并不长。以矿山和铁路联运的百万富翁 O. H. P. 贝尔蒙特夫人和钢铁、铁路、银行大王的女儿安娜·摩根小姐为首的主张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妇女们作为“被蹂躏的缝纫女工的带头人”站出来。罢工的女用衬衫工人被请到贝尔蒙特夫人付了钱的纽约最大的礼堂——希波卓姆礼堂，听了一场满怀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同情和情感并夹杂着关于“富豪统治集团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平等”的胡言乱语的说教。在这些天，对罢工女工大表同情成了纽约名媛的时尚；当年轻的花花公子在情人的陪伴下到他们经常出入的地方去时，从为罢工积累资金来卖报的姑娘手中用银币买份报纸成了他们的义务。这样，眼睛昏花和惊讶不已的姑娘们突然发现她们自己已成为注意的中心和受到人们的欢迎，连接“姐妹关系”的银丝细线很快就葬送了勇敢的姑娘们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努力。必须承认，一支劳联当时不甚活动和活跃的妇女力量——“妇女工会联盟”——突然活动起来并前去把那些轻信的姑娘置于自己的卑鄙控制之中。夏娃·麦克唐纳·瓦列什——长期以来被注意其行迹的人认为是龚帕斯、米切尔等人手下的一名聪明的女干将——亲临现场以控制局面的发展。这时，社会主义的鼓动在姑娘中发挥了作用，这显然引起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姐妹们”对她们的反感。安娜·摩根跺着脚（据报道）说，社会主义的鼓动该停止了！夏娃·麦克唐纳·瓦列什流着痛苦的眼泪（亦据报道）抗议道，她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鼓动。她大肆辱

骂社会党女党员，完全是在恐吓她们。这几个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她们的遭遇均正式记录在社会党妇女委员会领导成员签署并刊登在社会党的刊物《纽约呼声报》1910 年 2 月 8 日号上的文件中：

“恐怕在工人运动史上，没有比社会党女党员在女用衬衫工人罢工中所处的地位更难堪了。只要她们干黑人（忠仆）干的活，就会被容忍并许可干下去；但是，她们一旦试图做任何领导工作，马上就会被人置于幕后。”

当然，这只能记录社会党妇女党员被排挤时的悔恨，但文件促使我们相信，担心社会党违背劳工联合会利益的想法是完全不必要的：

“其他毫无根据的指责——社会党女党员仅仅在鼓吹社会主义的教条——再次被证明不对，瓦列什夫人在罢工中从未参加任何商店的集会。在整个罢工期间，社会党人仅把自己局限于纯粹的工会演讲中，结果，他们不仅仅帮助姑娘们赢得了罢工的胜利；她们帮助姑娘们认识到并记住，一个健全的工会是使人们摆脱残酷无情的工作条件的唯一出路。为此，姑娘们无论在罢工时还是在平时都应支持这个健全的工会。”

女用衬衫工人的罢工在社会党扮演的黑人“忠仆”这个令人难堪的角色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篇；它再次证实劳工联合会就像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就像是一个避雷针，把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的革命电流导入地下；它清楚地揭示了主张妇女享有投票权的妇女所拥护的“姐妹关系”的使命，明确指出开展完善的社会主义宣传使得成立公民联合会妇女分会成为必要并把它建立起来。夏娃·麦克唐纳·瓦列什目前在这个分会中拥有一个支薪的职务。

罢工期间，“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不顾上流社会妇女的愤怒和劳工联合会的抗议，继续从事我们的教育活动。当有人指责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宣传时，我们并没有像我们的社会

党姐妹们那样，申明自己是“清白的”。

我们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并告诉安娜·摩根小姐、塞缪尔·龚帕斯先生和所有他们用钱收买的人及其仆从，我们还要很快地经常进行这种令他们反感的活动。

尽管由此产生了种种混乱，社会主义——完善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对美国的富豪统治集团来说仍然是，并将不断是一场噩梦。

总而言之，如果有人要问，看来要永远支离破碎的美国工人运动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会告诉他们，美国工人运动令人遗憾地缺少阶级觉悟和健全的阶级组织精神。在这个国家里，工人当中不乏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赞同，不乏对遭蹂躏的同胞的同情，不乏反抗现状的心理。但是，这些情感现在都烟消云散了。因此，如果美国的工人运动要想具体化为能进行革命活动的运动，完善的教育、鼓动和组织必须是我们未来活动的口号。

为使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能适应这一要求，“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决心竭尽全力继续它的使命，即使美国的妇女无产者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携手并进。

“大纽约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

安娜·B. 图罗

日本社会党的报告

日本社会党在过去三年间处境艰难，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俄日战争中进行的反战宣传使资本家和当局看到和感受到日本社会党人的力量和影响，他们开始把这样的宣传视为犯罪。自由派在战争结束之后上台执政，我们在此期间有了一个社会党并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在原来的桂太郎军国主义政府再度上台后，党马上就遭到镇压。我们被当做真正的罪犯，随时受到密探的追捕。当局禁止了社会党人的一切组织，不许社会党人集会，没收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社会党人从事任何工作都遭到干扰，雇主不得不解雇他们。

这些迫害使年青的同志们因绝望而走向极端，一些同志成为直接行动的支持者，甚至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转向激进主义的做法导致社会党队伍发生分裂，并使当局以及资本家控制的报刊把我们描绘为恐怖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我们当做危险的罪犯。

尽管当局对社会党人进行了这样的镇压和迫害，我们在思想传播方面还是取得了长足进展，社会主义思想以野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在陆军和海军中有很多社会党人，这使当局感到非常害怕，其迫害和压制变得更加严厉和残酷。很多社会党人成了极端分子，社会党分裂成三四个组织，但所有的组织都被当局镇压了。

资本家越来越害怕社会党人，因为他们正在使工人变成奴隶，并对他们进行最残酷的剥削。他们想让工人永生永世做顺从的奴隶。这里既没有工厂法也没有事故责任法，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剥削工人，日本如今

成为国际资本家的最佳投资地点。这使他们越来越憎恶社会党人，因为社会党人会使工人起来反抗压迫，为改善自己的处境举行罢工。

尽管在日本存在众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社会党人难以成长壮大。

最近，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企图用炸弹炸死天皇，他们遭到逮捕。随后，多名社会党人也遭到逮捕，罪名是同谋。我们这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在为国际社会党人的原则而奋斗，但密谋炸死天皇的事件使政府惊恐不安，它以此为借口，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无政府主义者一网打尽。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社会党人，政府的态度同样如此。

我们没有结社权，我们被禁止建立社会党。帝国宪法保证所有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但我们社会党人没有这样的权利。审判和监禁都是秘密进行的。任何人只要一被逮捕和失去联系，就肯定是被关进监狱了。众所周知，日本现在最恶劣、最残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治安法庭和监狱。在治安法庭，拷打折磨是家常便饭。被捕的人常常受到凌辱、伤害，有时甚至被打死。最近在警察局就发生了两起犯人死亡事件。听说被判入狱的人会染上肺结核，在狱中慢慢死去。我们没有办法验证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但社会党人一旦入狱就肯定会染上肺病却是事实。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日本的监狱是世界上最腐败、最肮脏的地方。到处爬满了臭虫、跳蚤和其他传播病菌的害虫。狱警为使自己高兴对犯人施加种种人们无法想象的折磨。对于这些丑恶的行为，我们社会党人现在无能为力。

日本的工人阶级是最受压迫的阶级。他们仍然处于封建压迫之下，但是，随他们生活变得困难，他们正在觉醒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会，如东京印刷工人工会、造船工人工会、锯木工人工会。有时也会发生罢工。仅仅在几天前，横须贺造船厂的2000名工人为将工资提高30%举行罢工，最后提高了10%。该厂的五金工人

中，有数名社会党人。

工厂法草案在上届议会被自由党政府否决。这个草案是政府提出来的，政府随后对此进行调查，以便提交议会进行更全面的讨论。工人现在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一丁点保护。工人必须为其工作承担沉重的责任。无论是有缺陷的机器或者雇主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他们都必须为此负责！他们为不是自己犯的错受到审判和惩罚。这种状况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他们将很快理解社会主义。

日本工人无疑将或迟或早遇到一种重大的危险。随太平洋两岸种种事件的发生，这种危险越来越逼近日本和美国工人；在满洲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此。这种危险如果到来，美国和日本两国工人都将会遭受巨大的苦难。是的，他们将会被无情地作为牺牲摆放到贪婪和利润的祭坛上。他们将会在他们参加的战争中阵亡，而这种战争是人为制造的仇恨引起的，两个民族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开战的理由。于双方而言，显然两国的海军将相互厮杀，整个太平洋将被鲜血染红。美国舰队时常出现在我国岛屿附近，似乎是在挑衅。在美国，人们在报刊和公开集会上毫无顾忌地谈论对日战争不可避免。这场军国主义运动由罗斯福领导，受到肖和希夫等资本家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美国商品打开中国的市场。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工人给这一潜在的冲突煽风点火，正在助长这种贪婪的企图。他们不公的反日运动使美国群众坚信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希望建造大军舰，希望在太平洋沿岸、夏威夷和菲律宾建造坚固的堡垒。由于两次大战的惨痛经历，我们日本工人反对战争。我们向支持反日运动和支持将日本人赶出本国的美国工人和社会党人发出警告。目前在美国和夏威夷有 17 万日本人。对日本人进行迫害、压迫和抵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抢走和毁坏他们的财产，所有这些极度野蛮的行径和种族偏见如同火上加油，会在任何情况下点燃可怕的战争。我必须提醒全世界的同志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工

人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组织反战运动的地步，因此他们会轻而易举地成为战争狂热的牺牲品，被像牲口一样地被宰杀。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全世界社会党人的荣誉感和正直心。

现在的问题不是向美国移民的日本人将会造成什么麻烦，而是已经在美国的10万名日本人和在夏威夷的7万名日本人应该受到怎样的对待。美国工人和很多社会党人赞成把所有日本人赶出美国。但怎样把他们赶出美国？显然只能靠迫害、抵制和歧视！但这样的做法不能持久。我们向今年在哥本哈根举行代表大会的社会党人求助，希望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不要在为时已晚时才受到制止。

代表日本工人和社会党人

片山潜

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向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

前 言

本报告的起止时间为1907年2月至1910年4月。这一时期的起始正值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之际，其结束恰逢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三次会议举行期间。把我国政治史上的这两个数据简单地放在一起所作的比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反动派不断强大，它逐步和系统地破坏了革命时期取得的成果，首先破坏了工人运动取得的一切成果。

在反动派变得强大的同时，资本也在更快和更有力地组织起来，这些组织的目标同样是破坏无产阶级所争取到的工作条件的改善。

当人们专门研究犹太无产阶级时，除了这一阶级，还必须注意到被当局公然挑起的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仇恨，尤其必须注意到卑鄙的杜马和反动的政府的政策所针对的犹太民族。

此外，群众缺乏革命情绪，因此他们也不可能采取反击政府反革命措施的行动。另一方面，工党[①]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必须适应比以前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1905年前，即革命前，没有选举，没有杜马，没有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在组织上加入了该党。——编者注

合法的工会，没有合作社，没有各种公开的大会，也没有教育协会，等等。在任何一个宪政国家，社会民主党都是在正常的条件下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而我们党必须在一个由军事法庭、刑事和行政流放以及对工人组织的肆意迫害构成的制度下完成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在形式上与欧洲社民党所做的无异，但工党所处的境地却是亚细亚式的、没有法律保障的。一个秘密的和非法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在公开的、合法的领域展开工作。这个矛盾成为组织工作中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解决这个危机，崩得也不例外。根据这一基本矛盾，人们可以将我们的工作报告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1907 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崩得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半公开和半合法地存在（在报刊和工会运动领域）；其他时间属于第二阶段，崩得被迫转入非法的和秘密的状态。

下面叙述的情况将表明，犹太无产阶级的这个政党是如何在这两个阶段适应新的工作方式的，它必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一、政治工作

1. 第二届杜马

从我们向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提交上一份报告[①]至今，我们的绝大部分政治工作都是围绕杜马和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展开的。如上所述，报告所述的时期始于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之际。尽管参政院作出的“法律解释”使选举法变得更糟，尽管警察在竞选期间进行了干

① 即《关于移民问题》，见本书第 22 卷第 73—101 页。——编者注

扰，第二届杜马还是具有极其明显的反对党的特征，社会民主党在其中有66个席位。

不过，这一反映了我国强烈的反对情绪的选举结果同样清楚地说明，如果革命群众不支持杜马，等候它的命运像第一届的一样。

以犹太语出版的“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说明了把群众组织在杜马周围的必要性。有必要唤起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市民中具有民主思想的阶层对杜马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兴趣，有必要使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与这些群众和党的组织团结在一起。这是当前的紧要任务。

在完成这个任务时，犹太社会民主党必须克服极其严峻的困难。一方面，它必须反对犹太各阶层群众对待杜马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它必须查明议会党团对待这些群众的错误做法。

由于议会党团中没有犹太群众的直接代表（因为警察竭力在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有望进入杜马的崩得候选人），所以并没有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氛围，即在议会党团中没有任何靠我们的选票和斗争选入杜马的议员。这更加重了群众的冷漠态度。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第一个声明，策列铁里同志的发言，还是另一个同志关于预算的发言都没有提到非俄罗斯族，特别是犹太人遭受的残酷压迫。当犹太资产阶级的报刊按照他们的看法大肆报道这件事时，这样的失误就令人更加遗憾。

因此，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所有与杜马有关的工作。

那些讨论社会民主党议员对民族问题所持态度的文章，以及各工人大会上作出的有关该问题的决议和提出的抗议，都被译成俄文，送交杜马党团。在1907年5月于伦敦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崩得”代表团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它提出的相关决议结果获得通过。

此外，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代表居住在俄国的各族无产阶级的

利益和一切被压迫者的利益，这一思想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对群众的口头宣传中都得到了支持。我们的机关报从这一立场出发，要求各组织“向广大群众解释组织起来的犹太无产阶级所支持的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民族权利的宣言”。

3月初，“崩得”中央委员会给各组织发去了一份名为“犹太无产阶级致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请愿书的草稿。在概述了这个国家权利不受法律保障的状况，特别是犹太民族和犹太无产阶级受到压迫的状况，并提到在党团中没有经过犹太工人的斗争而被选入杜马、了解犹太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条件的议员这样一种情况之后，请愿书说：“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利益在杜马中由好人，即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你们是被一切压迫者的卫士，也会是使犹太人摆脱民族压迫的勇敢而忠实的斗士。”请愿书要求杜马党团为实现党的总纲领而斗争，然后强调提出犹太工人的如下特别要求：

“1. 取消一切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公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

2. 使用母语享有完全自由。在犹太人居住区，承认我们的语言在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享有平等的权利。

3. 各民族的一切文化事务由自己，即由他们选出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管理（民族文化自治）。”

按照请愿书的精神，我们的组织采取了各种行动。一些城市的组织征集签名，以支持中央委员会发出的请愿书；另一些城市的组织召开专门的大会，通过相应的决议或提出自己的请愿书。为其他特殊目的而举行的大会也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我们在24个城市举行了31个大会，共有11542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决议或提出了请愿书。8次大会的参加人数没有公布。此外，在7个县举行了会议，共有5384名工人和“崩得”盟员参加，并通过了决议。（见下表）应该指出的是，那些不是为专门

起草请愿书召开的大会是合法举行的，大部分在警察的监视下进行的。其原因是，1906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有关商店职员和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的法律在那时生效。这项法律要求成立由企业主、商店职员和手工业工人的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商店职员和手工业工人的代表由特别大会选出。我们的组织利用这些大会来起草请愿书。警察常常禁止在这样的大会上使用犹太语，这等于禁止集会。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部分请愿书都特别强调“使用母语的自由”。这个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对都犹太无产阶级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不过，只要对犹太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秘密和非法地进行的，那么这个要求只能是纸上谈兵。如果能在这些群众中合法地进行工作，那么争取使用母语的斗争就能成为日常的口号。

城市	召开大会次数	参加人数
1. 维尔诺	2	2500
2. 科夫诺	1	1000
3. 罗兹	1	600
4. 博布鲁伊斯克	1	400
5. 华沙	1	180
6. 克列梅涅茨	1	150
7.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1	120
8. 希托米尔	2	650
9. 阿克尔曼	1	?
10. 斯捷姆雅季希	1	120
11. 楚敦斯卡沃拉	4	154
12. 杜布罗夫诺	2	1400
13. 敖德萨	3	720

（续表）

	城市	召开大会次数	参加人数
	14. 切尔卡瑟	1	?
	15. 波切普	1	60
	16. 别尔季切夫	1	2000
	17. 谢尔佩茨	1	100
	18. 比耶拉	1	150
	19. 瓦希尔库夫	1	?
	20. 梅希雷切耶	1	?
	21. 斯梅拉	1	?
	22. 伊夫耶	1	65
	23. 萨摩斯季耶	1	200
	24. 鲍里索夫	签名	300
共计	24 个城市	31 次集会	11542①

	县级会议	参加人数
	明克	1005 名有组织的工人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600 名有组织的工人
	希奥利埃	700 名有组织的工人
	德文斯克②	502 名有组织的工人
	格罗德诺	543 名有组织的工人
	斯洛尼姆	521 名有组织的工人
	沃利宁	1513 名有组织的工人
共计	7 次县级会议	5384 名有组织的工人

① 数字有误，原文如此。——编者注

② 今陶格夫匹尔斯。——编者注

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讲一讲上述 1906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法律（斯托雷平政府企图以此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收买商店职员的选票）以及“崩得”怎样利用这一法律。至于直接与杜马有关的工作，我们想作如下说明。按照法律规定，商店职员每周的休息日是星期天，各个商店都应在这一天歇业。对于星期五下午四五点关门的犹太店主，星期天再休息一天意味着一周歇业两天半。不用说，对于商店职员来说，他们作为全体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全体人民休息的那一天才是他们真正的休息日；但意味着强制停工两天半的星期日休息的规定，将对犹太商店职员的经济状况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依民族不同规定职员不同的休息日成为热烈宣传的起点。这种宣传是在上述法律生效时开始的，而法律生效之时，第二届杜马正好开幕。在“崩得”办的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讨论每周的休息日问题。中央委员会发送给各地方组织的致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请愿书的草稿也谈到这个问题。因此，上述工人大会通过的致杜马党团的请愿书也提出了废除这一强迫犹太商店职员在基督教休息日休息的法律。

所有这些围绕杜马及其发生的事情进行的工作也已经取得成果。中央委员会在杜马解散之际发表的号召书里完全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及其在杜马里的代表们开始建立无形的组织上的联系。

随着杜马的解散，这一进程也结束了。在政治工作的各个领域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反动派在强大起来。“崩得”进行广泛、公开和合法的政治宣传的唯一可能是利用其日报，该报在选举第三届杜马时继续出版。而在其他领域，工作范围不断收缩，这不仅是由于警察的阻挠，而且主要也是由于全国以及工人群众和党内的情绪不断低落的缘故。这不可能不对下届杜马的竞选产生影响。

2. 第三届杜马竞选

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对第三届杜马选举特别冷淡。选民的弃权带来的危险是，运动的一切成果将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党一开始就必须特别关注与选民的冷淡态度进行的斗争。

1907年6月3日颁布的选举法几乎夺走了犹太无产阶级和全体犹太人民对于直接在选举中取得胜利[①]的任何希望。此时，“崩得”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选举法在形式上给予各阶层选举权。杜马从一开始就受地主和最上层的资产阶级摆布，选举法也知道不应该减少我国选民人数，其人数与旧时的法律规定的人数几乎一模一样。然而，在从前根据等级和阶级特征设立选区的制度中新设一个全国选区的做法，使发动政变的政府[②]能够在多次间接选举中把选举人平均分配到选区中，犹太民众因此几乎无法对选举的最终结果施加任何影响。虽然他们仍然有权投票，但是不能帮助自己的候选人取胜。根据特别规定，6个省的选举人团有责任从每个工人选区中选出一名议员，但这一规定并没有考虑到犹太无产阶级。因此，犹太无产阶级只是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对选举直接感兴趣，这几个阶段的意义仅仅是为选举选举人和工厂的全权代表而斗争。[③]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犹太工人大部分在雇工不到50人的作坊里做工，按照旧的法律，他们同样不能参加选举全权代表的选举；而参加城市选区的选举，他们又没有必需的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唤

---

① 指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编者注

② 1907年6月3日，俄国政府总理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同时颁布新选举法。——编者注

③ 工人选区的选举多数是间接的。50人和5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选举全权代表。各省全权代表选举一定人数的选举人，选举人参加选举人全体大会。

起广大群众对选举的兴趣这一任务极其困难。然而，使选举为党的组织和宣传服务却非常有必要。

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在一系列文章中向各组织指出了大力反对选民的冷漠情绪的必要性。这些文章还强调，必须把竞选与我们各组织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如上所述，绝大部分犹太工人和“崩得”盟员没有选举权。只有在我们各组织的成员尽可能多地参加竞选运动的情况下，这一运动才能为壮大我们党这一目的服务。

在阐明党对于杜马的基本立场，并强调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俄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之后，中央委员会在其选举号召书中号召群众参加选举，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中央机关报也发出同样的号召。在目前的形势下，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的举动是对6月3日政变的抗议，是对现政府的抗议。“杜马中的任何席位都不能不经斗争就让给敌人！”“尽管现在反动派得逞，但我们不会不经斗争就放弃我们的阵地！”

竞选运动在这些口号的基础上进行。无论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号召书（它使“崩得”的活动领域得以扩大）还是在口头宣传中，“崩得”都努力阐明它的全部纲领，通过这种方式把广大民主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个方面，目前犹太社会民主党处于比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更加有利的地位。那时“崩得”必须在第一阶段选举时与非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政党结成一个选举同盟。当犹太族选民和俄罗斯族选民一起选举时，在选票分散的情况下就有下列危险，即反动分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在犹太人聚居区对俄罗斯民众有一定影响的“黑帮百人团”的代表有可能被选进杜马。但在选举第三届杜马时，犹太族选民组成特殊的选区，“黑帮”的危险不复存在，因为犹太人中这类反动分子很少。因此，现在完全独立地进行竞选的“崩得”常常得与资产阶级分子的同

盟作斗争。

我们的各个组织通过召各省和各市专门会议来开展竞选，在这些会议上，各组织提名全权代表和选举人，作出与竞选有关的重要问题的决议。为了选出“崩得”参加全党的中央委员会[①]为决定选举运动的重要问题而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代表，“崩得”组织了四次区级会议，我们各个最重要的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在这些会议上进行的协商对于“崩得”在全部领域中的活动在原则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遗憾的是，由于当局的压制，我们合法的中央机关不可能确定投给“崩得”候选人的总票数，也无法确定“崩得”参加选举的城市的总数。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我们组织在30多个地方参加了竞选。在工人选区，“崩得”候选人在7个地方当选全权代表。全权代表共计16名：维尔诺3名，罗兹4名，华沙4名，平斯克2名，波洛吉1名，卡缅诺布罗德1名，莫吉廖夫1名。

在城市选区，“崩得”在17个地方提出自己的选举人候选人，在8个地方取得胜利。他们在下列地方当选：在德文斯克，得票达投票总数的67%；在诺沃格鲁德—沃利斯克，得票达投票总数的74%；在卢茨克、奥帕图夫（拉多姆省）和希奥利埃，得票达投票总数的40%至50%多；在斯卢茨克和奥什米亚内，得票达投票总数的93%；在罗兹的一个选区，得票达投票总数的70%。上述各市各有一名候选人当选选举人，在罗兹有20名当选。我们一共有27位候选人当选。

我们的候选人在其他城市的得票如下：维尔诺，15%；维捷布斯克，45%；新乌斯奇加，46%；戈罗多克（维捷布斯克省），46%；斯莫尔贡，27%；利耶帕亚，35%；罗兹其他3个选区的得票均为19%。

---

① 指社会民主党工党。——编者注

（我们的组织在希托米尔、波内维耶什和斯文茨亚尼也提出了候选人，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有关选举的数据。）

“崩得”在利耶帕亚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一起参加竞选，在罗兹则与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起参加竞选。社会民主党在罗兹获胜的选区，就是我们活动的区域。

在某些城市（如在希托米尔），当局在选举之际大举抄家，逮捕有影响的人士，这是我们的候选人落败的直接原因。在德文斯克，崩得已经当选选举人的候选人被从选举人名单上划掉。在其他城市，警方有计划地禁止举行选举集会，并且想方设法阻止发放印有我们候选人的选票。即使在集会上也只允许用俄语发表演讲，演讲的吸引力因此大打折扣。

尽管这些不利的情况，我们党还是几乎到处成功地使不参加投票的情绪只影响到极少数人，唤醒了广大群众，引起了他们对选举的兴趣，使选举为普及我们的纲领服务。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崩得扩大了对犹太最贫穷的民众中的落后阶层的影响，这是我们第三届杜马选举取得的一个真正令人欣喜的成绩。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开始的这个阶层摆脱资产阶级政客传统影响的进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这种情况给崩得提出了下列任务：向那些居住在这些资产阶级政客的影响占据优势的犹太乡镇的群众阐明对各种问题的立场。我们将在第三部分里更详细地谈论这一问题。

3. 第三届杜马

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是我们报告所介绍的时期内所进行的最后一项规模较大的政治行动。反动派一直在壮大，全国的气氛却一直在低落。任何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活动都不可能开展。此外，上面所说的对

我们的日报压制同样使我们党与广大民众隔离起来。即使无产阶级中一些有组织的分子对崩得的一些要求作出了反应，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第二届杜马时期，崩得与群众的联系犹存，1907 年年末，这种联系开始消失。第三届杜马开始的那段时期，我们的政治工作可以说是单方面的，主要是开展一种与杜马的发生的事情有关的宣传，而采取任何群众性的政治行动。这也说明，我们报告的这一部分也是单方面的。

1907 年年末，法庭对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进行审判。党中央要求各组织在这一天召开群众大会，作出相应决议，为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请愿书征集签名。当时（1907 年 11 月）正在举行的“崩得”专区代表会议也受要求作出相应决议。在会议上，选举了出席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确定社会民主党关于第三届杜马的基本策略和基本路线。

在专区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的日报在最后几期讨论了这个策略问题；在日报被封杀后，我们在周报上讨论这个问题。利用杜马进行宣传再度成为必要，因此，党面临下列老任务：唤醒群众和党组织对杜马发生的事情的兴趣，在他们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之间建立接触和联系。在第三届杜马任期，“崩得”都在进行这样的宣传工作。

杜马党团刚一开始工作，我们就遗憾地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视民族问题。因此，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发表第一份声明之后就正式致信杜马党团。这封信指出，由于杜马党团“对民族压迫问题保持缄默，尤其因为这届杜马的全部政策是建立在镇压非俄罗斯民族的基础上，犹太族无产阶级在遭受巨大的伤害”。

1908 年 7 月，在杜马的首次会期结束后，由于杜马党团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不作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又做出一项有关的决议。在整个杜马会期期间，几乎只有自由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犹太人辩

护。虽然中央委员会完全清楚，杜马党团的工作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但是它还是“认为，我们在杜马里的同志没有想方设法去排除这些障碍”。

把在议会中为犹太人辩护的工作让给资产阶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更何况一位隶属于立宪民主党的犹太自由主义者[①]的发言从根本上说是在试图贬低犹太无产阶级实际上的革命作用。此外，犹太群众的要求也被他歪曲了。这位先生还装出一副代表**全体**犹太人民的样子。在1908年6月给各组织发出的通告信中，中央委员会要求各组织举行大会并且作出反对这样的犹太民众代表的决议。我们的报刊也一再指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参加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是何等重要。

杜马第二个会期开始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民族问题，特别对犹太人问题表现得热情了一些，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同志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犹太民众情况的材料。1909年，我们已经大为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同志别洛乌索夫和格格奇柯利就犹太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讲话。这使我们有可能提高群众对杜马党团工作的兴趣，并且强调犹太群众支持我们在杜马的同志的必要性。我们在书面和口头宣传中做了这些工作。

我们在非法和秘密的报刊上也讨论与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有关的问题。我们的非法机关报《崩得之声》第三期发表一篇名为《一项紧急的任务》的文章，再一次提出围绕杜马党团的活动开展政治行动的问题。在第二届杜马期间，我们还可以召开公开的、合法的大会，但现在举行这样的大会根本不可能了。尽管这样，“犹太工人应该大声和有力地说明自己的要求。举行一系列小型和秘密的集会，通过决议和发

① 在400多名杜马议员中，只有2名犹太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党员。

表声明，这样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唯一不应该做的就是沉默”。1909 年 11 月，中央委员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我们组织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联系。

在口头宣传工作中，与杜马党团有关的问题总是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些问题在小型和秘密的会议上受到讨论，在秘密活动的读书小组中也受到讨论。然而，由于这项工作暂时只是在狭小的党组织的范围内开展，所以不可能要求起到政治宣传的重要作用。

4. 1906 年 11 月 5 日的法律

因 1906 年 11 月 5 日生效的法律而于 1907 年初开始的政治运动，在我们从事的党的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法律在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之间制定的，是最高当局指定的法律。该法律涉及手工业作坊工人和商业职员的工作条件，规定每天最长的工作时间为 12 小时，每周法定休息一天。确定各个商业和手工业部门的工间休息时间、缩短工时以及详细的工作条件是所谓的“混合委员会”的工作。各混合委员会由相同数量的工人代表、企业主代表和市政管理机构的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拟订的规章需要经过市政管理机构的批准。由于这些委员会中的市政管理机构代表（他们是根据市议会选举法之类选出的，这种选举法几乎没有把普通群众纳入选民的范围）同时也是资本家的代表，所以 1906 年 11 月 5 日的法律无异于把工人和商业职员完全交给手工业作坊的老板和商人处理。

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法律出台的政治背景。当时为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做准备的官员们想向手工业和商业部门的无产阶级（根据那时的选举法，他们对城市选区的选举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表明，他们是关心无产阶级的幸福的。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或许对工人运动刚刚起步的落后地

区和行业的无产阶级有一定意义，但是对于经过长期斗争已经争取到十小时或九小时工作制（有的地方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的犹太无产阶级而言，十二小时工作制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而如上提到的规定星期日为每周的休息日和硬性规定基督教的节日为全民的节日，直接威胁到犹太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

为争取规定不同的休息日而进行斗争是完全有必要的，但这样的斗争也同样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特别是对商业职工而言。犹太人的商店每周少开一天半，这正是基督教的店主所希望的。但犹太商人在市议员委员会里没有代表，因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企业主和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有责任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整个问题是，犹太人希望能在星期日营业，因为它们星期六停业。如果犹太企业主希望他们在市政当局的基督教企业主代表作出某些让步，那只能以缩短非犹太族的工人星期天休息时间为代价。[①] 基督教店主不会同意在他们歇业的几天和几个小时里，犹太店主继续营业。对于这样的规定，犹太社会民主党自然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激励，它激励我们围绕“混合委员会”的选举全力展开相应的宣传。

在1907年的1—4月，在属于我们活动区域的各个城市，几乎都配合选举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活动。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我们的组织在25个城市参加了工人代表和店员代表的选举。它们举行很多集会，在集会上提出自己的代表应参加各混合委员会的要求，并制定了代表应该采用的策略。

例如在比亚韦斯托克，商店职员提出如下要求（这些要求在大多数城市都被提出，只不过内容略有不同）：

① 基什尼奥夫、基辅和科夫诺部分地区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1. 混合委员会的代表应由全体店员选出。

2. 代表们应支持下列要求：（1）延请各商业部门的店员代表加入委员会，他们拥有建议权；（2）委员会的协商对外公开；（3）有权自由集会，讨论委员会的所有事宜。

3. 工人应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4. 十小时工作制（一些城市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或者把九小时工作制作为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最后通牒）。

5. 每周连续休息42小时或40小时（夏天）。

6. 星期天和基督教的节日，允许犹太人的商店营业。

在有些地方没有举行工人代表的选举，因为警察禁止谈论上述法律的意义，但常常也是因为不是所有工人都接到参加选举的要求。后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组织通常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党组织和工会联合推荐的候选人在各地当选。此外，还举行一系列集会，代表们在会上报告他们在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不计各工业部门举行的规模较小的集会（这样的集会在各个城市多次举行），登记的大型集会有51个，参加人数在100至3000人之间（如维尔诺）。总人数达25870名，其中15次集会的人数没有公布。13次集会（在维尔诺、德文斯克、科夫诺、别尔季切夫等地举行）通过了抗议禁止说犹太语的决议。德文斯克的非犹太裔工人也强烈抗议这一禁令。维尔诺的委员会在犹太工人代表的影响下决定：为允许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在集会上使用母语而斗争。

许多集会作出了抗议强制犹太人在星期天休息的决议。参加集会的非犹太裔工人（大约20次集会有非犹太裔工人参加）也总是支持这些决议。常常是在工人代表选举之前，大家已经作出决议，抗议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立法途径颁布法律。这些集会常常被用来进行围绕杜马党团的活动而展开的鼓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

说过。

这些活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唤醒了无产阶级中的落后阶层，使他们学会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方法。在星期六休息的问题上，我们常常成功地劝说小资产阶级参加我们举行的集会，例如在科夫诺、格罗德诺、维尔诺等地。在我们发言人讲话的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开始考虑离开向权贵和富人请愿的传统方法，采用革命的方法。在科夫诺举行的几个集会通过了有这一内容的决议。

5. 五一节

在我们报告所述时期举行过三次五一节：1907、1908 和 1909 年的五一节。1907 年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与后面的两次有很大的不同，这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的情绪和我党活动的深刻变化。1907 年 5 月 1 日，第二届杜马还存在。当时群众的情绪也是压抑的。原因有很多：那时迅速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闭厂策略，势力在扩大的反动派对工会的迫害以及其他镇压手段，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和不断煽动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尽管如此，这时人民与专制制度之间的争斗并没有暂时停止。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五一号召书说：“当前的政治形势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正在对峙和对抗”。明天将属于我们，人们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与此相应，不仅我们五一的所有宣传工作，而且中央委员会的五一号召书和我们中央机关的五一专号都以这样的口号为基础：为即将到来的斗争**组织起来**！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犹太无产阶级在 5 月 1 日表明，他们的斗争干劲远远没有耗尽。

1908 年和 1909 年的情况不同。其他事件，首先是 6 月 3 日的政变和全国群众对此的沉默表明，积极的行动被推迟了，反革命势力还将继续猖獗下去。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必然会使广大群众情绪低落，我们各个

组织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在1908年和1909年也不可能扩大对五一节的宣传。合法的日报受到镇压；1907年，积极参加过1907年五一庆祝活动组织工作的工会或者遭到破坏，或者处境艰难。当时我们组织的力量大为削弱，以致中央委员会在1909年的五一号召书中提出下这样的口号："巩固我们的组织！"（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直至现在，巩固组织仍然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在1908年发表的五一号召书中要求犹太无产阶级，"通过庆祝五一节证明，那种在那些忘我斗争的日子里为所有被压迫者的自由和权利进行殊死斗争的力量源泉还没有枯竭。"

犹太无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响应了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众所周知，1909年，人们在一些地方通过停工庆祝五一节；1909年，人们在一些地方举行集会庆祝五一节。（1909年5月1日正好是星期六，是犹太工人的休息日。）由于没有合适的新闻机构，所有这些活动的情况都没有被收集和记录下来。

1907年的五一节可是另外一种情景。在我们开展活动的区域的大部分城市里，合法工会的领导层也被吸引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召开各行各业的集会，在一些地方甚至发表号召书，要求停工庆祝五一。在其他城市，人们利用借选举"混合委员会"之机举行的各种集会来进行五一鼓动工作。这些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使我们可能使我们的五一节鼓动深入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此外，我们还为进行五一鼓动工作举行秘密会议。各地都提出了要求五一节停工的口号。党中央发表的五一号召书被广泛传播，有些地方组织也发表了自己的号召书。

我们收到的报告表示，五一节的宣传鼓动席卷55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各地都停工庆祝五一。只有13个地方报道庆祝活动的规模（其中

一个地方仅仅报告了部分活动）。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 11435 人[①]。其他城市没有汇报参加五一罢工的人数，但我们知道，**31** 个城市在 5 月 1 日**全都**停工：所有的犹太工人都在那一天停工了。

5 月 1 日那一天到处都举行了集会。尽管发生了与警察冲突的事件，但这并没有影响那一天普遍存在的气氛——欢乐和满怀希望。

二、工会运动

由于工业的不景气和政治领域里反动势力的不断加强，在报告所述的这段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斗争的意愿显著消沉了。工会在革命时期飞速发展，而如今工人组织正处在消失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开始并不显眼，而现在正加速发展。合法工会的消失尤其快。在合法工会存在的时期里，经济斗争只是**在形式上**由地下的罢工委员会领导（实

---

① 1. 卡利什 500 名罢工工人
2. 霍多尔科夫 250 名罢工工人
3. 波列什蒂 150 名罢工工人
4. 别尔季切夫 2000 名罢工工人
5. 科夫诺 300 名罢工工人
6. 格罗德诺 3000 名罢工工人
7. 梅希雷切耶 1700 名罢工工人
8. 索罗基 400 名罢工工人
9. 比耶尔济 400 名罢工工人
10. 普罗斯库罗夫 500 名罢工工人
11. 贡琼茨 85 名罢工工人
12. 斯莫尔贡 2000 名罢工工人
13. 罗加切夫 150 名罢工工人

11435 名罢工工人

际上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工会理事会理事组成的[①]）。现在对这种斗争的领导完全是在地下秘密地进行的，在本报告所述时期临近结束之际，这种情况已经是常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采取有计划的、经过周密准备的行动。无产阶级斗争的主动性消失了。他们不再实行进攻性的政策；只是在必须自卫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斗争。情况常常如此，因为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本家迅速组织起来成立雇主联合会，企图从无产阶级手里夺走他们之前取得的胜利果实。自卫性罢工和解雇是本报告所述的这3年零4个月的时期中的主要斗争形式。警方经常介入劳资双方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是在**合法的企业主组织和非法的工人组织**之间展开的。其介入起到特别的作用。

1907年的头9个月（2至10月），在我们活动的区域共发生114起劳资冲突，其中39起是解雇，75起是罢工。在解雇事件中，有14起导致其他工厂的工人用罢工作为回答，所以罢工次数实际达到89起。只有10起罢工是工人为了改善现有的工作条件举行的。其他79次罢工都是为了反对厂方计划采取的恶化工作条件的做法而进行的自卫性罢工。再把25起解雇事件计算在内，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90%的冲突事件中，工人只不过是进行自卫性的斗争。参加这些斗争的工人总数无从知道。在51起冲突中（占记录在案的冲突的45%），罢工工人和被解雇的工人总数为11124人。63起罢工和解雇事件的持续时间已经公布，共计2271天。每次事件的持续时间为2至135天，平均36天。如果只考虑26次持续时间和参加人数已经公布的事件，那么可以算出，在9个月的23%的冲突中，我们地区的无产阶级共付出27017个工作日。虽然有些斗争取得了胜利，一部分损失的时间得到回报，但工人只是在

① 按照1906年3月4日生效的有关“联合自由”的法律，合法的工会无权领导罢工。

43 起冲突中取得完胜，在 13 起冲突中取得部分胜利。

我们已经指出，这些冲突 90% 是为了捍卫在从前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在 17 起冲突中，企业主企图延长工作时间；在 21 起冲突中，企业主企图降低工资（这常常表现为要求实行计件工资）；在 35 起冲突中，企业主企图强迫工人既延长工资，又降低工资。

双方的斗争都是有组织的。工人方面，斗争由非法的工会或专门的罢工委员会——在工会合法的情况——领导，它始终得到我们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直接领导。企业主常常提出如下要求作为与工人谈判的前提条件，即他们应断绝与工会或者党组织的联系，但必须特别强调指出，企业主的要求从来没有实现过。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企业主方面均由闭厂协会和辛迪加出面。在这一时期，工人们通常不是与单个的企业主打交道，而是与企业主的组织打交道。后者常常使用什么样的压制手段，人们从如下事实即可看出：在工人的要求中，一再提出的要求是释放因企业主告发而被警察逮捕的同事。

资本家组织起来，力图再次破坏工人在过去取得的成果，这使工人组织扩大规模和走向集中的要求更加强烈。但因群众情绪的压抑和工业的长期萧条而产生的条件（资本家的进攻政策的条件），使群众对他们自己的组织采取某种冷淡的态度。不过，在这 9 个月的时间里，新成立了 26 个秘密的工会，24 个原来非法的工会现在合法了。实现合法并不容易，因为警察想方设法为此设置障碍。但即使在成功排除了警察设置的障碍的地方，我们还必须不停与群众的冷漠态度进行斗争。工会会费没有及时缴纳，集会参加的人很少。部分原因是集会上禁止使用犹太语，部分原因是缺乏系统的教育活动。

到这 9 个月的末期，群众的冷漠态度达到最低点。有的工会被警方解散，也有的工会自行解散了。1907 年 2 月至 6 月，没有发生自发解散

工会的现象；6 月，一个工会自发解散；7 月又一个工会自发解散；8 月解散 2 个；9 月解散 2 个；10 月，4 个工会停止活动。

不过，集中力量的要求并没有被打消。无产阶级中领导作用的分子以及党组织为此开展了积极的活动。1907 年 6 月，根据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会委员会”得以成立。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向各工会介绍国内外工会组织的实践活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并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出发解释经济斗争中的各种问题。”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持续到 1907 年年底，它出版了 8 期《工会报》，发出了一些通函，并通过提出建议和介绍专题报告人支持各个工会。我们的普通报刊也极为关注工会运动，特别是关注克服群众的冷漠态度的问题和运动走向集中的问题。

很久以来，各地工会运动的领导权已经集中在党组织手里，党组织实际上是各地各个工会的中央办事处。但随着工会运动的发展，专门的中央办事处开始成立，它按照统一的计划领导工会运动。在合法工会存在的情况下，中央办事处以秘密的方式存在，因为法律禁止各个工会之间建立联系。在报告提到的 9 个月中，下列城市设有中央办事处：维尔诺、华沙、科夫诺、莫尼莱夫、德文斯克、博布鲁伊斯克，等等。

在有些行业，人们也试图阻止中央联合会。制革工人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于 1907 年 2 月举行，20 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 17 个工会的 4000 至 4500 名会员。一名“崩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如下最为重要的决议：（1）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制革工人中央联合会；（2）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允许成立中立的工会作为组织的过渡形式；（3）成立民族支部，以满足联合会会员的文化需求；（4）大力争取工会合法化；（5）用犹太语、俄语和波兰语出版工会机关刊物；（6）通过派代表的方式加强联合会理事会与党的联系；（7）大力进行五一宣传鼓动工作。

1907 年 3 月，格罗德诺的印刷工人联合会决定召开整个西北地区印刷工人组织的代表会议，以成立一个中央联合会。同年 4 月，我们地区的代表在全俄印刷工人联合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磋商，主要商讨成立西北地区中央联合会的问题。沃利宁的“崩得”组织开始创建地区瓷器业中央联合会。鲍里索夫火柴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给俄国西北地区各个火柴工人组织发去一份问卷，以准备举行一次代表会议。维尔诺裁缝联合会也发出同样的问卷。在维尔诺还成立了一个负责召集俄国西北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裁缝代表会议的委员会。我们的联合会参加了比萨拉比亚店员代表会议和南俄裁缝代表会议。我们的工会和党组织也积极参加了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这是 1907 年我们工会运动的概况。

1907 年之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局既不允许召开筹备中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也不允许举办其他类似的活动。主要由于警方的压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即 1908 年）工会运动的处境特别悲惨。

工会运动的集中完全不再可能。工会联合会开始在整个俄国消失。1908 年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崩得之声》断言，在我们的活动地区“昔日的工会运动声势浩大，现如今已是夕阳西下”。在许多城市（维尔诺、斯摩尔贡、华沙、罗兹，等等），大部分工会联合会解散，而个别得以幸存的工会联合会不得不进行力所不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当局的迫害，另一方面要克服群众低落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运动坚持到现在。1909 年下半年开始复苏的经济斗争也未有助于工会组织的巩固。

目前工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非法的和秘密的工会行业委员会，它们大部分是党组织的一部分。在一些城市的多数行业中都存在这类委员会，它们还是经济斗争的领导机构。有时，会有非法的工会联合会成立。人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合法化的努力。但这样的组织工作只是由人数

较少的党员进行的。因此，在把主要力量用于经济斗争时，“崩得”不得不采用革命前采用的老方法。人们认为，现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可能使工会运动会长期处于这种状态。1908 年、1909 年和 1910 年头 4 个月进行的经济斗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1907 年年底，唯一为或多或少准确记录各种经济斗争大事提供保障的“崩得”的合法机关刊物被禁止出版。从那以后爆发了好几次罢工，工人多次对资本家的攻击进行了抵抗；我们的非法报刊记录了工人取得胜利的事迹①。1909 年底至 1910 年初接二连三罢工，但由于记录的数据非常不完整，而且是随机的，它们一点也没有反映出经济斗争领域的真实状况的图景。因此，我们不得不仅限于用手头的三件特别典型的事件证明，当局的迫害和资本家组织起来的做法不可能完全摧毁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精神的。

我们想提的第一件事是 1908 年维尔诺和毗连地区织袜工人的罢工。3000 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罢工持续 4 个月，以罢工工人的胜利结束。罢工开始时，合法的工会联合会因领导罢工而被警方解散，以示惩罚。一个非法的罢工委员会接过了领导权，与其对峙的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和合法的企业主协会。而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在织袜业，工人都是分散在雇工人数为 3—5 名的小作坊里工作的；在小地方甚至常常在家里干活。无论是小作坊还是在家中生产出来的袜子都供应给大型商店。这些分散的工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没有罢工基金，仅有对于胜利的渴望，却坚持了 16 个月之久的斗争。织袜工人的要求包括恢复原来的工资标准，它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被大幅降低了。大部分工人每周挣 2 至 2.5 卢布。除了罢工工人坚持斗争的毅力，也应强调指出其他行业的工人对罢工工人的支持。仅彼得堡的工会联合会就捐助了 600 卢布。罢

① 明斯克的制鞋工人罢工、维尔诺的制鞋工人解雇事件和梅希雷切耶的罢工。

工成功结束时，共收到德国纺织工人联合会625瑞士法郎的捐款和哥本哈根工会680瑞士法郎的捐款。“崩得”海外委员会援助罢工工人2354瑞士法郎。这次罢工共花费3265卢布。

这个时期，制革业也开始采用闭厂的做法。1908年初从格罗德诺省开始的闭厂运动于1909年5月在维尔诺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第一次闭厂发生在格罗德诺省的小城市斯维斯洛切，持续了14周，工人取得部分胜利。企业主要求降低30%的工资，闭厂结束后工人的工资降幅略低于30%。在格罗德诺和维尔诺省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的闭厂。规模最大的闭厂发生在斯摩尔贡和维尔诺，分别于1908年11月和12月开始。应该指出的是，1907年年初成立的制革工人中央联合会在这时解散了。其在斯维斯洛切闭厂时还开展了积极活动的理事会，[①]这时停止活动。

警察解散了斯摩尔贡的制革工会联合会，作为对它支持被解雇的工人的处罚。另一方面，企业主却有自己的辛迪加。这个辛迪加几乎遍布俄国西北部地区，大力支持闭厂的企业主。尽管这样，斯摩尔贡1500名犹太裔工人和非犹太裔工人成功地坚持了长达十周之久的斗争，最终迫使企业主作出一些让步。工人的工资只降低13%，而不是像企业主打算的那样降低38%。企业主的主要要求——工人不要介入雇用和解雇事务——被否决。

维尔诺的闭厂没有那么幸运。那里的皮革工人长期以来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企业主得到当地其他行业企业主从业者的极大支持。此外，警察的干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维尔诺1000名制革工人

① 制革工人联合会中央办事处召开过一次格罗德诺省以及维尔诺省部分地区制革工人的特别代表会议，使遭遇闭厂的免于完全失败。斯维斯洛切闭厂后，该办事处还以犹太语和俄语出版了一期工会的机关报。

坚持了22周的斗争，直到工会联合会被解散，积极分子，特别是理事会全体成员被捕，工人才被迫承认罢工失败。之后实行九小时工作制，工资降低10%，200名企业主不喜欢的工人被解雇。

皮革业闭厂结束时，猪鬃业的闭厂开始了。但与维尔诺相反，闭厂以猪鬃业工人取得完胜而告结束。猪鬃业工人是犹太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先锋。15年前，他们率先开始了有组织的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在当初成立的、至今还是非法的“猪鬃业工人总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们成功地使每天的工作时间从13—14小时缩短到10小时。1905年，西北地区的整个猪鬃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现在，反动的政治势力开始反击，企业主普遍采用闭厂策略，猪鬃业企业主贸然向八小时工作制发起进攻。

无论在小规模的集会上，还是1906年最后几个月的大规模闭厂期间（涉及2000名工人），企业主都遭到痛击。不仅八小时工作制还保留着，而且工人们的境况如工资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到了1907年和1908年，猪鬃业工人同样受到普遍的不利条件的影响，企业主在很多方面反扑成功：工资降低了，卫生条件恶化，医疗补助被取消，等等。但企业主不敢触动八小时工作制。直到1909年初，企业家才壮起胆子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削弱工人组织。威尔科维斯基的企业主组织首先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之后9个城市的企业主组织也提出同样的要求。猪鬃业工人的斗争精神被重新唤醒。1100名工人反对闭厂斗争5个月，八小时工作制几乎在各地都保留下来。

“崩得”中央委员会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斗争。根据它的建议，猪鬃业工人举行了代表会议，7个城市的工人代表、组织委员会的2名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2名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制定了斗争计划，并决定重新巩固被削弱的联合会。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们的各个组织（包括国外委员会）都为反对闭厂斗争举行捐款。它们募捐到一笔可观

的款子，共计2800卢布。其中，柏林德国纺织工人联合会捐助368瑞士法郎54生丁，赫尔辛福尔[①]工会捐助49.07瑞士法郎，位于纽约的“美国崩得组织中央联合会”捐助500瑞士法郎。凡是猪鬃业工人斗争的消息能够传到的地方——当然必须冲破斯托雷平政权的种种障碍，这些消息都唤起人们的极大的同情，并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黑暗的反动派统治时期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给我们地区的无产阶级增添了新的勇气。

1909年6月，闭厂结束；10月，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参与下，猪鬃业工人召开了第四次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巩固协会的新措施，并采取了应对的斗争的措施。[②]

三、党的生活

在本报告所述时期，党内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此必须把第一年和其他时间区别开来。国内总体政治形势和犹太无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不可能不对后一段时期党组织的建设和党的内部活动的内容产生影响。在党内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活动的范围却越来越小。

1907年上半年是党内生活丰富的时期。除了开展上述政治运动、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崩得”还准备参加定于5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代表大会。党代会的目标是，从过去的各个革命时期吸取教训，

① 今赫尔辛基。——编者注

② 华沙面包工人总罢工的消息传来时，本报告已经写就。崩得的非法工会领导了这场斗争。工人们提出10项要求，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以及企业主承认工人组织。罢工以工人获胜结束。

得出结论。完成这个并不轻松的任务需要做许多认真的工作。我们的报刊针对党代会各项议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们各组织对这些议程进行了三个月的讨论。

“崩得”16 个较大的组织（每个组织有 300 名或者更多的成员）选出一位大会代表，小组织通过每个区的代表会议联合推选代表。在此期间召开了 13 个这样的代表会议。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手头有详细报告的 7 个区级代表会议有 53 个组织的代表出席，加上上述 16 个组织独立选出大会代表，可以把参加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组织的总数放心地估计为至少 120 个。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团有 55 名成员，代表约 29000 名有组织的工人。在各级代表会议上，代表们除了讨论大会议事日程上的各项内容，还讨论我们组织内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后来也由我们的整个代表团在伦敦进行了讨论。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南俄组织还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下列议程：（1）南俄的组织；（2）南俄的报刊；（3）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最后一个问题尤其引起敖德萨同志的兴趣，因为这个城市的各种无政府主义组织那时已经成为我们组织开展活动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907 年 7 月，在第三届杜马选举和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伦敦代表大会之后举行）之后，举行了 4 次区级代表会议，我们最重要的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 4 次会议为：（1）南俄代表会议；（2）波兰组织代表会议[①]；（3）明斯克区代表会议；（4）德文斯克区代表会议。每次区级代表会议都有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参加。

维尔诺、布列斯特、比耶洛斯托克和平斯克举行了 4 次小型代表会议，专门讨论第三届杜马的选举问题，临近这四个城市的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

① 即俄属波兰的“崩得”各组织的代表会议。

同年9月，在我们斯维斯洛切的小组织的建议下，召开了比耶洛斯托克区代表会议，8个临近城市的组织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第三届杜马选举的情况并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在1907年11月于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3次代表会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3次会议之后，党内工作活跃、党的中央机构与地方组织及地方组织之间频繁联系的时期结束了。仅有于1907年11月举行的“崩得”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值得一提。为此，我们举行了一系列党员集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发行纪念专刊。然后到了1908年，这一年是“崩得”的党内生活最为停滞的时期。

1907年，特别是这一年的下半年，即将到来党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革命群众既没有对1907年3月的政变，也没有对警方逮捕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作出反应，更没有对紧随其后的无数工人组织首当其冲的镇压活动作出反应。在这以后，情况越来越明显，无产阶级开展反对专制制度的直接的群众运动的时期将长期陷入停顿。我们处于人们所说的进行准备工作的时期。我们报刊上的许多文章和上面提到的会议，特别是后来举行的会议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1907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心工作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是筹备在大街上展开直接的群众活动，这一点在本报告第一部分叙述的政治工作的特点中可以看出。当时无产阶级活动特点的改变尚不明显，从旧的活动方式转变到新的鼓动和组织方式还没有多少困难。显然，有必要在我们的工作中利用革命的成果——即使是非常小的成果，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这些成果得到利用。到1906年年底，尽可能把工会联合会改造成为合法的和公开的工会联合会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任务。我们党的刊物深入讨论了利用一切“合法的途径”为政治鼓动和一般的教育和文化工作服务的必要性。1907年8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建议我们的地方组织

成立合法的工人联合会，以满足会员们的文化需求。1907 年年底举行的几次代表会议也通过了相似的决议。

“崩得”努力使自己适应党的新工作方式。在群众提出新的需要的同时，我们却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越来越强大、其行动越来越残暴和厚颜无耻的反动势力。此外，革命马上取得胜利的希望落空使人们普遍产生的低落情绪，以及投身运动的人们的筋疲力尽，使知识分子仓促地退出党的每一项工作。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正是种种新的工作方式更加需要这些力量的时期。地方各组织的领导机构越来越集中，各方面都抱怨缺少积极分子。

这些情况在 1907 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我们还拥有合法的报纸时，它还与我们扩大了的活动区域内的所有城市有联系，因此还能把各单个的组织结合成一体，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党的危机的严重性。几乎还不到我们的报纸因当局的镇压而停刊，党的危急形势就已经非常明显。1908 年访问我们各最重要的地方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察觉了这一可悲的处境。

如今党面临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继续领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一方面面临加强和扩大我们非法的和秘密的组织的任务，另一方面必须竭力利用各种合法的途径。因此，问题在于：我们活动的中心应该放到哪一方面？非法的和秘密的领域，还是公开的和合法的工作？

1908 年 2 月底我们召开一次讨论会。除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外，还有六个最重要城市的代表出席会议。讨论会议程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特点”。通过的决议是一种折中。它指出巩固我们紧密的组织（即非法组织）的必要性，同时建议“在我们的组织工作中尽可能适应自然产生的众多的工人小组”。但是讨论会拒绝了再度出版一份秘密的和非法的机关报的建议。直到 5 个月以后，即到 1908 年 7 月底，中央委员会才决定出版秘密的机关报。

我们工作的特点问题引起我们组织内部以及我们的报刊的热烈讨论。出席190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崩得”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这个问题也是“崩得”下一次（第八次）代表会议的议题。

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缺乏一种有约束力的党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进程几乎没有影响。在文化和组织方面，我们利用了合法的途径；此外，我们也做了许多加强我们非法组织的工作。出于大家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们不能介绍合法的工作。至于不合法的工作，我们组织的中央机关用犹太语和俄语出版的非法报纸已经进行了报道（犹太语报纸在俄国的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俄语的报纸在国外印刷）；此外，我们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五一号召书，给地方组织发去多份通函，并给它们提供演说员。中央委员及其受托人不时访问地方组织。

1909年初，地方组织的工作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尤其在加强组织方面比较明显。在年轻一代工人（他们后来经常成功地把那些从前在党内工作的老工人重新吸收到党的工作中来）的努力下，许多在1908年完全停止活动的地方组织再度开展活动。当前地方组织构成的特点是，领导机关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职业革命家”。工人党员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很少有例外。

政治工作的方式是建立宣传小组，开展宣传活动，举行小型的非法集会；根据城市可供使用的场所的大小和警察的干预程度，参加集会的人数在30人至150人之间。在宣传小组中，人们或多或少有计划地研究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发布了这些小组开展教育工作的标准方案，其第一部分已经付印。政治鼓动工作的主题大部分是有关杜马党团活动和犹太人生活的问题。

反动势力无法阻止与犹太群众登上历史舞台紧密相关的政治活动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密切的新问题成为讨论的主题，如犹太语与

犹太学校的问题，设立具有公法性质的普通民族机构，改组犹太市镇。“崩得”觉得自己面临的任务是，一定要对无产阶级参加这种市镇工作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市镇除了宗教的和慈善的功能外，还有**文化上的**功能。参加这种市镇工作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路线吗？它能够使民族文化自治得以实现吗？如果希望无产阶级像现在那样积极参加市镇工作，那就出现了制定这种工作的纲领的问题。至于拥有平等地使用母语的权利问题对于犹太工人运动具有多么现实的意义，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了。[①] 所有这些问题在近几年都成为报刊上热烈讨论的主题，也是专题报告、演讲和大会讨论的主题。

1909 年 11 月在科夫诺举行了一次由各犹太团体、联合会代表以及在犹太人公众生活中活跃的人士参加的讨论犹太市镇改组问题的代表大会。它也引起我们同志很大的兴趣。他们在许多城市举行集会，在会上对参加大会的问题作出决议，讨论大会议事日程上的各个问题，批评大会组织工作中的不民主方式，在大会结束后报告了会议情况。当前，在筹备召开“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的背景下，犹太人的生活问题是各个组织讨论的主题。

根据去年完成的工作，我们的党的机关报能够断定，犹太无产阶级经过反动势力的沉重打击、1908 年群众的冷漠和运动的停滞之后，已经开始恢复了。这同样使中央委员会能够着手执行去年 12 月份作出的决议，即召开“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重建我们组织所取得的成果，就犹太无产阶级关心的各个问题发表“崩得”的意见。

党中央建议的议事日程是：（1）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在各教育协会的工作。（2）工会运动。（3）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尤其

---

① 见第一部分。

是犹太人问题方面的工作。（4）有关犹太职工每周休息日的法律规定（是星期六还是星期日休息?）。（5）我们在犹太市镇的工作。（6）为争取犹太语的平等权利斗争。（7）报刊。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为庆祝奥古斯特·倍倍尔70岁生日，我们举行了一系列集会。这些集会于1910年2月举行，会上通过了贺信已经发给倍倍尔。中央委员会也给他发去贺信。

四、报刊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合法报刊在报告所述的第一年中在党的生活中所具有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不言而喻，只要能不顾财政困难和警察设置的障碍，日报照样坚持出版就有意义。当局的审查设置的障碍虽然很大，但我们还是能够在报上发表党的看法，按照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解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处理党内问题和组织问题。简而言之，报纸虽然不署党的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全面地和忠实地表达“崩得”的意见。那时几乎不需要出版秘密的和非法的报刊和图书。在整个1907年，除了只发给党员的一些胶版印刷的通函，中央委员会只秘密发表了两个号召书，其中一个是五一号召书，另一个是就解散第二届杜马和社会民主党议员被捕发表的号召书。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发表了第三届杜马的竞选纲领。

在当局采取措施、扼杀了继续出版我们的日报的一切可能之前，情况一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日报的出版也不再可能。我们不得不只出版周报，但很快就不得不停止出版，这一次完全是由于警方的压制。[①]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停止出版不定期的俄文文集。出

①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合法报刊作详细的介绍。

版这种文集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不懂犹太语的同志了解“崩得”的生活和工作。

一直能够合法出版的“崩得”犹太语刊物使“崩得”有可能公开讨论纲领中的许多问题，有时也能公开讨论策略问题，但由于这些刊物不是定期出版的，由于书报检查使情况越来越艰难，出版一份具有领导作用的机关刊物的需要未得到满足。1908 年以来，非法刊物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急需解决。起初，我们只想出版一份刊登消息和通信的小刊物。1908 年 3 月，这样的刊物出版了，它的刊名为：《党内生活》。但情况表明，这是远远不够的。1908 年 7 月，中央委员会决定（在第三部分中已经提到），出版一份不合法的中央机关报《崩得之声》。从如上介绍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崩得之声》只介绍不合法活动的情况，因为介绍合法活动的文章有可能在合法刊物上刊登。这是《崩得之声》仅仅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几期的主要原因。到 1910 年 4 月，出版了 3 期大开本的《崩得之声》，第一期有 12 页，第二期有 26 页，第三期 16 页。另外，在同一时期里，海外委员会出版了 4 期俄文版的《崩得之声》。

在报告所述时期，“崩得”报刊的出版情况如下（用犹太语出版）：

用犹太语出版的报刊

日报	202 期（合法）
周报	3 期（合法）
工会报刊	9 期（合法）
小册子、文集等	37 种（合法）
《党的生活》	1 期（非法）
《崩得之声》	3 期（非法）
号召书	5 份（非法）

用俄语出版的报刊

周报	5 期
文集	1 种
《崩得之声》	4 期
总计	270 期（种）

上表不包括各地方组织（大部分是具有工会的性质）的号召书。

在本报告所述时期开始之时，日报的发行量为 20000 份；但在第二届杜马时期，发行量已经降到 16000 份；在第二届杜马解散后，全国情绪低落，人们的政治兴趣减弱，日报的发行量降至 9000 份以下。这种状况自然加大了我们出版社从一开始就必须应对的财政困难。

必须作出说明的是，我们党组织习惯了秘密的出版物（它们大部分是免费发放的，而不是出售），党组织销售和征订党的出版物的难度很大。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多次在通函里指出，应该更加重视这项工作。由于报纸陷入财政危机，报纸的管理部门和编辑部发表了一份题为“致我们的朋友们”的呼吁书。各大小城市、党组织、工会联合会、工人集会和各个读者很快开始就表示支持，寄来大笔款子。另外，许多城市还专门成立了征订和招徕广告的委员会。一个月后，编辑部断言：“广大订户支持我们，给予我们有力的援助，以此回应我们的号召书。这表明，我们的报纸受到犹太工人群众的钟爱。”这一时期，订户增加到 22000 户。国外也给我们捐款。一共筹集到 4000 卢布。

目前我们正在展开一项经常性的鼓动工作，以筹集用来出版党的刊物，包括非法刊物的款项。

五、财政

下面的数字只涉及“崩得”中央委员会账户的情况。对于地方组

织的财政状况，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数据。

过去的3年零2个月（1907年1月至1910年2月）的财政收入情况如下（单位：瑞士法郎）：

	中央委员会	国外委员会	总计
1907年	125.244	16.194	141.418
1908年	41.329	11.110	52.439
1909年	22.056	19.949	42.005
1910年（2个月）	2.707	3.769	6.476
总计	191.316	51.022	242.338

国外交来的款项逐年下降，因此我们党不得不认真考虑把预算的重点移到俄国。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几次提醒后，我们的地方党组织近来更加关注党组织的财政情况。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扩大党的以党费和地方组织上缴的款子为基础的财政收入。在这个意义上，财政问题一再成为中央委员会很多次会议的议事日程。1907年2月的讨论会就谈到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即将召开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也将讨论这个问题。

俄国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
关于斯图加特大会以来的活动的报告

——提交1910年9月举行的国际社会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怀着沉重的心情撰写这份报告。当前是否有人清醒地认识到，俄国革命伟大的政治、社会和民族目标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俄国悲惨的现实与这些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另一方面，不久前声势浩大的政治反抗的场面浮现在我们眼前，唤起了我们对广大群众高贵而又似火的热情的回忆。现在，这些群众却陷入政治上的冷漠和精神上的极度沮丧，任凭各种迫害横行，听任社会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合法反抗和各种进步的追求被扼杀。所有这些，都是当今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造成的现象和后果。

犹太群众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俄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些不利条件。

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历史的弃儿，现在受到反动政府和第三届杜马多数派的残酷迫害。这个杜马的多数派由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推行遭受反抗最小的反动的政策，走民族压迫和反犹太主义的道路。这届杜马不仅绝口不提人民大众，尤其是犹太无产阶级非常关注的犹太民族自治机构的进步改革，不承认我们最基本的民族权利，如办自己民族的学校的权利、在法庭使用犹太语的权利和凭良心行动的权利（如强迫犹太店员在星期天休息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而且还保留中世纪的特别法，政府特别顽固和残酷地捍卫其“神圣”地位。

与政治上的普遍反动相联系这一切情况自然使犹太群众极其懦弱和麻木不仁。在犹太人公众生活的舞台上，作为犹太民族“救世主”的资产阶级慈善人士和神职人员再度登场；而在刚刚过去的革命时期，他们被广大群众通过有力的行动赶进了地洞。

但犹太人的社团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它们专注于内部生活。犹太民主人士做了广泛的文化工作和民族工作，与犹太神职人员和有钱的慈善人士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以扩大犹太自治机构的活动领域，满足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犹太无产阶级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列，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就是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在我们描述党的各方面工作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指出我们已在前面简单介绍过的俄国政治生活的总的基础。

一、政治运动

1907 年 6 月 3（16[①]）日新的选举法颁布后，第二届杜马解散。我们不想谈论这个法律的细节。我们只想强调，它使民主派的代表更加受到限制，犹太民族的代表减少，工人阶级的代表，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几乎消失了。

除了俄国南部持抵制态度的组织外，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仍然参加了竞选。它们在希托米尔（其选举人得到 80% 的选票）和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克（其选举人当选）提出了自己的选举人，在维捷布斯克提出与犹太资产阶级集团候选人竞争的“崩得”选举人候选人（选举人未当选），在辛菲罗波尔（选举人未当选）、费奥多西亚和叶夫帕托里亚（选举人未当选）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

---

① 括号内为俄国旧历日期。——编者注

在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工人选民的人数很少而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一些地方，我们党也像在上述城市一样在选举前夕开展了反对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宣传。

但是，没有一个由党提出和支持的选举人成为杜马议员。

在组织上，党与任何杜马党团都没有紧密的联系。

党就杜马讨论的工人和职员的保险问题展开宣传，并把一份有关的备忘录递交杜马。此外，党借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杜马就迫害工会联合会一事进行质询的机会，向该党团通报了它了解的情况。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普遍冷淡和与日俱增的失望，杜马不可能使自己成为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

党的政治活动集中在工会里。在党在其活动范围之内在建立工会联合会时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党员参加相应的联合会之时，在联合会里成立党小组，同时在小组里着手确定关于工会问题、政治鼓动和宣传的统一的行动方针并非难事。但由于受到政府不断迫害（它用暴力解散工会）的威胁，党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完全非法的活动形式继续其政治活动。

由于普遍的政治冷淡，当局对积极活动的同志的不断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秘密印刷所一再遭到没收，以及难以适应重新开展的地下活动，党员人数自然显著减少。现在积极活动的党员有2000人，还有一些人看法与我们相同，但没有直接而积极地参加我们的活动。

有关党在省和市行政机构中的活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汇报，因为犹太民众没有选举这些机构的权利。

但我们注意到犹太堂区生活的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半宗教式的、仅受现行法律的部分承认、由犹太财阀控制的犹太堂区对犹太人的教育产生有害的影响。为实现教育民族化和世俗化的原则、扩大犹太堂区的活动范围、满足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失业救济金、流移民补助）而斗争，是我们党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内容。我们着重指出下列工

作：争取失业救济金运动（维捷布斯克，1907 年），学校斗争（维捷布斯克，1908 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909 年），参加费奥多西亚和新莫斯科斯克的堂区选举和文化活动，倡议制定民主的、工人阶级有代表权的堂区章程，为堂区改革而参加竞选（辛菲罗波尔，1909 年）。

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以及印刷所屡次被没收，党不可能正常出版自己的报刊。不过，我们仍然出版了如下书籍：犹太语文集《呼声》（1909 年），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俄文译本（1908 年），《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8 年）[①]。此外，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组织（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维捷布斯克）发表了五一号召书（1908 年、1909 年和 1910 年），散发了抗议谋杀第二届杜马议员卡拉瓦耶夫的传单和抗议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监狱大屠杀的传单。

近来民族文化问题在犹太民众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与沙文主义者、犹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化倾向作斗争，用犹太语创作文学作品，研究犹太文化和文学——所有这些都是在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大的文化潮流的特点。

在彼得堡、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维捷布斯克、罗夫诺和戈罗多克等地举办文学讲座，在各地成立文学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不能说出地址），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尤佐夫卡[②]、巴赫姆特[③]、叶纳基耶沃和根尼切斯克举办有关工会运动、工人立法和保险问题、有关妇女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讲座，在一些地方的青年大学生中成立文学小组和社会主义小组，参加建立和领导工会图书馆，所有这些是党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概况。

---

① 同参会各党共同出版。

② 今顿涅茨克。——编者注

③ 今阿尔乔莫夫斯克。——编者注

我党党员出席了下列代表大会：厂医代表大会（1909 年），南俄裁缝伙计代表会议（1907 年秋），南俄店员代表会议（1907 年秋），犹太公众人物代表会议（1909 年秋）以及学校和民众教育界人士代表会议（1910 年春）。最近一段时间，党在积极参加即将召开的全球犹太移民大会的宣传工作。通过对这一重大的问题作出有计划的、捍卫犹太工人利益的安排，尽可能使移民群众集中在一个地区，这次大会应该在消除犹太人在移民过程中所遭受苦难起到作用。大会工作的成功需要犹太民主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全球性的组织。

党像过去一样与社会革命党结成同盟。遗憾的是，由于党的活动减少，这个同盟不可能有具体的形式了。社会革命党对我们的道义上的支持也表现在，该党派出一名代表参加了我们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我们将在后面再谈。

在我们的倡议下，我们与俄国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联盟（“锡安工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规定的一项任务是，在俄国、奥地利和美国的犹太无产阶级中间宣传成立国际犹太人支部的思想。

我党与上述各方结成了同盟，以尽可能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参加移民大会的代表。

在那些除了我们党之外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我们与它们就工会、文化、合作社和政治工作问题（参加竞选，散发传单，参加红十字会救助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的人）达成协议。

二、工会组织

从 1907 年开始，对工会的镇压产生了很坏的后果，许多在革命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工会，只有少数几个留了下来。竭力捍卫工会运

动的真正利益的党从未建立过党的专门的工会，但它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其经济组织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在各个协会及其联合会中都有代表。

如下是我们党进行活动的各协会的概况：

	行业	会员人数	其中党员人数	结局	年份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店员	1000	200	被政府解散	1909
	烟厂工人	150	100	被政府解散	1909
	木工和裱糊匠	200	50	自行解散	1908
	鞋匠	175	40	自行解散	1908
	木工	300	60	被政府解散	1907
	锁匠	300	50	被政府解散	1907
维捷布斯克					
	店员	300	200	被政府解散	1907
	裁缝	350	70	被政府解散	1908
	鞋匠	200	40	自行解散	?
	金匠	70	40	自行解散	?
	亚麻梳理工	400	50	被政府解散	?
	印刷工	130	40	仍然存在	?
	锁匠	200	20	自行解散	?
	面包工	150	30	自行解散	?

巴赫姆特：店员协会；尤佐夫卡：店员协会；巴甫洛格勒：裁缝协会、鞋匠协会、店员协会；奥尔沙：店员协会，建筑工人协会、裁缝协会、印刷工人协会、理发工协会（不合法的协会）；韦利什：裁缝协会、店员协会、林业职员协会（不合法的协会）；辛菲罗波尔：裁缝协

会、店员协会、鞋匠协会、铜矿工和管子工协会；费奥多西亚：裁缝协会、店员协会；梅利托波尔：裁缝协会；希托米尔：沙发制作工协会、木工协会（不合法的协会）；别尔季切夫：旋工协会（不合法的协会）；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克：裁缝协会、鞋匠协会、店员协会（合法协会）、木工协会（不合法的协会）。

对于上述数字需要作如下说明：被政府解散的行业协会往往变成非法的协会；一些协会自行解散是由于在当前条件下无法开展斗争，由于工人对组织工作准备不足，特别是由于群众对政治变得冷淡。

上述数字决不能提供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的全貌，但它们反映了党的工作的方向：党竭尽全力使各协会摆脱这种命运，呼吁群众在不可能建立合法协会的情况下建立不合法的协会；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党并不总是取得圆满的成功。

工会斗争的范围一般都非常小，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完全不利于开展这种斗争。

三、合作运动

犹太工人特殊的生存条件（他们分散在小作坊里，一些手工作坊仍然在支付实物工资，等等）阻碍了犹太无产阶级合作运动的发展。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进行两次建立消费合作社的尝试，一次是在维捷布斯克与社会主义者革命党人一道，另一次是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道。这两次尝试都得到工会的支持。

1908 年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建立的消费合作社吸引了犹太族和非犹太族工人的注意力。但由于商店开在非犹太族工人居住的城区，所以犹太工人参加得极少。在一年半卓有成效的发展之后，商店被政府解散。

1908 年，由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起来的铁路职员和工人对官办的铁

路消费商店表示不满，向我们党建议在维捷布斯克共同建立一家消费合作社。我们请求幸存的行业协会给予支持，但由于这些协会力量单薄，以及如上所述的犹太无产阶级的恶劣生存条件，我们未能完成铁路职工向我们提出的这个任务。铁路职工的独立尝试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迫害。

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人们尝试成立一个依靠裁缝协会的裁缝生产合作社和一个依靠烟草和造纸工人协会的生产餐具和纸袋的合作作坊。由于前一个协会被政府取缔，另一个协会活动变少，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 * *

在报告结束之际，我们可以向大家汇报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1910 年 6 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

党的各个地方小组所作的报告都指出，工人运动至今的不幸时期或多或少地结束了，工人群众再度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兴趣，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意志增强了。大会解决了一系列组织、政治、经济和民族方面的问题（工会问题，合作社问题，堂区问题和学校问题，等等），并明确规定了当前应对工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战术方针。

希望这次代表会议将极大地有助于使党的力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使党以新的力量与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一起投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进行的斗争。

俄国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

中央委员会

1910 年 7 月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联盟（“锡安工人”）致尊敬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联盟（“锡安工人”）请自己的使者向各国无产阶级转达成千上万犹太无产者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我们怀着希望和信心注视着千百万无产者在把工人从我们时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个讲坛。我们衷心希望并且坚信，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将给这个社会主义讲坛增光添彩，并为保障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的团结和使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更快取得必然的胜利作出贡献。

自从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在犹太工人群众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许多成就，但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猖獗的沙俄和阿根廷共和国的反动势力破坏了我们在两个国家中的组织，但我们运动的生命力和我们党员同志的不懈斗志仍然在我们在**俄国**的地下组织的团结一致和再度崛起中表现出来，它们创办了一份名为《自由之声》的机关刊物。与此同时，我们的周刊《面包和荣誉》在**阿根廷**问世了。在那些政治运动享有自由的国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美利坚合众国**，去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表明，我们在美国的党已经克服了经济危机。接受斯特罗夫斯基同志的纲领草案使党与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复国主义者统一的基础得以奠定，机关刊物《犹太斗士》周刊重新出版，发行规模扩大。在**奥地利**，党的报刊也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已经出版7年的《犹太工人》，党还出版一份

波兰文的月刊《我们的密码》，隶属于我们奥地利党的“犹太青年工人联合会”同样拥有一份犹太语月刊《犹太青工》。在**英国**，一份党的报纸《我们的声音》于几个月前在伦敦问世。在**罗马尼亚**，散布于加拉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等地的组织统一为罗马尼亚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锡安工人党）。

在**土耳其**和我们未来的国家**巴勒斯坦**，青年土耳其党的变革为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我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锡安工人党）在耶路撒冷拥有一家印刷所和一家出版社，并在两个月前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团结》，用犹太语向居住在巴勒斯坦和土耳其的犹太工人传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报刊的不断增加是衡量我们在各国的党取得的进步的最佳尺度。这些党于1907年8月在海牙、1909年12月在克拉科夫召开国际代表会议，成立了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联盟（“锡安工人”），并使之得到巩固。我们的联盟是各国犹太无产阶级的团结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这种团结深深扎根在犹太工人的心坎里。资本主义剥削、犹太问题的影响、同样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以及相同的文化和习俗促成了这个联盟的建立。

根据代表大会[①]章程目前的规定，我们的代表必须分到各国的支部中，但我们统一的国际组织和我们的原则使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我们于1908年10月向社会党国际局递交了一个提案，建议在国际工人协会[②]中设立一个包括所有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犹太支部**。在社会党国际局中有一个合适的和独立的代表，这是绝大部分有阶级觉悟的犹太工人的愿望。1909年11月，我们和其他政党就此事进行了磋商，我们已经

① 指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这里指第二国际。——编者注

向社会党国际局通报过此事。磋商的结果是：俄国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俄国锡安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我们的要求。

尽管如此，我们放弃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讨论犹太支部的问题。如下考虑和情况使我们这样做，为避免引起误会，我们希望对此作详细说明。

与行动受到不少限制的俄国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磋商费时很多，因此遵守提交有关犹太支部的提案时限不再可能。同时，由于我们组织的扩大——它遍布旧大陆和新大陆，举行支持犹太无产阶级的代表进入国际局的群众大会不再可能，特别是在犹太无产阶级最为集中的俄国，更不可能举行这样的活动。另外，其他民族的社会党人和同志们对于犹太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可能我们对此也负有责任，我们国际联盟的任务繁重而艰巨，这使我们迄今都未能着手用国际的工作语言出版印刷品和杂志。

可是，正是在我们联盟的办公室所在的国家发生一些事情使我们认识到，甚至在奥地利这样一个犹太工人人数众多和存在两个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人们都可能对犹太工人运动一无所知。例如，根据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命令，犹太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维也纳举行五一节庆祝活动时受到排斥，因为他们拒绝撤走印着用犹太文字书写的国际口号的旗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最近在议会提出国家对少数民族学校作出规定并提供资助的议案，但他们在提案中完全忽视了犹太民众的权利和文化需求，对于犹太民族在奥地利的存在置之不理。有鉴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党人对犹太工人运动缺乏了解。我们近期的任务是，在我们请求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就成立犹太支部作出决定前，与其他犹太社会主义组织一起深入地和详细地向参加国际的各党介绍我们的情况。

我们平静地等待着这个决定；我们认为，成千上万犹太无产阶级与

我们有同样的要求，社会党人的国际不可能否认犹太工人阶级的权利。

对于那种说我们企图通过建立犹太支部来表明犹太复国的要求的恶毒攻击，我们予以坚决的驳斥。我们纲领中没有任何规定可以证明这种无理指责是正确的。在社会党人的国际设立犹太支部是为了表明全世界犹太工人阶级的团结。此外，建立犹太支部意味着承认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自主地处理自己民族的事务、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使自己的民族得以自立——这是各民族社会党人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不是承认他们有权建立一个我们从未作为过奋斗目标的“犹太国”。

我们请求你们，尊敬的同志们，再次向大会代表转达我们兄弟般的衷心祝贺！

致予社会主义的敬礼！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联盟（“锡安工人”）办公室

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土耳其的形势

尊敬的同志们！

作为近邻，即巴尔干国家的社会党人，我们有必要借助代表大会向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通报当前土耳其的形势。在此之后，我们无疑要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受压迫的、手无寸铁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人民推行的闻所未闻的野蛮暴政提出共同的抗议。

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权在其建立伊始很快就获得了欧洲新闻界的支持，甚至大部分社会党的报刊对这一政权表示支持，只有极少数社会党的报刊对青年土耳其运动采取保留态度，这种态度被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社会党报刊对于发生在土耳其的革命事件表示支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土耳其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处于最危险的国际冲突和动荡的中心。土耳其本身的不断削弱和无政府状态，一方面激发了巴尔干地区各个小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怀有吞并巴尔干半岛、征服其“软弱”的人民的野心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看到这种野心有望不久能够实现。

青年土耳其运动爆发的时刻，正是马其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发展到顶点之时，**是土耳其面临列强反复干涉之时，也是欧洲面临新的冲突威胁之时**。巴尔干边界变动的可能性越大，这些歹徒们的破坏行动就越具有毁灭性，其唯一的结果是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自相残杀以致灭绝，在

巴尔干国家埋下仇恨和敌对的种子。列强的所谓“改革”行动根本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他们的干涉不是从为了按照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创造更容易忍受的条件，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吞并欲望准备条件。

出于这一原因，青年土耳其运动作为**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落空**的一种历史性因素而受到欢迎。青年土耳其运动被看做是摆脱欧洲危险的幸运的出路，青年土耳其党人以其国家和世界和平意想不到的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必须采取以复兴土耳其为目标的行动，战胜贪婪的列强，挫败他们的外交阴谋和煽动。

同时，由于宣布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各民族人民享受自由、平等和兄弟友爱，青年土耳其运动也得到本国基督徒的同情，并在国内外赢得很高的声望。因此，青年土耳其党在与**旧政权**斗争最关键时刻不仅获得受压迫的马其顿基督徒的同情，而且也获得他们最有力的支持。这些基督徒遭受土耳其特权阶层的寡头政治的奴役，最强烈地感到无法忍受旧政权。由于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文化和最先进的那一部分民众，因此更加难以忍受这一特权阶层。对于基督徒的热切希望和他们的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做出了许多承诺。

我们的目的是向各国社会党声明，青年土耳其党一点也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实际上他们的罪行和暴行大大超过阿卜杜尔·哈米德政权。

青年土耳其党没有给各民族带来他们宣称的自由、平等和兄弟友爱，而是采取各种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压制信奉基督教民族的复兴和发展；他们不允许人民自由参加和从事政治活动，而是通过土耳其统治阶层变本加厉地加强极端的管制制度。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不仅远离人民，而且特别无能、野蛮、腐败和嗜血成性。青年土耳其党不建造学校和文化设施，不修筑道路，而是盖了许多监狱，监狱里现在关满了无辜的人，人数超过旧政权被推翻之时。**旧政权时代，政府试图通过**

煽动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在这个地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青年土耳其党则直接采用最野蛮的镇压手段——戒严、种族灭绝、扼杀任何运动和剥夺每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力图永久地维持它对土耳其各民族独裁统治。他们根本不考虑解决农业问题，不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因为这样做只会增强人民的反抗能力，使他们更快地觉醒和扩大影响。这当然不符合青年土耳其党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采用酷刑、绞架和大屠杀，扑灭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前塞尔维亚人民的反抗。

这个20世纪的野蛮人的政权在镇压阿尔巴尼亚人民起义时采取的非人的野蛮手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年土耳其党人最终利用唾手可得的胜利，夺走人民手中的武器，把所有对其暴政的反抗持久地镇压下去。他们采取的手段，其残忍超过有关暴政的史书所记录的一切暴行。真是恶贯满盈！为了说明这个政权和土耳其形势的特征，我们从众多例子中举出几起告诉大家。土耳其的“救世主们”为了使马其顿获得“和平”，洗劫了所有村庄的村民，敲碎不幸的囚徒的手骨和脚骨，用鞭子把他们活活打死。这些最现代的“革命者”采用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折磨被捕者，把滚烫的鸡蛋放在他们手心里，用铁爪拔掉他们的手指甲和脚趾甲，把被处决者的尸体摆在行刑的地方示众达十天之久。一位神甫被用棒子打昏失去知觉摔倒在地，待他苏醒过来后，又再次被打昏，如此反反复复达八次之多。一名乡长的脚骨被打断，无法走路，只好用双手爬出监狱；一名乡长被打死，另一名自杀以结束苦难。被这个制度奉为至宝的绞刑架仍然在开动。官方发布的口号被各地狂热的和嗜血成性的穆斯林暴徒用来对付其敌人。不久前，武契特恩的一个基督徒在大街上被人用一把斧子像砍一根木头一样砍死。民众为了活命成群移民国外，或者逃进森林。

我们觉得，公开谴责这一政权，是在履行我们对这些不幸的国家的人民的职责，履行我们对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职责。我们相信，社会民主

党是最真诚地对这一吃人的政权进行抗议的唯一的政治力量。最后，我们希望，这个呼吁不会在国际社会党人中不起到任何作用。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始终及时和全面地了解各国的情况。**如果他们对土耳其的了解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社会民主党人不会根据一个政权所杜撰的所谓有利于“和平”的可疑作用来评判该政权，而是根据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自由和普遍进步提供的条件所起到的真正作用来评判。**无疑，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目标所在。

土耳其欧洲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

一、总的形势

资本主义在土耳其的兴起不是始于近期，尽管先前的专制、腐败、徇私枉法和贪污的体制明显阻碍了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1908 年 7 月的“革命”没有导致土耳其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它创造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我们的报告只涉及土耳其欧洲部分，希望通过我们提供的情况，大会对土耳其的形势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

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将土耳其的亚洲和欧洲部分连接在一起的城市，同时又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工业中心。根据 1907 年《东方杂志》发表的数据，君士坦丁堡有 40 多种工业，322 个工厂和 32000 名工人；这个数字不包括火车车厢制造、修建铁路的大工地以及一些小规模的作坊，这些地方雇用的劳工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

排名第二的工业城市是群岛上最大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①]；那里有 11 个不同工种的企业，拥有 20 家工厂和 1 万名工人。在亚德里亚堡[②]省，丝绸工业迅速崛起。仅亚德里亚堡市就有 4 个丝织厂，1 个雇有 350 名工人的铁路工地。在亚德里亚堡市周围和省里有不少雇用了 80—

① 即塞萨洛尼基。——编者注

② 即埃迪尔内。——编者注

200 名工人的磨粉厂、丝织厂和生产其他产品的工厂。这个省，特别是马其顿、斯凯确、兹拉马、卡瓦拉等地最重要的是烟草工业。斯凯确、兹拉马和卡瓦拉分别拥有 6000 名、5000 名和 16000 名烟草工人。

接着是与马其顿同等规模的小城市，如斯科普里（于斯屈布）、沃敦[①]、盖夫盖利亚、纳盖茨、科库什、塞雷斯，这些地方生产 1—4 种工业产品——丝绸、烟草、纺织或现代磨粉厂，比托拉（莫纳斯提尔）及其周围有 5 个工厂，有 4 个拥有 250 名工人的纺织厂和 1 个拥有 20 名工人的现代磨粉厂。

二、工人运动

以上数据表明仅仅土耳其重要的工业中心就拥有 10 万工人。在这些数据中，还可以加入土耳其欧洲部分其他一些不同行业的工人，如一些具有未来发展前景的、逐渐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正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制鞋、成衣行业的工人，还有煤矿和各类金属矿的工人。很多矿（如君士坦丁堡附近的赫拉克利亚）的成千上万的工人，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德迪亚加茨[②]、卡瓦拉以及其他港口的码头工人，商店、邮局和电讯局职员、铁路员工和农村的无产者，总之，所有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的雇工——众多的无产者——很自然地聚集到土耳其欧洲部分、马其顿和亚德里亚堡省。从一开始，雇主和雇工之间就孕育着无法避免的冲突。

在旧政权统治时，尽管工人斗争遇到强大的阻力，但劳资冲突并未停止，特别是在阿卜杜尔·哈米德统治后期。1902—1903 年间，斯凯

① 即埃德萨。——编者注

② 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编者注

确爆发了机械工人大罢工；1904 年，卡瓦拉烟草工人（8000 人）和萨洛尼卡地区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比托拉也举行了 150 名制鞋工人以及面包工人的罢工，萨洛尼卡发生了 50 名制鞋工人的罢工；1905 年，君士坦丁堡纺织工人举行大罢工，萨洛尼卡、斯凯确、沃敦和君士坦丁堡 800 名皮革工人举行罢工；1906 年，韦莱斯 150 名制鞋工人举行罢工，斯科普里 70 名制鞋工人和 40 名其他行业的工人举行罢工，韦莱斯成衣工人全面罢工，部分木匠、铁匠和制鞋工人举行罢工，萨洛尼卡阿拉丁陶瓷厂 450 名工人罢工。1908 年的 7 月“革命”之后，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斯科普里、盖夫盖利亚、亚德里亚堡、卡瓦拉、兹拉马、斯凯确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制鞋工人和成衣工人的罢工。

部分工人群众组织成立了工会和工人协会，但我们无法给出参加这些组织的确切人数；经过我们核查的确切数据是：君士坦丁堡有几个希腊工人的制鞋、制衣和印刷工人工会，1 个 350 名法国印刷工人的工会，1 个亚美尼亚工人的印刷工人工会和 1 个东方铁路工人工会。

此外，君士坦丁堡有几个土耳其人的组织，我们难以评价说他们的工作是有实效的。

萨洛尼卡的主要活动分子是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组织得非常好。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工会如下：1 个有 1000 名会员的烟草工人工会，1 个有 30—50 名会员店员工会（行业总共有 500 名店员），1 个有 500 会员的名为“光芒”的烟纸工人工会，1 个拥有 100 名会员的名为“未来社会”的工会，1 个有 40 名会员的冶金工人工会（行业总共有 300 名工人），1 个有 30 名会员的锡工工会（行业总共有 200 名工人），1 个有 50 名会员的天然羊毛织物工人工会，1 个有 40 名会员的石匠工会。希腊人的工会缺乏详细资料。

保加利亚人的工会有：1 个有 23 名会员的印刷工人工会，1 个有 30

名会员的制鞋工人工会，1 个有 20 名会员的铜匠工会，1 个有 20 名会员参加的成衣工人工会。

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卡瓦拉、兹拉马和斯凯确以希腊和土耳其人为主的烟草工人工会。

我们注意到，除保加利亚人的工会外，土耳其其他工会组织都落入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卡瓦拉、兹拉马和斯凯确的希腊人工会之间相互没有联系，完全受土耳其希腊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和摆布。按理当选的工会主席应当是高级神职人员、主教或大主教或者希腊著名的爱国领袖，而现在的领导人都是些民族主义分子和沙文主义者，大肆宣扬对其他种族的刻骨仇恨。

在同样的城市，土耳其组织全部都由“青年土耳其委员会”掌握领导权。在萨洛尼卡，“青年土耳其委员会”对犹太人工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这主要是通过 7 月“革命”后移居萨洛尼卡的一位名叫 A. 贝纳罗亚的保加利亚中间人和另外一位在“土耳其青年委员会”操纵下当选的议员 D. 弗拉霍夫的帮助下实现的。这位议员不懂土耳其语，根本不符合选举法的有关规定。

另外，工人群众由于没有文化知识，特别是土耳其工人根本不识字，非常愚昧无知。

三、社会主义运动

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在土耳其的系统兴起和宣传是在 1908 年 7 月“革命”之后。在保加利亚，尤其是在索非亚的亚德里亚堡和马其顿移民先前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1894 年，马其顿的韦莱斯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协会，由于政府的野蛮镇压，4 个月后被迫解散。

1895 年，在索非亚的马其顿和亚德里亚堡移民成立了“马其顿革

命社会党人小组”，试图在马其顿通过引进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文学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为此，他们还创办了《革命报》，该报出版 10 期就被勒令停刊。同年，马其顿爱国侨胞持续不断地尝试以小组的方式返回祖国，这引发了国内的动乱，阻止了他们实施后续行动。1897 年，他们发行了《政治自由报》，但很快被迫停刊，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将活动重心转移到马其顿。他们的许多成员潜入到了内中心区域，在工业重镇安置下来，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帮助下开始散发社会主义小册子，在自己的周围成立社会主义小组。在 1903 年，即“革命”爆发的前夕，这些社会主义组织和宣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正统派教会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1903 年发生的暴乱导致他们的活动全面瘫痪。

1904 年，在索非亚创立了新的“亚德里亚堡和马其顿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研究 1903 年暴乱后在土耳其开展活动的新办法。1907 年末，此项工作大功告成，他们宣布了将要实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在“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月通过了有关章程，并发行文件告知即将执行的原则和采取的行动方式。

1908 年 7 月的“革命”完全改变了土耳其欧洲地区社会党人的活动条件，“亚德里亚堡和马其顿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转移到了国内。土耳其欧洲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真正拉开了序幕。

今天我们拥有以下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对 4 个保加利亚工会有巨大影响并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萨洛尼卡小组，有 33 名成员；与拥有 89 位会员的混合工会保持联系的斯科普里小组，有 15 名成员；两个月前成立的君士坦丁堡小组，有 11 名成员；在其他一些城市，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小组和遍布四方的在思想上与我们一致的同志。

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核心小组都由土耳其唯一的一份社会民主运动机关报《工人火花》联系在一起。这份仅有两年历史的刊物已经

发行了8000份。两个月前，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发行了《劳动者》。在其他社会主义小组和《工人火花》编辑部的帮助下，我们小组发行了几本小册子，以进一步促进宣传和组织工作。下面是其中两本的书名：保加利亚语、希腊语、土耳其语和西班牙语版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印刷了4000册的保加利亚语版的《赤色工人历书》。

我们的组织，主要是萨洛尼卡、斯科普里、比托拉、斯凯确、亚德里亚堡和君士坦丁堡的组织在无产者中全力以赴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启蒙和教育劳动者。所有的劳资冲突、工伤事故、政治和社会事件都被用来组织和教育无产者。

我们的组织积极参加了在斯科普里举行的土耳其首次“五一”活动。我们还参加了1909年1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首届巴尔干地区社会党人代表会议。

结　论

前面所述说明土耳其欧洲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起始阶段，许多障碍阻挠了它前进的步伐，其中最大的阻力之一是绝大部分无产者，尤其是土耳其的无产者的愚昧无知和缺乏文化素养。

另一个困难是奥斯曼政府利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罢工和联合的法律，对“游民”实行体罚。最难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这种在邻国始终发生的冲突从未停止，成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社会主义运动真正的绊脚石。

还有一个障碍是君士坦丁堡“青年土耳其党”和议会的政策。与旧政权毫无两致，他们不但不想法减轻种族仇恨，反而人为地通过独有

的法律，甚至通过暴行来挑动矛盾。这里还要强调，带有民族偏见的资产阶级操纵者制造的障碍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希腊和土耳其工人组织之间。

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仍然坚信只要拥有良好的愿望，努力地工作，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希腊的进展以及在去年首届贝尔格莱德巴尔干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为这一事业打下的基础上，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使土耳其的社会主义将比从前更加自由地发展。

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依靠国际在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相信报告下面的情况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障碍且对推进土耳其社会主义宣传至关重要的是接纳政党加入国际的问题，当前国际准备接纳的政党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我们在社会党国际局的第一号公报中看到一个萨洛尼卡的“社会主义联合会”已经提出加入国际的申请。国际局执委会正在向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达什纳克楚纯”调查萨洛尼卡“社会主义联合会”的情况。“达什纳克楚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提供的情况是完全错误的。以下就是一个例子。该党举荐 D. 弗拉霍夫先生为“社会主义”议员代表，而此人的当选是萨洛尼卡“土耳其青年委员会”的意愿并得到其大力支持。此外，弗拉霍夫和该党的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土耳其欧洲部分“青年土耳其党”的工具或分支。不客气地说，萨洛尼卡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联合会”，国际接纳的不是社会主义组织，也不是单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而是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打着“社会主义联合会”旗号的组织，它接纳的是执政党的代表“土耳其青年”分支或至少是这个分支中的主要干将弗拉霍夫和其核心成员。这将成为我们在工人群众中推进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大障碍。青年土耳其上层旨在利用国际在工人组织中制造混乱和错觉，动摇他们的斗争意志。

我们提醒国际局注意此事，希望国际局拒绝通过借助接纳虚假的萨

洛尼卡“社会主义联合会”分支而接纳“土耳其青年党”。这样的决定是对我们这些在土耳其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同志的最有力的支持。

亲爱的同志们，请接受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兄弟般的敬意。

土耳其欧洲地区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及其
机关报《工人火花》和《劳动者》代表
V. 格拉维诺夫

附　录

美国社会党全国书记
向1910年5月15日全国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代表同志们和全美国的同志们：

我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将在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它为全体党的代表们提供了首次机会，使他们自己能够集中精力过问组织、鼓动和宣传上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而不受运动日常工作的干扰。

而且，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正追随着在往昔更悠久的运动中那些同志们做出的榜样。

陌生的人和那些没有门路的人总是不受信任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另一方面，个人接触足以消除误解，促进和谐并解决莫须有的分歧。

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们为此目的而经常在一起聚会，这是特别有利的。

但是，必须为此制定规章制度，以保证聚会的实际开支不致成为党员们的过分负担，甚至更糟，造成动用全国组织的基金而影响到正常而必要的鼓动工作的后果。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正巧是在国际社会党和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之前。国际代表大会将于今年8月28日在哥本哈根开幕，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或讨论的许多文件和问题将能通过社会党国际局的事先呈交给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吸引世界社会党人的注意力。

国际局为准备国际代表大会，专门要求它所属的各国党就自1907年开始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报告，这些报告印刷规格一致，英文、德文和法文每种文字各提供一千份。它还要求报告所涉及的主题要遵循同样的次序。本报告的内容安排正是按照国际局的要求作出的。

全国执行委员会为了便于美国党向国际代表大会作出报告，采取了如下措施，即：

“指示全国书记准备一个报告，并将这一报告提交执行委员会。”

“全国书记的报告将按照国际局所作的规定和要求上呈。”

党章和全党公决

自从上一次修改党章的党的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公决，党章有如下的变动：

1909年1月31日的全党公决决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书记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条款，由这些官员经全党投票选举产生（采用选择选举制[①]，并按照候选人自己的选择编入按字母顺序编组的名单）取代。

同一次公决废除了关于党的大会和代表大会的旅程津贴费用估算的规定，代之以为此目的拨出全党每月党费的百分之十的规定。

同一次公决还废除了全党公决所需附议者人数的期限（90天）。

这几个动议的表决，最高的赞成票为10158张，最低的赞成票为6730张；最高的反对票为5725张，最低的反对票为1813张。

---

① 指由选举人在选票上标出对各候选人的选择顺序，当第一选择的票数均不超过半数时可将第二、第三等选择的票数一并计入后决定当选人。——编者注

1909 年 11 月 10 日的全党公决决定：废除在选举全国性官员时按字母顺序编组的条款，规定在单数年份举行选举；候选人需要五个地方党组织的提名才能取得资格，并实行一种轮流任职制度——在得票相同时，候选人轮流担任其竞选的职务。第一个动议，赞成票 3920 张，反对票 2865 张。第二个动议，赞成票 5183 张，反对票 3352 张。

全党公决动议的失败

1909 年 4 月 24 日对如下动议进行了全党公决：全国执行委员会将永久设于全国总部并组建办事班子；党费增加到每月 20 美分，党费总金额由州的和全国组织平分。表决结果，赞成票最高为 4052 张，最低的为 2439 张；反对票最高为 8493 张，最低为 6483 张。

1910 年 2 月 10 日对如下动议进行了全党公决：用新党章代替旧党章，新党章包含如下的条款：全国书记的月薪定为 75 美元；全国总部设于书记的住宅；取消全国执委会和全国委员会；选举出由 5 名委员组成的竞选委员会，以便在总统选举运动期间展开工作；政治候选人的提名要经过全党公决；每个有组织的州每月捐献 5 美元以支持全国组织，等等。表决结果：赞成票 2334 张，反对票 9318 张。

1910 年 4 月 6 日对如下动议进行了全党公决：取消有关党的代表大会的条款。赞成票 3740 张，反对票 5020 张。

在 1909 年 7 月的全国执委会会议上，如下动议得以通过：

“我们向全国委员会建议，对全国组织员的补贴定为每天 4 美元并加上开支费用。”

该动议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会支付给他们的组织员的补贴高

于社会党，因为工会的支付标准是由他们现行的工资水平决定的，或是与此有关的。而且，正如全国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

“全国执委会也感受到这样一种广泛批评的压力，即我们的全国组织员并没有成功地深入到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中去，它采取措施派遣特别组织员进入工会。迄今试验的结果，这项工作较之任何形式的宣传都更富有良好的成效。

为了这一工作，我们发现需要有积极从事工会工作的最干练和最富有生气的同志们的效劳。但是要得到这样一些同志的效劳，我们也发现完全有必要为他们支付相当或者接近于公认的工会的工资标准。而且，除了不这样做就不能使这些人参加此工作的事实之外，我们相信，社会党本身也应该蔑视向它的公仆支付低廉的工资。”

上述动议为全国委员会通过，并且于1909年8月30日以赞成票32张、反对票19张和弃权票8张的表决结果被采纳。

1909年2月9日，全党对下列动议进行了公决：“指示全国委员会恢复旧的工资标准，即支付全国组织员和发言人每天3美元再加上开支费用。”这次全党公决赞成票为5740张，反对票为3071张。

1909年9月7日，全党对党纲的如下修改进行公决：

在总要求部分第二条中删去“和所有土地”的字样。

在党的原则部分，紧接“使之为集体所用”的字样之后插入下列一段文字：“土地不能有任何绝对的私人所有权。一切私人所有权，无论是称为继承者的绝对处置权还是别的什么，都要而且必须从属于公共所有权。社会党为阻止土地被用于剥削和投机目的之行为而斗争。它主张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控制和集体经营，并尽一切可能来达到这一目的。党并不反对那些以有益的和诚实的方式使用土地并不进行任何剥削的人拥有土地。”

第一个动议获赞成票5382张，反对票3117张；第二个动议获赞成

票 5926 张，反对票 2565 张。

在付诸全党公决的事项中，为了防止议案内容的相互矛盾，也为了消除那些不重要的问题，并把公决限于党章、政策和行政管理等问题的改变，应当重新实行有关公决时限的规定，在合理规定的时期内必须得到足够的附议者的支持才能举行公决。

党的管理

党的最高权力在于全党公决，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权力在此之下，而全国执行委员会只是处理紧迫的行政事务或具有执行性质的事务，它们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全国委员会的审议，后者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拥有倡议新工作和解释新政策的较大的权力。

全国委员会由每一个建立了党组织的州派出一名代表，加上每两千名党员或者每个主要的分支机构派一名代表组成。全国委员会被授权可以在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时候召开会议。然而，这个委员会自从 1903 年于圣路易斯举行过会议以来从未再召开过会议。这期间它的所有事务都是经过通讯方式处理的。

1907 年共有 37 项动议被提交全国委员会，1908 年有 41 项，1909 年有 10 项，而 1910 年迄今只有 3 项。

这些动议的大部分属于行政事务或者与党对当时的公共问题采取的行动有关。此外，这个机构选举了各种委员会和小委员会，还增选了一位国际书记，那就是维克多·路·伯杰同志。

同样，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在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时候召开会议。自从上届党的大会（1908 年 5 月）以来已召开过 11 次全国执委会会议，每次只占用两天或稍多一点时间。这些会议召开的情况如下：

1908 年：5 月 18 日的会议部署了贯彻党的大会决议以及就此举行

全党公决的安排，任命了一名常设的妇女组织员，解决了旷日持久的内布拉斯加州的争议，讨论了全国办事处的财政以及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的前景。

6月11日的会议选出了竞选运动的发言人；制定了总统候选人初选办法；决定了竞选材料和宣传事宜（其中包括致农民的传单）；建议明尼苏达州的同志们在大选之后支付备案费用，同时在法庭上对候选人提名法进行抗议和抨击。此外，会议决定对那些看来非常有希望的国会议员选区给予特别关注；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同志受委托编写一本竞选宣传读物。

7月10日的会议就出版几种传单和小册子作出规定，命令出版《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指定《同志的工作》刊物编辑这份记录，详细讨论并批准了租用一辆社会的竞选专列问题，并授权为大选专列的财政资助发表一项呼吁。

8月15日的会议主要讨论有关专列的问题，指示全国书记完成各项安排，并与耶莱克斯先生为拟议中的截至25日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海岸往返竞选旅行签署合同。

12月18日的会议指定各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就组织工作、社会主义学习课程、会议、文学、报刊、工会运动、在农民中的宣传以及竞选方法等主题作报告，要求全国委员会增选一名国际书记，讨论了讲外语的党员组织的条例，提醒人们注意美国联邦主义者的社论对社会党竞选经费的攻击，为全国书记提供了一张总金额为一万美元的支票，委任克莱德·J. 莱特同志为内布拉斯加州临时州委书记（在全国办事处的指导下工作）；为出版关于入籍法的小册子作出了规定，指定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提案为妇女宣传专日，并推荐类似主题为给五一节庆祝时采用的主题。

1909年：1月22日的会议召开时，收到了12月会议所指定的各委

员会提出的专题报告；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包括上述报告的内容，书名为《组织和鼓动——途径与手段》。会议安排出版《每周课程》杂志，兰德学校受委托准备出版这份杂志。从 1909 年 11 月 6 日开始至 1910 年 4 月 30 日，在 33 种党的报刊上单刊登了 26 期《每周课程》。这些报刊的总发行量约为 5 万份。

4 月 9 日的会议召开时，《华盛顿新闻服务报》问世，由弗雷德·H. 梅里克同志负责；会议制定了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进行更有效的社会主义宣传的计划。

7 月 23 日的会议对出版关于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的小册子作出安排，指定了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以及讨论的题目，选出派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并要求批准增选出来的书记伯杰同志出席 11 月 8—10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局会议。

12 月 11 日的会议主要考虑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专门的宣传；提出了一项呼吁，号召党员提名出席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再一次确定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为妇女宣传专日。

1910 年：4 月 9 日的会议决定使用更少的全国组织员，专门考虑了文学运动，对《每周社会主义课程》显示了足够的兴趣，决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同样的教材。会议授权全国书记就工人运动或公共生活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印发传单，给予全国书记的支票减少到 5000 美元。此外，会议为本届党代表大会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除了这些会议上所采取的行动之外，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几乎经常有通讯联系，并且经常在通讯中提出动议。

党的公报或党报上发表的特别呼吁或启事常常被授权代表各种以外国语出版的报刊，同样，这也适用于对其他重要目标的支持。

我们不时给比较薄弱的州的组织员拨款或发放每日津贴，拨款应对某个特定地方出现的特殊情况，或者帮助斗争中的讲外语的党员的组

织，具体情况如下：

新罕布什尔州，125 美元；斯洛文尼亚人，60 美元；佛罗里达州，60 美元；威斯康星州，84 美元；波希米亚人，98.18 美元；佛蒙特州，30 美元；肯塔基州，60 美元；阿拉巴马州，100 美元；克罗地亚人，120 美元；拉脱维亚人，41.61 美元；西班牙人，90 美元；路易斯安那州，60 美元；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50 美元；波兰人，200 美元；宾夕法尼亚州，60 美元；俄克拉荷马州，180 美元；西弗吉尼亚州，60 美元；《新生活报》（德文报纸），300 美元。在宾夕法尼亚的总罢工期间，《纽约呼声报》被授权每日发行特别增刊，花费了 250 美元；为弗里曼·诺尔斯同志辩护，200 美元；为《新堡垒报》、《自由报》辩护，25 美元。

党的组织

在本文件的范围之内，我还必须报告，在 1907 年 1 月 1 日，从保全州一级组织的角度看，存在着 39 个州或区域的党组织，其下属地方组织共有 1900 个。党员人数为 26784 人。目前，有 42 个州存在党组织，其所属地方组织和支部共计 3200 个以上。这样，尚无组织的州只剩下列几个了，即特拉华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前景是光明的，在不久的将来至少可以使若干个这样的州加入有组织的州的行列。同时，从更大范围看，在夏威夷、阿拉斯加、南美洲、古巴、波多黎各、墨西哥、南海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和菲律宾，也还有一些地方的组织或党员都从属于我党的全国机构。在过去 4 个月内有 53375 名党员交纳党费。

财务状况

收入

[从1907年到1910年4月30日（含），单位：美元]

	1907	1908	1909	1910	总计
节余转账	—	—	—	—	117.58
党费	17763.45	25154.01	25154.31	10645.01	79096.78
捐赠	1131.64	2528.31	1145.07	265.86	5070.70
出版物	1414.06	5980.58	1714.36	1350.23	10459.23
徽章销售	560.42	1079.59	706.21	305.64	2651.86
西部矿工联合会抵抗基金	10810.48	1003.88	—	—	11814.36
全国竞选基金	113.52	4043.74	215.39	36.25	4408.3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金	644.33	—	—	—	644.33
一天工资基金	45.65	—	—	—	45.65
全国组织基金	1218.86	—	—	—	1218.86
《分区社会主义报》和《纽约呼声报》	233.50	90.50	115.25	12.75	432.00
红色专列基金	—	41213.80	—	—	41213.80
红色专列退款和旅费	—	649.39	—	—	649.36
代表旅程津贴	—	610.65	—	—	610.65
红色专列贷款	—	3100.00	—	—	3100.00
旅程津贴估算数额	—	8929.41	—	72.50	9001.91
政治难民基金	—	—	354.51	2.00	356.51

（续表）

	1907	1908	1909	1910	总计
意大利地震基金	—	—	74.20	—	74.20
明尼苏达候选人提名法基金	—	—	162.28	2.00	164.28
瑞典罢工者基金	—	—	6318.91	302.43	6621.34
西班牙囚徒基金	—	—	305.35	11.20	316.55
密尔沃基竞选基金	—	—	—	576.88	576.88
其他	162.91	174.48	47.30	0.63	385.32
总计	34098.82	94938.13	36313.14	13583.38	179051.05①

支出

［从1907年到1910年4月30日（含），单位：美元］

	1907	1908	1909	1910	共计
刊物交换	33.79	94.84	48.15	22.36	199.14
总务开支	77.72	314.60	196.43	70.57	659.32
快递运费	229.71	1733.29	539.53	447.46	2949.99
邮资	1439.51	3535.53	2290.78	924.04	8189.86
电报和电话费	117.68	579.44	228.96	149.33	1075.41
办公室租金	1150.00	1200.00	1200.00	400.00	3950.00
文献	828.56	2764.78	1092.93	383.94	5070.00
公报印刷	1263.50	1959.40	1442.40	437.73	5103.03
印刷	2983.87	9389.63	2154.14	1019.43	15547.07
照明	115.32	96.41	—	—	211.73
办公设备	76.70	1186.84	28.90	17.52	1309.96
全国执委会会议	630.95	881.50	1040.10	364.00	1916.55
工资	5568.27	10071.95	6324.00	2248.50	24212.72
讲演者津贴	5073.94	10308.95	7069.33	2711.52	25163.74

① 数字有误，原文如此。——编者注

（续表）

	1907	1908	1909	1910	共计
西部矿工联合会抵抗基金	10810.48	1003.88	—	—	11814.3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金	644.33	—	—	—	644.33
文具等	278.11	674.08	418.54	203.35	1374.08
党徽	705.82	1393.40	960.05	142.44	3201.71
《芝加哥社会主义日报》	700.00	203.02	—	—	903.02
印刷品等	—	429.55	—	—	429.55
红色专列	—	34188.75	—	—	34188.75
《纽约呼声报》	—	500.00	500.00	—	1000.00
代表旅程津贴	—	7910.73	—	—	7910.73
党代会会议记录	—	924.75	—	—	924.75
偿还红色专列贷款	—	3100.00	—	—	3100.00
意大利地震基金和西班牙囚徒基金	—	—	379.55	11.20	390.75
政治难民基金	—	—	354.51	2.00	356.51
明尼苏达候选人提名法基金	—	—	150.00	50.00	200.00
华盛顿新闻服务	—	—	480.00	—	480.00
《新生活报》	—	—	300.00	—	300.00
瑞典罢工者基金	—	—	6318.91	302.43	6621.34
密尔沃基竞选基金	—	—	—	576.88	576.88
旅程津贴储备基金	—	—	2110.30	1064.45	3174.75
其他	922.67	649.45	1021.04	756.95	3350.11
总计	33650.67	95094.77	36648.55	12306.1	177700.35
结余					1350.70
1910年5月1日					179051.05
旅程津贴储备基金					3174.75
预付给代表的款项					605.50
旅程津贴储备基金结余					2569.25

资产

1910 年 5 月 10 日账面结余	3252.96
地方的和州未结账目	386.50
库存文献	3290.62
库存党徽	470.61
文具、账本等物资	540.94
办公室、家具和固定装置	1497.60
《社会主义日报》代用券	167.25
《纽约呼声报》代用券	991.00
总资产	10597.48

债务

拖欠组织员：	
约翰·M. 柯林斯	66.35
莉娜·莫罗·刘易斯	259.19
安娜·A. 梅利	345.86
约翰·M. 沃克	406.22
C. J. 莱特	4.00
	1084.62
H. G. 阿代尔	12.00
H. G. 阿代尔印刷公司	130.00
鲍曼自动化处理公司	15.00
兄弟出版公司	2.00
中央印刷和雕版公司	150.00
联合剪报公司	10.00
A. B. 迪克公司	10.50

（续表）

M. 弗赖公司	41.55
福克斯打字机公司	0.80
弗雷德里克·古米	7.50
约翰·F. 约尔丹	10.00
利维打字公司	7.50
詹姆斯·H. 奥尼尔	60.00
P. F. 佩蒂伯恩公司	39.40
《进步妇女》	3.00
拉德尼茨卡·斯特拉扎	18.00
扫罗兄弟	21.50
L. C. 斯密斯打字机公司	8.90
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	37.75
威尔希尔图书公司	100.37
总欠款	1771.33
结余	8826.15
共计	10597.48

党费收入

（1907 年至 1910 年 1—4 月）

州名	1907	1908	1909	1910
阿拉巴马	20.00	41.50	48.50	22.00
亚利桑那	60.00	48.00	65.00	50.00
阿肯色	75.00	160.00	95.00	78.00
阿拉斯加	—	13.40	1.50	13.20
加利福尼亚	344.87	480.00	525.00	295.00
科罗拉多	99.00	196.00	181.75	112.80
康涅狄格	100.00	86.50	130.00	96.50

（续表）

州名	1907	1908	1909	1910
特拉华	—	10.00	—	10.00
佛罗里达	—	29.00	38.00	37.50
佐治亚	13.30	8.00	18.40	10.60
夏威夷	—	4.00	4.00	8.00
爱达荷	55.65	129.25	111.10	81.65
伊利诺伊	532.75	536.00	725.00	750.00
印第安纳	122.25	161.10	199.65	199.50
衣阿华	128.70	195.00	150.00	150.00
堪萨斯	140.00	295.00	228.00	260.00
肯塔基	32.00	35.00	55.00	34.00
路易斯安那	22.50	60.00	45.00	55.00
缅因	52.00	58.24	59.00	73.00
马里兰	35.10	45.00	65.00	92.50
马萨诸塞	340.35	378.50	518.20	572.70
密歇根	186.95	204.20	280.60	255.40
明尼苏达	251.40	327.80	366.80	513.85
密西西比	12.30	4.20	15.70	8.70
密苏里	200.00	326.00	257.80	300.00
蒙大拿	97.95	165.05	93.85	114.90
内布拉斯加	30.40	83.50	88.70	60.00
内华达	48.00	51.10	45.00	54.00
新罕布什尔	26.10	41.90	51.50	76.50
新泽西	250.00	200.00	250.00	400.00
新墨西哥	26.70	41.25	40.00	26.00

（续表）

州名	1907	1908	1909	1910
纽约	560.00	650.00	800.00	850.00
北卡罗来纳	17.30	35.80	11.30	6.20
北达科他	—	37.75	41.90	62.00
俄亥俄	316.55	362.50	518.85	523.00
俄克拉荷马	310.00	556.20	285.00	2000.00
俄勒冈	159.00	216.50	200.70	165.15
宾夕法尼亚	553.12	440.40	648.35	750.20
罗得岛	33.00	28.00	45.00	45.50
南卡罗来纳	—	—	6.70	16.00
南达科他	46.10	77.75	62.50	34.95
田纳西	25.00	22.00	40.00	20.00
德克萨斯	102.35	309.30	293.30	259.90
犹他	10.00	72.00	73.10	48.20
佛蒙特	12.00	7.00	9.95	11.95
弗吉尼亚	9.00	13.80	25.20	20.40
华盛顿	201.10	318.70	144.50	234.00
西弗吉尼亚	27.50	35.50	35.00	40.00
威斯康星	396.40	391.55	409.05	481.10
怀俄明	33.60	130.70	108.31	138.01
巴拿马	4.50	—	—	—
波多黎各	—	—	—	1.10
其他地区	6.10	27.20	25.40	22.85
华盛顿特区	19.00	—	—	—
总计	6144.89	8147.25	8536.51	10645.01

总统竞选运动

在这期间进行的大选，可以慎重地说，为此进行的宣传是前所未有，以致过去多年的宣传与总统竞选的这短短几个月的密集宣传相比简直相形见绌。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公民在这个日子里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08年角逐白宫的竞赛中有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讲坛和一位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那时的报刊合订本几乎毫无例外地显示出报刊对这些事实的注意。许多发行量极大的出版物以广大篇幅从事竞选事件的报道，更无需提到无数论述总统竞选运动的文章充斥于当时的报章杂志和那些颇为自负的期刊上。

竞选运动不仅导致一般所说的“吸引人们注意”的宣传，而且也带来选票，虽然这一事实在最初看到大选报表数字之时未必会清楚地表现出来。人们必须记住，被断言为激进民主派的候选人进行了他最后的抗争，并且把支持他的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抱有最后希望的力量重新集结了起来。

此外，美国劳工联合会那时已通过它的执行委员会首次作为一种党派力量进入全国大选运动，它投了民主党的票，该组织的主席从事积极的运动以支持民主党。

1908年的竞选运动的因素和问题很难与前几次竞选运动作比较；人们几乎不能找到一个相同的条件。诸如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兴旺时期（经济繁荣?），广泛的罢工浪潮，不利于布赖恩的工业的不稳定，恐慌肆虐的时期，普遍失业的状况，大量工人因居无定所而丧失投票资格，雇主——提供工作的阶级——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和问题都会使

社会党在最近这次竞选运动中得票减少，使保守主义成为当前的主流。

由于缺少证据，我们不能断言说有充足的理由怀疑社会党所获选票远远多于计票结果。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没有理由抱怨。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组织工作应吸取的教训。我们不仅要敢于发表反对资本主义的宣言，而且还必须表现出必要的决心、力量和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以使每一张投出的选票都成为我们的选票。

为了保存纪录，特向大会呈上一份社会党所获选票的对照表：

1900—1908 年美国社会党所获选票

	1900	1902	1904	1906	1908
阿拉巴马	928	2312	1853	389	1399
阿肯色	27	—	1816	2164	5842
加利福尼亚	7572	9592	29533	19515	28659
科罗拉多	684	7177	4304	16938	7974
康涅狄格	1029	2804	4543	3005	5113
特拉华	57	—	146	149	240
佛罗里达	603	—	2337	2530	3747
佐治亚	—	—	197	98	584
爱达荷	—	1567	4954	5011	6400
伊利诺伊	9687	20167	69225	42005	34711
印第安纳	2374	7111	12013	7824	13476
衣阿华	2742	6360	14847	8901	8287
堪萨斯	1605	4078	15494	8796	12420
肯塔基	770	1683	3602	1819	4185
路易斯安那	—	—	995	603	2538
缅因	878	1973	2106	1553	1758
马里兰	908	499	2247	3106	2323
马萨诸塞	9716	33629	13604	20699	10781
密歇根	2826	4271	8941	5994	11581
明尼苏达	3065	5143	11692	14445	14527

（续表）

	1900	1902	1904	1906	1908
密西西比	—	—	393	173	978
密苏里	6128	5335	13009	11558	15431
蒙大拿	708	3131	5676	4638	5855
内布拉斯加	823	3157	7412	3763	3524
内华达	—	—	925	1251	2103
新罕布什尔	790	1057	1090	1011	1299
新泽西	4609	4541	9587	7766	10249
纽约	12869	23400	36883	25948	38451
北卡罗来纳	—	—	124	—	345
北达科他	518	1245	2017	1689	2421
俄亥俄	4847	14270	36260	18432	33795
俄克拉荷马	815	1963	4443	4040	21779
俄勒冈	1495	3771	7651	17033	7339
宾夕法尼亚	4831	21910	21863	18736	33913
罗得岛	—	—	956	416	1365
南卡罗来纳	—	—	22	32	100
南达科他	169	2738	3138	2542	2846
田纳西	401	—	1354	1637	1870
德克萨斯	1846	3615	2791	3065	7870
犹他	717	3069	5767	3010	4895
佛蒙特	371	—	844	512	547
弗吉尼亚	145	155	218	—	255
华盛顿	2006	4739	10023	8717	14177
西弗吉尼亚	268	—	1572	2611	3679
威斯康星	7095	15970	28220	24916	28164
怀俄明	—	552	1077	1827	1715
海外领地：					
亚利桑那	—	510	1304	1995	1912
新墨西哥	—	—	162	211	1056
总计	96931	2234940	409230	331043	424483

社会主义报刊

如前所述，支持党的出版物因其提供的援助而受到最高的赞誉。它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给党的通讯提供不受限制的版面，并且在组织工作中给予了真诚的合作。

去年，政府官员将不可能办到的邮递规则强加于财政上有困难的出版物，企图以此来阻碍社会党和自由派的报刊。看来，眼下的抗议运动使他们的这些决定被束之高阁。与此有关的一个不祥事件是《诉诸理性》周刊的编辑弗雷德·D. 沃伦同志的被捕，联邦政府的理由是他传播了缉拿肯塔基州前州长泰勒的悬赏告示，当时，这位州长是司法部门追捕的逃犯，被控谋杀罪。沃伦同志被判有罪并被课以1500美元罚金和6个月的徒刑。当局无视这样的事实，堪萨斯州吉拉德市的邮政局长早已证明沃伦同志在邮出告示之前就已获得同意。

这个使沃伦同志受到指控的行动，是对西部矿工联合会事件的一个突然的反击。因为沃伦同志正直地参与了这一事件，并在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工作人员的申辩中竭尽全力使他们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人员在科罗拉多被绑架，并被押送到爱达荷。

从政府提出指控到开庭审讯沃伦同志期间，前州长泰勒获得了赦免并代表联邦当局作为主要证人露面。

大家应该知道，斯科特堡审讯的记录证明泰勒州长从未被指控过，从未被指责有罪，自然，他也从来不是司法机关缉捕的逃犯，虽然举世皆知这样的记录不过是一派谎言。

在过去几天之内，沃伦同志在圣保罗出庭接受复审。他个人向法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绑架一名工作人员是不是合法的？提议去绑架一名资产阶级政客是不是一种罪行？至于法庭重新审理结果如何，截止本文写作时尚未能得到消息。

再谈有关报刊的问题。对于运动的一个危险就是布置同志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开办一家地方报纸，这种报纸就其性质而言，注定常常会夭折早亡。

两家英语日报对于美国工人的价值，当然不能估计过高。《芝加哥社会主义报》创刊迄今不到四年，《纽约呼声报》存在还不足两个年头，它们都被针对工人阶级的野蛮阴谋扼杀在襁褓之中。使一切暴露在公众面前，已经证明是对付这种阴谋的极为有效的手段。

外文日报的价值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它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创办一家英语报纸往往必须事先发起一个运动，而通常情况下极少有，甚至没有组织作为靠山的寥寥几个外国同志却创办了外语报纸，这些报纸已经或正在从事着相应的运动。

党的全国办事处列入交换名单的社会主义报刊

日报（英语）

名　称	通讯地址	年订阅费(美元)
《芝加哥社会主义日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华盛顿街 180 号	3.00
《纽约呼声报》	纽约市珀尔街 409 号	3.00
《每日纪录报》	南达科他州利德市	3.00

（续表）

周刊（英语）

名 称	通讯地址	年订阅费(美元)
《卡顿周刊》	加拿大魁北克省考恩斯维尔	0.50
《灯笼》	南达科他州戴德伍得市范布仑街50号	1.50
《世界》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第17大街523号	1.00
《常识》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东梅因街649号	0.50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德雷克塞尔大道5623号	0.50
《诉诸理性》	堪萨斯州吉拉德市	0.50
《俄克拉荷马社会党人》	俄克拉荷马州邓肯市	1.00
《农民周刊》	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市	0.25
《圣路易斯劳工》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第四大街212号	1.00
《蒙大拿新闻》	蒙大拿州海伦娜市	0.50
《劳工》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梅因街401号	1.00
《保卫劳动者》	宾夕法尼亚州科尔戴尔市	1.00
《社会民主先驱报》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第六大街344号	0.50
《西部号角》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	1.00
《矿工杂志》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铁路大楼605号	1.00
《克利夫兰市民》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尚普兰大道310号	0.50
《先锋报》	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市	0.50
《工业民主党人》	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市	0.50
《代言人》	堪萨斯州加登市	1.00
《芬德利呼声》	俄亥俄州芬德利市	0.50
《韦尔奇周刊》	堪萨斯州威奇托市	0.50

（续表）

名　称	通讯地址	年订阅费(美元)
《威尔希尔杂志》	纽约市威廉大街200号	0.25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东坎齐街118号	1.00
《同志》	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东七街436号	0.50
《竖琴》	纽约市东第155街436号	0.50
《教育进步杂志》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拉萨莱街45号	0.50
《进步妇女》	堪萨斯州吉拉德市	0.50
《新时代》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南高街184号	0.25
《事业家》	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	0.15
《进化论者》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华盛顿街180号	0.75
《小小社会主义者》	纽约市斯普鲁斯街15号	0.50
《自由报》（双周刊）	宾夕法尼亚州纽卡斯尔市622号邮箱	0.50
《世界公断人》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第一大街713号	0.50

日报（外文）

名　称	通讯地址	年订阅费(美元)
《正义报》（波希米亚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卢米斯街679号	4.00
《美国工人报》（波希米亚文）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百老汇4032号	1.00
《人民报》（德文）	纽约市斯普鲁斯街15号	6.00
《日报》（德文）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卡洛威尔街613号	3.00
《前进报》（犹太文）	纽约市东百老汇175号	3.50
《人民报》（波兰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密尔沃基大道959号	3.00

周刊（外文）

名 称	通讯地址	年订阅费(美元)
《新生活》(德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华盛顿街180号	1.50
《工人周刊》(德文)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南四街212号	2.00
《前进》(德文)	纽约市斯普鲁斯街15号	1.00
《工人周刊》(波兰文)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第六大街15号	1.50
《平等》(斯洛伐克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卢米斯街679号	1.25
《无产者》(斯洛文尼亚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蓝岛大道2146号	1.50
《歌舞团》(丹麦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北大道2639号	1.00
《社会主义言论报》(意大利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蓝道大道874号	1.00
《工人世界》(犹太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十二街739号	1.00
《定居者》(芬兰文)	马萨诸塞州菲奇堡梅因街392号	2.50
《同志》(芬兰文)	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市第十和杜安街	2.00
《工人杂志》(芬兰文)	密歇根州汉考克市	2.75
《工人联合会》(法文)	宾夕法尼亚州沙勒罗伊市	1.50
《先锋》(匈牙利文)	纽约市第二大道1528号	1.00
《工人》(拉脱维亚文)	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市百老汇28号	3.00
《科瓦》(拉脱维亚文)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南二街418号	2.00
《继续》(挪威文)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锡达大道415号	0.50
《工人后卫》(克罗地亚文)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中心大道1800号	1.00
《未来》(犹太文)	纽约市迪维辛街141号	1.00
《俄裔美国工人》(俄文月刊)	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麦克沃特街208号	1.00
《瑞典社会主义者》(瑞典文半月刊)	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第七大街330号	0.50

关于坐落在纽约市的兰德学校、大学校际社团、社会主义主日学校，坐落在明尼苏达州史密斯维尔市的芬兰社会主义学院，以及其他从事教育的机构，也有许多可讲。但所有这些主题不是已经在正式的每月公报上受到了广泛报道，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提交的其他文件中得到说明。

国际行动

我们党与社会党国际局以及它所属各支部的关系是最愉快的、兄弟般的和热情友好的。我们所有的出版物，各个种类和各种性质的，都按惯例送交国际局。遵照国际局的倡议，必要的情报也根据需要转送给每一个国家，而财政援助也是只要有可能就按要求提供。

美国社会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它对阶级团结的确认，也许能在下列表格的数字中得到体现：

1907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流血星期日基金（至年终）	3312.01 美元
1908 年：	
西部矿工联合会抵抗基金（至年终）	15956.15 美元
1909 年：	
政治流亡人员保护基金	354.51 美元
意大利地震基金	74.20 美元
瑞典罢工工人基金	6318.91 美元
西班牙囚犯基金	305.35 美元
总计	7052.97 美元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议程和任务

1. 合作社与政党的关系。合作社应该保持中立而独立于政治组织，还是应该通过个人纽带与之联系，抑或加入政党呢?

2. 失业问题。汉特同志将就这一问题作报告。

3. 仲裁与裁军。所属各党应报告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说明为使这一问题引起工人阶级的关注，他们希望做些什么。

4. 劳工立法的国际成果。伯杰同志将就这一问题作报告。

5. 组织反对死刑的国际抗议。

6. 迅速贯彻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办法，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做法。

7. 国际团结的组织。在劳资之间出现重大斗争的情况下，获得帮助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如何向工人报纸提供消息以及防止报刊通过造谣中伤来破坏运动?

希尔奎特同志将就美国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进步作报告。

目前，我们正在举行全党投票，以选出 8 名参加这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为报销他们的开支应提供一些资金，这笔费用大约需要 2500 美元。

工 会

至于党对工会或者劳工组织的政策，这里已无需赘述了。只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党在上次大会上发表的有关宣言及后来全国执委会发表的声明都完全符合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任何敌人都不能以任何遁词利用这些文件的内容把我们置于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对立面，也不

能在整个工人阶级面前贬低我们的立场。不幸的是，我们的某些党员无视党的每一个宣言。这些宣言的主要内容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所陈述，决议宣称：

> “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党和工会都必须执行同样重要的任务。这两个组织中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一个由它的性质决定的、独特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可以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活动。”①

再有，一部分人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即由于有组织的工人还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按这种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成为“群众性”组织而表示失望并诉诸严厉的批评。有关于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有组织的工人的历史和趋向，他们的经验和成就，而且，在他们之中和在其他人中，物质利益也在起着作用。

1986 年，即 14 年前，组织起来的工人在美国有 60 万人。他们主要是由店员和室内作业工人组成的，如印刷工人、缝纫工人、制鞋工人、卷烟工人、钉马掌工人、烘面包师、模具制作工、服装工人，等等。在过去的十年间，竞争是工业的主要特征；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同雇主进行了重大的斗争。相对地说，此后有组织的工人数目没有发展，他们后期在改善行业状况方面的成就与早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相比的。

然而今天，与 1896 年相比较，约有 180 万名工人新加入各类劳工组织的行列。这些新增的有组织的工人是由建筑和运输工人们组成的，他们是户外作业工人，如小车司机、木匠、水泥工、电工、货车司机、矿工、铁路职员、建筑业铁架子工等。在前述时期内，许多这类行业中的工人阶级是没有组织的。现时工人运动约有 70％来自新的工人和新的组织。后来的这些岁月中，他们的主要成员参加了斗争。组织的会员

---

① 参见本书第 22 卷第 177 页。——编者注

常常逐年大幅增长，同时，组织几乎同样经常地大幅使工时缩短，使工资提高。有些地方在一个时期内工资提高了一倍多。

从前的分会都是较老的组织，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和他们中间存在的趋向是很敏感的，并且越来越认识到阶级路线。这是有原因的。

后来的分会由新近组织起来的工人组成，他们全然不顾生活费用的上涨或者考虑其他因素，集中注意力并全力以赴地从事近期的日常斗争，在当前的制度下改善了他们的物质条件。

我们大家的责任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指出资本主义的不安全和丑恶之处；指出其不公正和极不平等的做法，即从辛劳的生产者夺走利润，或者通过其他抢夺手段从劳动生产者那里攫取了公平和完全的报酬，却给游手好闲之徒提供了奢侈的享受，给当权者提供了不应得到的权力。

选举权的限制

两年前，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承诺给明尼苏达州委员会根据现行候选人提名法进行合法的竞选提供援助，并建议他们只在提出抗议的前提下支付当局所要求的费用[①]。1909 年 4 月，全国委员会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保证给予各州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还进一步规定所有的州委会应当按比例分担费用，并对全国委员会办事处进行偿还。但是，只有一半的州委会予以响应。

明尼苏达州的州委书记纳什同志于 1909 年 4 月 22 日书面陈述如下：

① 指备案费。——编者注

“在执委会的上一次会议上，我得到请求你们发出另一个支持将备案费诉讼提交美国最高法院的呼吁的指示。州最高法院已经对此案作出不利于我们的判决，但这我已经预料到。也许把更多的钱花在这起诉讼上是愚蠢的，但我现在认为，要是我们现在早已了结此案当然最好，因为将来的结果可能是我们赢得这桩案子，否则也可能其他一些州将会适当处理此事，这比在资产阶级法庭上作斗争浪费更多的金钱要好。”

虽然大约有 12 个州多少相似地响应了号召，不过党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义务为这一针对阶级立法的闻名全国的诉讼提供资金并为之进行斗争。这是从许多被提交美国最高法院的案子中选出来的最佳案例，此案的胜利将会有利于每一个党组织。在财政方面还应该制定其他规定，以解脱明尼苏达州的不合理的份额的重负。如现在安排的那样，它承担了总费用的三分之二。

悼　念

自从我们上一次大会以来，两位英勇的党的工作者停止了他们的劳动，长辞安息了。两位都曾长期为党工作，并把他们一生卓有成效的努力奉献给党的事业。我非常遗憾地在这里宣告 **M. W.** 威尔金斯同志于 1910 年 1 月 18 日逝世。他是 1904 年党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并且是为党工作最久的老党员之一，也是最有声望的全国组织者之一。我还要宣告本·汉福德同志于 1910 年 1 月 24 日逝世。他是 1904 年和 1908 年党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并且在两次大会上都当选为我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晚年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为他的阶级效劳，他的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并将永远成为成千上万的同志们的一个榜样和启迪。

讲外国语的党员组织

我真诚地希望，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行动，或者确切地说，有关讲外国语的党员组织的问题，将能找到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并付诸实施。必要的做法是，各个这样的组织被置于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并明确界定它们与全国党组织的真正的关系。然而，这一问题将作为5月13至14日于本市召开的讲外国语的党员组织代表会议的一个决定向你们提出。我预期他们能审慎而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建议，以达到在整个运动中促进团结与和谐的目的。

由于最近举行的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问题的全党公决（表决直至4月6日才结束），党的各个支部近期在选举代表问题上时间紧迫，有鉴于此，我建议党章中采纳一项条款，以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发生。可以预先给出足够长的时间——几个月，以选出所有的代表；或者党章可以规定禁止在一定日期之后提出任何影响代表大会或会议召开的公决。

* * *

这份报告如果再涉及其他诸如组织、宣传、妇女中的组织工作之类的主题，篇幅就可能无休无止了。但是，报告员们可以将这些题目向你们公开，各种常设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博采众议，对来自各方面的建议采取“开门”政策。

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正是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举行的。

代表同志们，作为被选出的美国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代表，你们拥有伟大的荣誉、责任和机会。

今年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年。多年以来，这个世纪以及它

可能取得的成就，已成为博学之士的理想、诗的主旋律和劳工儿子们的希望。

我们的目的和计划是清楚的，那就是维护劳动本身所创造的价值。在这个正义的要求中，并没有什么深奥而隐蔽的哲学。没有劳动就没有报酬；没有充分的报酬也就没有劳动。更为有幸的是，我们的阶级有力量——数量上的优势——在它选择的那一天把这些付诸实行。

此时此刻，正是你们这些代表们有责任使我们的组织变得如此紧密，如此有纪律，如此积极，以致只要一声令下，不论远近，受调遣的同志们将步伐整齐、步调一致。

业已登记的党员、积极的同情者和投社会主义党的票的选民们，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主体。更为机灵、恶毒的敌人清楚地了解，对付我们的巧妙而隐蔽的手段是试图阻止我们的进步，分裂和瓦解我们现有的力量。

他们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日复一日，在贸易市场上，在司法大厅里，在整个工业的五花八门的领域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证明他们的不诚实和无能，这使工人们去思考并日益走向反抗。

为了实现工人的统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提高了自己的水准，并以政治行动来辅助在经济方面采取的阶级行动。

资本主义盔甲上的脆弱点已经暴露出来。资本家们为他们自己制定并解释法律。国际运动中的美国支部——其自觉的工人阶级——比以往具有更光辉的前景和取得成功更大的保证。它转过身来，面向华盛顿，将用工人自己制定的维护工人利益的法律去惩罚它的敌人，去报偿它自己。

全国书记

J. 马伦·巴恩斯

社会主义的宣传

——在1910年5月15日召开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我们宣传的目的

社会主义的宣传是一个大题目，就像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一样。它蕴含着我们为改变未改变的信仰而付出的一切努力，它使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和理论上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使我们想起我们队伍中存在的一切意见分歧。

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全面和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题目。

我并不乐观到会希望我们能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拟定出一项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将获得我们大家一致赞同的宣传纲要和行动计划。我认为我们中间的一些争议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大部分争议是由于我们缺少更多地坐在一起坦率和友好地交换意见的机会所造成的误会引起的。

我希望本次大会能够消除这些鸡毛蒜皮的争议，并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有组织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持有的观点和观念的基础上拟定出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把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我们，尽管我们当中存在着激烈而频繁的讨论。在我向你们阐述我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这个题目的看法时，我不会声称这些观点具有党

正式批准的权威性。这些观点是我个人的，我本人对其负责并请你们把这些观点仅仅看做是讨论的基础。

我先谈一个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同意的基本题目，**即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获得成功，除非美国人民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

无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是通过民众的宣言、立法或政府的法令宣告成立的，无论它是不是一场流血的革命或一系列渐进而和平的改革达到最高潮的自然结果，无论政治行动、工业斗争或道德教育是不是即将到来的社会改革的主要因素，或者无论所有这些因素是否将共同促使人们所盼望的变革的到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都必然是很大一部分人——即使不是绝大多数——的意志的表达。因此，尽管我们有特殊的信仰和分歧，我们最崇高的共同使命是造就更多的社会主义者。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问题是找出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要旨以最有效和最省力气的方式传达给人民大众。

我们必须采纳一项仔细制定、解释完好和始终如一的宣传纲要，并试图训练我们的党员沿着这个纲要制定的路线开展稳健、统一和协调的活动。要想全面证明这样一个纲要令人满意和行之有效，就必须恰当地回答下面两个主要问题：（1）针对人民中的哪部分人我们能获得最大的成功？（2）我们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或手段更好地获得人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理智上的同情和积极的支持？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工人运动

为了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我必须回顾一下问题常常涉及的范围，并对社会主义哲学和策略的一些重要概念加以评论。我无需为对这个题目进行初步阐明的做法提出理由。过去几年我们在队伍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思想非常混乱，因此我只得大体概述一下我们有关策略和方法的

看法。

因此，我开头将重申自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代起每一次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表过的声明，即社会主义者首先必须争取雇佣工人阶级。

这只不过是对采取最省力气的途径的法则的运用。雇佣工人没有同社会主义纲领相悖的动机或利益。相反，他们有一切理由支持社会主义的纲领。社会主义既对工人的利己主义意识有吸引力，又对他们的利他主义意识有吸引力；既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又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既符合他们的眼前利益又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对于其他阶级，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为社会主义辩护并呼唤社会主义；对于工人，我们只需对社会主义做些解释。我们可能会改变其他阶级的个人信仰，但我们能从整体上赢得工人阶级。面对“境况尚佳”的阶级的强烈反对，我们仍然可去设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面对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积极反对甚或是冷漠，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哲学严格地说可以称做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哲学，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在我们的运动中，有些人认为这种看法太狭窄。他们主要把社会主义视为对全人类都具有同等吸引力的社会正义和永恒的兄弟情谊的福音。他们反对使这一崇高的运动“沾染”上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肮脏教义，否认那种只有通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胜利才能建立更高级的社会秩序的理论。

这些好同志依然墨守着早已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遗弃的原始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概念，他们顽固地拒绝从社会主义运动在其他国家的具体教训中得到教益。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对立的极端主义者：在他们眼里，这一概念似乎太广泛，他们总是想让我们仅仅局限于争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最不熟练、收入最低和就业最不稳定的工人，他们常常

被称做“贫民无产者”。

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辩解说，只有工人阶级中最低层、最贫困的工人才真正配是“无产者”，才能独自进行革命行动，而工人中境况尚佳的那部分人过着物质上相对来讲舒适的生活，他们易于留恋这种舒适的生活，而且这种舒适的生活也易于使他们趋向保守。

这种观点同纯粹的伦理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一样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更有害。这种观点如果付诸实践则会造成分裂工人队伍的结果，并把社会主义运动贬低到那种因饥饿和失去理智而暴动作乱的水平上。

社会主义者应力求获得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即所有在工业、商业和农业中被雇用从事熟练和非熟练工作、进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薪工人。

有组织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同样的推理使我们对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给予了最大的强调，它也表明在工人阶级中我们应该最先接近有组织的工人。这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正像所有策略问题一样。无组织的工人既分散又消极，而有组织的工人则集合成群，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相会。除此之外，他们积极从事反对资产阶级的永不停止的坚决斗争。比起他们那些无组织的工人兄弟，有组织的工人更易接近，当然也就更容易受激进而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福音的影响。他们一旦被社会主义的宣传所征服，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一支更伟大、更富有潜力的力量。

说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我是指现在正在进行着的运动，而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臆想的理想运动。我主要是指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它们代表着大多数美国有组织的工人，

其次是指其他按人数多少排列的工人经济组织。

这些工人代表着一支250多万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军。他们如果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与智慧的熏陶，就会在美国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我坚信他们能被转变到我们的事业中来。我们当中有些同志似乎倾向于放弃在“纯粹”的行业工会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一切努力。他们坚持认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腐化堕落，其普通成员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也变得反动和毫无指望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运动的确会落到悲惨的境地。仅次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会运动代表着美国工人中最进步的那部分工人，假如这些工人对社会主义都毫无指望，那么，社会主义本身在这个国家也就没有指望了。幸好这种所谓的美国有组织工人没有指望的说法，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缺乏耐心——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能——的表现。从组织的角度看，我们的工会普通会员一点错误也没有；他们只是缺乏广博的见识，而别的国家的工人是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中获得这种见识的，对于这一缺陷，我们起码要负同他们相当的责任。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运动在过去有弱点，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采取的错误策略，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忽视在工人中进行耐心、系统和合理的宣传工作。单凭这种宣传，我们本来是可以使工人们受到社会主义哲学的教育的。

中产阶级

因此，我们必须主要致力于在工人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这种努力绝不能只限于工人阶级本身。社会主义运动主要符合工人的眼前利益和物质利益，并且主要是由工人推动和支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运动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远远超过了社会上任何阶级的利益，其社会理想是这样崇高，以至它完

全可以从其他阶级中吸引大量男女。况且，尽管雇佣工人肩负着资本主义统治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绝不是怀有赞成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经济动机的唯一一个阶级。我们国家的农业人口绝大多数从事报酬极低和永无休止的苦役，过着这样的苦闷生活。他们已被抵押给放债人，受着铁路的剥削并受证券经纪人控制。众多的小商贩和小工厂主开始意识到他们同集中在现代工业垄断集团和托拉斯手中的大资本作斗争是没有希望的。在专业人员队伍中，为生存所进行的竞争日益激烈。所有这些阶级都会从我们所提议实行的在我们的工业制度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获得好处。他们中间许多人容易受我们的宣传的影响。

尽管我们应该主要致力于把工人争取到我们的运动中来，但我们绝不能忽视我们能争取到我们事业中来的所有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因为我们需要所有这些人。我们的斗争既是革命的，又是广泛的——涉及现代工业、政治、社会和知识活动的各个领域。一致起来反对我们的不仅有金钱资本势力，而且有许多训练有素的“政治家”、教师、传道士和作家，我们必须同所有这些人作斗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场像我们这样旨在彻底改变整个当代社会结构的运动承担不起把“知识分子”从其队伍中清除出去的代价。一场由清一色“吉米·希金斯”[①] 参加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是这样一场运动完全或大部分由“知识分子”参加是十分荒唐的一样。一场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运动如同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必须以合理的分工为基础。

近几年来，有种倾向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地方完全把自己局限于雇佣工人，并拒绝同其他阶级的人士进行合作，无论他们是如何真诚地起誓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也无论他们的帮助对社会主义事业多

① 这个名字在20世纪之初在美国常被用来指工会会员或社会党党员。——编者注

么有价值。这并不是合理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是荒谬绝伦的拙劣模仿。

如果我们能恰如其分并合理地进行宣传，我们的宣传自然就可以吸引比有产阶级成员更多的工人。但是，我们如果把其他阶层的人士拒之门外，就不可能壮大我们雇佣工人的队伍。

工会的宣传

如果上述一般性的看法确实正确，那么，社会党首先必须比过去更加重视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中开展宣传。社会党必须在这一领域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作计划，并有系统、有所作为地去贯彻执行。

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的最近几次试验表明，大批工会组织，甚至那些被划为极端保守的组织，都十分乐意在他们的会议上听听我们的宣传。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机会。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应该对其地区的现有工人组织进行研究，应该用额外的努力去劝说他们让社会主义的宣传员在适当的时候在他们的会议上发表演说。

无论我们能否在一个工人组织面前进行直接的演讲，我们总能够设法在其组织开会的会场门口向其成员散发社会主义的宣传品。这是一种比演讲更加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党的地方组织不可能总是拥有足够的、训练有素并具备能给工人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技巧的演说家。但是，它能时刻向工人提供适于宣传目的并且写得很精彩的小册子、传单或社会主义的报刊。毫无疑问，这些宣传品中有些还没看就会被扔掉，但另外一些却有人看。这些人起初是漫不经心，然后则是以不断深化的理解和增长的同情心来看这些宣传品。如果我们的宣传品写得易于理解和系统化，长此以往就能引起工人们的兴趣。我们应该努力使散发社会主义宣传品的活动成为国内各工会组织每次会议上的一个固定内容。即

使我们今后几年不干别的工作，仅此一项工作就能使社会主义运动获益匪浅。

然而，比口头或书面宣传更有力的是用行动来宣传。我们不仅要用我们的主张和声明，还要用我们的行动和表现来证明，我们同工人的事业休戚相关。

全国执行委员会最近获得的不完整的数据表明，我们的党员中约有20000人同时是工会会员。他们遍布所有的行业中，有把握地讲，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人组织中社会党党员在其成员中或多或少占有一定比例。不幸的是，这些社会党党员并不总是适当地利用这些赋予他们的极好机会。他们认为自己是少数，对改变保守的工会会员的信仰的可能性不抱希望，因此，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般的社会主义宣传上，对他们在工会中充当一名消极的会员感到满足。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通常，社会党党员处于最有理智的工会会员之列，能广泛、全面地看到工人运动日常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应该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供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同事使用。通过扎实、有能力和无私的工作，而不是经常不断的批评或一年到头的社会主义说教，社会党党员会在有组织的劳工界——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特点——获得有益的影响。我们绝不能把这一领域总是拱手让给带有保守主义观点或心怀叵测的人，然后以令人不满意的领导为由指责整个工人运动。

尽管这样的做法——即社会党党员对他们的工会组织的事务给予更大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的党或我们的党员为此而试图从外部指导工人经济组织的内部事务的做法是严重错误的。我们可能都更喜欢工业组织，按照传统的职业或“行业”的组织，我们当中身为工会会员的那些人很可能拥护在自己的组织中实行“工业主义”。但是，作为社会党党员，我们没有理由或正当的依据在这场纯属经济组织内部的争议中支持任何一方。假如工人运动充满了理解和社会主义精神，那么

它会找到一种言之于表和付诸行动的适当形式。只要工人运动仍然抱有偏见、因循守旧，仅仅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并不能使工人运动富于革命精神，充满阶级意识或进步的性质。组成对立的工人经济组织不会改变现有的工人运动，在有组织的工人心目中，社会党党员参加对立的工人经济组织只会伤害我们的事业。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历史证明这一断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工人的斗争

除了日常的工作和问题外，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常常同资本势力和政府势力进行激烈的较量。一会儿爆发一场令人愤怒的大罢工、同盟歇业或联合抵制运动，一会儿是为争取某个重要的劳工立法议案或为保卫现存的劳工法律不受法院的践踏而斗争。正是在这些困难和危急时刻，有组织的工人最需要积极的援助和支持，这种援助和支持在所有情况下都应主要来自社会党党员。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应是我们自己的斗争。我们要投入到每次重要的工人斗争中去，这不仅仅是为了使工人们改信社会主义哲学，而且也是为了决心在工人的实际斗争中帮助他们：既在日常工作中，又在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帮助他们。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们对当前工人运动中我认为社会党党员的工作最为有利、最有前途领域给予特别的重视——我是指争取社会劳工法在美国得以颁布的运动。

在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文明国家，政府通过颁布照顾伤、老、病、残工人的措施正式承认政府对工人阶级所承担的社会义务，有些国家还逐步完善了使工人避免失业的制度。只有在美国，工人们在伤、老、病、残时听天由命。只要他们年青力壮、身体健康，只要他们的劳动有需

求，他们就可能挣到足够的钱把他们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贫困线以上。但是，严重的工伤、痼疾、体力下降或工业突然萧条将会把他们抛出工人队伍之外，并无情地把他们推到乞丐、流浪、犯罪或挨饿的道路上。

在工伤的情况下，工人的状况更加令人震惊。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雇佣阶级从不把工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心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人在工业中的死伤如此令人震惊地频繁和普遍。在我们的矿山中，工厂里和铁路、建筑工地上，每星期都有成百的工人死亡，上千的工人致残和受伤。我们这个基督教社会实际上通过剥夺工人及他们赡养的人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手段来惩罚这些不幸的现代工业战争的受害者。因为在我们这个古老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下，受伤的工人以及因工所亡工人所赡养的人无权向社会提出要求，也得不到雇主的任何赔偿。各州的雇主责任条例是如此的偏向雇主，起诉的过程是如此耗时、破费和复杂，法院对工人阶级的偏见是如此之大，靠受伤工人的灾祸为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如此诡计多端、不讲道德，因此，在大多数诉讼中受伤的工人和他们所赡养的人在提出赔偿要求时都败诉了。

现在的雇主责任条例的弊病如此引人注目，同别的国家的法律对比差距如此突出，以致长期忍耐惯了的美国工人也开始牢骚满腹。我们的立法机关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极其重要的问题上。

目前，美国国会中正在讨论一项工人补偿法；纽约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已委任立法委员会审查这一议案；差不多所有其他的工业州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在今后的几年里，激烈的辩论势必会大大增加。

美国的工人尽管在反对现今所谓的雇主责任条例中差不多是一个整体，但是他们拿不出行之有效和意见一致的良方，也没有确切的行动计划。他们需要引导、团结和支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和机会。在所有其

他国家，社会党人领导了每次争取社会劳工立法的运动。美国的社会党人也要对本国的工人履行同样的义务。社会党应拟定一项全面、具体的议案以保证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或幸存者能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相当于工人伤亡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补偿要随时进行调整，不受法院和律师的干涉；补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切、快速和可靠。措施要各州一致，社会党要处处想到同当地工人组织合作来开展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对工人们是如此密切相关和至关重要。他们不可能不真心实意和热情满怀地汇集在运动的旗帜下，就像最近纽约社会党人的尝试所充分显示的那样。

千万不要认为这一提议微不足道，不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因而对其置之不理。对于每天在工作中面临死亡或残废的数百万工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关注的大事，因此我们绝不能漠然处之。况且，为争取一项全面和激进的改革措施所进行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必将导致美国工人阶级投入到更大、更重要的斗争当中去，开辟更新、更广的前景。除此之外，它还能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共同的斗争中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这对双方的成功是十分关键的。

一般的宣传

当然，上述特别的工会宣传不应被视为取代迄今社会党所进行的一般的宣传，而应被看做是对一般的宣传的补充。我们应继续下大力把社会主义的使命传播给人民大众，但是我们应比过去更有理智、更为经济地进行这种宣传。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放弃游行示威而采取系统完善的措施，放弃革命的辞藻而采取革命的行动。

街头集会目前可能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精力，它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形式中无疑占有一席合法的位置。不过，其重要性恐怕常常为人们过高

地估计。过去，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鲜为人知或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时任何吸引公众对我们运动存在的注意的方法本身都是有效的宣传形式。不过，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已经是人们接受和承认的因素。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宣告我们的存在，而是使我们的同胞了解我们为之存在的目标和目的。我们的街头集会以及我们的室内大会在性质上和效果上都应充满真正的教育意义。我们那些站在肥皂箱上和站在讲台上的演讲人都必须精心准备他们的演讲。除此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每次会议成为广泛散发宣传品的机会。演讲人毫无准备，不在会议中散发社会主义的宣传品，这种仓促安排的大会，特别是街头集会，常常毫无价值甚至适得其反。

因此，我们在工会中进行特别工作时，必须把通过宣传品进行的宣传摆在首要位置上。精彩的演讲可能激发人们的情感或激励人们去思考，但是其作用仅限于直接聆听的与会者并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或被人忘却。而一本撰写精彩的书或小册子可以被反复阅读并能在众人中传阅。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注意我们的宣传品，它们的质量和散发的方法。

在这方面，我们迄今毫无章法。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出版了几十种；这些书籍可能完美，也可能有瑕疵；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可能合适也可能不合适——其销售量或发行量在所有情况下都主要靠发行人或作者的事业心或推销能力。社会党的全国总部、州组织、地方支部、私人出版商和个人常常不加选择地发行小册子和传单。在这些小册子和传单中，经常重复和重新陈述同一主张。这些小册子和传单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不好，或者写得一般，它们被不加选择地散发下去或经常被堆放在地方支部的办公室里。

这种发行方法，或者说缺少章法的状况必须改变。在出版方面，我们应仅限于出版涉及我们的哲学和运动的主要方面的几部著作。我

们应选择那些能最准确地代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撰写得极为通俗易懂的著作。这些著作应在我们的所有公众集会上出售。另外，我们也应促使其发行。当然，这些著作不会详尽讨论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但是，我们如果能引导一个人去阅读几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就可以放心地任凭他自己去判断是否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总方向进行研究。

小册子和传单的发行应由全国总部承担，我们队伍中胜任的笔杆子应由全国总部保证其有写作的时间。小册子和传单种类要精，每一种都要适合某种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使一本小册子包含我们运动的目标和方法的简明易懂的要点，一本小册子用于工会的特别宣传，一本小册子用于农民的特别宣传，等等。一旦发生任何具有全国意义的事件或出现新的民众运动，全国总部应立即发行一张特别的传单，对该事件或运动阐述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所有这样的小册子和传单均需按价卖给地方支部，而后者应训练其成员定期和认真地散发它们。全国的每个地方支部每月都应用一天的时间来广泛散发社会主义的宣传品。

争取自由和进步的运动

尽管社会党主要是工人事业的带头人，它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此。作为全国唯一真正进步的政党，它有必要成为主要的力量来维护我们制度的纯洁和民主、维护一切真正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即使在仍然留有一些老派的自由党人和激进分子的欧洲国家，维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国家在政治上的公正的任务正越来越多地落到社会党人身上。在美国，两大统治党同样反动和腐朽，所谓的改革党派看起来好像是在政治中进行忽冷忽热和滑稽可笑的幕间穿插表演。因此，上述的使命差不多全部落在

美国社会党身上。

我们的社会党党员必须站在所有反对反动和腐朽的斗争的最前列，必须在一切争取社会正义和进步的运动中起带头作用。

无论是遏制独裁的美国寡头政治的势力——美国最高法院，还是争取裁军和国际和平的运动，无论是反对侵犯言论、出版或集会自由的权利的斗争，还是反对其他压迫和腐朽的行为的斗争，我们社会党人都应把这些斗争当做自己的斗争，并将其组织和宣传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些斗争和运动中。具有公正头脑和进步的美国各阶层人民应会把我们社会党人看做是自由和进步的永久支持者。

我们时代最主要的运动之一就是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争取社会正义和进步的非常具体而且至关重要的运动，它每年都在获得力量和动力。在美国，这个运动已度过了单纯的理论阶段，它已成为人们正视和在不远的将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是以要求所有的人（无论什么阶级或性别）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我们党的政治纲领包括一个明确的誓言，即美国的社会党人应为争取男女之间不受限制和平等的选举权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这一誓言是发自肺腑的，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全心全意地去实现。我们不能忽冷忽热或草率行事，而是必须扎实、热情地去进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宣传，绝不能放过任何这种宣传的机会。无论是合法的听证会、公众示威还是辩论会，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拥护妇女选举权的位置上。

在美国，实际上还没有开展任何争取选举资格的运动。总的看来，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是支持妇女获得充分的政治权力——无论她们的阶级和财产资格如何。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像我们的欧洲同志那样就这一问题进行单独的运动。在欧洲，选举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阶级划分来进行的。尽管社会党绝不应在任何运动中丧失自己的身份，但在我

们党的原则和目标同其他组织的原则和目标完全相吻合时，社会党也不能随意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地位。我们应全力支持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普遍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必须突破我们自己的组织的狭小圈子，必须作为一支生龙活虎般的力量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在青年中进行宣传

在社会主义宣传的特别领域里，教育我们的男女青少年理解社会主义哲学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最终的战斗将大部分由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进行。我们必须尽早开始训练这代人，使他们得以胜任。欧洲社会党人长期以来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差不多在每个欧洲国家，他们都成立了强大的青年组织。美国的社会党人则刚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既重要又棘手，应以同样的智慧和热情来处理。

对儿童进行社会主义训练应从几岁开始呢？需要使用何种方法呢？我们的公共教育体制被安排来向未定型和具有可塑性头脑的儿童灌输统治阶级的观念，发展他们对生活和为生活而斗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这一体制在儿童襁褓时就抓住他们不放，直到他们长大为止。我们在任何阶段都会遇到这些恶劣的影响，但是我们一定要仔细地使我们的方法去适应儿童在不同年龄时的智力发育情况。我们可以教小学生珍重生活中的社会精神和合作努力。但是，他们不可能抓住阶级斗争的哲学和真谛。使用术语来训练儿童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术语对他们未成熟的大脑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公式。教育儿童需要大量专业训练，不应成立招收年龄很小的儿童的社会主义主日学校，因为我们还不具备有经验和可靠的老师来办这些学校。儿童的头脑太神圣，还不能作为初步试验

的目标。以不合格的技术或方法兴办的社会主义主日学校常常是弊多利少。

成熟年龄的孩子，比方说14岁以上的孩子，则另当别论。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通常拥有足够的理解力来掌握我们运动的主要哲学和目标。训练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模式不能以太多的热情和精力去进行。应在全国各地组成青年社会主义研究俱乐部和社团以作为党组织的正式助手。成年社会党人应重视这些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主要仍然是研究性质的俱乐部，不应鼓励这些组织进行实际的政治活动。这种鼓励对我们的运动一点好处也没有，还会抑制年青的热心人的智力发育。一旦长大成熟，他们将会成为运动中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人，因为他们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

联系到这方面，我们应注意在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这些地方的学生不全是富裕阶级的子弟，甚至多数人都不是。他们通常来自穷人家庭，他们的父母忍受着贫穷，不切实际地盼望高等教育可以使他们的子女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面临毕业后工作无着落的命运。他们注定要壮大正在发展的“知识分子无产者”的现代阶级。他们充满年青人的全部理想和热情，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比他们阶级中由于为生活挣扎而变得冷酷无情、怀疑一切和愤世嫉俗的成年人更敏感。大学校际社会主义协会在这些年青人中开展着良好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党应该积极支持和鼓励这一运动。

在“外国人”中开展宣传

我认为，另一个我们党有所忽视的工作领域是在不讲英语的居民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

“美国人民”毕竟是一个移民组成的民族。我们所说的“美国主义”仅经历了几代人；在国家的工业和政治生活中，“外来”人口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美国有上千万外国出生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工人，仍然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交谈、书写和阅读。

资本势力通过他们的政治代理和所谓的教育代理，常常在教会的帮助下，一直歧视这些外来人，让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并怂恿他们反对有组织的工人。

社会党人必须大力抵制这些恶劣的影响，并在外来工人中开展宣传。

社会党在所有这些民族或差不多所有这些民族中没有支部组织。只有少数几个支部在他们当中力量强，影响大。很多支部人数不多而且活动效率不高。

这些组织工作的条件同党的其他组织的工作条件不一样。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下，他们接触的都是有着自己特定心理和特定经济条件的特定的人。他们最有资格评价哪种宣传方式最适合他们的同胞。在社会主义宣传的特别工作中，社会党应给予这些不讲英语的组织以最大的行动自由，应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

专业化与合作

上述建议可能既多且长，但我并不想以此构成社会党实际宣传工作的整个纲要。我努力勾勒的仅仅是这个纲要的大概轮廓并探讨一些该纲要的重点。社会党本身必须有一个总的行动计划，党的官员和委员会必须就党员要采用的工作方法向他们作出指示。当然，从整体来看，不可能制定一项对所有州和地方组织都有约束力的总纲要，更别说对党员个人了。每个地方组织都要针对当地和当地人民的情况来使自己的行动与

其相适应。在一个纯农业地区坚持进行专门用来对工会开展的宣传是愚蠢的，反之亦然。也不可能期望每个党员都采用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宣传活动的所有方式方法。我们的男女党员有着不同的爱好、天赋，受过不同的训练。一些人在性情和能力上最适合在社会主义宣传和组织的一般领域做一种专门的工作。其他一些人则最适合做另一种专门的工作。这是很自然而且十分正当的。我们的时代是专业化的时代，复杂的社会主义需要其所有的工作领域都有专家。我们既需要理论家，又需要实践工作者；既需要宣传员，又需要组织者；既需要那些强调当今按社会主义纲领的路线改革的重要性的人，又需要那些喜爱详细讲述我们运动的最终目标的人；既需要那些对党的工作均能面面俱到的人，又需要那些完全献身于一个经过选择的专门领域工作的人。只有通过党内所有这些形式各异的活动之间的密切配合，党本身才能变得强大和有影响。不幸的是，我们的党员有时倾向于把对他们个人意愿和性格爱好最有吸引力的活动看做是唯一正当和有益的社会主义工作，而把所有其他工作看做是毫无意义和有害的。这种荒谬的态度应对我们队伍中存在的许多苛刻的讨论和使党瘫痪的派性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们的运动不成熟的表现。我们越早地学习到尊重和容忍相互之间的工作、观点和爱好，对运动总体上讲就越有益。

在我国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没有什么时候像现阶段这样好。工人运动处于不安和期待的状态之中——它正迅速接近其发展的转折点。两个老的政党士气低落，近几年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常出现的假改革运动已完全声名扫地。为保证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国家平稳、快速和健康地兴起，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开展系统、合理和协调的宣传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履行这个属于我们党和我们事业的崇高义务，我们将会背信弃义，贻笑大方。

实际建议

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实际工作中，一般的原则常常是枯燥无味的，除非把它们化分具体、确切的行动计划。如果没有对这项行动计划的具体建议，我的提议也就不会全面了。

我们的党组织由地方支部再加上州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组成。地方支部是党的工作机关，社会主义宣传在我国获得成功最终要依靠地方支部的工作。因此，最重要的是设想出一些方法手段来不断指导地方支部注意更为重要的宣传细节。作为其中的一种手段，我建议，每个城镇和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分设常务委员会，负责教育、宣传品、工会宣传、公共事务和组织工作。这些委员会应该各司其职，经常保持同州组织、全国组织以及他们自己地方支部的党员联系。

有了这样一个适合我们运动的所有实际需要的机构，我们就不太容易忽视我们的义务和机会。

但是，本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更关心的是党的全国总部和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可以直接指明和规定全国总部的工作和政策，但是我们只能对地方支部的工作提些建议。

我们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在直接和独立宣传的领域中几乎无能为力。它也不是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我相信没有人打算要执行委员会担当此任。全国总部固定的党费年收入大约为25000美元。固定的业务开支和全国总部应付的固定费用，如房租、工资、邮资、快递费和印刷费，结算起来大约15000美元。这样，每年所剩大约10000美元用于组织和宣传工作。

如果我们没忘记我们党由3000多个地方支部组成，全国总部要付每个组织者和演讲人平均每人约3美元，我们就会看出试图由全国总部

继续开展独立的全面组织和宣传工作是多么徒劳无益。

从我们党现在的状况来看，全国执行委员会只有在特殊的时候才应直接承担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只能在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尚未组织起来的州里承担有系统的工作。对于有组织的运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应是指导和协调党的州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工作，及时向它们提供合适的宣传用品，用州组织自己的钱为州组织安排横穿全国的演讲旅行，能供得起多少组织人员就出钱供给他们以便他们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和工会中开展工作。一旦特别重要的事件在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例如，大罢工、同攻击人民公民自由或任何进步的民众运动的现象作斗争），需要我们马上行动，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应能够不失时机地派遣一些或全部这样的组织人员开赴斗争的现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组织人员对我们的运动会有很大价值，不仅因为他们个人的工作，而且因为（后者的可能性还大一些）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将获得全面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们能够组织地方社会党党员有效地支持这类斗争。

为此，我建议：

1. 指示全国执行委员会就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方法这一总题目，就这一运动的特殊方面——特别是工人斗争和其他进步的社会运动，就国家工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和形势，定期发行小册子和传单。这种小册子和传单以及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宣传品由全国文献局管理，尽可能按原价卖给地方组织和州组织。授权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把文献局工作交给一个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专门助手负责。

2. 授权全国执行委员会聘用一些专职演讲人员在工会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以及聘用一些专职组织人员援助所有那些党的支持可能对之来说是适当的重大斗争和运动。

取消一切诸如对这样的专职演讲人员和组织人员进行补贴的限制以及对他们进入有组织的州和地区的权利的限制。

3. 为促进社会主义的宣传，把《每月正式公报》改为机关报。以简短的形式发表一切重要的正式报告和通告，取消一切个人通信和琐碎的例行公事的内容。《每月正式公报》中的大部分版面将用于报道全国、州和地方组织所开展的较重要的宣传工作以及讨论新颖有效的宣传方法。

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致国际

同志们！

我们认为必须向你们汇报我们这些原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被迫建立一个新党的原因。

我们一刻不能接受将我们视为无理由地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那帮人。我们知道应该全力避免分裂，社会民主党国际提醒大家注意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作出的团结决议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合理的。因此，在忍无可忍的最后一刻，在经历任何政党都未出现过的党内多数派的迫害和针对我们采取的极端措施后，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少数派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宣传越来越困难，许多同志在开展活动时受到阻挠或被告知不允许行动，不得不宣布放弃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为保持荷兰党的内部团结，我们愿意服从多数派的修正主义策略，只要他们最终没有采取反对我们的极端措施：禁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多数派要求取消这份刊物，并决定如果我们不服从就将我们开除出党，这阻挠和践踏了言论自由和民主原则。我们因此认为成立一个新党是挽救我们倡导的原则和策略的唯一出路。

我们知道向你们提供我们的看法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缺乏信息，你们不可能了解荷兰政党的全部情况，我们作为少数派很难能够像多数派

那样让别人聆听自己的声音，而且还很可能被看做是制造分裂的罪魁祸首。有鉴于此，我们希望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斗争的情况。

一、第一场斗争

土地问题

党内两派关于土地纲领的分歧出现于1901年，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反对纲领中的两个观点：

1. 根据纲领的规定，地租应根据土地的产量计算，只能来自赢利。

2. 以低廉的租金向农业工人提供土地和劳动工具，以保证其独立生存。

第1条的意义是："土地耕种所得首先用于支付佃农的报酬，土地所有者只能提取剩余部分。"

根据第2条，减轻农业劳动者的贫困应该让农民在所属地区放弃自己耕作的土地。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是与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相违背的。为使你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之间的冲突，在此引用一下修正主义者的言论。

有关于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村仍有众多农业工人期待通过拥有土地完成自救，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鼓励这种想法，而是向他们指出除了社会主义外没有任何希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给他们提供幸福和无忧的生活，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培养小资产阶级的组织。

议会党团主席特鲁尔斯特拉对此作如下反驳：

"正统派说得好……但是工人们如果不在属于自己或租赁的土地上种植土

豆，而是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冬天必将挨饿。

想一想，罗兰-霍尔斯特夫人告诉工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土地上是愚昧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他们……

应该告诉他们**尽快**用最好的租金租种土地，如**有可能的话**学习合作耕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拥有土地，对他们来说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工人政党从自己的理论考量出发，向需要帮助并对“社会主义怀有希望”的部分工人开此种玩笑不可能让工人阶级接受他们的原则……

我们应该尽力减轻穷人的痛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拥有土地的想法纳入我们的纲领。如果没有条件，也要全力以赴，因为我们不是政客组成的团体，特别是受苦的人民现在正在通过合法的努力谋求自己在社会上必须拥有的东西。

努力地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至于如何使用土地是**下一步**关注的问题，**生活第一，理论第二。**”

议员范科尔发表如下讲话：

“我们议会党团做过研究和拥有自己的经历，希望这一点受到尊重。我们的土地纲领接受了火的考验，议会党团的声明决不后退半步。我们将获得这方面的胜利。”

虽然修正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抵抗，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先是专门委员会接受了我们的观点，特鲁尔斯特拉随后也放弃了论战。接下来召开的1905年海牙代表大会将这两条从土地纲领中删除。这是第一个回合的冲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胜利**。

学校问题

冲突的对象是国家向教会学校提供补助的问题。荷兰很多学校由天

主教、新教和加尔文教创办。在自由派执政时期，他们坚持反对向这些学校提供国家补助的原则。国家的原则是帮助中立的、非宗教的公立学校。加尔文派在经过激烈的抗争后，争取到国家对他们学校的补助。在无产者开展阶级斗争时，自由派认识到宗教是资本主义堡垒不可或缺的阵地，逐渐放弃了反对国家向教会学校提供补助的斗争。

修正主义分子也推动社会民主工党声明同意国家给教会学校提供补助，1902 年格罗宁根代表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 “大会要求国家提供全民的、基础的、义务的、免费的和充分的教育。
>
> 为此，必须提高初等教育水平，国家承担所有教育费用并组织教学能力检查。
>
> 由于荷兰部分工人阶级要求自己子女能够享受教会教育，阻挠他们实现这个愿望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社会民主党在社会领域围绕反对资本主义信仰的理论辩论只能破坏工人阶级团结。
>
> 大会要求教会学校与世俗学校在教员待遇和其独立性方面享有同样的物质保障，国家保证父母拥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学校的自由。
>
> 国家对教会学校与世俗学校采取一视同仁的措施，同时学校必须满足国家提出的全部条件。”

因此，只要教会学校满足所有条件（如果没有一部分或全部自由派的帮助，教权派政府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社会民主工党将为他们争取资助（根据上述第二段）并要求国家承担全部办学费用。

这个决议引发的争论显而易见，无需评论。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予以激烈的抨击。

该决议证明社会民主工党在改良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表明他们与革命纲领提出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决裂。政教分离原则除了涉及向教会学校提供官方资助外，还涉及其他许多内容。

铁路罢工

1903 年铁路总罢工引发另一场重要的争论。事实如下：1903 年 1 月 31 日自发的铁路工人罢工取得不准使用替工阻止港口工人罢工和承认工人组织的成果后，政府颁布了旨在防止新罢工的罢工限制法。工人成立了抵抗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与其结成联盟。特鲁尔斯特拉以此名义在 2 月 20 日的会议上提出通过以下决议："工人们应该了解铁路工人的声明，即他们决定停止工作，反对禁止罢工的法令，运输工人工会和其他工会将举行同样的罢工"。决议还决定成立抵抗委员会，向荷兰全体无产者发出团结互助的呼吁。

特鲁尔斯特拉是党的**领袖**和机关报《人民报》的主编，他通过报纸继续鼓励工人"一旦工会发出罢工号召，应该立即停止工作"；并称这是经历"火的洗礼"；他要求工人"时刻准备在抵抗委员会发出号召后立即举行大罢工，以表明荷兰劳动者宁死不屈的精神。目前除激烈反抗外，没有其他出路——这场斗争需要采取合法防卫和抵抗措施。"

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文章。

当获知第二次罢工不可能成功时，他**没有通知参加抵抗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工党**，而是独自得出放弃政治罢工的想法，并决定在可能实现经济要求的地方不再举行罢工。这种做法导致组织的无序，社会民主工党是抵抗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不能拒绝服从自己组织的命令。这个决定令人沮丧，造成工人失去斗志的后果，罢工失去威力，政府不再惧怕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

特鲁尔斯特拉的这种态度导致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三次冲突。他的态度——一个能干而圆滑的政客的行为——鲜明地表现出修正主义的特征，无需范德格斯和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同志的揭露和批评。

两派之间的分歧还有许多，为使同志们准确地了解冲突的根源，我们只列举以上例子。

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

继上述这场争论后，一场以修正主义者反对我们的策略为标志的新的斗争阶段拉开序幕，它最终导致我们之间的分裂。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其发展过程，我们首先谈一下至今还未涉及的这场斗争的特征。

修正主义者的头目特鲁尔斯特拉在关于党的策略的争论开始之时就在其中加入了其个人色彩。他从头至尾并且愈演愈烈地将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变为反对他个人的斗争，称有人想把他轰下台并提出对他的信任问题。他反对以《新时代》杂志编辑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格斯、赫尔曼·戈尔特为首的“新时代”小组，反对潘涅库克，反对与修正主义者作斗争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他利用一切借口称大家把矛头针对他个人，把他作为攻击的目标，而没有将他作为领袖来信任。

他采取的这个攻击个人的策略从源头上破坏了我们两派之间的争论，并将我们置于不利地位。

同志们，不要忘记荷兰工人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广大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未因肩负这一艰巨的任务而消失，反而由于一小部分人的坚持变得更加尖锐，这使开展群众运动更加困难。

由于对方将个人色彩作为一种既定策略和原则，马克思主义者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格斯、赫尔曼·戈尔特、潘涅库克非常注意与这个策略保持距离，尽管有时他们的言语比较激烈，但从未试图进行人身攻击。

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地进行斗争，不需要与策略和原则化身的那位代表一样考虑和强加个人色彩。

我们的对立面则截然不同。例如，在1901年举行的党代会上，特鲁尔斯特拉想方设法地要挫败戈尔特提出的以考茨基的理论为基础的土地问题的建议，称戈尔特借助外国人反对他，他无需傍在先知考茨基的大腿上；当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批评修正主义者的学校政策时，他们含沙射影地攻击她在驱逐议员；当我们批评特鲁尔斯特拉对待铁路工人罢工的态度时，他们称“只有当特鲁尔斯特拉对党形成危害时开展对他的批评才有意义”。

我们是以这种方式与那些手段恶毒的人进行斗争的。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力争将论战控制在事实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引导党内部分重要的力量站在我们一边。

此后，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他们的做法更加露骨，完全摈弃以事实为依据的争论，全部采取个人攻击策略，试图把自己的怀疑强加给对手，严重侵犯言论自由的权利。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决议批准了他们的这种策略原则。下面谈一下这个决议得以通过的过程。

二、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之前

1905年海牙代表大会

在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之前，以议会党团领袖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与1905年海牙代表大会事件和当年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选举的批评紧密相关。

与前几次大会一样，这次大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组建**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的编辑部上面。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内其他同志对特鲁尔斯特拉在铁路罢工中采取的态度提出批评之后，他于1903年秋决定辞去《人民报》总编一职，P. L. 塔克被选为其接班人。1905年海牙大会前夕，

塔克表达了不再担任这一职务的想法，党的执行委员会曾试图提议让特鲁尔斯特拉继续担任总编。然而海牙大会上党内许多不同派别的代表希望塔克留任，继续以他的方式领导编辑部，塔克接受了这一意见。代表们同时也希望中央机关报通过与特鲁尔斯特拉继续紧密合作，进一步改善工作。会后当塔克向他发出合作邀请时，特鲁尔斯特拉明确予以拒绝。塔克称他借口不了解编辑部工作而婉拒了向他发出的合作邀请，并指责大会代表们冷落了他。特鲁尔斯特拉一刻也不考虑党的利益，仅仅因为个人原因拒绝合作。不久后，同样是他高调谴责那些拒绝为党服务和违反纪律的人。

海牙代表大会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讨论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马克思主义者发出警告，强调必须以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标准确定党的态度。无产阶级表示只有进入决选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同意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 1903 年对法律草案提出的举行公平公正的全民选举条件，才能支持这些候选人。在这一关键时刻，防止工人阶级被教权派政府蛊惑是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克伊波教权派政府在工人阶级中挑拨离间，撒播仇恨种子，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府一样，他强烈反对铁路工人罢工——自由党对此予以支持。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非常重要，我们坚决不向被资产阶级民主蒙骗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阶层让步。我们的党应该时时刻刻告诫工人们，议会中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敌人，在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中选择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准备给工人普选权？

在各省的选举中，我们党支持自由派反对克伊波政府候选人，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忧是合理的。我们的观点在大会上占据上风，特鲁尔斯特拉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决议获得通过，以下是其中一段的话：

“（党）仅仅支持声明赞成立即举行普选的进入决选的候选人”。

决 选

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担心的危险不是空穴来风。第一轮投票后，可以看到只要社会民主工党选民投自由派的票，克伊波派必然落选。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机关报《人民报》、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没有坚持大会的决议，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预见的危险境地。决议规定在只有两个候选人竞争的地方——自由派对教权派——党建议选民不要投票。这样的规定并没有阻止一些人对决议作出这样的理解，即选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如同投票结果证明的那样，事实也表明几乎所有派别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将票投给了自由派。

当包括潘涅库克在内的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大会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时，特鲁尔斯特拉认为围困其激进对手的最佳时机成熟了。他利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煽动反对情绪，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秋后算账。他写道："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所谓的对公式宣誓的愚蠢和傲慢的政客潘涅库克，所有事情的发展都逃脱了他的视野，他给参加投票的选民扣上了不谙世事的可恶孩子的驴耳纸帽……"接着他这样写道："现在出现对党的执委会的不信任，这些人越来越离奇地疯狂躁动，党在下次大会上最好明确有力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使那些对党信任的人在几年来损害党的领导的歪曲指责面前，享有对党完全的信任……"

特鲁尔斯特拉不只谈决选问题，他在《人民报》发表了系列文章，集中火力攻击《新时代》，要求党满足他提出的要求，否则他将停止为党工作。这些文章将个人攻击置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之上。他谴责马克思主义者躲在阴暗角落里用不正当的手段攻击他，以此动摇瓦解党组织。

特鲁尔斯特拉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

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党的执行委员会由全党选举产生，马克思主义派委员（戈尔特、怀恩科普、门德尔斯、洛普伊特以及后来当选的维博）占据多数。这届党的执委会受“教条”影响太深，没有得到议会党团主席的青睐。当执委会成为他的行动障碍时，这位自称十分信任党的神圣的执委会的议会党团主席组织了一场反对诋毁党的执委会的运动。

特鲁尔斯特拉建议党的执委会推动依赖社会民主党立足的新自由派政府加快改革，“起草立即能够实现目标和要求政府立即予以实施的纲领”，并为此发动了一场实现目标的运动。

范德格斯以“新时代”小组的名义对特鲁尔斯特拉的鲁莽攻击进行了回应，两人同时要求党的执委会对特鲁尔斯特拉的攻击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特鲁尔斯特拉的谴责没有任何根据，报告得出了对马克思主义者有利的结论。特鲁尔斯特拉称它为毫无价值的报告。

新政府把上届政府遗留的**劳动合同法草案**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改革”的第一步纳入工作日程。党和工会一致同意开展一场强有力的反对运动，因为该草案使罢工权利的行使越来越困难。这个决定使党的议员非常不快，他们认为草案在作了调整后并不那么糟糕。沙培尔讥讽地表示：“悲伤地看到在劳动法草案问题上党内舆论正在逐步形成和固定。”需要强调的是该法律生效后，**一系列事件证明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是正确的**。当时工会展开了强大的反对运动，而资本家则竭力希望实施法律。当时与沙培尔持有同样观点的特鲁尔斯特拉于 1906 年 3 月 9 日在议会发表讲话称：“新法律颁布后，更希望看到局势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资产阶级议员的质询，他否认工会领导的这场运动得到党的

支持。党的执委会非常吃惊地得知他发表这样的言论，因为直到1905年5月31日他一直是党的执委会委员，1905年10月中旬至1906年1月间他是党在议会的代表，他从未声明要发表与自己党的执委会和党的意见不同的言论。特鲁尔斯特拉于1906年3月15日在《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坏榜样》的文章，批驳党的执委会鲁莽行事，表示“希望党的组织和领导能从这场走向死胡同的运动中总结经验，找出党的执委会和议会党团发生分歧的原因”。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们可以在下一节的结尾部分看到。

特鲁尔斯特拉抓住阿姆斯特丹建筑工人举行罢工的另一次机会攻击党的执委会。在1905年10月3日的《人民报》上，他批评党的执委会犯下重大错误，“严重忽视”罢工，党的执委会对这种莫须有的指责予以严厉驳斥。

《党的领导班子》小册子

为给这场运动冠名，特鲁尔斯特拉在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了一本长达150页的名为《党的领导班子》小册子，书名[①]表明了作者的写作动机。书的第一部分以“围绕党的领导班子的斗争”为小标题，列举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土地问题、教育问题、铁路工人罢工问题。他在土地问题最后一段明确突出了个人问题：

> “使其（党的领袖）远离领导职位，不让他在党内和公众面前露面，让别人替代他，对党或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策略。
>
> 我此刻感觉有人不希望看到我担任总编一职，后面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看

① “领导班子”一词的荷兰语原文为“leiding”，其动词原形为“leiden”，意思是一个领袖或舵手率领的活跃的领导班子。——法文版译者注

法是正确的。”①

我们认为这不是有助于广大党员独立地作出决定的必要的观点交锋，而是个人或小集团之间为争夺党内领导权开展的斗争——绝对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世界观，即在被操纵者和操纵者的对弈中只能选择合适的操纵者。

“我不用吹灰之力就能证明《新时代》小组在最关键的时刻通过对我不负责任的攻击阻止我进入党的领导班子。

孩子们都能理解当相同的事情发生后，这种事情在未来还会重复发生，我宁愿放弃我的职位……

任何人在无法预测别人将如何审判自己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失去对工作的趣味……”②

为此，使舆论分辩真相的批评应该停止，因为这将使“领导”失去工作趣味，工人运动将失去靠山。

他不仅表明《新时代》小组的批评使他失去了为党工作的兴趣，同时还指责小组的精心策划使他远离领导职务。小册子中很大一部分描写《新时代》小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密谋撤销他总编一职。这种晦暗的描述刻画了特鲁尔斯特拉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的特征。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是教条主义和空论主义：

“狭隘的空论主义至今还在疯狂地影响德国的党，使党内生活无法开展……”③

---

① 《党的领导班子》第22页。
② 《党的领导班子》第9页。
③ 《党的领导班子》第8页。

他不停地用工人的“自然情感”反对空论主义，嘲笑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维护者是世界上最孤立的教条主义者。他这样描写海牙代表大会上关于决选策略的争论：

“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最不愉快的印象是这种精神（教条主义）占据上风，在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政治态度的讨论中，他们实在太离谱了，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在省的选举中，在没有我们候选人的地方，**自然**要支持自由党反对克伊波，潘涅库克对党中央提出的批评是不诚实的，因为这一点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桑内斯和其他人企图将自己的决选策略强加于人，拒绝考虑社会主义工人反对克伊波这一最基本的情感。门德尔斯受到与教条主义政策保持一致的压力，在发言中多次变更阵线，引起哗然。这里是现实政治，谁尊重事实谁就有发言权。结论是根据幼稚的阶级斗争理论事先作出的，而不是事后汇总所有的情况后得出来的。”①

特鲁尔斯特拉这里指的是他维护的适合国情的非教条的社会主义，他在后面的段落里这样写道：

“工人党应该明确表明争论的主要观点：**以什么方式领导党**。小小荷兰的经济结构和其宗教无法向工人政治运动提供有利条件，而你们却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和极端的革命理想出发，想要与工业国家看齐，党能否从实际出发？或者党能否愿意在类似荷兰国情的国家开展一场工人运动：为何不能少一点理想主义，为何不考虑工人群众的宗教信仰，为何要无视工人阶级的社会团体，为何不好好利用资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矛盾？② 或是党不情愿看到我们的国情完全不符合理论和教科书，要强行推动③一场人为的社会主义运动，采用一种外国的语

---

① 《党的领导班子》第 81 页。

② 粗体为编者所标。

③ 我们译为“强行推动”（pousser）的词在原荷兰文本中为“drijven”，意思为驱赶牲畜。————法文版译者注

调、思想和策略，使党降格为一个由傲慢的作家、演说家组成的宣传俱乐部？党是在工人阶级梦中徘徊还是深入其中，党从一开始就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国会和市镇议会中践行了这一点，党是否应该走在人民的前面？

我相信党内绝大部分人在这些问题上与我的想法一致。但愿他们能够表达出来！他们应该毫无顾忌地说出荷兰参加阶级斗争的有觉悟的劳动者想说的话，尽早拒绝教条主义的冒险。"①

他们向党内群众发出劝告的意思没有被误读，那些没有受到良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者策略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能力让这些策略的维护者闭嘴。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会议听从了这个策略。

特鲁尔斯特拉在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个人和庸俗的攻击后得出重组工人党的结论。他自认为代表党的议会党团，在政治实践中是党在议会的正式代表，应该加强他们在党领导班子中的地位。他对现状不满，强调如果议会党团的两名议员不能加入党的执委会（党章规定议员在党的执委会中的委员不能超过两名），他们应该有权出席党的执委会的所有会议并拥有咨询权。

"我的观点是议会党团不仅应对党的执委会的政治决定和纲领发表意见，而且还应实地和负责任地参加有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党对所有重大运动的政治领导应该由党的执委会、议会党团和机关报总编辑组成的总委员会领导，由这三个机关领导和进行运动。"②

如果特鲁尔斯特拉拥有良好的记者素养和充足的时间，机关报编辑部在这位杰出的党的领导人的个人负责下当然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如果他真的如同7月发表的文章和小册子中所说的是党的优秀政治领导

① 《党的领导班子》第96页。
② 《党的领导班子》第101页。

人，党的重组也是可以考虑的。然而他的实际想法是通过重组实施议会党团（他是党团主席）对党的专制。好在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决议没有提及此事。与马克思主义者交战的挫败加剧了他的仇恨。

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决议

特鲁尔斯特拉的小册子在大会前几个星期发表并在《人民报》上长篇转载，大会代表人手一册。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全面反驳，我们仅对其中明显的违背事实的部分予以更正。《新时代》小组成员的文章主要刊登在自己的杂志上，很少在《人民报》上发表，因此党内许多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实际观点。另外，一些事件已经过去多年，而很多人是事后加入党的，因此他们只相信小册子并认为特鲁尔斯特拉和机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牺牲品。

在这种情况下，特鲁尔斯特拉、弗利根、塔克、沙培尔非常容易让大会通过决议，驳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决议说：

> “鉴于，近些年来党内有这样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一些党员同志被另一些同志有计划地打上不坚持原则①、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标签，后者以为自己有特别的权力和责任来防止党弱化②和脱离原则；
>
> 这激起另外一方的反对，在争吵中也与对方恶语相向；
>
> 党的团结因此必然面临危险；
>
>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对于这种滥用在我们党内不受任何质疑的批评

① 译文中的“不坚持原则”一词在原荷兰文本中为“beginselzwakhied”，确切的意思是“原则的削弱”。——法文版译者注

② “弱化”一词在原荷兰文本中为“verwatering”，意为“稀释”。——法文版译者注

自由的做法表示遗憾；

大会责成党员同志把这样的批评保持在尊重其他党员同志的尊严和维护党的团结的限度内。”

大会决议第一段明确点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无法绕开的词汇，而现在成为每次与论战前他们敲打马克思主义者的利器。

这就是决议中的这段话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

与对革命阶级使用的暴力一样，这里采用的也是暴力，它激起了新的反抗。反抗者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武器，创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机关报《论坛报》，以此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三、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之后

党的新策略

大会之后，类似尖刀的乌得勒支决议完全被作为武器使用了。

特鲁尔斯特拉会后马上在《人民报》上写道：“如果戈尔特愿意冒着危险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乌得勒支决议中的尖锐批评将被撤销。”

几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许诺与中央机关报保持正常的合作关系。该报编辑部已经改为集体领导，总编辑由特鲁尔斯特拉推荐（1906 年圣诞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讲话中）的一位在国外知名度很高并且个性很强的“纯修正主义血统”的弗利根担任。与他第一次接触后，所有的合作者都弃他而去。

当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表达自己对法国极左的社会主义的看法时，弗利根立即表示这种看法没有任何价值，是被事前的舆论遮住了双

眼，她立即表示不再与其合作。

党的理论和实践先驱范德格斯同志不再受宠。《人民报》连篇累牍地赞扬民主自由派新政府起草的医疗保险草案。范德格斯没有予以好评，而是强烈抨击草案的缺点，称借用别人的生活样板突出党内的分歧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特鲁尔斯特拉反驳说：

"范德格斯称党内在此问题上有分歧，实际上是党内一小撮人对此有看法。对待这些人，不能抱有其他希望，他们只遵循那些**偏激的观点，把党置于工人感情和真实想法之外，而不是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行动**。"①

《人民报》编辑部对此也发表了看法：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试图将分歧挪到实地，这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只要对现实问题制造一种不切实际的有别于党报编辑部和'修正主义'党的舆论就可以。这种把戏过去已经玩过。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精力放在制造这种舆论上并表示为了崇高事业愿意妥协，将别人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光荣的党在实践中的分歧。

我们保证将在第一时间揭露这种行事方法。围绕每天工作十小时的讨论失败了。在此前的几次大会上，党的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成员决定反对十小时工作日"。②

乌得勒支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支持开展**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决议。作出这个决议是因为只要工人继续施加压力，就有可能**推动自由派政府进行改革的想法**。这是一个临时的向八小时工作制迈进的过渡措施。党的纲领明确规定实施八小时工作日。但为获得自由派工人团体的支持，他们故意忽视这个国际的和革命性的要求。党的中央机关报写道：

---

① 1906 年 12 月 8 日《人民报》。

② 1906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报》。

“当群众将八小时工作日的实施视为空想时，这种宣传大于实际的要求就成为**纯粹的空想**。因此，大会决定不立即提出这一要求，而是谋求从实施十小时工作日开始。”

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种做法。在1907年耶稣升天节举行的党和工会联合会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大会上，议会党团主席和编辑部粗野地称这种批评为“教条主义”和“行不通”，以致这些批评变得无足轻重被束之高阁。党内多数派试图以此推动自由派政府的改革策略与1899年吕伐登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是背道而驰的。特鲁尔斯特拉本人也曾竭力维护过这个决议：

“鉴于现行选举权旨在最大限度地阻止最广大的工人阶级投票，催生将社会改革变为幻想的政府和议会，让他们拿着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去搞军国主义，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阻挠劳动者物质条件的改善；

只要工人阶级不能通过普选和行使投票权在立法权力机构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不可能实现**；

大会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所说的借口，只要他们拒绝改善选举条件和推迟进行社会改革，**没有劳动者参与的所有社会改革只能导致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危险**。”

党对十小时工作日和医疗保险采取的新策略是违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正确决议的这一边，有责任和义务对此提出批评。请看大会决议导致的后果。

修改纲领

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之后，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党内多数派出于修改纲领的需要迅速改变策略。

多数派中间的重要人物（特鲁尔斯特拉、沙培尔、弗利根）好多次在重大问题上否定党的纲领，认为纲领采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贫困化、经济危机增长的观点等。

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修正主义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在**没有大会决议**，甚至在海牙和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上根本未谈及修改纲领的情况下，自行任命了党的纲领修改委员会。

他们依据修正主义假设的事实，提出修改党的纲领。这种做法是把党的纲领放在一个可以变动的基础上，这种做法在那个时期十分非常危险，因为参与执政的资产阶级极左派正在攻击党纲中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准确性。更有甚者的是党的执委会的做法**不民主**，首先是没有大会授权，无权进行这样重大的事情，其次是任命纲领修改委员会的方式也缺乏民主。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者和前修正主义中央机关报总编塔克自然拒绝参加这项工作。

党的执委会根本不考虑缘何这些同志以同样的方式反对这种做法，而是谴责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强加于党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集体抗拒行为**。执委会委员特鲁尔斯特拉称此为拒绝为其他党员服务，遭到攻击的同志共同起草了一份说明原因的声明。

其他被任命参加修改委员会的同志几乎都是党内的右翼，他们在哈勒姆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一份报告称，由于肩负责任重大，现在无法提出修改建议，特别是对先前纲领有意见的一些成员，他们强调不能在只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对纲领做一些词句或段落的改动，建议起草一份新纲领。这就是说要抛弃现有的纲领。

为更好地了解新纲领的精神，我们引用他们报告提到的几个观点的段落。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全新的、符合伯恩施坦对爱尔福特纲领提出的批评的纲领。

报告称党纲没有足够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的无产阶级行动中出

现的有利于无产者的倾向。报告没有重视失业增加的现象。在经济危机方面，纲领没有足够重视通过组织托拉斯生产减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等。尽管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在世界各地尚未形成一致，但纲领中关于农工企业集中生产的方案是错误。

关于财富转移的方向，纲领对劳动工具日益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的强调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说明财产所有者的人数在减少。报告没有表现出征用（通过抵押手段）和强大资本已经进入现在还能维持的小企业生产领域。无产者贫困增加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只能说无产者生活水平相对降低。

纲领中描写的经济发展历史过程非常混乱，没有区分野蛮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行动催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反对力量。

另外，纲领中有许多站不住脚的夸张表述，如上面提到的劳动工具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和一个“一无所有”和“完全”依靠有产阶级的阶级……

纲领关于中产阶级衰弱的提法过于一致，没有重视出现的新中产阶级，没有提及农业形势。

纲领称尽管物质利益决定阶级斗争派别的立场，但仍有许多人站在个人和阶级利益对立面的劳动者一边……

纲领表述了支持马克思政治经济体系的愿望，但拒绝接受其哲学思想。

最后，修改委员会中小部分人声明他们已经达到可以作出结论的地步，而他们对纲领中涉及的许多思想潮流还未搞清楚，尽管他们力求准确地分析并作出合理的结论。

考虑到个别或不少党员对当前纲领的批评，修改委员会认为提出的修改建议不能只是对纲领中的一些表述进行调整，并确认在下次大会召开前不可能完成提出修改建议的工作。

哈勒姆代表大会确认了党的执委会提出的决议，不少马克思主义者

也参加了修改委员会工作。修改委员会此后没有更多发声。只是当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要求继续进行这方面工作时，特鲁尔斯特拉表示说最好等等看党内危机的发展动向，危机后党的重组将取决于大会通过的是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还是妥协的纲领。

> “纲领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或两派之间妥协的产物。三个方案中究竟哪个胜出取决于党的结构、意图和倾向。只有当党决定接纳两派时，妥协纲领才是不可绕开的。如果这一方案不成功，正统的马克思者脱离党，党内必将开展一场反对他们的斗争，纲领也因此必须为所谓的修正主义或改革势力与他们斗争提供理论武器。”

根据特鲁尔斯特拉的观点，政党的组成不是在一个共同承认的基本思想上，而是应该先组成政党，随后看看哪种观点在党内全部或部分占据上风。

1907 年的哈勒姆代表大会

哈勒姆代表大会是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被捆绑着双手参加这场斗争的。党内失败者的地位对其极为不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被从反面阐释。在两派的斗争中，由于被禁止采取进攻策略，他们只能实施消极反抗。由于被视为党内的破坏力量，他们不再愿意参加执委会，不愿意与对手开展辩论，因为对方总是以下面的论据将其击败：“你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你们在党内都无法成功地为自己辩护。”马克思主义者的消极态度被修正主义者利用，多数党员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纪律，将自己失败的怨气撒向别人。

乌得勒支代表大会期间，两派迈出了走向分裂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清楚地说明两派之间的对立，许多支部邀请自己的演说家举行

报告会和讨论会，同时禁止他们就分歧说三道四！潘涅库克撰写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原则》的小册子在几个星期内销售一空，表明了党内分歧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党的执委会谴责它破坏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决议。虽然党内舆论对分歧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党员对无休止的争吵日益反感。

修正主义头目到处散布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这场论战的始作俑者，挑动人们对其的仇恨。我们已经领教过他们如何利用我们拒绝参加修改纲领的手段。1906 年当《人民报》送报人开展罢工时，特鲁尔斯特拉又一次利用这次事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称他们是这次罢工的幕后黑手，指责他们违反纪律的做法给这些穷鬼提供了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恶劣榜样。

在这种情况下，哈勒姆代表大会不可能达成妥协。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保持批评自由权利、避免恶语攻击的决议，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受挫。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决议也有过同样的表述。这些决议成为悬在反对中央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党内群众认为策略的分歧没有那么重要，不可调和意见之间的故意挑衅是导致分歧的真正原因。

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及时反对特鲁尔斯特拉在党内散发的小册子，这种做法再次酿成大错。如果利用好这次机会，可以很好地揭露特鲁尔斯特拉制造分裂的恶劣做法，因为小册子只有在大会讨论期间才被允许散发。范德格斯同志撰写了《党的坏领导》一文予以反击，但在大会召开前夕没有发表。文章细数特鲁尔斯特拉那些无端的指责和前后矛盾的策略。范德格斯同志在大会期间听从了劝告，未将小册子散发，只发给了参加讨论的 50 多位同志。特鲁尔斯特拉的做法违背党的民主原则，开创了社会主义国际史上的先例，范德格斯采取这种做法旨在避免党的分裂。党内同志希望论战尽快结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意被视为争吵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伤害了已经支离破

碎的党内民主，虽然出发点是善良的。

大会赞同党的执委会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成立修改纲领委员会。修改纲领一事未经过必要的严肃讨论。大会仅是见证了修正主义者的提名，他们也没有特别介绍自己的观点。

政治形势

自哈勒姆代表大会遭遇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分裂，党的多数派更加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缺乏多数派支持的衰弱的自由派政府只能依靠社会民主党和各种自由派政党的支持得以维持生存，除劳动合同法外，改革一事无成。参议院占据多数的教权派想方设法要将其取而代之。而自由派希望在省选举中（参议员在省议员中选举产生）战胜教权派党，所有派别都在为此协调立场。社会民主党应该怎么办？哈勒姆代表大会让党的各个支部委员会自己决定决选策略。《人民报》和党的各个支部委员会首先表示支持自由派采取进攻策略，但在自由派在首轮选举中遭遇耻辱的失败后，他们马上改变策略。在随后举行的市镇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选民又再次支持自由派反对教权派。

1907 年秋，自由派政府最终抛出**宪法修改**草案。原来自由派曾许诺要**扫清走向普选道路的障碍**[①]。但自由派政府在履行这个承诺时，却

---

① 1896 年生效的法律予以那些不直接纳税但通过特定测验的人、拥有存款的人和收入以及房租收入达到一定数目的人选举权。根据不同情况，每个人还必须履行一些必要的手续后才能注册成为选民。法律根据因市镇的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收入和房租标准，排斥大城市绝大多数工人的选举权，农村则实行普选。社会党的 6 名议员除 1 名在大部分由工人居住的收入相对高的阿姆斯特丹第三选区当选外，都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恩斯赫特、弗拉讷克、西斯泰林韦弗、阿平厄丹、霍赫赞德都属于北部农业区。

开出了设法阻止普选的药方。这个“白处方”草案没有任何关于选举权的规定，选举法草案加剧而不是缓和业已严重的局势。

在议会一读讨论法案时，特鲁尔斯特拉发表重要讲话，他非但没有指责这个无益的决议，反而保证向已经启动的改革提供支持。他说这个草案可以成为各个不同党派探讨的基础，可以取代教权派和反教权派之间的人为对抗和保守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对立。但两年来议会的政治实践足以表明所谓的民主派与保守派一样，很少关心工人阶级利益，根本没有准备将普选作为工作重心。在强调教权派主义的危险后，特鲁尔斯特拉指出：

“我们应该提出一个与保守派和民主派的论点相反的论点……应该向所有试图把政治斗争放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基础上——即今天占据政治重心的社会问题——的人致敬。”

关于社会民主党该怎么办？他说：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总是把问题与谁将担任部长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为重大目标奋斗的各党将被形势推动站在一起，而不是分道扬镳，它们会在重大事情上相互支持。如果展开与保守派和民主派的斗争，我不相信社会民主工党将对执行至今的策略作任何改变。”

他说现在政治斗争进入了死胡同，这是政治基础薄弱造成的。普选权和为争取普选权进行的斗争是解开死结的关键。

如何看待“白处方”？他说：

“我本人希望它在政府内获得通过，因为草案已经提交，最好的做法是通过相互合作让它获得通过。当然我这样的立场是难以面对工人的。最好能把运动引向政府决议的方向，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白处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既想取悦普选权的支持者，又不想得罪其反对者。实实在在地说，自由派人

士罗德黑岑称草案的动机为‘白处方’是本世纪最优秀的发明。我们拒绝将它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真正目标……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对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态度暧昧，只关注党内情况……这种态度破坏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如果‘白处方’决议未获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将开展一场更加浩大和激烈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

其讲话的策略是建立在“民主派”希望举行真正的普选的乌托邦空想上，是希望与民主派接近以组成一个实现改革的“民主”集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危害国家的策略。这种态度在1906年年底议会一次军费预算的表决中已被证实，他曾宣称与其投票反对预算，不如逃避表决以挽救国防部长。

1907年年底，自由派政府被推翻。这届无能而可怜的政府的经历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他们从未对这届政府抱有任何希望，坚持反对吕伐登代表大会通过的相信这届政府在**选举权改革实施前**会采取部分重要改革的决议。

四、《论坛报》

《论坛报》的问世

自从马克思主义者在哈勒姆代表大会经历第二次挫败后，参与日常论战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日益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组织，就日常发生的事件向工人进行原则宣传，正确教导人们认识日益被工党背叛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采取这个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人民报》完全陷入修正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误导舆论。例如1906年和1907年期间，它对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抱有很大希望。《人民报》和特鲁尔斯特拉将1907年德意志帝国的选举斗争视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称该党在德累斯顿代表

大会后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没有团结非无产阶级力量。

主办《论坛报》的同志完全不赞同上面的意见，他们与大部分德国人对选举的看法相同，认为传播《人民报》的观点是有害无益的。荷兰对国际问题采取的立场和工人运动的软弱是其经济形势和历史发展造成的，荷兰无产阶级比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需要邻国，特别是德国工人兄弟的帮助。能够自由地、毫无阻力地宣传国际①的这一策略有助于荷兰工人阶级的解放。哈勒姆代表大会后，在《人民报》自由地发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阻力很大，创办《论坛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论坛报》在创建之初确立了以下主要目标：（1）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在普选权和社会立法问题上的骗人手法；（2）向工人宣传各国工人的形势和斗争，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代芬特尔代表大会决议不允许在党内采取这种做法，但《论坛报》的创办实际上是《新时代》的延续，也符合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

创刊之初，《论坛报》受到《人民报》和党内大部分人的反对。这种态度与对待几年前几个人创办的《欢乐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那是一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宗旨是介绍社会主义核心的道德情感和教义，而非宣传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人民报》从未对这份党内的极右刊物说三道四。②

1908 年年初，在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同志撰写了几篇文章后，围绕《论坛报》的斗争拉开序幕。她在文章中谈到国际形势，认为作

---

① 指第二国际。——编者注

② 发行社会主义报刊从未需要得到党的直接审查，社会民主工党内至今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在乌得勒支代表大会上，人们试图将《新时代》改为由大会任命编辑的党的机关报，但遭到期刊编辑的断然拒绝。多数派的头目多次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特鲁尔斯特拉和弗利根还分别在《运动》和《当代》期刊上谩骂马克思主义者。

为全球危机后果的工人革命力量开始上升，展望荷兰工人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加有力的活动阶段和阶级觉悟阶段。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党的一系列会议上，她再次强调这一思想。《人民报》在论战中指责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写道：

> “所有在《论坛报》上撰文的人中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夫人最出格，她称党受到反社会主义力量的侵蚀，我们坚持认为她与科内利森（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两样，她在一系列会议上所持的立场是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必然导致的结果，她企图逃避对她的指责是徒劳的。”

此前，在她表示支持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的观点时，多数派领袖已经批评她走向无政府主义。我们仅以此表明《人民报》对待《论坛报》的观点所持的态度。

1908 年阿纳姆代表大会

在上述情况下，《论坛报》成为阿纳姆代表大会关注的重点。马克思主义者提议用集体编辑部取代现在的《人民报》总编制。《人民报》强烈反对，称此为“党的自杀行为”。这样，围绕编辑部和党的总策略开展讨论是不可能的。大会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对待《论坛报》的态度上，出席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只了解《人民报》发表的类似对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夫人等的一些只言片语和看法。党的执委会（特鲁尔斯特拉因病请假几个月）对禁止《论坛报》发行的决议进行了辩论，但大会决定推迟执行。

阿纳姆代表大会表明党内多数派由越来越多地持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组成，他们不太了解党的性质和纲领。这导致维博会后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温和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文章这样写道：

“第 14 次代表大会没有给出近年来党需要的明确目标。我这里指的是城市和农村特别是农村同志的信仰问题，党内对未来工人运动发展的宣传与策略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许多同志继续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我们的报纸加强对党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宣传，加强在公共机关的代表的严厉监督，保证我们的宣传与阶级斗争性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者担心工会运动只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目标服务，认为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党的爱，而是想破坏它。而那些善良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我们的党完美无缺……

我们不想批评投票结果（选举《人民报》编辑）……但要指责**这种选举方式违背党内民主**。

大会领导……没有意识到荷兰党内的多数派**不是社会主义国际的多数派**，没有从社会主义政党是由多数派和少数派共同组成的立场出发，他们对少数派的错误看法与本次大会的之前的领导毫无二致……

编辑部领导和大会领导将《人民报》6 篇引起混乱的文章归为弗利根个人犯下的错误：认为少数派的意见是针对党的，不是社会主义观点。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民主原则**，事先预设少数派不可能成长壮大。”

在谈到党员缺乏社会主义觉悟时，维博写道：

“我们不赞成工人运动的壮大仅以数字为证。社会主义教育应有自己的地位，不应被置于其他活动之下。正在成为一个伟大的党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重视教育，就会缺乏战斗力；为了党的发展壮大，党员必须是了解且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二天的会议证明了这个事实。大会表示无力讨论霍尔支部提出的**维护工厂已婚妇女劳动权利**问题。我们承认推迟讨论有充足的理由，但错误的是没有确定推迟讨论的期限。企图掩盖这个事件的意义是自欺欺人，表明党内大部分同志根本不了解党的纲领。党的纲领在 13 年前就明确要求解决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之一的妇女工作权利问题。现在一个基层支部提出这个建议却遭到大会拒绝。大会的意见表明同志们根本不了解党纲中意义重大的原则。这难道只是个别支

部的意见吗？党的领导层可以对此另有考虑，但需要确定一个讨论日期。这里无需借住范科尔的说法，党内很多同志都认为纲领确定的目标是一纸空文。”

维博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人民报》和其他地方党报没有对不断加入党内的半无产者和工人进行党纲和党的世界观教育。我们甚至认为地方党的报刊也是如此——在阿纳姆代表大会前后，出现一种随意将那些坚持宣传党纲原则的省报社会主义编辑解职的倾向。阿纳姆代表大会后不久，鹿特丹机关报多数派领袖（同时任党的执委会委员）发动了一场重大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编辑的运动并宣布将他们解职。其他机关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上面提及的关于阿纳姆代表大会的文章有充分的权利揭露此次大会前后违反民主原则的事件。

阿纳姆代表大会后的第二年夏天，再次发生了令人吃惊的阿姆斯特丹事件。

经过长时间深入的讨论，阿姆斯特丹党支部以多数票通过决议，称《人民报》宣传无力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缺乏社会主义斗争特点和觉悟所致。《人民报》视自己为首都报刊，受到除阿姆斯特丹外党内多数同志的支持，对他们的决议不屑一顾。

经济危机

《人民报》和议会党团将1907年秋天以来荷兰工人阶级经历的经济危机视做贫困化潮流的态度使《论坛报》不得不再次对其展开批评。下面详细介绍一下两个不同派别对危机的看法，以更好地了解修正主义和《论坛报》之间的对立。

1908年秋特鲁尔斯特拉在议会质询时发表的讲话称，《论坛报》的

一些观点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没有回应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主要批评。特鲁尔斯特拉抨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继续追求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抽象理论的论证，工人们将加速进入贫困化”。他将“革命贫困化的理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同时他将“灾难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瞬间爆炸将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还表明：“资本主义自身可以变为社会主义。”他引用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说：

“强大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本身将社会引向社会主义方向。”

他拒绝经济危机的阶段性，称不是阶段性导致工人进行抵抗：“危机本身对工人形成的威胁足以推动他们反抗这个制度。”

《论坛报》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对这种有害无益的引起混乱的言论进行了驳斥，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特鲁尔斯特拉这位质询者在持续几天的三场质询辩论中成为社会两个阶级关注的中心。无论是今年冬天做得非常棒的‘私人慈善救援计划’部长，还是使用科学推理的教授议员特勒布——他的德国教授同行将十分惊讶地聆听他维护时过境迁思想的讲话，在此问题上都无法拥有特鲁尔斯特拉讲话的分量。特鲁尔斯特拉为支持自己的讲话，使用了难以得到的数据来描述荷兰严重的失业情况，他的第一次讲话堪称完美，并且他圆满完成了第二次质询任务，浅薄的部长 TH. 海姆斯凯克几次无言以对。作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他在关于失业的辩论中应该表达更多的意见。

人们早已知道且事实已经证明：质询不会产生直接影响，而这次质询确实没有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被问及当前失业问题时，通过讲话和辩论——质询不能空洞无物，他不仅要向在危机中受到剥削的无产阶级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不

愿向其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指明出路。十几年来，无产阶级借助于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已经知道路在何方。让工人了解并不再对我们的理论持有怀疑，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和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的事业：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指出解决失业的唯一出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而不是在其制度内；避免失业的唯一政策和实际做法是让工人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这一理论将取得比特鲁尔斯特拉的质询更为重要的实际成效：增强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意识。

社会民主党务实的政治家应该懂得、认识和捍卫这一理论。这可能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过高标准，当然工人阶级不会降低对自己领袖的要求。工人阶级有时可能比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些理论。工人能够很快从自己生活中得出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应该首先从这个理论中学习的东西，尽管特鲁尔斯特拉还没来得及谈到两个阶级的经济鸿沟日益加剧的理论。

如果对此一无所知，又没有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怎能得知社会主义是由工人自身努力实现的？还有一种可能即阶级鸿沟不再加剧，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信念，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必然，只是希望而已。工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反正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信仰和希望愚弄，教堂可以继续让他们相信天堂更加美好，勇敢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寄希望于形势近期有所改善。然而正是亲身经历和见证阶级经济鸿沟加剧和聆听了社会民主党坚持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后，我们坚定了科学信念，工人阶级必须作出或者自己消亡或者消灭对手的抉择。社会民主党坚信工人阶级选择消灭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并将此传达给了工人阶级。我们已经作出了抉择。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努力工作，不再为已经存在的并“可能”缩小的鸿沟建造桥梁，而是面对不断扩大的鸿沟承认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征服和改造资本主义。我们应该使用所有的材料、数据、演说才华和热情让工人们知道只有‘一种可能’，将他们尽快引导到组织和斗争的道路上。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沙培尔在《人民报》上曾经作了很好的论述，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社会主义理论，特鲁尔斯特拉在议会中没能做到……

我们承认特鲁尔斯特拉击败了海姆斯凯克和特勒布，但他没有说服——唯一必须做到的事情——聆听他的工人相信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因为他本人没有从社会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必将到来，而是认为这只是一种可能。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内在经济必然性’还未确立。基于此，应该有意识地在农民、小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这个正确坚实的基础上引领社会主义，因为正是他们希望一系列美好和正确的东西，然而这一愿望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特鲁尔斯特拉曾经在议会叫嚣：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到达目的就行。这是一个绝望者不知如何实现目标的呼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在于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社会的发展使我们掌握了革命工具。资本主义在工厂引进的组织方法，也被我们引进到了无产阶级中间，强迫无产阶级接受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最终将导致无法生产被社会的社会主义组织机构取而代之。我们的任务，特别是在危机时刻是要向无产者指明如何使用社会演变斗争的工具。

特鲁尔斯特拉在第三次发言中谈到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描述，称‘不管人们愿意与否……经济力量的作用将使人们日益贫困，社会主义由此必然到来’——我们对此不予以严厉批评。他只能作出如此解释。对那些试图弄清楚根据经济作用，人们或者无产者为何愿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们，我们建议读一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比一下，就能得知我们的领袖特鲁尔斯特拉是否具备社会主义者应有的知识：生产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机关报发表了三篇文章勾勒了这场全球危机的特点和危机产生的背景，称它不仅是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学危机，文章再次举证说明危机的阶段性并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不去问马克思怎么说，而看看现实告诉我们什么：生产周期（即生产到过剩到危机）越来越短。周期开始为 11 年：1815 年、1825 年、1836 年、1847 年都是经济危机年；接着为 10 年：1847—1857 年；然后是 9 年：1857—1866 年；接着是长时间的衰退：1873—1879 年、1882—1887 年、1871—1875 年。在

这些年中，1878—1879 年、1886—1887 年和 1894—1895 年是最差的年份，危机间隔只有 8 至 9 年。1900 年新的危机爆发，衰退时间相对较短（持续到 1902 年）。1907 年爆发的大危机影响到全球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的预言全部被证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周期越来越短，危机经历了生产从过量到疲软的转变，竞争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由初起的局部灾难变为全球性祸害。”

党的危机

对特鲁尔斯特拉态度的批评——这是向工人阶级正确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报刊应该做的，也是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简单的观察就能作出的批评——再次激起《人民报》和多数派的愤怒。多数派翻出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反对《论坛报》的决议。鹿特丹当地党的委会的几位领导成员在《人民报》结论的鼓舞下，几个月来一直在开展反对少数派的斗争，并禁止在特鲁尔斯特拉发表演说的公众大会上销售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之一《论坛报》。

这种做法前所未闻。在党的公众大会上自由散发包括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所有刊物（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个人的文章）是以往的一贯做法。

《人民报》同意鹿特丹支部领导的做法。

社会主义报刊就此展开热烈讨论，《论坛报》为了自己的生存权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

1908 年 12 月，形势受这一事件的影响变得危险起来，以修正主义者为主的党的执委会（两名马克思主义者门德尔斯和维博除外）决定采取必要的干预行动。他们邀请《论坛报》编辑介绍自己的态度并要求他们表明准备收回论战中的尖锐批评。经过几次谈判，他们发表了令党的执委会满意的声明：

“对党的机关报和党的执委会任命成员的攻击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向党的执委会保证作为优秀党员的我们和《论坛报》编辑部未来特别是在竞选期间不再攻击机关报和其他党内同志，同时希望党的执委会会阻止对我们进行不符合规定的组织和人身攻击。”

如果议会党团不介入的话，至此事件可以画上句号。然而议员同时又兼任党的执委会委员的沙培尔和弗利根不赞同党的执委会多数派的调和意见，决定辞去执委会委员一职。

在此期间，新的分歧又一次加剧和激发相互间的仇恨情绪。起因是议会党团主席特鲁尔斯特拉不同意戈尔特提到的马克思的阶级道德问题。《论坛报》以系列文章刊发了戈尔特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其中谈到与考茨基相同的阶级道德观点。

反革命派头目萨沃宁·洛曼在议会攻击戈尔特，他以惯用的手法歪曲戈尔特提出的在阶级斗争中面对敌对阶级不应遵守一般的道德的说法，说他向工人宣传对资本主义甚至在阶级斗争以外不需要服从道德命令的思想。

特鲁尔斯特拉非但没有维护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而站到反革命派的立场上。他称戈尔特的观点激怒了所有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这种论点是完全错误的，面对一个将被淹死的资本主义孩童，工人也应该实施抢救。作为文明人，我们是根据基本伦理进行斗争的：不要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尽管他最后有所收敛，但他站在洛曼反动立场一边不容否认。

戈尔特直率的讲话遭到攻击。不仅《人民报》对他的论点保持沉默，甚至有人还翻出禁止向修正主义宣传真理的乌得勒支代表大会决议，强迫马克思主义者保持沉默。每当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发生重大分歧时，这个决议总是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利器被反复使用。

议会党团的参与和两名党的执委会委员的辞职将党又一次推向危机。人们清楚地看到特鲁尔斯特拉和议会党团比执委会的多数同志表现更为激进，要求取消《论坛报》或开除其编辑。

很遗憾党的是执委会无力抗拒这股强大的潮流。它没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未能等到党的代表大会在复活节召开。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执委会组织了一次就此举行非常代表大会的全党投票。党的执委会认为举行这样的代表大会是多余的，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在议会党团和特鲁尔斯特拉的挑动下，党内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就《论坛报》问题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

五、代芬特尔代表大会

在非常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民主再次遭到践踏。党的执委会和特鲁尔斯特拉一致同意召开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和宣传工作者的会议讨论如何避免危机。《论坛报》编辑未受到邀请。他们被允许出席会议，但议会党团威胁说如果他们出席，议会党团成员将退出会场，允许他们出席的决定因此无法执行。议会党团的专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会上有人建议将马克思主义者的《论坛报》作为《人民报》每周出版一次的副刊出版，其内容与《人民报》保持一致，《论坛报》不复存在，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和维博为保持党内的团结，同意承担副刊的编辑。

《论坛报》编辑们和赞同该报观点的读者当然反对与《人民报》合并。他们认为新副刊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能够如实发表，担心党的执委会会对批评采取行动。这些年来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粗暴态度使他们不再相信这种突然发生的转变。另外，同意创办新副刊不是为了宽容对手自愿作出的让步，而是大部分党内优秀的马克思

主义者和中间派施压的结果，他们曾经威胁说如果取消批评的自由将退党和不再担任何党内职务。这种强硬的态度迫使对方不得不松动立场。修正主义者在大会上反对给予副刊编辑独立性。特鲁尔斯特拉会后撰文谈了他对副刊的想法：这是一份科学普及的刊物，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服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刊物。

《论坛报》编辑们反对决定的主要理由是接受这项建议表明自己配合了社会民主工党**又一次违反民主的做法**。这个民主原则给予所有党员批评党的领导层以及发行类似《新时代》和《欢乐世界》等私人刊物的权利。

屈服压力是自己放弃社会主义国际赋予的权利，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犯罪。

1909 年 2 月 13—14 日，在代芬特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上，党的委员会提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党创办一份周报，由罗兰-霍尔斯特和维博担任编辑。周刊将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报》的副刊发行。周刊编辑部成员在工作中保持与日报编辑部进行协商，为使周刊与《人民报》保持一致，他们同样有权在协商中对《人民报》发表意见。

2. 大会声明上述决议执行的结果是《论坛报》停刊。

3. 如果出版《论坛报》的党员同志不愿意停刊，大会声明将宣布取消他们的党员资格。”

新 党

在代芬特尔代表大会决议第二、第三段通过后，将近 400 名同志宣布退出社会民主工党。在全党投票确认了大会通过的决议后，荷兰社会

民主党（S. D. P）于3月14日宣布成立。

社会党国际局试图促进两派妥协并通过以下建议：

1. 依照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制定的有关工人运动团结的必要性的原则，在社会党国际局的调解下，最近退出社会民主工党并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重新申请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承认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政治组织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总纲领及行动，表明愿意为党的事业进行兄弟般的合作，立即承诺执行取消《论坛报》的代芬特尔代表大会决议。

2. 根据党的决议和1909年3月1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作出的关于《论坛报》编辑和《人民报》编辑部关系的决议①，下届鹿特丹代表大会——除了已被任命的两名编辑外——将在宣布被取消的刊物编辑中指定一名担任新周刊的编辑。

3. 最后，少数派在穷尽向党内机构申诉和因冲突形势之需任命仲裁委员会的办法后，在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干扰之时，在遵守党的纲领和纪律以及合理地表达意见的前提下，有权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申诉。

这个建议没有作出撤销《论坛报》停刊的决议，而且不能保证批评的自由，相反继续明显违反民主原则。社会党国际局根本不了解分裂的真正原因，认为这是个人之争，通过个人让步就能够重新合好。一个政党不会接受党外对其特定职位进行的特定任命。同样，个人问题不可能成为党的分裂与合好的动因。被开除的编辑们拒绝担任副刊编辑，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编辑比《论坛报》编辑能力差，而是新刊物创立的背景——停办《论坛报》——是对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批评的限制。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唯物主义决定我们的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原则，而不是对我们作出让步，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自由，才有可能使我们回归社会民主工党。这就是3月21日社会民主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① 这表明新周刊编辑部独立于《人民报》编辑部。

作出反对国际局建议的决议的原因，以下是该决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只有当两党都公开表示了合并的愿望时，两党合并才能实现；

鉴于在两党发表这样的声明之后，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承认在社会民主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即接受执委会的建议中臭名昭著的 b 和 c 条①；

鉴于《论坛报》从未放弃过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相反，它始终以最纯洁的语言宣传这一原则，因此，该报的三名编辑决不能作为优秀的社会民主义者被开除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鉴于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部，思想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应当不受限制、不受阻挠地得到维护；

鉴于对领导机关或受托人的原则意见和有关行为的批评并不是攻击私人名誉，社会民主党鹿特丹支部宣布在荷兰只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向往的愿望；

社会民主党鹿特丹支部向代表大会建议：授权执委会在下列条件下解散社会民主党：

第一，社会民主工党举行全体党员投票通过决议，撤销开除三名《论坛报》编辑和取缔《论坛报》的决议。

第二，社民民主工党在明确措词的决议中承认其任何党员或党员团体以各种书面的或口头的形式公开宣布体现在党纲中的原则和进行批评的自由；

大会决定授权执委会只有在国际局准备拟定并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符合本决议要求的建议，从而使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合并有可能真正建立在符合国际社会民主党利益的实现基础上时，才继续同国际局进行谈判。”

这个建议遭到社会党国际局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反对，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成为事实。

亲爱的同志们，希望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代芬特尔代表大会的

① 即代芬特尔代表大会决议第二、第三段。——编者注

决议是修正主义多数派长期以来以一系列攻击来回应马克思主义少数派对他们策略提出的批评的做法的最后谢幕。只要通过报刊能够维护我们的观点并在党内拥有一席之地，我们会继续坚持留在党内。然而决定取消我们的报纸，剥夺我们自由批评的权利，我们决不接受。

同志们，我们坚信了解真相后，你们会予以我们同情。

社会民主党

戴·J. 怀恩科普 主席

玛丽·门辛 书记

J. C. 塞东

赫·戈尔特

G. 曼努里

威·万·拉维斯泰因

后 记

在上述报告完稿之后，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试图促成荷兰社会民主党两派谈判的报告。该报告拒绝考虑所有事后调解的要求，并向所有的加入国际的政党寄送了社会党国际局拒绝接纳我党的文件。

为此，在向国外的同志介绍完党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历史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执行委员会报告的主要观点作出回应——我们不可能对报告的全部内容一一作出回应。

* * *

同志们！社会民主党没有决定破坏荷兰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只是认为两派在一个组织内的合作已无可能。导致社会民主党作出这一抉择的理由，首先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自由受到阻挠，其次是代芬特尔代表大会践踏了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的民主原则，为此我们拒绝承认它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取消马克思主义者维护党的原则的刊物和开除其编辑，只有一个原因——特鲁尔斯特拉在代芬特尔代表大会上宣称①——刊物的原则观点不符合党的原则，这种做法是违反民主的。

为此，我们非常遗憾执行委员会相信不在党内恢复民主并保证马克思主义者未来发表意见自由的决议能够恢复党内团结——尽管执行局的出发点是善良的，而且我们也对此表示赞赏。

在我们作出坚持自己建党时的立场，拒绝接受在此基础上恢复党内团结的表态后，执行委员会谴责我们，**称我们谢绝事后所有的调查，怀疑我们的良好用意，我们不得不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

首先，我们反对执行委员会关于分裂“毫无理由”的说法。

这个论点与报告的第一部分“只有国际局全体会议才有权对问题的实质作出判断”的说法并不一致。

这表明执行委员会没有开展调查，对引起分裂的原因并不清楚，它还以同样的方式要求我们服从党制定的停办刊物的纪律。发表这种言论

---

① “涉及党外的语调和言论……我承认《论坛报》在这方面表现还说得过去。《论坛报》的目标是坚持反对党过去和目前正在执行的策略。你们的主要问题是将自己置于党外。如果你们成功征服了党，党将从群众运动缩小为一个宗派团体……”

表明它对分歧目标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从未否认党原则上拥有禁止在与党员身份不符刊物的编辑部工作的权利，但反对以此阻止甚至取缔对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提出批评的做法。

我们特别要抗议下面段落中对我们的谴责。

第一段："我们明确拒绝进行事后调解的谈判，尽管社会民主工党同意按照社会民主党的要求进行，后者可能还会重复过去的历史并提出新的要求。"

这是完全不准确的。我们只有一次提出过条件，因此没有必要再提新的条件，我们从头至尾就一个要求：维护社会民主党的核心原则——民主。实际情况是：当社会民主党从国际局书记那里获悉调解的建议后，党的执委会于3月18日立即开会讨论，提出作为重返谈判的基本建议，并将结果告知国际局书记。我们在事前事后都再也没有提出过其他任何条件。

执行委员会谴责我们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同意将报告中的三点作为谈判基础，而事后在阿姆斯特丹又提出更多"难以实现"的要求。3月18日胡斯曼书记在给社会民主党的信函中表达了谴责意见：

> "你们应该记得你们组织有两位代表来到布鲁塞尔向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我们谈了和解计划，他们同意将它作为谈判基础……"

这种说法不准确。在布鲁塞尔两名代表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和解，这只是向执行委员会的一两名委员表达的个人意见，并且是在会议外和会议后。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两位同志完全根据授权介绍情况。执行委员会只对他们进行了告知，并未征求其对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的个人意见。在3月18日举行的会议上，我们已经告知胡斯曼同志信函中的表述不确切，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不应将此列为内容。

此外，关于我们第一个观点的说法不准确：坚持代芬特尔代表大会

的决议——取消《论坛报》的决议。只要能够保证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代表肯定会表示予以同意。

假设代表中的一个同志改变看法，这难道不行吗？在这期间，这位同志作了别的思考，与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在详细阅读了你们的建议后，难道不允许改变意见吗？这难道就是执行委员会可以对我们拒绝事后调解发火的理由吗？还有，就算我们全盘否定自己的意见——我们错了，难道这个形式上的错误比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罪行还严重吗？

第二个更加严重粗暴的谴责："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而且还拒绝接受伸过来的手，他们提出了事先早已知道的必然导致失败的要求……"

这是指责我们在破坏团结——完完全全错了。

我们希望团结，我们只求团结。与我们过去的同志团结，与所有觉悟的无产者团结。我们不但需要外在形式上的团结，更期望看到日益增强的内部的实实在在的团结。这种团结只有在党内给予充分的批评自由才能实现。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互为补充的严格纪律和坚不可摧的民主基础之上。自愿的非强制的纪律只有在多数派愿意自己的行动接受自由批评的前提下才能够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难以理解为何被称为"事先得知必然导致失败的要求"。我们相信所有的、包括存有分歧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派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通过维护这一原则而保持党内团结的。

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修正主义多数派通过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强迫取缔他们的刊物，否则要将他们开除出党，这种做法是对原则的粗暴践踏。

荷兰修正主义者走的是违反民主和纪律的道路，这种做法永远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团结的基础。

面对1905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社会民主党要求建立在不是表面上的完全民主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令人诧异吗？

* * *

同志们！请记住我们讲述的荷兰党内的两派斗争，并请再次阅读一遍我们提交给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承认执行委员会不可能了解两派分裂前的所有情况，这点影响了它对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所作的结论。现在你们了解了事实真相，应该理解我们对执行委员会建议所持的态度。

他们的和解建议没有撤销取缔和禁止《论坛报》的决定。这样的话，两个决定将永远成为悬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外，充分的自由批评也未被承认。社会民主工党明确要求我们的刊物必须在符合党的决议的限度内。这里指的是一直被用来攻击我们的乌得勒支决议：涉及我们对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批评，对德国和法国改良派态度的批评，对议会党团和《人民报》关于医疗保险、劳动合同和十小时工作日的批评，对道德和危机辩论的批评！谁能保证在《论坛报》被取缔和新周刊编辑部成立后，不会再出现解散编辑部或取消周刊的所谓乌得勒支决议？面对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保证。

他们的建议没有体现党内充分民主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自由。

社会民主党不追求表面的团结，团结亦无法建立在表面的基础上。过去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迫害和压制。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反对资产阶级最有效的武器，但在社会民主工党内无法宣传这个观点，我们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即在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向无产者举起这面旗帜。

团结并非是不可能的。只要社会民主工党向我们或通过社会党国际

局提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够接受的保证，我们将立即同意和解。这是我们真诚的意见和诺言。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努力将这个诺言变为现实。

如果无法实现团结，我们将毫不掩饰通过真正的斗争来实现团结。我们深知阶级斗争不光需要选票、罢工，还需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开展的认识、观念和原则方面的斗争等手段。我们不能以维护表面团结为借口逃避这种斗争，这种必要的斗争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内部至今尚欠缺的知识分子的力量。

虽然我们和平宣传马克思主义之路受到封锁，但为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我们决定采用斗争手段。

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社会主义国际拒绝接纳我们，因为我们制造了“没有正当理由的分裂”，但同时它也承认没有全面了解分裂的原因。单纯地将分裂归咎于外部因素的说法能令人信服吗？

我们非常重视接纳我们的建议遭到拒绝一事，要求在大会日程上加入我们要求加入社会党国际局的内容。为此，我们向你们国际局和社会主义国际的成员组织提出申请。

我们不要求你们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知道国际只对重大问题采取立场，不具体介入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分裂细节。我们知道自己肩负着为荷兰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重任。

我们对你们只有一个希望，不要像执行委员会那样站在社会民主工党一边反对我们，站在于我们不利的一边介入荷兰党内的两派斗争。我们仅请求你们根据我们倡导的原则和策略承认我们是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此，我们请求你们同意我们加入国际局。

我们完全相信你们作出的决定。

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

党的执行委员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国际第八次（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文献．2／
童建挺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王学东主编；25）
ISBN 978-7-5117-3418-1

Ⅰ．①第… Ⅱ．①童… Ⅲ．①第二国际－会议文献－
汇编 Ⅳ．①D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309 号

第二国际第八次（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文献．2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盛菊艳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5（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46（馆配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432 千字
印 张：33.5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ISBN 978-7-5117-3418-1

定价：200.00元（第25卷）